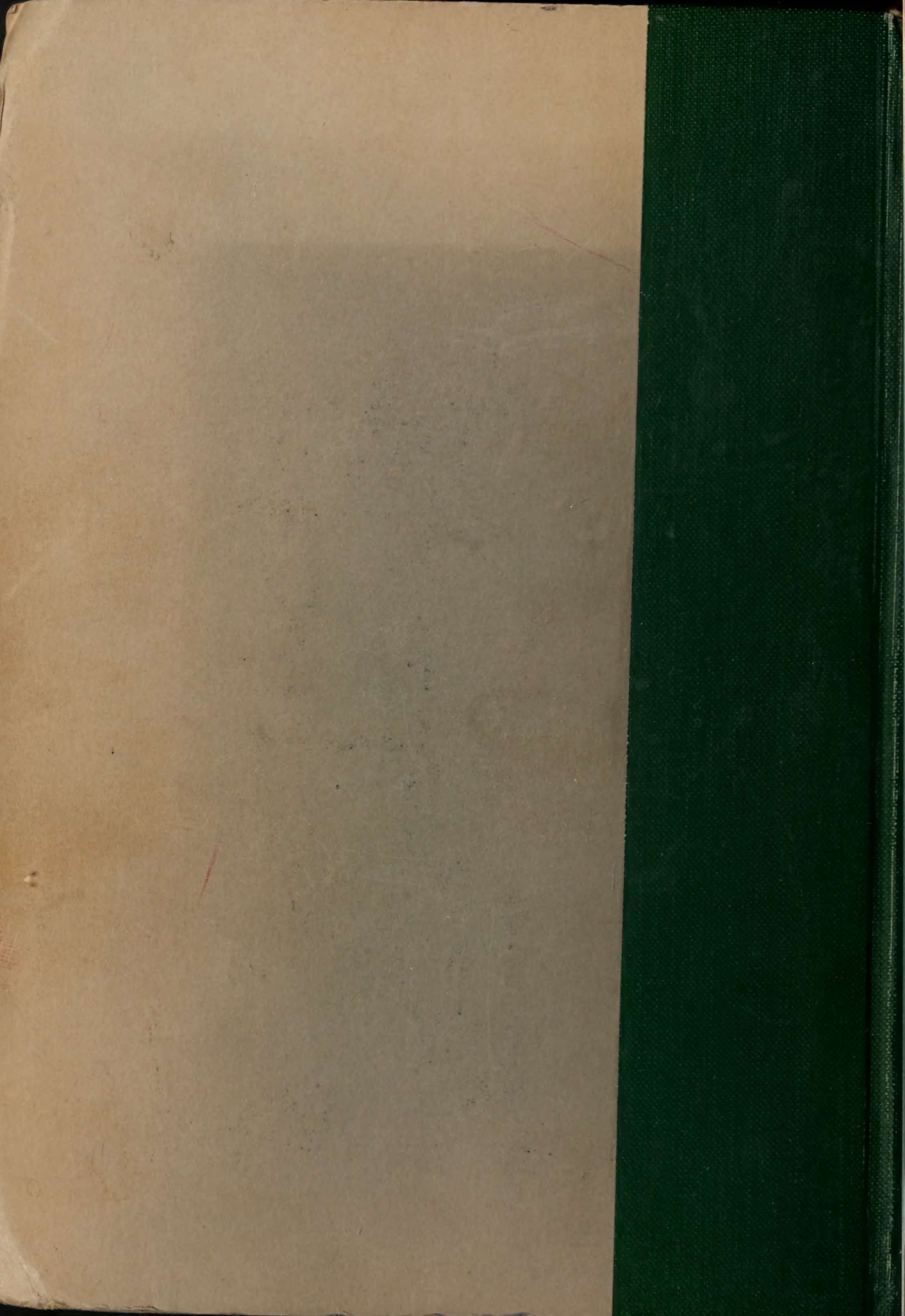




陶希聖編

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

新生命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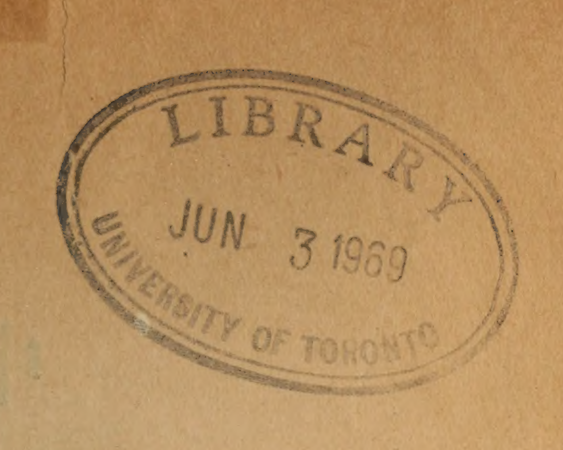


1931. 4. 16.

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

陶希聖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LIBRARY
JUN 3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目錄

第四編　知識分子及過剩人口問題

第五編　家族問題

編輯者小引

一　民國十七年秋到民國十八年現在，是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展望的時期。這個時期，一方面過去革命高潮已成過去，他方面未來革命戰鬥尚在未來，有形成理論鬥爭時期的定命。在其間，有許多刊物，定期不定期或以雜誌或以書籍而出現。若對於此其間在理論鬥爭之名之下所發表的論文，加以概略的觀察，則可分爲兩大部門。其一爲原理的爭辯，如所謂唯物或唯心或心物二元論，又如所謂革命之階級基礎以及階段轉化等說。其二爲歷史及事實的檢討。而歷史及事實的檢討，首要在認定中國社會形式爲何物。

二　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解答者意見，極爲紛歧。各種意見，以編者所目擊者爲限，已有六種：

(一)中國是封建或半封建制度之社會；

(二)中國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勢力尚存在着；

(三)中國是商人階級社會，或商業資本社會，或封建勢力支配下之初期資本主義社會；

(四)中國百年來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
(五)中國是封建政權支配下之小地主商人社會；
(六)中國是馬克斯所謂亞細亞社會之一。

此六者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爰集各種意見之論文爲本書之第一編。

三　無論中國社會是何種社會，農業經濟總是中國社會所賴以生存的一個基礎。所以農民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之一。這個問題是以資本爲中心而成立，抑或由於封建制度或封建勢力的崩壞而造成呢？這是我們要拿事實來證明的一個問題。因此，本書搜集各種意見不同的論文，列爲第二編。

四　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之二是資本問題。中國革命之前途應當是資本主義，抑應當非資本主義？這在一方面決定於革命勢力的性質即革命的階級基礎如何，他方面決定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爰集數文，列爲第三編。

五　第四編及第五編涉及知識階級、過剩人口、及家族問題，皆從中國社會形式爲何而立論。

六　由本書而可知中國之過去，及推測中國之未來。由本書而可知所謂理論鬥爭者之事實的根據何在。編者爲參加鬥爭之一人，曾以其鬥爭之文字，輯爲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及中國社會與革命二書，皆尚能流行於社會。因此編者有收集關於這次鬥爭的各家論說之光榮，並向登載各家論說的諸刊物及執筆諸先生表示無限之謝意。

陶希聖　十八、十二、十、上海

編輯者小引

第一編　社會構造及其變遷

第一章　封建半封建社會說

葉非英

一　中國之封建的勢力

中國現在的社會組織是屬於那一種形態呢？中國現在還有沒有封建的勢力呢？關於前一個問題的解答是不容易的，後一個問題的解答也有多方的意見：一些人說，中國封建的勢力在秦以前就消滅了；一些人說，中國現在還在封建制度的統治之下。這兩個解答相差得如此之遠，幷不是他們那一個對，那一個不對的問題，實在他們對於封建的認識不同了。我的意見以爲最光輝的封建時代在秦時已經結束了，自秦以迄於滿清是封建制度之最後的形態，這

個形態因外受資本帝國主義侵入的影響已在崩壞的末途中，現時中國的政治大勢就是殘餘的封建勢力之最後的掙扎與狂暴的狀態。

許多人以封建制度爲封建主對農奴的統治關係，這種關係在現時中國社會的大部分當然是不存在，而且在中國歷史上曾否普遍的存在還是疑問。但曾部分的存在過並且現在仍遺留下這個形態，這一層是可以證明的。我在廣西的山地內發現過這種關係，常存在於土人（該地漢人自稱土人）對猺人之間，此種關係占據着廣西不少的地域，同樣的形態也間或發現於土人與土人之間。此種農奴不特要爲地主服役並貢獻禮物，而且可以鞭打，讓與和買賣。就算在廣東及其他許多比較進步的地方，佃農也常須爲地主服役，除定額的地租之外，還貢獻其他禮物，不過沒有及到身體管轄的程度。

封建主對農奴的統治關係，乃是歐洲各國封建時代之特有的形態，不能限制封建時代之必非如此不可，而且細考歐洲封建時代的變遷也不限於一定形態。我現在從歷史上闡明封建制度成立的特質及其經過的形態，因而明瞭封建制度究竟是什麼？中國現在還有沒有封建的形態。

封建制度的成立許多人說是由於農業經濟的影響。是的，封建制度成爲一種明顯和穩固的制度是在農業經濟之後，有許多民族在農業經濟以前完全沒有封建制度的痕跡。但在幾個游牧的民族社會中也未嘗不可以發現封建制度之最初的形態，許多農業民族的封建組織是由遊牧時代蟬聯下來而加以新的堅強的意義的。

例如：我們近隣的蒙古民族，牠的大部分仍然是保留在畜牧經濟的，在十數年以前未曾受我們移民的影響，和蘇俄的赤化以前，完全是在畜牧經濟的形態下。他們也有王公部落和各旗、族的旗長、族長。這些王公長官都領有大塊私有的牧地，許多的家畜，他們同時又是各旗、族、盟的統治者。這一種統治的形式已脫離祭師、酋長的簡單的遊離狀態，有更深的穩固地位和意義，在社會進化史上給這個形態以地位，除了封建時代還有甚麼？

又例如阿富汗的經濟形態仍然大部分滯留在畜牧時代，但是已有較深的土地和穩固的意義。我們不能不承認阿富汗的政治制度是一種封建制度。在歐洲從十二世紀到十五世紀北方的條頓遊牧民族南下縱橫於歐洲的中部和南部，這時歐洲的中南部已在農業經濟時代，這個遊牧民族到了這裏深染了土地的意識始行定居生活，雖然牠們仍不事農業，但我們不能不承

認牠們的部落組織已有封建的氣息了。

就算在農業經濟時代的封建組織也不是一定取農奴的形式。在農業經濟的初期所謂封建主也不過是族中一個老成的祭師和戰時的指揮者。不過到了農業時代，封建制度添了堅固的基礎那是眞的了。這因爲：

1.農業有了土地的定着性，所以封建制度開始有了固定的形式。

2.在遊牧時代作戰是全族參加的，此時酋長者沒有過人的技能，就不能在族人中有名顯的地位，雖然那時也留一小部人看理家畜，但是沒有明白強固的分工作用；在農業時代的作戰，農民因受土地的牽累，勢不能隨時參加，於是一部擔任保衛農業生產的常備軍勢不能不成立了。這樣，封建的統治關係就由最初的分工形式顯現出來了。

跟着農業經濟的發展，封建制度的內容和形式也逐漸進化了。農業經濟常分：一公有公營，二公有私營，三私有私營的三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的封建主不過是一個老成的祭師和作戰的指揮者，他是全族的公僕，也是族人的敬仰者，在農業之最早的時期，他或是義務的臨時職，後來就成了由全族供養的常時的首領。

第二個時期由氏族經濟推移到家族經濟，家族的成立使封建制度有急激的發展。這時封建主有他特大的一塊私營田。公田的收穫，也由他支配管理的。他有私人的或公有而受他支配的一個比較宏大強固的家宅，這個家宅就成爲後來城堡的起源。他利用他私有的公家的特有的經濟去發展他的家族，封建家族就成爲其他家族之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保護者。

第三個時期的封建主不特有他特大的一塊私有地，而他又是其他農民的保護者，農民就不能不聽他的命令，幷於其私有的土地上貢獻租稅。這時封建的勢力就算登峯造極了。他利用他經濟的能力收羅所有文武的人才，復利用他的知識和武力去擴大他的經濟勢力，他竟可宣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濱，莫非王臣！』

這是封建制度之內在的發展，還有封建制度之外延的擴充；使封建制度不特有內力的基礎，而且有偉大的組織系統。封建制度是一套戰爭的過程，跟着戰爭的綿延，使封建勢力的內容和外形都有繼續的增大。初期的封建制度的單位不過是一氏族。氏族的戰爭，征服或合併，擴大封建的組織。於是有天子、諸侯附庸的整個的偉大的組織。所以從封建制度的外延上看起來，也可以分做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各封建氏族獨立的時代，這個時代略與農業經濟發展的第一期相對。第二個時期爲各氏族聯合而成諸侯和由各諸侯合而成天子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封建實力已移於諸侯和天子，但這些諸侯的結合不過是武力的結合，武力的平衡一破壞了，就復趨於爭戰。最後由一個強盛的諸侯戰勝了其他的諸侯，遂成爲統一的國家。中國的周朝就適合於第二個時期，秦時就適合於第三個時期。

至於歐洲這種農奴的社會是如何成立呢？這也不外乎外的和內的原因：

1. 封建勢力之外的發展。一民族壓服別個民族了，當然刼奪別民族的土地，而因當時的人口不多，不敷耕種這許多田地，就夷被壓迫民族爲農奴，使他們仍然耕種土地，而負納稅的責任。這種事情在東羅馬帝國時代算充分證明。東羅馬帝國因國勢的擴張，俘虜得許多奴隸，這些奴隸，當初被強迫來做工，但生產力很薄弱，於是改做農奴制度，一面給他一點私地，一面令他負責耕封建主的私田，這樣生產力比較相當的擴大。

2. 封建勢力之內的發展。只有家族觀念，沒有了氏族觀念；於分配耕地的時候不特要有特大的部分，而且掠奪別家族的部分作爲自己的私田；但因爲自己沒有人耕，仍不能不強迫

農民耕種，而責其納較高的租稅，這就成爲了農奴。在中國以王田的名義封建主取得了一切公田的支配權，由封建主分配給農民耕種。這種制度與農奴制度也差不了許多，不過較有道德上的意義罷了。

農奴制度在中國古代征服別民族的時候或曾經實行過的。至於農奴制度的成立基於以下的兩個條件：

一　封建主的家族利己觀念太深；

二　人口的缺少，所以不能不強迫農奴耕種。

中國民族對於天道仁義的觀念很大，所以雖或暫時曾行農奴制度，但此種制度終非道德的中國所忍爲。所以這些農奴不久就和中國農民處同一的地位幷同化了。歐洲農奴制度的崩壞，固然新的工業生產力，基督教的教義，和封建主的太殘暴，使農民逃荒及其他原因有些影響；而重大的原因是由於人口的增加，毋強迫農奴耕種的必要，不如自由佃種於農業生產力上較能增大，而此時人口增加土地缺乏，農民也不能不就條件苛虐的佃種。

明瞭了這一點就可以知道，農奴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之一種特殊的形態，不能代表封建

制度的全部。中國雖然沒有農奴制度，也不能說中國沒有封建制度。就算西洋在農奴制度以前，也不能不說東羅馬帝國是一種封建制度。法國在十六七世紀時代農奴制度已逐漸消滅，但我們不能說，路易十五時代已不是封建制度。英國從十二世紀到十八世紀圈地盛行，雖然有一個極短的時期和極狹的範圍行着農奴制度，但仍以自由的小農民爲多，這些小農民一直就墮落到佃農和勞動者的地位。所以無論那一個國家，農奴制度都未曾有過普遍的和永久的存在。

因是我歸結到封建制度的特質是什麽？封建制度是一套政治的關係，這個政治關係，是隨着戰爭而開展着的。但封建制度終有他文化上和物質上的基礎的。封建制度只能在這個基礎上創立起來。這個基礎若坍塌了，封建制度的本身也緩慢的或急激的而趨於崩壞與消滅。

在原始的共同社會中所謂知識不過是祖宗遺傳下來的一點教訓，這些教訓由年老者而傳授於全族。但是一到氏族的人口增加，勢不能時常聚會教授，而知識的聚集日多也不能人人遍而教之。於是擇人而教的一老傳一老的方法起而代之。此時老者的地位極得全族的重視，因爲老人的知識包含有生產防衛、作戰、醫藥的各種方法，此種方法都爲全族所需要的。在

家族制度成立之後，家族的利己觀念發生，於是家族傳授相承的方法發生。這時此家族處着特別的優勢，此種優勢跟着戰爭和經濟的發展而開展起來，就成就了封建的勢力。所以封建制度的基礎是存在於文化的獨占上的。跟着文化的積蠹，文化的專業就發生，而文化與普通的民衆距離日遠；在此種高文化與低文化的比較距離上就產生出統治的關係，這種關係的最初形態就成立了封建制度。

所以封建制度在畜牧時代也未嘗不可以存在的。但畜牧時代的酋長只有文化上的獨占，仍然不能建立輝煌的封建制度。到了農業時代封建制度加了兩層的保障，所以更能穩固的確立。在畜牧時代的鬥爭中常用着全部落的力量，酋長不能脫離全部落而獨立。到了農業時代生產者和保衛生產者勢不能不行分工作用，於是文化的獨占者同時握着了軍事的武力。有了這兩層的優勢，於是可以隨意欲爲了。農業經濟使生產的民衆和武力分離了，於是構成封建制度之實力的基礎。此外農業經濟使家族經濟明顯化，和給與封建政治和經濟以土地的堅固之基礎，這也是間接成就封建制度的原因。

總之封建制度是建設在文化之獨占和武力之專業這兩個文化的和物質的基礎上面的。

基於以上的觀點，若說中國在秦以後就沒有封建制度，那不能不算是錯誤了。有人說秦以後是一個統一專制的國家，其實專制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的最後一形態罷了。我們且把秦以後的專制制度（第三期的封建制度）和秦以前的第二期封建制度比較一下：

1. 第二期的封建制度是許多獨立的封建諸侯的結合組織，專制制度是統治在一個統一的君主之下。

2. 第二期的封建制度的農業是公有私營的，專制時代是私有私營的了。

3. 第二期的地方封建制度是在附庸諸侯的統治之下，專制時代的地方官吏大都是智識階級。此種知識階級固然大部出自豪門貴族和地主階級，卽使偶有不是地主貴族出身的，發達之後也就爲新的貴族或地主階級。

所以在素質上，秦以後的專制制度與周以前的封建制度，幷無何等差別，同是文化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特權階級對於無識的農業生產者的統治。不過帝皇專制制度是諸侯封建制度的進化罷了。

許多人依字面解釋封建制度以爲是封君建主的，有層次的、多頭的統治制度。其實此種

層次的多頭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之一形態罷了，牠是由分離的多頭制度進化而來的，更進一步的演化，牠當然趨於統一的統治制度了。

依史書所載，周爲天子之後，大封他的同族子弟，幷加封諸先王之後。然此諸先王之後原是獨立的諸侯，周不過加之以名義罷了。眞正的名副其實的「封而建之」的制度或反在統一專制之後，漢、晉、元、諸代都大封他的子弟功臣。然這不過專制制度下的一形態罷了。

許多人以爲封建制度是建設在井田制度上面的，不知井田制度不過是農業公有私營的方法，此種制度是由公有公營的共產村落進化而來的；因人口的增加和生產力的發展，此種制度必進化爲家族的私有私營的阡陌制度。

有人給秦以後的制度以官僚政治的名目。是的，在專制制度之下除了萬世一襲的君主之外就是官僚政治。但我們要知道，在周時也有公卿大夫元士的官吏，甚麼丞相御史尙書不過就是他的替身；甚麼知事、太守、總督就代替了附庸諸侯的地位。公卿附庸的職位雖也有變換，然比較是固定的，但此種接近於世襲的職位原先也是基於文化和武力特長而競爭來的。丞相、知事的職位雖不固定；但總不出士的階級。所謂士之子常爲士、農之子常爲農，仍然

只有極少的例外而存在於秦以後的。專制時代當然有其特有的政治形態，但封建的特質是仍然繼續存在着的。

有人說，自秦以後直至現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組織都沒有改變，是一種爲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資本主義。他的理由是，錢幣經濟、商業資本、及土地購殖的普遍化和流通化，這個斷語不能不算是太像急色兒了。

據史書所載，神農時已有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業。就算此說不可靠，周時已有錢幣經濟和商業資本是千眞萬確的。難道周時已是初期資本主義制度了嗎？從社會史上看起來，在畜牧時代和初期農業時代的共同經濟中已有交換的經濟，所以錢幣和商業幷無傷於封建制度的。

社會是進化的，後一個社會制度常保留有前一個社會制度的遺物，前一個社會制度也孕育有後一個社會制度的母胎。例如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中已包含有社會主義的生產形態，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中也定保存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難道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嗎？

購殖土地是中國極普遍的情形那是眞的，但這不能稱做土地投資。第一購殖土地的人不是資本家而是官僚；第二購殖土地的原因固然不在於經營農業，而且也不純是爲謀利，而是爲得到社會的地位，地主和紳士。這一點在日本和英國不久以前也有同樣的現象，那些新興資本家爭着購地以冀得到貴族的頭銜。有一點是封建制度和資本制度的最大分別的是：封建時代的購殖土地是一種力的關係，不是錢的關係。

一個發達的官僚，一定將他的寃孽錢廣置田地，而這些田地不全是以自由買賣手段得來的，是帶幾分強迫，而且簡直掠奪的。敝省過去的督軍陸榮廷譚浩明在他得勢的時候，他的土地占着全道的三分之一，但一失勢之後甚麼也沒有了。所以封建的地主對於土地所有權完全是力的支配，並沒有現在的家族私有財產權的穩固的經濟意義。

其實土地和資本有最大的分別性：土地是一種天然利益的獨占，資本是勞力的積纍；土地是有限制的不能增殖，因是不能像資本樣流通。所以歐美學者對於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制度仍然認爲是封建的，而資本主義者也仍然繼續的向封建土地制度進攻。其他德法日本的土地制度保留着更大的封建形態，但土地問題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中是很微弱的，

所以牠們仍不失爲資本主義的國家。

考察社會經濟的整個構造，須從大處着手。封建經濟的特點是自足經濟、貨物經濟；交換經濟，錢幣經濟不過是補助的手段。資本經濟的特點是商品經濟，爲市場而生產，因是貨幣經濟是必需的。封建經濟的關係是一種文化的武力的特權經濟，因其有文化上的和武力上的優勢，由這個優勢所以在經濟上也享有優勢。資本經濟的關係是一種自由競爭，因自由競爭得到了經濟的優勢，再由經濟的優勢而握住政治的權力。簡單的說起來封建制度是以政治來統治經濟的，有政治的實力就可得經濟的利益，沒有政治實力的經濟利益可隨時失去。資本制度是以經濟來統治政治的，資本是萬能。

基於上述的諸點，我們就不能不說，自秦以後仍然是封建制度的時代了。

這裏可以討論到，中國現在還有沒有封建制度呢？中國現在還有封建的勢力沒有呢？中國現在已經沒有整個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已趨於分裂崩壞的狀態，但封建勢力却仍磅礴在中國，從兩方面可以證明中國封建制度已趨於崩壞：

1. 從封建經濟上看起來，自從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侵入中國之後，中國農民的手工

副業已歸破壞，農業也受外國工業的影響，自足經濟已完全打破，而代以交換經濟。不過這只限於交通便利的地方，深山內地却仍保留着整個的封建經濟形態呢！

2. 從封建的政治上看起來，自滿清推倒以後封建政治之最後的形態專制統一的國家已歸於打破，而且再不能建立起來了。跟着戰爭的過程封建政治原是由小而擴大的，但封建的經濟單位却由大而小，因是這個龐大的政治組織統理這個零碎的經濟組織，又未免成不相稱的狀態了。所以在專制的國家中非有雄厚中央勢力不可，若中央的勢力稍爲薄弱就成爲羣雄割據的狀態；到羣雄的戰爭至於疲困的時候，又重新建立專制統一的國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描寫這個歷史狀態的最好語句。

中國十幾年來正是羣雄割據的戰爭局面，但因受外國資本主義和民主思想的影響，中國已創立了一點新的民主勢力，這個勢力使分崩的封建制度再不能完整起來。但這個民主勢力終竟薄弱得很，所以封建勢力仍然磅礴於中國。

封建君主原是有文化的和實力的兩個基礎，但跟着文化和武力的發展，這兩個基礎也不能不行分工作用。在歐洲教會常與諸侯分治，在中國第二封建時期也有文武的分職，文人是

繼承文化的獨占這個系統的，武人就負擔實力保衛和統治的作用。大概割據的時候武人的地位比較重要，統一的時候文人的地位比較重視。現在的軍閥，就是繼承這個武力獨占的系統的。在這個分離的狀態，武人當然成爲最高的統治者了。

中國的儒者是一脈相承的文化獨占和統治者，到現在就演化成官僚政客，所以官僚實在是繼承封建的血脈的。官僚軍閥同是利用一種特別地位來統治宰割民衆的，不過其間有分工的不同罷了。在目前這個紛爭的局面下，官僚當然要依附軍閥而存在，但軍閥沒有官僚作爪牙，也不能完成統治作用。

我用再來看看下層的地方制度有沒有封建的形態和勢力？有人說：中國地主與農民的關係近於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這不能不認爲是瞎說。我這裏且引所謂西洋封建制度的特徵於下，并附以中國的事實：

1. 農民是土地的附屬品　這原不是封建制度的普遍形態，但中國也不是毫沒有相似的事實。廣東海陸豐的佃農(又稱田僕)，因佃種的條件太苛，對地主休耕，地主因找不着別人耕種，就說不耕種也要收田租，這離農奴的狀況也并不甚遠。

2.土地所有權和統治是連帶的　這是封建制度的神髓，中國各地都普遍存在的。鄉間的農民簡直不知有軍長省長，只知有地主。地主是鄉村的統治者、保護者、團局的紳董和收糧的委員。

3.農民對地主有種義務的力役　這在我們敝省狠暴的豪紳之下的極平常的事情，中國各省也都存在着。

4.農民須向地主納種種之租稅　地主以團局的名義向農民抽稅，凡留心鄉間的人沒有不知道的，而且團局的稅比政府的稅還要多，畜稅、田稅、酒稅、蛋稅是敝省士紳的一項大收入。

5.農民往往使用地主的度量衡器、市場、磨坊烤爐等而納一定之租金　農民納租使用地主的度量衡器，而且是加大的器，是極普遍的事情。敝省團董同時是市場的管理者，設有公秤，凡用秤的須納手續費，一切買賣也都值十抽一的納於團局，地主常在山溪中築有水力磨坊，農民要用的當然要納租金。烤爐，我在廣東地方會看見過。

6.地主常有在隣近農民的田地上狩獵之權　這原屬狩獵時代的遺物，不是封建的內質。

在廣西地方，荒山、樹林和牧地都由地主占領，農民要打獵、採薪或放牧就須納租金，這是封建的主要形態。

所以中國的封建勢力是有普遍的根深蒂固的地方之基礎的，軍閥官僚的勢力從個人上看起來似乎是十分宏大，但從總體上看起來實在較廣闊的穩固的地方封建勢力渺乎其小。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實是建設在下層普遍的封建勢力上面的。軍閥、官僚、士紳就是目今封建勢力的代表，這個勢力籠蓋住全中國。我們可以說，中國現在的封建勢力不大嗎？

封建制度是一種家族制度，家族的一員得勢，就是全家族的得勢，所以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中國封建勢力充滿於中國的政治舞台。這一層也不用我來述說，大家都很明白的看到的。那一個軍閥官僚不任用他的私人，家族和親戚？甚至比較文明的革命份子也不能跳出這個歷史的束縛，把公共機關作成了家族宗祠！

這不是人的問題，是整個封建勢力的反影。基於以上的敍述，我們就可以明白中國封建勢力的深厚，磅礴和彌漫；牠是有長遠的歷史背景和穩固的基礎的，雖然這個基礎已相當動搖，但仍未到傾塌的地步。從反面說起來，中國的民主勢力還沒有代封建勢力的權能。

二 中國社會之蠡測

熊康生

一

中國社會果眞是一個謎麼？然我們還不必靠着什麼地層的標識，岩石的記錄，即據傳說的所謂有巢、燧人、包犧、神農等等，已就是很鮮明的進化階級，即開始棲息於自然的森林以後或因氣候的變遷，或由自然果實的不足，遂由森林以至平原。到得平原之後，已與森林環境不同，或許利用自然爆發的火（當然這個時期還說不上能夠用燧石或鑽木的火）以威脅爪牙蹄角是猛獸，即所謂「火獵」，藉以維持人類原始的生存。不過「火獵」雖是威脅擁有爪牙蹄角的一個的利器，究竟是太不經濟，因爲經一度燒盡之後，舉凡果實、鳥獸等要經過相當的期間，才能發育齊全，故不能不由狩獵變爲畜牧，大概就是所謂包犧氏的時代。既有了畜牧，爲着畜牧的芻糧起見，就不能不有原始粗放的園藝與農業，然而人們經過幾星霜的經驗之後，覺得農業較畜牧更爲經濟的，更爲生產的，故由畜牧進到農業，大概就是所謂神農時代。這種進化的步驟，只要是同一的自然環境，各地都是相差無幾的。

中國由神農以前的社會，可叫作原始共產社會，由神農以至唐虞之間，可叫作氏族共產社會，由虞夏以至於周，可叫作封建社會。我何以這樣分法？每一個社會的進展，就是生產技術的進展，而生產技術的進展，即依當時的生產工具以爲斷。據呂氏春秋云：「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又據越絕書云：「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據此看來，當時的生產工具，猶不能出乎自然的林木、石塊、乃至鳥獸的皮革以外。其生產物之僅能滿足原始的慾望，或至不能果腹可知，其生活集團之狹而且小可知。故認定該時爲原始共產社會。固然該時已達所謂畜牧時代，然該時的畜牧，却不能例作今日新疆蒙古的畜牧。因爲今日的新疆蒙古雖還滯在畜牧，但其比鄰的進化，已超過了他們好些世紀，他們由交換上、模擬上還可利用較進步的生產方法。自所謂神農以至唐虞之間，當然是較畜牧進步了的，然其生產工具還只能認爲新石器時代、乃至陶器時代、赤銅器時代。據越絕書云：「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這裏所謂玉的，當然就是琢磨有光的石，並不是所謂珠玉的玉。農耕上既只是石器、木器，其生產力必不大，其每一部落亦必只爲數十人乃至數百人。故史上所載「黃帝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又云「旁行天下，方

制萬里，畫野分州」的話，我絕不敢相信。其生產工具既巳粗笨如此，則其經濟領域或政治領域，必爲這個幼稚的生產技術所限制，而不能擴張。再者，黃河流域實爲中國古代的發祥地，若說黃帝以來就是所謂封建時代，然何有關於河水工程簡直沒有一點記載，眞是那些年代黃河清了，不曾氾濫過麽？當然是該時幼稚的生產技術上反映的幼稚知識，還不能及此。試看每年洪水的記錄、季候的測驗、閘隄的條築，這種工程與知識本是不容易來的。該時尙不能計及到此，足徵該時代只是不相聯屬的各個部落，決說不上什麽「監於萬國」的話。故所謂什麽金天氏、高陽氏及高辛氏等都只是氏族部落的稱號。

然則當時的氏族共產社會既屬農耕，究竟是怎樣的組織。大概就是井田制度。玆據世界經濟史比較的研究，就越發明白。夫井田是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這本是儒家所說的。但這一個制度的原起，却不在儒家宣傳的封建時代，而是氏族共產社會時代。這裏所謂私百畝的私，當然不是私有權的私，只是用益權的私，因爲民年到二十是受田，到六十却要歸田的。這裏所謂公田的，當然一井或數井必有組織者司分田受田的職務，司耕耘季節的職務(某時播種，某時收穫)，司井內婚喪祭儀的職務，司抵禦外敵的職務

（農業土著常受游牧部落的侵掠）。故「選其耆老有高德的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主持這類事務。這個公田大概就是他們的贍養。准此說來，我們收徵引外國氏族共產社會的井田制來證明中國井田制乃是發生於封建社會之前。

（一）斯拉夫人的蜜爾（Mir）制度。密爾是斯拉夫人土地共有的一種名稱，凡於土地、耕地、牧場、森林、湖沼、河川等都屬於村落所有，應人口的多寡而分配田畝。至於土地的肥瘠、交通的便否、則配置均平之後，抽籤分配。人死，則其使用地歸之於蜜爾。而這一切的公共事務及裁判，都由村落公開會議執行。這種蜜爾的痕跡，迄今在南俄查杜家（Zabruga）地方還遺留着。然到了俄國封建時代以來，蜜爾形式雖還存在，卻只成爲一個搾取租稅的機關。

（二）日耳曼人的馬克制度（Mark）。馬克村落是土地共有的。每一個村落的成員，都有使用土地的權利。所以他們的村落是一個共產體（Communitas）。其成員也叫作共有人（Gemeinar）。他們成員的權利，對於抽籤地有一定期間的使用權，對於不分割地有平等的使用收益權。其義務則爲相互扶助、共同防禦、共同耕作。至司行這些職務的，則爲村落集會，

(Markversammlung)的馬克代表者(Markvorsteher)與軍司令官等，這爲日耳曼的馬克制度。

類似這種的甚多，如祕魯的馬加(Marca)，日本古時的「村」，都同中國古代的井田一樣，然而是在那封建社會以前的一個階段。這種變遷的經過，中國史上固無由推測，因爲毫沒有什麽記載，或許是儒家淹滅了證據的。然據德國的經濟史看來，居住萊因河、易北河兩岸的幾個氏族爲佛立正(Friesen)、沙克生(Sachsen)、雅列曼連(Alemannen)、秋林格(Thuringer)、拜崙(Bayern)、巴肯特(Burgunder)、佛蘭克(Tranpen)等，都是行的馬克制度。然而該氏族中的佛蘭克族終於併吞各氏族的土地，逕自成爲佛蘭克王國，而使馬克完全變形變質，失却原來的意義。故在佛蘭克王國的支配之下，馬克的名義從還存在，而已成爲對封建主供給賦役的機關了。本來這種變遷，乃是最容易推測的。譬之井田制中有所謂父老或里正的，他們在生產力比較不發達的時代，雖然一則有最豐富的經驗(父老)，一則有最精練的體力(里正)，可以組織並扞衛一井乃至數井的事務，然而還屬生產的一員，迄沒有離開生產範圍的，卽未曾與實際工作分離。迨農耕法比較進步(或爲三田法，或爲燒田法)，而井內的事務當亦比較複雜，於是所謂組織者並扞衛者的父老與里正，卽不能不從實際工作脫離，而專

司組織與扞衛的事務；這樣，就漸漸有了身分的萌芽或階級的雛形。父老以其最富的經驗，自爲氏內所尊崇。這或者就是後來祖先教的起源。也許是羲氏、和氏、祝史、儒教的先導。（關於儒教的發生，愚意以爲同西洋的僧侶一樣。不過西洋的僧侶儼然一時還有以教權支配政權的，即羅馬教皇是。而中國的儒教始終只作了支配者的裝飾品，究竟不知是何原故？或者是這一個原因，即西洋的僧侶他是有經濟基礎的，如教會的領地、教會的什一稅是。中國的儒教完全是寄生，此其一；再中國的支配者也特地聰明，他本身是以天子的資格，教權政權都握在一起，故儒教已失了一個大憑籍。再如春秋時的衛君因遭權臣甯氏的排斥，都還說「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可見中國的支配者特地聰明也就是儒教只是一個裝飾品的由來。不過儒教階級的倫理說得很好，很合支配者的口胃，故在停滯的中國社會上，亘數千年都顯其大作用，即在今日都還明定孔子紀念週，儒教亦可不朽，亦可算是無冠的帝王！）至里正差不多就是軍事司令官，平時還不大顯其作用，一遇着對外戰爭（或是爭着土地、或是抵禦游牧部落），其權力就會擴大無限。平時都是平等的成員，戰時得都以軍法部署。這種權力或者用之於戰時的，到平時都還久假不歸，里正的權力於是日益擴大。尤其里正開始本是一

井或數井選舉的，久之則以其家屬受有特別的訓練而致成爲世襲，遂致大事併吞各家土地，使平等的成員都爲其家屬，使公有的土地都爲其私有，遂是形成了封建的局勢。

如果這種的推論不錯，那末，我們就可推定虞夏是氏族共產社會的終局，是封建社會的開始，茲更舉出數種證據，以證明這說就是比較合理的。據越絕書云：「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據此看來，虞夏時期已能廣用銅器，這自較前的新石器時代自爲進步，因有這個進步，故其經濟領域與政治領才比較擴大，才能說得上河水工程，也才可感覺得有河水工程之必要；只此，才可說得上從虞夏才具封建社會的雛形。尤其這時期較前不同的，天子的寶座，就老實不客氣地傳給他的兒子（禹傳啓），這才是封建社會的觀念。若說黃帝以來，就有了所謂封建社會的，那以前的譜帖，何以記載不清？既是封建社會，則個人本位的思想與英雄觀念必十分充足，何以還有堯舜揖讓的這段事？我不相信什麼堯德如天、舜德如地的誣說。若說堯舜時代果眞就是封建社會，那必就是舜篡的堯的位，堯決不會好好地就把天下傳給他。我想舜既稱爲都君，亦必爲該時代的部落首長，篡了堯位之後，或者後來也還有好的結果。如史載舜葬於蒼梧之

野，想即他後來謫遷的區處（蒼梧在今湘粵邊界）。論當時的交通，他怎會死到那些區處？或者就是夏禹將他竄逐的。並且史上又明載堯都蒲坂、舜都平都、禹都安邑，若都是揖讓相承，爲什麼其都城都域各不一致？總之如要比較徵信的，封建社會自當以夏朝爲起點。而所謂夏禹的，想必就是從來「里正」的擴大。

二

據上所述看來，由夏以來，才看到有明白的直屬皇統繼承，才看到有廣大的河水工事，這才正是日耳曼人的佛蘭克王國一樣，這才可以說是封建社會的開始。可是說到這裏，就是證明，田中平等的父老與里正，已經同井內的成員有了身體和階級的區別了，已經不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原來井的性質，而是成爲納貢賦於封建的機關了。如劃爲九州，列各種貢賦的名目，已不是井內相互的義務，而是由井內平等的成員變爲由人民對於支配的義務了。可見封建社會一開始，就已失却了井田原有的意義。不過在夏代雖是稱爲封建社會，而亦只是封建社會的萌芽，就是說搾取的程度，還不甚厲害，因爲生產力不甚發展，交換亦必沒有什麼大發展；既是交換沒有發展，則支配者過度的搾取必爲無意義，即無

由得着豐厚享樂的原故。如禹貢關於畿內的五百里，有「納總」的（連禾藁在內）、有「納銍」的（禾穗）、有「納結」的（稻草）、有納「粟」的（糙米）、有納米的。其次關於五百里以外的有林產如箘簵、楛、菁茅等。有礦產如五色土、鹽、瑤琨、金三品（金銀銅等）。有水產如蠙珠、魚等，有狩獵物如熊羆、狐狸等，有婦工如玄纖縞、織文等。總之這都屬原始產業的產物，或直接採之於自然，或製之於家內，想當時如歐洲中世紀的同業組合的這類組織，都還沒有發生。由夏以至殷代，並殷代末期，雖亦歷時千餘年，依然沒有很大的進步。或許是亘殷朝全代，黃河常是氾濫的原故。試看殷代的都城，都爲避水遷移了許多次。至於民間受水患的侵擾，更是不堪言狀了。即據殷墟所發見的看來，當時的器物，如彝、尊、壺、斝、卣、卣、敦、鼎、俎、皿等等，概屬於陶器、骨器、石器、玉器、木器、銅器。生產技術本沒有什麼進展。故終殷之世，大概封建主與領民的關係，亦猶之夏代一樣。

然入周代以來，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即生產力亦已有了較高度的發達，而封建主搾取領民的程度亦隨之加增。大概周代以來，就已由銅器進到鐵器。農作上或許不僅利用獸力，還可以堅銳的鐵能夠深耕。即其他工藝亦必有相當的發展。據越絕書云：「當此之時，作鐵兵

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又江淹云：「古者以銅爲兵，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迄於秦時，攻爭紛戰，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鐵足之。」由此看來，周代既已能用鐵器，則影響於物質的生產亦必至重且大，所以工藝也就繁興，而同業組合亦至爲發達。如王制上說：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不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據上所述看來，有的雖屬祭品、名器，是爲維持封建體系的尊嚴，而有的則屬各種工藝品的規定。這儼如歐洲中世紀的同業組合差不多。然而因此封建主對於領民的搾取，也特別地厲害。卽據儒教宣傳的周禮說來，有所謂九職任萬民，則爲三農、園圃、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等。有所謂九賦斂財賄，則爲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拜縣之賦、邦都之賦、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弊餘之賦等。有所謂九貢致邦國之用，

則爲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斿貢、牧貢等。這種繁瑣的剝削，就儼如歐洲封建時代的(一)貢租 (abgabe)，(二)賦役(Trondienest)，(三)不規則的徵課，地主任意徵發的，(四)地主特權的束縛，如准許的手工業，則徵發手工業物之一部，准許牧畜、漁獵、採伐森林的，也是徵收其一部。(五)要服從地主的裁判權，並其裁判官也要獻納貢租，(七)鷄卵稅，(Eiergeld)，蜜蜂稅 (Biemenzins)，風車稅(Windmuhlenzins)；尤其無人道的還有所謂新婚初夜權(Tus Primae Noctis)。這同周的建時代之對於領民，雖有樣式的不同，或程度的差異，總之到了這一個時期，歐洲的蜜爾、馬克等共產村落，早經變形變質，而在中國的井田，還不是一樣的變形變質？所以據我的推定，井田當是起源於神農以後，至夏殷則井田的內容與性質早經變異，至周代就已完全的變爲一個搾取機關，即內容與性質完全喪失，而儒家的宣傳，想只在憧憬古代的遺意了。

顧歐洲由封建制度而至統一的中央集權，即極端的君主專制，這個中間的變遷，是經由何種程式？玆將其重要的略舉數種於下：

(一)封建制度是領主有很大的土地，隸屬很多農奴。但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必至發生自

由都市，逐漸排斥領主而獨立，同時封建莊園內的許多手工業者亦必乘間突出隸屬的農奴，而逃入自由都市；因此，都市比封建的莊園，經濟上比較立於進步的地位。尤其使封建制度受影響的，封建莊園的基礎，本是自足經濟。一旦與都市的商品經濟相接觸，從來在隸屬關係之下的勞動，一定不堪商品生產的競爭。

(二)貨幣經濟勃興的結果，領主與農奴的貢租和賦役的關係，則變爲金錢的關係。唯其因貨幣經濟的勃興，故領主的軍費、奢侈品等的慾望，無一非金錢莫辦，然而通同都是要出在農奴的。故富裕的農奴，則以金錢緩和他許多苛酷的義務，其他則逃走一空。顧封建主若失掉農奴，就是封建主失其所以存在的地方，自必要對逃走的農奴加以補。充然其待遇農奴則已緩和了許多。其形式則有如今日的地主與佃戶。故在這一個期間，已使領主對農奴的關係，本質上起了變化。

(三)領主因商品經濟提高了他們的慾望，自然對農奴的壓迫愈厲害，然農奴往往團結起來對抗領主。經濟史上所稱爲農民戰爭的實勃發於各國。如一四九三年、一五四一四年、一五二五年，德國的農民戰爭，一三八〇年乃至八一年，英國的農民暴動，一三五八年，法國

的農民暴動，其結果，大半皆是封建貴族勢力失墜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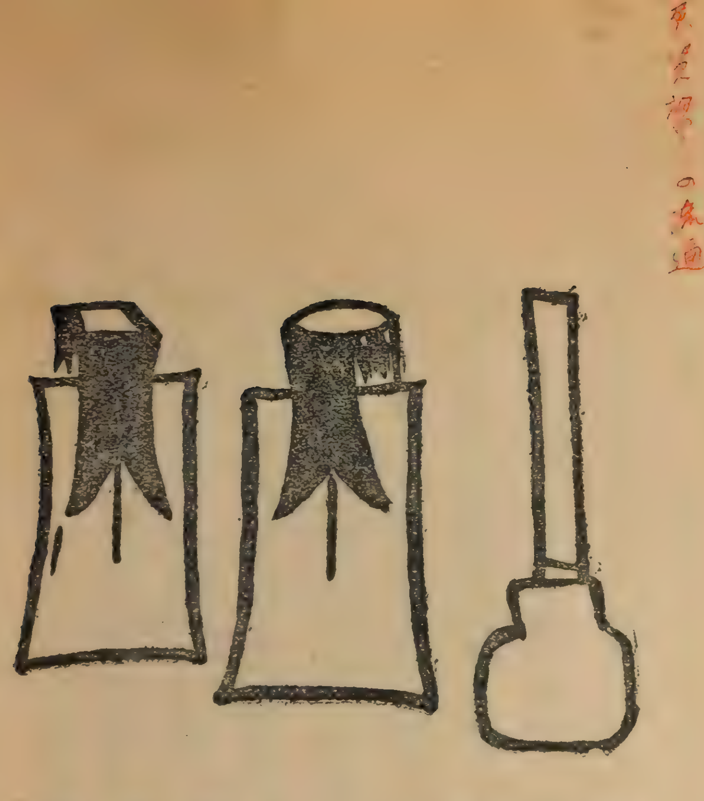
（四）都市繁盛的結果，商人階級因商業範圍的擴大，愈加成爲經濟上的勇者。他們卽不能直接掌握政權，至少能支配着掌握政權的，以便適應他們商業上的發展。故在歐洲商人階級抬頭的結果，都幫着國王削平其他形同自立的領主，而將政權歸之一尊。因此，於一四九二年發見新大陸，一四八六年發見當望峯；一四九八年，迴航非洲而發見東印度的航路，而商業的重心，也就由地中海遷向大西洋。始而西班牙、葡萄牙平分東西兩半球，繼而荷蘭、英、法等的商業資本也後先在世界稱雄，而有所謂重商主義，而有所謂商業殖民政策，這眞表示了初期資本主義的曙光。

據上所述看來，商業資本一方就是腐蝕封建社會的敗菌，一方卻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淸道夫。它眞是由封建社會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一個不可少的過渡。顧商業資本在歐洲新舊交替的社會中起了歷史的重大作用，在中國若何？茲試檢討一下。

三

說到商品經濟，自必是交換盛行，但是當時交換的媒介爲何？夏殷以至周初，還說不上

什麼商品經濟，自也說不上什麼交換。縱有，其交換的媒介亦只是貝貨。這徵之殷墟上發掘的東西與周代的銅器文字，貝貨亦曾通行於殷代以至西周。然而到了周末以至戰國，却有了



錢圖　　錢幣圖

金屬貨幣出現，即所謂「錢」。考錢爲農具，即鐵鏟，以剗地除草者，詩經上有「痔乃錢鎛」這句話，據農政全書，錢的圖形如上。這就是錢的農具爲一般人所利用，既而則以之爲交換的媒介，久之變爲一般的等價。成爲一般的等價之後，錢的樣式又一變，終則變爲有孔的錢。這種錢幣開始於周之中葉（因爲錢的農具是鐵質的，周時才有），盛行於周末及戰國。貨幣既盡了交換的重要任務，而交換之發達由此可知。故在當時如洛陽、邯鄲、定陶、燕、臨淄、南陽、壽春等都爲很繁盛的都市，就中尤以邯鄲、定陶爲最繁盛。當時商業的狀況，

如齊國通貨積財，富甲天下；衛文公通商惠工，國用充裕；晉文公寬農通商，遂成霸業；越用計然、范蠡的策劃，講求商業，遂吞強吳。並且當時商業的環境，即號為「重本逐末」的儒家，亦不免為之轉移。如子貢貨殖之後，「結駟連騎，束帛三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這一個時期，誠有如太史公所說：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楹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

降至戰國，自必商品經濟更占重要，商人階級更顯出色。如猗頓以販鹽起家，郭縱以冶鐵為業與王者埒富。至魏之白圭，更以商人而兼為政治家。魏文公且不惜以國家而拜倒於牛馬商人所謂駔的段干木的門下，（據淮南子段干木是一個駔商，然儒家則認段干木是一個賢者）更足見當時的趨勢。商業資本是土地資本的勁敵，是封建社會腐爛的敗菌，這在歐洲經濟上看得很明白，究竟它的作用於當時的中國社會何如？

固然，我們看到一方，封建領主因爲人民多逐本就末（棄農趨商），而流入於都市，就越登提高奢侈的慾望，越發加重對人民的剝削，越發要引起土地的兼併，以便增加剝削的對象。如入春秋初年。見於經傳的凡有一百餘國；然入春秋末年，就只有十餘國；入戰國，就只有所謂七雄了，這種兼併的背景，或者就是商品經濟對於封建社會的腐化作用。一方又因商品經濟以至土地兼併的影響，從來的身分或階級都被打破。如「欒郤胥原」等爲晉望族，卒致降爲皂隸；裴豹焚燬了丹書的隸藉，就可名列仕版。因之當時的思想上也呈一大解放，眞是諸子百家，齊放異彩，直有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雖然該時的學說依然未能全擺脫封建的倫理（如荀卿孟柯等），依然馳騙於四公子的門下講究其所謂個人的功利主義（如縱横策士等），依然感飾當時的環境，只有過去美妙的回憶（如莊周列禦寇等）。然而比之前期的思想專制，排斥異端的簡直有霄壤的分別。（孔丘作了魯國的幾天司寇官，七日便殺了一個亂政大夫少正卯，其罪名是：(一)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二)其談說足以飾衺惑衆，(三)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這三件罪名譯成今文便是「聚衆結社，鼓吹邪說，淆亂是非」，可見戰國以前思想的專制之一般。）

這種商品經濟的影響，果然使社會起了劇烈的變化。那末，由七雄而統一於秦的時候，照歐洲經濟史看來，至少也應該是適應於商人階級的政治。至少，雖不能像歐洲的商業資本開闢新大陸，迴航好望角，演一番商業殖民的事業，然而商業資本至秦時應該有了相當的偉大。由秦至漢以至於漢後，至少也應該是中國產業革命的時期。然而事實上却不盡然。秦漢以來，不惟商業資本沒有長足的發展，且還現停頓的趨勢，這在中國史上不能不說是個難解的謎。

可是我們仔細推敲起來，這種謎是不難解釋的。周末以至於戰國，商品經濟有了相當的發展固是事實；腐化封建社會，也是事實。然而商品經濟只是相當的發展，只是盡了腐化封建社會的責任，却是當時的都市如邯鄲、定陶等從沒有像歐洲的自由都市能對抗領主的這回事。他們既不能對抗領主，自必是商人階級雖有相當的勢力，還無絕對的勢力。就是說商業資本還未能完全勝過土地資本（封建階級）。因此，周末以至戰國，商業資本雖說是擾亂了當時封建社會的秩序，却還沒有力量來代替封建社會，而走上另一個階段。抑商業資本在社會的進化上有兩個趨向，商業資本若是由包攬家庭的手工業，進而至於商業資本自身能將家庭

手工業變爲工場手工業之後，是進步的。反之商業資本專事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的敲吸，而自身却於生產行程上沒有什麼建議或改良，那就是退步的。因爲它完全只盡了一方面的腐蝕作用(猶之今日的買辦階級)，所以是退步的。這在歐洲確有這樣的實例，如在中世紀稱雄的威尼士、琴諾牙等地中海各處的都市與德國的漢堡同盟，都逐漸衰微是。或者中國該時的商業資本，完全只是盡腐蝕作用的資本。

我們由這樣地觀察周末以至戰國，社會秩序的紛擾，土地資本的兼併，都認爲商業資本腐蝕的影響。然亦只是腐蝕的影響，却不能說是當時的商業資本就有支配社會一切的力。如果眞這樣說，那末，秦之能統一六國，必定是秦之商業資本強大於六國的商業資本，才是合理的事實，然而却不盡然。

秦國與其說是商業資本的國家，毋甯說是土地資本的國家。我們說起秦國來，必定連帶想起商鞅。顧商鞅就是中國第一個重農輕商的。試看商鞅執政的時候，他說：「大小戮力，致粟帛多者，免除其身役（力役之征），事末利（商人）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收其妻女，沒爲奴隸）。」又秦始皇本紀說：「上農除末，黔首是富。」這就是貴農賤商的意義。又李

斯說：「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僅說到農工而不及商。又秦代往往「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今嶺南地）」，這直把商人與逋亡的罪人同一看待，可見秦代的商業資本還敵不過土地資本。顧秦國何以有這樣重農賤商的政策？我們就其經濟背景看來，他這種政策是不錯的。據通典食貨田制上說來：「秦孝公用商鞅，制轅田，開阡陌。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能使秦人應敵於外。……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由此看來，秦國本來是：「地廣人寡，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若猶爲重商輕農的政策，那就不啻爲自己掘墓道，那裏有這種事！

秦國既是重農賤商，他本國的商業資本沒有什麽發展可知，因之其商人階級也沒有抬頭可知。然則秦國怎樣統一六國？這正是因爲中原有了退步的商業資本盡其腐蝕的作用，秦國才能乘其敝。本來秦國逼處西陲，較中原開化較遲，他本國的貴族階級還沒有很大的勢力，觀之他國內多用客卿是其明證。故以精銳的民族，又加之他地理的環境出函谷關攻山東，出武關攻南陽、襄漢，都是上流之勢，而當暮氣沉沉，爲商業資本所腐蝕的國度，自然是摧枯

拉朽，勢如破竹。於是秦朝竟統一六國，竟打破了舊時的封建局面。

說到這裏，不能不說又是中國史上一個難解的謎。何以？即中國社會史上從秦代已把封建變爲郡縣，此後中國社會應走入非封建社會的階級，才是合理的。換一句說，此後社會的重心，應由地主階級過渡到別一階級。然而秦代統一中國，廢藩置縣之後，以爲可由一世以至萬世，不料很短的期間竟遭瓦解。雖然很乖覺的秦始皇也曾注意到把天下的豪傑（豪傑到底是那一階級，秦始皇必很清楚，），遷移了十二萬戶到京城咸陽，但是起而亡秦的仍屬豪傑。試看秦二世的時候，則有：楚王陳勝、趙王歇、魏王公子咎、燕王韓廣、齊王田儋、沛公劉邦、會稽守項梁、這些豪傑們千眞萬確的怕都是地主階級罷。

劉邦做了皇帝之後，雖然聽了張良的勸阻，未曾再封六國的後裔，然對於異姓的則有：齊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趙王張敖、燕王盧綰、同姓的則有荊王賈、楚元王交、吳王濞、齊悼惠王趙、代王恆、趙隱王如意、淮南厲王長、梁王恢、淮陽王友、燕靈王建、這是不是封建社會的復古？社會的重心是不是地主階級？豈僅漢代如是，我們到西晉代不又有所謂同姓的「八王」麼？即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趙王倫、汝南王亮、長沙王義、

楚王瑋、東海王越是。茲爲證明中國社會史上究竟是某一階級占社會的重心起見，將更錄出數段關於每代興亡交替的中間之活躍的人物於下：

隋唐交替的期間，則有：

竇建德據樂壽、李密據洛口、徐圓朗據魯郡、劉武周據馬邑、梁師都據朔方、薛舉據天水、李軌據武威、蕭銑據江陵、林士弘據鄱陽、朱粲據南陽、杜伏威據歷陽、李子通據海陵、陳稜據江都、沈法興據毗陵。

唐代的藩鎮，也就是封建，如天寶十大鎮：即安西節度、北庭節度、河西節度、朔方節度、河東節度、范陽節度、平盧節度、隴右節度、劍南節度、嶺南節度。終之薛嵩據相衛、李寶臣據恆趙、田承嗣、李懷仙據范陽、李正己據淄青、陽行密據淮南、錢鏐據兩浙、馬殷據湖南、王審知據福建、劉巖據嶺南、王建據劍南、李克用據河東、而唐遂以亡。

宋代雖然罷置了武人的兵柄，恐違反趙氏江山，雖然昌明了儒教的理學，以維持所謂封建的倫理，然終爲游牧的野蠻部落所征服。元末都借滅胡興漢爲名，又是許多豪傑們起

兵自據，如劉福通起兵於安豐、蕭縣李二起兵於徐州、徐壽輝起兵於蘄州、張士誠起兵於高郵、郭子興起兵於濠洲、朱元璋自立於集慶。

明太祖有鑑於宋廢藩鎮，致為胡元所乘，於是大封其子弟，如秦王㮮王西安、楚王楨王武昌、甯王權王大甯、魯王檀王兗州、瀋王模王潞州、代王桂王大同、郢王棟王安陸、慶王㮵王甯夏、周王橚王開封、燕王棣王北平、潭王梓王長沙、韓王松王開原、湘王柏王荊州、唐王桱王南陽、遼王植王廣甯、岷王楩王岷州、齊王桐王太原、齊王榑王青州、谷王橞王宣州、蜀王椿王成都、肅王楧王甘州、伊王㰘王洛陽、趙王杞(未之國)、安王楹王平涼、靜江王王桂林。然而一遭着必然的末運，仍不免為遊牧的滿族所滅。

清廷以關外的精銳，入主中華，然仍不能不賴各省的總督「分治合作」，嗣因列強資本主義從海外襲來，致清廷起了財政上的恐慌，因之內不能制家奴，外不能敵強鄰，遂有辛亥之役。但辛亥年間，以排滿革命而獨立的亦實繁有徒，這屬中國最近史，或者還有人能記及，茲特錄出，以便檢閱他們究竟是屬於何階級的。

長沙九月初一獨立　　民軍都督譚延闓

九江九月初二獨立	馬毓寶
西安九月初四獨立	張鳳翽
雲南九月初八獨立	蔡　鍔
太原九月初九獨立	閻錫山
南昌九月初十獨立	吳介璋
上海九月十三獨立	陳其美
蘇州九月十四獨立	程德全
杭州九月十四獨立	湯壽潛
廣西九月十六獨立	沈道仁
安慶九月十八獨立	朱家寶　孫毓筠
福建九月十八獨立	孫道仁
廣東九月十九獨立	張鳴岐
山東九月念三獨立	孫寶琦

成都十月初七獨立　蒲殿俊　尹昌衡

總之自秦以來數至現代，儘管換了許多朝，儘管是開亘古所謂民主國的創局，其間起伏盛衰，迭爲雄長的，我們始終都尋不出商人階級的影兒。即從民國初元間看來，所謂民主國政黨的共和黨，不是清一色的大地主階級的官僚麼？顧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權推移一定要落在大地主階級之手，換一句說，演去演來，總脫不掉封建社會的局面，這究竟是什麼原故？簡單說來，就因爲產業沒有發達。產業不發達，影響於交通上亦必至大。以中國這般遼闊的幅員，要施行極端的中央集權，至爲困難。故在事實不能不演成封建的局面。即因爲交通不發達，各地方必然有所謂「土皇帝」出現。上文在各朝代更替中列舉的許多活動分子，怕很少有不是土皇帝的。說到這裏，我們要問何以不能發達產業？這大概是（一）由於中國的自然環境，如中國多爲東西行的山脈，梗塞南北的交通，西向遇着葱嶺的堵閉，此外又是很短的海岸線；（二）由於西北接觸的，都是野蠻的游牧部落，直同肉食獸吞噬反芻獸一樣，也侵擾了中國數千年，有時割據一方，有時則入主中華；差不多同日耳曼人侵入羅馬一樣，使歐洲成爲黑暗社會者千餘年，這一點影響於中國的進化至大；（三）政治的，旣是地主階級相互的掌

握中國政權，我們替他想想，他將是什麼政策維持他的政權，他必然是重農尊孔。他何以要重農？因爲農人多受制於自然環境（季候、節令），而且是行有機的生產，出門是祖宗的墳墓環繞着，入門是家神的本主對立着，雖伏於家園，固着於土地，風醇俗茂，至易駕馭。他何以要尊孔？因爲孔子是封建盛世的思想結晶（孔子雖生在晚周，而其思想的路徑，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總之不是把時代搬向前，是把時代搬向後的），並且許多都是擬制的，身分的倫理（名正言順）極爲注重，爲臣當忠、爲子當孝，既爲忠孝，必不「犯上作亂」。有了這幾種的原因，恰恰是一個封建社會的畫圖，恰恰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顧這些支配者的地主階級們，他們之重農的意義，是否眞實有「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的懷抱，或是只想拿出這一塊招牌，藉以愚弄黔黎，我以爲這都是不成問題的。一個大的地主階級所謂「登大寶」的時候，至多的德政也只能豁免租稅，省重刑罰，決沒有什麼積極的方案，這在中國史上是屢見不一見的。然而爲要維持唯一支配者的權威，軍費是少不了的，力役也是少不了的。顧軍費除了剝削農民外，外債是無從舉借的。至於力役也不用說，正是農民唯一的義務。可是農民一方疲於供億，一方又將生產的勞動（農耕）變爲不生產的勞動，勢必演成「老

弱塡溝壑，壯者散四方」的趨勢。然因此就未免觸動其他野心家的大地主了。他將說「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一民溺，由己溺，一民饑，由己饑。」的話頭，藉以召散而之四方的失地的農民，以爲攫取權利工具。果然戰爭擾攘數年不息的結果，於是勝敗之局以成，於是「成王敗寇」之勢以立。於是屍遍河渠，血滿原野，人口因戰爭而減少，耕地因戰爭而加多。於是人口與食物得其暫時的均衡，而稱爲「天下一治」。可是新主登極不久，必然又演從來的政策。旣演從來的政策，必然又是從來的結果。這大概就是中國史上所謂治亂相循的機構，也就是地主階級歷來把持政權的由來。

四

我們在上面旣述了封建主重農尊孔的由來，那末，他另一方面必是賤商輕工無疑。他何以要賤商輕工？乖覺的封建主他旣知道重農尊孔是維持封建社會的一個好工具，他必然又知道工商是腐蝕封建社會的敗菌，故他非抑商不可。本來商人的環境，不是祖宗墳墓，家神的木主所能限制的。他是懋遷有無，江湖遍走。他的經歷廣大，他的胸襟因之開拓，迥非渾樸的農民可比。若屆封建時代而有了佔勢力的商人階級，就是封建社會的危機。因爲商人階級

沒有農民好駕馭的原故。因之歷代封建主的抑商政策，都如同一轍。

秦代賤商，從商鞅就已開始，已如上述。漢高祖既定天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又重租稅以困辱之。」並且禁止他們爲官吏；又不給他們田產（禁毋得爲吏與名田）。商人以外，只出賦錢一算，而商人與奴隸則出倍算；其賤視商人爲何如？茲更引賈誼之說，就越發明白。

「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農）而趨末（商）者甚衆，淫俗之侈，日月以長，天下財產何得不蹶？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工業者）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據上所述，漢之重農輕商，至爲明白，當然也不是說漢代沒有商人階級，然而若與大地主比來，則覺瞠乎其後。試看貨殖傳說：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

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川，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畝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可見大地主的勢力高於商人階級的勢力。既屬這種趨勢，故在東漢時代，桓譚請限制商人不得兼營二業及爲官吏。西晉則爲政府「欲使力農，故重征商稅」，始由東晉以至於梁陳，凡買賣奴婢牛馬田宅立有文券者，價值一萬，賣者納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值百稅四，名爲散估，此殆即寓征於禁的意義。隋高祖開皇十六年，禁工商不得仕進。唐高祖定工商雜類不得與於仕伍。唐肅宗遣鄭叔清等括江淮蜀漢富商之財，十收其二，謂之「率貸」。五代戰爭，沒有甯日，然商人更因當時的鐵法、鹽法、麴法、倍遭打擊。宋代爲理學最盛的國家，自然更是重本賤末，故自熙甯十年的前後，簡直是商旅裹足，因爲擔負微物貿易於村落的，都指爲漏稅，科以重罪的原故。元代商稅的征收，是名爲三分取一制，究竟是何比例，其詳不得而知，總之屬於苛征商人無疑。明代頒布的賤商之令，據農政全書所載：「太祖加意重本折末，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只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

賈者，亦不許穿紬紗。」十八年又諭戶部以「業本必先於黜末」，又謂「足食在於禁末」，可見明代的賤商，是何等的厲害。清初入主中原，商人階級更其倒楣，有所謂賦外之賦、差外之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如揚關淮關之外，邵伯又加攔阻，既有滸墅關，復於無錫設老人關，此卽關外的關。揚關滸墅關正數一倍，納至四五倍，此卽稅外的稅。這還屬清康熙時代的抑商政策，以後當更其變本加厲。迨國際資本主義闖進關來之後，工商業更危如累卵，更有自然沒落的驅勢。

總之由秦漢以來以至現在，都是地主階級迭掌政權，這由上述的事實可以證明。既是地主階級掌握政權，他必然是重農輕商，這殆如因果律似的。當然不是說由秦漢以來，就沒有商人階級存在，是說商人階級對於大地主立在隸屬地位的。再由政治上的反證，我們也可明白。如果秦漢以來占社會重心的屬於商人階級，其政治上必然是適應於商人階級無疑。然據上述看來，每代都是輕商賤商，每代都是重農尊孔，而謂商人階級占社會重心的，豈有這種矛盾現象？

第二章　封建勢力支配說

中國社會構造之史的觀察

——供給陶梅二先生一些意見——

黎際濤

我在新生命月刊上看了陶梅二先生關於中國社會構造的文章，及周佛海先生的附註，不覺引起我多少意見，我便隨便地寫了出來。不過我的意見，係同於陶先生而不同於梅先生，這些同與不同的地方，以及還要更深一步的探討，仍要請陶梅二先生及多數讀者的指教。

一　發端

我於未入正文之先，爲清醒眉目及論點起見，覺得還有兩點，應有說一說的必要，作爲發端。

甲、中國社會構造變遷的分野　中國社會構造變遷的分野，大致有如下的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係古代，自堯舜起至秦統一止，——即自紀元前二千三四百年起至秦統一

止。其間舊日種族部落和封建制度漸漸破壞，新社會漸漸產生，以迄漢代。

第二個時期，係中古及近世，自漢代及清末止——即自紀元前二百餘年起，至紀元後一千九百餘年止。其間舊日君主專制的社會漸漸破壞，新社會漸漸的產生，以迄民國。

第三個時期，係現在及將來。因爲現在還在變化之中——還在變化開始之中，究竟將來要變成一個什麼社會，尙不能說到。不過有趨勢可見罷了。

這三個時期，——陶梅兩先生，也是從此出發，——是中國歷史上一切變化歷程上的最大分野。不過若從詳細方面說，又可分出多數小時期罷了。

乙、社會的本質是什麼？　社會的本質，從最複雜的、最大的範圍來說，我以爲祇是「一團關係」。在這「一團關係」中，如果要用抽刀斷水或分析的手段，從他的着重點來說，便可謂之政治、經濟、宗教、學術思想、美術、教育、風俗、習慣、法制一切等等。在這一切等等中，並且還可分爲兩面，——兩面非相對亦非絕對——即心物是。——以上一團關係或心物，本是一個古今來鬧不清的所在，我們姑且如此說去——所以中山先生，他給予我們的教訓，一方面是要心理的建設；另一方面呢，是要物質的建設。便是對於我國物質的貧乏，

固然可憐；但是在心理上的混亂腐敗，亦不能不說是可悲吧。

在這兩點上，對於甲點，是我國民族在時間上所佔的映幕。至於所演的戲劇，乃有三個最大的階段，——卽由種族部落的割據，變到君主專制；再要變到民主自治。但是我覺得此種階段，乃是世界各民族，全政治史上的共相，而不是我國民族的特質。至於乙點呢，我覺得也與甲點一樣。因爲一團關係所着重的政治、經濟……等等，亦是全世界民族，在文化史上的共相，而不是我國民族的特質。所以我們要問中國社會的構造，便是要問中國民族在社會構造上所有的特質。

原來世界上各民族的特質，同者固然有，但異者終自有異。如果我們從關係上的範圍，大一點的來說：要拿西洋的美術，代替東洋的美術，是不行的；若再縮小其範圍，具體一點來說：要拿羅馬式建築的窗子，代替中國文學家所說的百葉窗；或者是中國茅廬式的三角窗或方窗，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要論中國目前的社會，只可就中國歷史行程上去觀察，不應當拿西洋社會學者或經濟學者與政治學者，所標出的幾個籠統的名詞，而來下一個概括的斷定。於是我們論到了中國的社會，我們縱然知道了什麽宗法社會、資本主義等名詞，——但

是西人所謂的宗法社會，是大部份建築於氏族經濟；西人所謂的資本主義，是大部份建築於機械工業，如何能拿來比擬中國目前的社會呢？中國目前是陶先生所謂「中國的宗法與封建兩制度已不存在，而宗法與封建兩勢力還存在着」的一種「中國社會狀況」呵！

在我的意見，以爲社會旣祇是「一團關係」，——自然界也是如此——所以我們似乎不能祇拿一個「地主」的事實或一個「商人」的事實來包括中國社會現象。因爲在社會上，雖然有某一社會羣壓倒其他一切社會羣的現象，但是被壓迫社會羣並沒有消滅，並且自有其所以被壓倒之故及壓迫的方式，又何能拿一兩個事實來包括呢？所以依我的觀察，中國的社會，是有幾個着重點，如下：

甲、武力割據的政治。這便是陶先生所謂封建態樣的政治。

乙、往後退的宗法勢力。

丙、停滯流於腐朽的國民經濟。

丁、國民之蠹的士大夫身分與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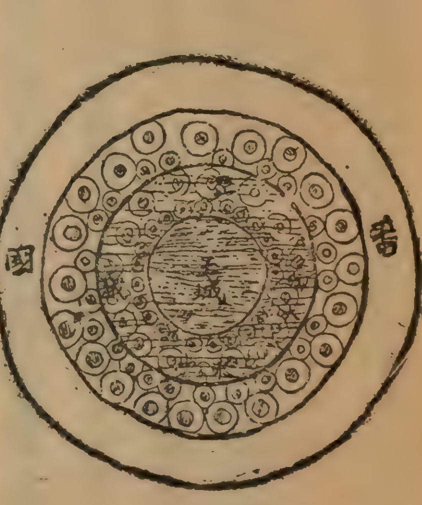
以上四個着重點，是中國社會由第一期到第二期之末所結構的特質，過此便是今後的變

化和趨勢了，以下試以次論之。

二　武力割據的政治

武力割據，是一種什麼？便是陶先生所謂「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勢力還存在着」的勢力。這種勢力在我國是什麼形式呢？我們求之歷史，皇古之事，雖不可詳。然在第一時期的種族部落社會和封建制度時期中，固與世界各民族的大性質共同，是一個種族部落分立和小封建國家割據或併吞的現象。所謂黃帝之時萬國、夏禹之時三千餘國、周初千八百餘國、春秋二三百國、戰國七雄以統一於秦。我們可以借田崎仁義的兩個圖，——見支那古代經濟思想史及制度——表之如下：





說明
圈 代表種族部落
黑線 代表勢力

這便是在政治上，中國古代社會由種族部落的割據，進而爲封建制帝國的情況；也便是中國古代的種族、氏族、進而爲民族的狀態；——即是禹貢上、王制上、國語上所謂之「五服」；也可以推廣至周禮的「九服」「九畿」與「六鄉」「六遂」。我有一個朋友，他研究了幾個月的甲骨文字，後來他寫信告訴我所得的結果，他說：

商代還祗是遊牧時代的末期，稼穡祗是正在開始。所以不要說神農氏的事蹟是僞造，就是夏代一代的事蹟也不可靠。甲骨文形聲字不少，所以倉頡造文字而定六書的事，完全是無稽；尤其使人驚異的是：該時的文字，並不是一字一音的。史遷謂商代稱帝，周代稱王

的事，完全不對。商代的王者並不稱帝，最多祇稱王；而最常見的，祇是「祖某」「父某」等。由此可見商代，實無所謂王帝方伯，治人者是一個強有力的家族，而被治者則以一家族被治，並非以一個人被治。該時的誅殺，大約多是滅族，而不是零碎地殺人，所以雖則是兵器並不利的時期，竟能於一次戰爭殺敵三千人以至於五千人，該時的政治，是神權政治。差不多天天都要問卜；天天都要問卜，大約不問卜的事，祇有殺人一件。當時中國是很小的，大約還不到千里邦畿，而敵人中最強悍的是呂方，中國對於他的戰事，大約每年都有一次以至兩三次。——這是大概的情形。

由上看來，可見古代種族部落的競爭，是很野蠻的。如儒家所謂一系相傳的堯舜禹湯文武，恐怕不祇是文武，是一種由夷狄入居中國的部落；——照梅先生說——即堯舜禹湯的幾個聖人，也不過是一種所謂夷狄入居中國罷了。爲什麼呢？因爲儒家雖然說堯舜禹是禪讓，而在竹書紀年及史記上，也曾稍爲記着堯舜相殺的事。——參考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又劉知幾也曾疑過舜係遭放逐而死。

後來這種種族部落的競爭日急，封建制度消滅了，氏族不見了，秦朝來了；入於我國社

會變遷上的第二期。便可以見到，我國的政治，自秦代統一而後，在一方面，氏族制度與封建制度破壞，日漸趨於帝國式的軍國。如劉邦、宋太祖、明太祖等，皆以平民出身來做皇帝。其他在古代之以平民而致卿相、作將軍，以及草莽割據，稱王道帝的人，尤比比皆是，不可計及。惟在另一方面：則氏族制度雖破，但皇帝的專制與威嚴，日見日高，無論某一朝代，完全係由君主及其家族、功臣、國戚、母后、以及妃嬪、宦官、倖臣等等，佔據政治上一切的重要地位，作威作福，在一般平民，若是想顧問或參加政治，則政法上的重要地位，已不能問鼎，問鼎則係謀逆和有罪。無已，則思其次，所謂次者，便不過是供役使承奔走的人。——因爲王公貴族，全是祗享高爵厚祿不做國事的——在一般平民，使欲得參加此項人員的機會，第一步須先讀書；第二步便要有貢媚獻佞的態度，以奉伺官吏與皇上，而後能漸由選舉或考試，參加政治，以達其政治的慾望。其不由此途參加，而果能由合法選舉出身正直的人，不過少數人成爲歷史上的嘉話罷了。因爲如此，所以在一方面，遂激成隱逸一派，生出一種「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的態度，甚爲淸高可貴；另一方面，乃範全國的國民於富貴利達之中。在全國國民的腦海裏，完全祇有利祿的可貪。於是未得利祿之先，便寡廉鮮恥，無

所不爲；及既得利祿之後，則威福貪賊，也無所不至。以利祿代替國事，國事尚可問麼！除此以外，如有英傑之士，欲發揮其才能於政治，以求利祿，而因不能或不善於貢媚而不得，乃退而爲亂。如古代的項羽、劉邦，近代的李秀成、石達開等，卽係其人。且在君主世襲制度之下，每一朝代的官僚政府一定由振作而趨於腐朽。最初的時候，所謂開國之君，攜帶一般攀龍附鳳的功臣，及有瓜葛的親族、母后、與夫伺候奔走的宦官、宮妾等等，自草莽中奮發艱困身經百戰而來，尚可振作一時。但到後來，則天高地遠，民事隔膜，做皇帝的人，既不悉民事艱難，且漸流於驕奢、淫佚。又一般功臣、皇族、親戚、母后等的後裔，更加以皇族、親戚、母后、與夫宦官、宮妾等，也通是流於驕奢淫佚、擅作威福、嚴刑重稅。於是在一方面：則因一般家族、親戚、功臣的子孫等，與君主的關係，既不如開國時的密切，遂有野心家者流，競爭權利而不得，乃演爲藩鎮割據的形勢；而一方面：則民不聊生，復加以全國國民，無智識的人，佔最大多數，既不知以秩序的民力，監促官吏的改造政治；而在一般學術思想中，也沒有多少民治的觀念，祇知嘯集爲匪，割據稱王，以擾亂社會秩序，打劫家舍，困苦民生。迨匪亂既多，外患日至，於是乃有所謂英雄豪傑者，挺生其間，而利用其機

會，呼朋引類，南征北討。一直到民力甚疲、民死甚衆、國力甚困的時候，縱然有所謂英雄豪傑者，想再擾亂紛爭，而亦苦於不可能。然後乃漸能由某英雄豪傑，打成一家天下，來作皇帝，稍稍問及國家的事務、民間的疾苦。但不到百數十年，民力稍蘇，這種搶掠割據的大禍，便又發作了。所以吾國俗語，有所謂：「十年一小亂，百年一大亂。」及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輾轉循環，前後如出一轍的狀況，於是我國的政治，便不得不一代不如一代的壞下去！

以上所說的種種，便是我國政治的結構，由種族部落的武力割據，變爲大則君主、小則藩鎮的武力割據。換一句話說，便是土匪化的野蠻政治。所以到民國以後，不獨袁世凱大做其皇帝之夢，吳佩孚、段祺瑞等亦大做其武力統一之夢，卽一般老百姓，一方面也在那裏希望眞龍天子，——這便是國民的惡化；另一方面呢，到處皆土匪蠭起，且土匪與軍隊不分，大家皆希望搶一塊地盤，做一個將軍，——這便是軍隊的惡化與軍閥的由來。似這種種的狀況，要他忽然轉到民主政治，亦相差得太遠呵！

三　宗法的勢力

我國的宗法制度，是起原於第一時期——即種族部落割據的時期。在這一期中，最古的記載，如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所謂：「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的確是一種圖騰社會的現象。——梅先生說——這是與宗法下的姓氏，有最密切關係的起源。因爲姓氏一物，不論從古書上——如春秋——或從現今看，他也是代表一族的。但他如何會由圖騰而變成？其間的關係，雖容易明瞭，然在古史上，尙缺於連鎖的記載，所以我們仍難斷定他是變遷於何時。不過由甲骨文字上沒有氏字的一點看來，似乎商代的時候，尙沒有姓氏。所謂姓氏者，是周代表示特殊階級而起的。故左傳謂：「天子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眞正的封建諸侯，也是起於周代——在周以前的姓氏，如神農氏、姜氏等之類，恐怕免不了有後人加上的嫌疑。

我們由姓氏而推到古代的宗法，雖可以知道一點，但仍不詳細。並且因爲當時的種族部落的吞併與仆，似乎此族與彼族的宗法，也各不相同。陶桌曾先生考證世數計算法，曾說：

般的部落，所行親屬制度，是個人本位的；周的部落所行親屬制度，是團體本位的。儒家便以周制爲背影，創造一個整密的宗法理論，經後世帝王採用施行，便成功中國普行的親屬制度了。——民鐸宗法上之理論——

這是陶先生由考證世數計數法所得到的結論，我們似乎可由此見古代世族部落的變化。至於他的作用與特質呢？便是陶先生所謂的尊祖、敬宗、收族；及父系、父權、父治各有三種。

在古代的社會，所謂世族者，由母系變爲父系，由神權雜以父權；這種尊祖、敬宗、及父權、父治的宗法，是不難形成的。但到後來，氏族隨封建制度的發生發達而漸漸的破了。所謂宗法制度的一物，本已伴着社會各方面的關係，如政治、經濟、思想、交通等等，要有一種顯著的變遷。不過中國的宗法，一個空殼的制度，雖在陷於若有若無的境界，但他的實質，却祗如陶先生所謂「宗法社會已不存在、宗法勢力還存在着。」的中國現今社會。這究竟是什麽緣故呢？在此一點，我們可以見到的，是有三點，如下：

第一、是中國的尊祖，已變成了宗教上普通的儀式與信仰，如宗祠、寢廟、及春秋二祭

之類，是可以代替一般民衆的宗教的；況尚有家法與譜牒以維持於其間呢！

第二、是思想上，君權與神權祖權的混合，這便是古代的書經與春秋，常常以「天」與「祖」並舉；也便是後世儒家書上，常常以「君」與「父」並列，以及前清民間所用「天地君親師位」一塊大神位的由來。

第三、是儒家的得勢。

我們知道，古代的宗法，未必如儒家所說的；但儒家所說的宗法，却得勢於後世。在儒家所組織的玄想，爲維持古代宗法與封建的社會者，也有幾點，如下：

一、是要適乎易經上所謂「天尊地卑、陽尊陰卑」的宇宙觀念。

二、是要適乎禮書上所謂「禮有三本」及「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敎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的政治與社會觀念。

三、是爲適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倫理觀念。

其餘還可以舉出多少來，不備及。原來儒家的國家秩序與社會秩序是承着古代的歷史，歸結於一個「仁」字。而所謂「仁」者，不是「智的仁」，乃是「情的仁」。所以他在國家與社會道

一個「連環圈」上，便要由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婦；以至於社會上的朋友、賓主；更至於政治上的君臣，便好像可以摑捉宇宙大自然中所謂自然法的秩序。這種理想，好處因然不可一筆抹煞。但是他的壞處呢，因爲他過於看重了情而不見智、過於看重了人類的物慾，可以由教育變成良心。於是結果乃適得其反，遂造成了後世一方面的禮，是如胡適之所謂穿戲衣做戲的木強迂腐氣；——中國哲學史大綱——及另一方面，也便造成了後世的國家上「政治君權」，與社會上「宗族父權」的階級秩序。所以我們便看到了後世的軍國式的帝國政治與民族社會，竟勉強地敷上了封建式的君權，與氏族式的祖權一頂破帽子！

我們看見春秋戰國諸子爭鳴的現象，在法家中，如商鞅，便是主張「子壯出分」的「農戰政策」——此處須與陶先生的從中國社會史上觀察中國國民黨文中一二節合看——而要脫除家庭中或宗族上，在一方面的倚賴性，不自立心；及一方面，也要脫除家庭中或宗族上的三方則「嚴而有威」，一方則「愚而強順」的私門性、教人人做個勇於公義的國民。其收效雖使秦室統一了戰國七雄，然到後世，爲儒家流化的腐敗思想所瀰漫，反被人罵得狗血淋頭，或則暴夫、或則嚴而寡思；甚而至於賈山的陳政事疏中，且以婦姑不相悅、反脣相稽之爭，歸

罪於商君，殊未知後世家庭之下、宗族之中、種種骨肉相殘的情況，恐怕當十倍於婦姑不相悅，反脣相稽的呵！

的確是，在一方面，在儒家這種因襲歷史的因襲性，是儒家得勢於後世之一大原因；也便是儒家最易流於腐敗之一大原因；而在另一方面呢，在儒家的這種理想，於不知覺間，便被一班所謂帝王的梟雄，拿着去作一個假面具的利用，遂使時代演化的事實，變爲社會上與國家中的盲目者，永不能循其道以進，而造成一個長久的黑暗時代。這種現象，我們在一方面，固可以看到漢魏六朝的閥國，唐宋的名諱；而在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在國家的所謂「制」上，會由儒家假造的周禮，其中的「六太」，變爲唐朝的六典，以至於太明會典與太清會典；及在國家的所謂「律」上，由李悝的法經，再變而爲蕭何的九章以後，便漸漸的會被儒家拿過來，一方面要以春秋斷獄；及另一方面，乃在各朝的律上，如門訟、戶婚、斷獄、禁衛、遠制等等篇目中，深深的加上了一重禮書的色彩，務期形成「禮爲主法」「律爲助法」的形式。在中國的國家與社會既有了這兩柄開倒車的大斧，於是中國人如中山先生所謂：「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的現象，便形成了。因而中國的個人，不是中國

國家的個個國民，與中國社會的個個份子；乃是勇於私門，弱於公務的個個家人和族人。而且還要變成嚮導聯軍入北京，及歡迎日本掠奪中國利權的中國國民與中國官吏，這又應當怎麼說呵！

四　停滯流於腐朽的國民經濟

我國民族經濟的歷程，雖然在上古時代，——即第一期中，不大明瞭其情形。但是由漁獵而畜牧、而農耕、而工商業，幾個「波紋狀段落」的大勢：還可以看出。這種大勢，我們如果根據古書來說，似乎堯舜的時候，已經有了頗有可觀的農業。因為在禹貢上，已有田賦及農官制度。但我還疑心這恐怕不過是如淮南所謂：「剡木而耕、摩蜃而耨」的情形。且堯舜時代，在我國民族所用的器具，似乎尚在新石器時代的後期。銅的一物，或者已經知道，但尚艱於使用，一直到商周，方纔盛用銅。——參考章鴻釗先生石雅附錄——鐵的開始在戰國以後，至東漢始盛用鐵。所以是時尚不過是一種最原始的農業。一直到商朝，農業還沒有蓋過遊牧。這是前述所引甲骨文的結論，可得到一個例證。並且又據王國維先生研究甲骨文的結果，也是如此。據他所得甲骨文字的各項統計，計有如下：

一、關於祭祀者三百六
二、關於狩獵者百三十
甲、關於獸者百二十三
乙、關於漁者七
三、關於天子之出入者百二十八
四、關於風雨者七十七
五、關於征伐者四十四
六、關於豐凶者二十五
七、關於告者十五
八、關於響應者四

由此亦可見狩獵遊牧，係佔商朝的大部份，所以知道農業，係盛於周代，迄春秋戰國之間，工商業始漸漸興盛。但是自春秋戰國之間，因工商業興盛，或與農業並駕齊驅，或跨過於農業以後，在中國的生產業，便永遠停滯而流入於腐朽的途徑了，這種停滯流入腐朽的原

因，我們可以找到幾點，是：

甲、經濟思想上的原因　我國的經濟思想，其最大部份，係與工商經濟反對，如下面三種：

A、慾望論　中國的經濟思想，對於慾望論，如思想極爲發達的春秋戰國，在老莊則主張「無慾」、孔子則主張「窒慾」、墨子則主張「矯慾」、孟子則主張「寡慾」、子宋子則主張「少慾」。就中惟有一揚朱，主張「縱慾」；及在比較上稍得其中者，祇有後出的荀子主張「導慾」與「節慾」，然在後代思想上，並沒有多大的勢力。且自漢而下，復加以佛家的「去慾」，循致宋、元、明、清的學者，莫不以「養慾」「矯慾」「去慾」爲務。清代的戴東原，稍唱「導慾」之說，便不爲一般儒者所喜。殊與歐美的經濟學者，認凡百行爲，皆以慾望爲前提；慾望的增進，即係經濟進展的本因者，大不相同。

B、生產論　中國數千年來的經濟思想，對於生產論，始終只是農本主義占優勢，大概自洪範八政以食爲先而下，如孔子的「足食均貧」、商君的農戰、管子所行的雖然是重商，但他的書却也是重農。——這書所以是假的——降至漢代，則因農工商三經濟勢力，互相

衝突的緣故。具體的表獻於鹽鐵論一書。但是後來，因爲政治思想等關係，——說明見後——重農者卒勝，重商者終敗了。於是重農輕商的政策，行於漢而迄於清，便使工商業雖偶有振作的時候，但總是不能長久，不過作一個高低不平的波狀能了。因而農業也便隨着工商業而衰敗。爲什麼呢？原來農工商之三經濟，正如左右手的相倚呵！

C、消費論　中國經濟思想，因生產重農；在農業性質，乃受天然的限制。對是在消費論上，乃有二特點：卽一爲節儉；一爲貯蓄是。此種思想，老子有然；孔子亦有然。又左傳謂：「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史記謂：「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節儉爲先。」其倡之最極端的，則有墨子。墨子的非樂，及反對儒者的厚葬久喪，皆是此種思想的表現。至於貯蓄方面，則「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九年耕而有三年之食」的貯蓄政策，無論是法家抑儒者，通是這樣主張的。所以後世貯蓄的社會政策，便日見發達。如隋長孫平的義倉法、朱熹的社倉法、皆佔國民共同貯蓄上的重要位置。因上述的三點，所以我國歷史上的財政原則，也有如下的三點：

A、量入制出　禮記王制謂：「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然後制國用。地大小，視年

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是即以府庫的盈虛，而為用度的伸縮的一種原則。此制自周而下，善理財的人，沒有不遵守的。

B、經費節儉　中國經濟思想的消費論，既在節用與貯蓄，所以在國用方面，也沒有不主張節儉儲蓄的。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荀子謂：「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陸贄謂：「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這便是國家經費亦在節儉與貯蓄的一班。

C、薄稅斂　這也是儒家、法家、道家同一的主張。呂覽謂：「竭澤而魚，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新序引魏文侯言：「夫貧其賦稅，開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殊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論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凡此等等，便是我國要薄稅斂的由來。

因為以上三者的財政原則，故在我國的賦稅史上，關於賦稅的系統，幾可謂之是完全的單一田賦制。其在上古——即第一期中，賦稅制度，完全是單一田賦制，可以不必及。秦漢而下，雖有對人的直接稅，如算賦、庸、調、丁稅等；對物的間接稅，如鹽鐵、酒酤、

茶稅、關稅等，然其主要收入，仍在土地。直到唐宋，迄於明清，賦稅制度，雖稍更變，唐代則有架稅，助軍錢；宋代則有月椿錢、板帳等等名目。但此種賦稅，在君主方面，要皆認為取便於一時；在國民方面，便簡直認為煩征苛斂。清代的收入，乾隆朝歲計共五千二百五十三萬兩，地丁、漕糧的收入，占四千三百五十九萬兩，仍是以土地單稅為最占重要位置。由此看來，可以知道中國的賦稅制度，自秦漢而下，雖有因經濟情況的變化，政治的發展等等，在財政及賦稅上，現出一種必須由簡入繁的趨勢，但始終只是因注重農業而保守租稅上的固定主義，不似歐洲各國的活動主義，趨於複稅制。於是國家的財政與政治，固不得發展；而國民經濟之進步，也被阻礙了。然還不止此，尚有其次：——以上參看胡鈞中國財政史，甘乃光先秦經濟思想史及黎世蘅中國經濟史等——

乙、政治上的原因　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幾點，如下：

A、政治上的君權化　由上第二節，我們可以看到政治的變遷，是由部族而趨於君主專制。在這種君主專制，所圖謀者，是在君主階級——即功臣、貴族、國戚等的富貴利達與利益，而不是為國民與國事的。並且歷代君主的出身，皆不能說是正大，多沒有受教育，

不是在土匪與流氓中鬼混出來的，便是在君主與官僚下驕養慣了的。所以他得天下，只是一個馬上的武力。及既得天下以後，富貴的目的已達，便要謀帝王子孫萬世之業。於是他希望一方面要有不法的法；——如歷上不能解決的封建與郡縣問題，即在於此——及一方面，要有皇帝的忠僕與順民，而不願國事的發展及國民的自動？尤不願商人的經濟勢力，壓倒政治勢力，此則在歷代的梟雄君主，多有遷徙國內豪傑，以及富商巨賈以實邊圉的由來；也便是君主施行愚民政策的由來。

B、由上第三節所述，我們可以宗法與政治的關係。但宗法之行，是利於農村，而不適於工商城市的。所以孔孟的理想社會，皆具有一個「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的鄉村社會，因而主重農。

C、農民與政治道德　農民性靜而質樸，不似工商的性動而質譎。所以儒家與法家，皆看到了農民的易治，而主張重農以抑工商。所以儒家罵商人爲賤丈夫，及道家說工人爲奇技淫巧的話，便接着來了。

因此三者，所以吾國的國家政治，與經濟思想，不但不能領導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而

反阻礙國民經濟的前進。於是其中所生惡劣的循環因果，除了因國民經濟不能發展，以致得到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的事務，均不能進展以外；還可以看到政治與經濟變亂的一條公例：即是因爲政治無方，農工商三經濟，又各自影響而不能發展，乃國家又偏重農業而遏抑工商。其在農業，是有如下的兩點：

甲、農業既不能發展，而土地則有限，使國家時際承平，人口日多，則必因農業受天然的限制，漸漸有失業者；殆失業者既多，則遊民生、盜賊起、而大亂出。在此一點，列代的皇帝或宰臣，雖曾積極講求：其一、「驅民入正業」的政策，——但尤重農業，是不啻添薪而求滅火；於是乃有其二；由狹鄉移往寬鄉的移徙政策，但因工商不發達，交通亦不發達；且復在宗法勢力的下面，農民不願離鄉背井，也沒有多大效果。所以吾國的政治與社會，永不脫十年小亂百年大亂的狀況。

乙、農業既受天然的限制，便不能負擔重稅。在此一點，列朝開國之君，雖尚知薄稅儉，與民休息；但過不了數代，便政治腐敗，皇帝奢侈，官吏貪索等等，因而租稅大重，農民便不能安生，而要流爲土匪，形成一種無理性的反抗暴動，造成一個梟雄利用取得皇

帝地位的絕好機會。

以上兩者，是我國政治狀况一治一亂的由來。至於經濟狀况呢，也隨着政治的一治一亂而一盛一衰。亂的時候，便百業斷絕；治的時候，百業又漸漸興起。所以春秋戰國的商業，自秦統一迄楚漢相爭，便漸漸蕭條；漢代的商業，到三國之際，也快到沒有了。故三國魏、蜀、吳的巨頭，當時雖想打仗，但苦於沒有軍費。於是魏武便任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及招撫關中流民，勸耕積粟，以充軍實；孫吳便親自受田而耕，又陸遜也請廢諸將田；諸葛亮治蜀，便積極勸農，且屯田於渭，以充軍費。是在此等情況下面，還能談得到什麼大生產事業嗎？

由上述來，可知中國的國民經濟，農業經濟要算是一根最大的峙柱。至於工商業呢？在工業一項，因為完全是手工業，沒有什麼機械，所以不能大發展。惟有商業一項，他只要交通便利，物產豐富，便可以隨時自然地發展起來的。司馬遷說：「用富求貧，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因而我國的商業，如果按照最窮僻的地方來說，尙有家庭自給的經濟，稍大一點，亦不過村落經濟；——這以交通不便為其大原因——若當水陸要衝，

或政治中心的地方，便可以瞻到城市經濟，顯出商業的色彩來。所以我國的商業，如果時會承平，縱國家看輕他，他也可以得到一個畸形的發展，而頗有可觀。不過時代混亂，便不然了。所以我國的農工商三生產業，在一方面，工商業兩業，雖與國民經濟有絕大的關係；但在一方面，工商業之影響於政治與社會，殊不及農業之大。故小之個人的生活，既在農業；大之國家的財用，亦在農業；與夫學者的經濟思想、政治上的村鄉組織、社會上的宗法聚團、更莫不在農業，於是乃有一方面，一般國民中的普通心理，皆有植田園以長子孫的觀念，——即自宗法勢力中來的——而皆投資於農業；及一方面，雜以政治階級廣占土地的關係，——即自封建勢力中來的——因而農民中的地主，遂有三種，如下：

第一種是：由政治上來的地主，——即皇帝、功臣、皇親、國戚，等等，

第二種是：由智識上來的地主，——即士大夫階級，如劣紳、土豪、猾吏等——說見下節——

第三種是：由經濟上來的地主，——即商人是。

以上三種，第三種不如第二種之大；第二種又不如第一種之大。所以說到吾國的農民與

地主、農業與土地制度的時候，我們可以見得到的，是如下：

甲、第一時期　在這一時期的部族割據與君主封建，自君主、諸侯，以及卿、大夫、士等，皆以階級，各占有相當的土地，而行共產的公田式，固不消說。但是他們對於農民的待遇，是不是便和歐洲封建制下的農奴(Serf)一樣，在這一點，我們似難於斷定。不過當時的情形，如堯舜禹時代，似乎是本族的人，既有為貴族者；也有服農業者。但對於外族，或係戰勝俘來、或係買來，則均是奴役種田，正好像白人開發美洲役使黑人一樣。所以我們在堯典上，便見有「九族」「百姓」「萬邦」「黎民」等字樣。——參看夏曾佑中國歷史第一冊——我們又從詩經、漢書食貨志、公羊宣十五年初稅畝何注、韓詩外傳的言井田、以及左傳中所記的古制古事等看來，他們大概是務農的時候便務農，不務農時候便去打獵，所以有「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的制度。並且他們不論是「農」或「獵」的所得，似乎均有一部份要獻之諸侯或地主。所以有「言私其豵，獻豣於公」，及「為公子裘」「為公子裳」，與耕公田或貢賦等事。又他們或是打獵歸來，或是初到農時及農畢的時候，似乎皆有祭神、宴會、與跳舞的事。殆後人口增加了，外族與本族同化的多了，氏族破壞了；國土雖然漸大，但也不夠用了；商業興盛

起來了，交通範圍也漸大了，政治的制度隨着社會的制度崩壞，於是春秋戰國與秦代到了！

乙、第二時期　秦代以後，入於第二期，在政治上，土地雖許私有，而不是公田制下的「等級占地」；但是皇帝、功臣、皇親、國戚等一般政治階級，仍占土地不少。所以漢代除「籍田」係皇帝僱人耕，及屯田係軍耕之外；還有官田。這種官田，自帝畿以至各郡國皆有，可以由皇帝隨時賜予功臣。但是一般農民，則多是沒有田。如明帝時詔郡國以公田賜貧民，宣帝假郡國貧民田，元帝令民務農，無田畝者假之。這是政治上承着封建制的占田。再加以豪強、猾吏、商賈的占田，於是漢代的農民，誠如董仲舒所謂：「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馬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計。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治。」這是「限田」說。其說如

晁錯、師丹皆有是說。又孔光及何武復武帝限田之議，亦謂：「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因權貴丁傅董賢用事，皆不便也，遂寢不行。由此看來，可見封建勢力下政治階級的占田，還要比豪強、商人的占田多得多。

因爲上述的緣故，到王莽的時候，便要實行儒家所夢想的「封建制下的等級占田」了；也便是晉武的限田，後魏、北齊、後周、隋、唐等代均田制的背影。至於「限田」與「均田」這兩種制度，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均田產的一個好制度。但按之實際，不過是增重封建勢力等級占田的程度，減殺富商豪強占田的力量罷了，——因爲古代等級占田，是有法度的；秦後而下，則無法度，均田限田，便是要恢復法度。——與實在的均田產，毫無關係。所以只要政治或官吏，稍爲一壞，反而加甚田產的不均、與農民的痛苦、及激起農民的暴動。如後魏的均田，除了皇帝占田不算外，功臣、皇親、國戚、權貴等，可以多占田；諸宰人之官，還授公田，刺史十五頃……等；又富貴家的奴婢與牛，也可受田，這還說得上是均田嗎？其餘

各朝，皆係如此。所以唐代的均田，也是除了皇帝的占田不計外，還有職分田，——即按官職大小授田——公廨田，——行政機關辦公費的田，——及莊田，——即諸將軍所買民間的田園——這不是增重封建勢力的等級占田，是甚麼呵！所以在行均田制的時候，如北齊文宣之世，社會上的狀況，遂以富豪多有牛田，占地甚廣，貧民幾難於得田。故宋良世上書，請以富家牛田、先給貧民，欲以矯其弊。朝庭輿論，皆稱其合理。顧終未見諸事實。又朱孝王關東風俗傳云：「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者連畛亘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爭地文案，有三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又云：「河渚山澤，有司耕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民，不得一壟。」又云：「露田雖不聽買賣，亦有重責——(債)——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又懶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蹔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猶縣聽其沽賣田園故也。」且均田制的施行，係以各地的戶口爲基礎，故三年必造「鄉帳」、一年必造「計帳」，即戶口册與賦稅簿是。於是一般官吏，便可在這裏面作弊。如唐玄宗時：宇文融、王鉷等爲戶口使，徒事搜括，適脅州

縣，妄增逃羨；不但戶口調查不確，並且妄增戶口以重民負擔，或無田而使之納租；或已亡而迫隣戶稱租，籍帳之名數，幾全與事實相反。加以租稅不常，課目繁多，民不堪命，乃相率棄田而逃，致多浮租。故杜佑述唐均田之後，遂謂：「雖有此制，開元天寶以來，法令廢弛，兼并之弊，有踰漢成哀之間。」於是便變成一面則占田者多；一面則逃田者多。在唐玄宗的時候，一般朝臣，如李嶠、韓琬、宇文融、皇甫憬等，皆以逃戶爲慮，屢請玄宗安插逃戶。徒以玄宗因循，遂致逃戶日多，有田難耕，遊手放蕩，形成盜匪，而爆發於安史之亂。迨肅宗至德二年，疊勅諸州，安插逃戶，然已太遲了。且亂勢既成，雖有善法，欲返從惡如崩的多數亂民，無所用之。所以肅宗以後的逃戶，終不能使之得所，以至河北再變，中原多故，晚唐黃巢，聚衆稱兵，劫掠屠戮，江山血洗，大半皆逃戶湊成之而已。

唐代以後，均田制便沒有行了。到宋代，簡直由皇帝、功臣、皇親、國戚、以及豪強、猾吏隨便的兼并田土，搾取農民。所以宋代的田制，除了屯田、方田的軍耕田；職田的職分田外，便是官田與豪強兼并。明代的官田，並有種類：(一)舊有官田；(二)還官田；(三)沒官田；(四)斷絕入官田；(五)皇莊及皇族勳舊賜田等等名目，占田約民田七分之一，這筆

數目，是多麼大！清代的田，則防軍田以外——也有官田——如學田、公田、牧地——並有旗田。——此田不隸州縣，由內務府設莊頭收租，爲分給八旗用的。——由此等等看來，可見中國農民上的大地主，第一個便要算封建勢力下政治階級的等級占田，其餘如商人等，是不過稍爲沾潤而已。

因爲上述的緣故，所以吾國的經濟，始終是向着封建與宗法兩勢力之下倒退，而轉於停滯入於腐朽了！

五　國民之蠹的士大夫與教育

士大夫階級與官僚政治，陶希聖先生的「官僚政治及其摧毀」「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從中國社會史上觀察中國國民黨」三文中，可算是說得透澈極了！

的確是，士大夫階級與官僚，雖然那一國都有，不過形式不同。但按照國民經濟說來，他是個不生產者。「儒者不事生產」及「無野人莫養君子」「小民奉絲麻布帛以事其上」這是儒家的親供。又按社會政策說來，他是個不正業者。原來社會政策上的職業問題，大概有四部份：（一）當業與不當業；（二）能業與不能業；（三）失業與不失業；（四）正業與不正

業。在士大夫究竟是那一項呢？因爲他不生產；而且依草附木，號曰「四民之首」，擾亂社會。所以他是個不正業者的「國民之蠹」。

士大夫階級的起源，在第一期中，卽天子諸侯的家臣。——參考上述陶先生的三文——這種家臣，一方面是世官，統治一切庶人。如禮記王制所謂：「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另一方面，是握着教育之權。所以他在着時，便有「官府之教」。如禮記王制所謂：「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參考原文——的話，恐怕與現在蒙古西藏等處的神權政治，幾個喇嘛或僧侶，抱着幾本經書及一本黃歷，便指教全族的吉凶婚喪等事是一樣。又他退職時，便有「學校之教」。王制謂：『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參考原文——尚書大傳謂：「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註謂：「所謂里庶尹，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又公羊宣十五年何註謂，「一家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畢，父老教於校室。」等等的話，便是他們退職施教的情形。並且，我們要知道，在氏族政治與宗法社會之下，是重耆老與尊貴的。這種重耆老與尊貴的情

形，一直到春秋時代，還保存着。所以春秋隱公、石碏諫衛莊公謂：「賤防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是謂六逆。」國語周語仲山父諫魯武公謂：「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又「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神明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因而後世之學校中，便有養老之禮；在官制中，也便有三公三孤制的由來。

士大夫在上古時，爲官則有祿田，學校中則有士田。但到後來，政治混亂，田制破壞，一方面固有一部份，乘着機會，爬到政權上面去了；——如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之類——然在另一方面，當然也是一部份，因爲祿田與士田的靠不住，——即薪俸與教育經費的靠不住，在生活上便不能維持。這便是春秋戰國時代私人教育之盛，及諸子百家——即所謂九流——的由來；也便是遊士說客源源興起的由來。所以中國士大夫階級與官僚政治的長成，一方面與政治之日壞固有關；但一方面，也是中國後教育制度最爲失敗的源泉。

當春秋戰國時候，諸家競響。除老子以外，其餘沒有一個不爲教育及爲遊士說客的人。

其中獨有一個儒家，在一方面，是述而不作，承先啓後，要沿襲舊日的制度；另一方面，在當時所成立的教育學說，也以儒爲最。所以法家雖然罵他「儒以文亂法」，但他終究在教育上與政治上，得着了最大的勢力。

這種教育與遊說之士，在春秋時，現象尚好。但到了戰國的時候，種類愈雜，便愈變愈壞。差不多完全是假學問遊說，以求利祿的人，一種熱衷權勢，淪喪道德的形勢，既不惜殺妻，也不惜賣友。所以朝秦暮楚，覆雨翻雲，完全是拿別人的國家，當作自己富貴利達的犧牲品。因而齊王建降秦以後，枯寂無聊，便發出「松耶柏耶，與建共者客耶!?」的悲哀了！

秦代統一以後，中國的社會構造，入於第二期。在秦始皇，是任法集權的人，對於說客的厲害，早已領着了教訓。於是有兩條政策：一條是設博士官，大抵係因收攬當時的學者說客及備使喚而設的。所以馬端臨說：「案西漢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既曰通古今，則上必有所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實繁。秦雖有其官，而甚惡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轉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一條便是發於李斯統一思想與文字的焚書坑儒。這種思想，秦室是迫於不得已，尚有可原處不過秦室的政治，實

在太專制，租稅實在太重；又加以李斯、趙高、二世的奢侈遊樂，農民暴動、封建反動；一呼便倒了。

士大夫階級，歷過春秋、戰國、秦代以後，雜着政治經濟等變化，可算形成了。所有游惰、倚賴、爭訟的惡劣性質，——陶先生語——皆已表現。故遙承乎上，則政治壞；緊接乎下，則社會壞。並且又因爲獨占教育與智識，以維持他的身分之故，所以遂聯帶的生出幾個大弊病。如下：

甲、教育本身的腐敗　教育本身的腐敗，卽自遊學的私人教育，以教育干利祿及論政治而起。所以到了漢代，國家的教育復興時，便有兩點：

A、武帝設五經博士、補弟子員，也是倣照秦始皇設博士的辦法，要消納一般士人，不使和他搗亂造反。所以文獻通考謂：「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考選用之爲學官，而復補卒史及郡國備員，意輕可知。」可見當時的士大夫，滯留郡國的必不少，如果沒法消納他，他是不能安生的。並且武帝的崇儒興學，終不過是幾個博士及弟子員，還沒有正式的學校制度。

B、武帝的崇儒興學，還有一種作用在裏面。因爲在政治上的階級，如功臣國戚等，多是一般不識字及吃飯不做事的人，所以不得不用一般識事的人，爲他們草詔令做文章供奔走。所以當時設學的本意，便是「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員。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事；其高可爲郎中者，太常藉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才及不聽通一藝輒罷之。」可見是時興學的標準，原不過以能草詔令做文章爲指歸，其餘幾爲附帶條件，所以不過是詔令文章類的練習生。

但是一般縛於利祿的士人們，也欣然就範。以致教育與利祿相結，讀書卽所以求官的思想，日深一日。殆後教育雖然擴大了；漸漸由增設弟子員，變成西漢的國立大學，沿及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皆有國立大學的設立；科目也頗有擴大，如唐代的律學、算學、醫學、書學；宋代的畫學等。但教育與利祿相結的事實與思想，始終是牢牢不破。並且誘致皇帝的干涉教務，如漢明帝親臨講經，及臨制稱決之類；與夫師生標榜干涉政治的惡習，如

漢、唐、宋、明的黨爭等；叩其實，究竟沒有什麼。不過是因爲政治上的位置，已早爲宦官、宮妾、功臣、國戚等所佔據；並沿着說客遊士的習氣，要立異鳴高，互相傾軋，所以鬧得一團糟。又中學教育，自漢武帝時，卽有派遣博士的郡國學校，並且有升入大學的手續，但與大學一樣。至於小學教育呢？便是落伍的士大夫們包辦了。

乙、道德的墮落　道德的墮落，也是始自遊學說客而來的。所以在一方面，便有皇帝的玩弄文臣，如東方朔、枚朔、枚乘、方皐之流，待詔金馬門中，武帝俱以俳優畜之之類。及一方面，一到後來，一般皇帝，因爲士大夫的靠不住，乃提倡奴隸式的氣節，如光武見阿莽者數十萬人，遂有此舉是。

丙、學術的退降與虛浮　吾國學術，在春秋戰國時代，極爲發達。就中惟老莊一派，涉於虛玄，屬消極者外，其餘如孔、孟、荀、墨、申、商、管、韓、孫、吳等，皆屬積極，並且極切實用，不尙空論。乃自秦漢而下，遂煙消雲散，渺不復見。其所變化的，厥爲如下的三派：

A、其一派爲黃老思想的變化　此派變化，其高者則成爲隱逸派，如嚴光之輩；或玩世

派，如阮宗嗣之流；又燒丹派，如葛洪、嵇康之徒；其最低者，乃與世俗的鬼話神談相結託，成爲黃巾賊的將軍，張魯之五斗米道；以迄龍虎山之張天師等皆是。

B、其二派爲印度思想之傳來與變化　印度思想，自漢代發其端後，大盛於有唐。除由六朝至唐傳來的十三宗外，且另闢四新宗，其變化的影響於社會，幾全同於黃老，高者成爲厭世派、隱逸派；低者亦變化爲神怪。

以上的兩派，影響於中國社會者甚大，依我觀察，幾可以說是「中國國民公毒」的一種。其來源(一)政治的污濁與高壓所成的厭世派與隱逸派，如詩歌中所謂：「不管人間是與非，」及「英雄末路半爲僧」等；(二)國民的無知識，加以中上社會的厭世，隱逸，所成的怪派。因此兩者，遂使中國的全國民，一方面皆曰樂天、安命、知足：「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無酒再作主意；」以及「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等等的消極思想，懶惰思想，而毫無公共團結氣與進取氣。又一方面，因佛道盛，既使遊民惰人，假神怪，結善緣以寄生，有害於國民經濟。又使神怪遍中國，所謂地獄天堂，菩薩羅漢，聖帝天王等。肇事之大者，如白蓮教、洪門祖師、拳匪、以及現在之紅槍會、黑槍會、天門會等。其小者，則人生之婚、喪、

嫁、娶、求子、求壽、治病等等，舉人生的範圍，幾無不包括。乃致人生不信己而信神；不求己而求天，種種怪誕返於野蠻固陋的思想，風靡全國，均陷於一種宿命論的狀況，這眞是所謂「自作孽不可逭」吧！

除此兩派以外，還有一派，便是：

C、儒家思想的變化　儒家思想，在其初時，大體上尚不能說壞。其開山祖師如孔子的爲人，在人格、精神與氣象上，實有一種高大、偉壯、深宏之處，足使當時的及門諸子，皆望塵莫及。殆後孟荀稍爲傑出，如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之間。」及荀子之「浩氣養心，大心則天而道。」等，雖較孔子差，然猶甚佳。不料戰國而降，末流所至，如秦漢儒者與經師，皆卑卑不足道。所謂申公、轅固、大小夏侯之流，不過徒以傳頌而已。或隨人主的好惡，以爲進退，亦兩無所表見。如前後漢以博士入官的，有賈誼、董仲舒、疏廣、薛廣德、貢禹、泌花、胡母生、江公、顏彭祖、蔡茂、承宮、曹褒、盧植、戴憑等；除作一二高調而外，其餘幾毫無所有。下迄唐、宋、元、明、清諸大經師，便均有木偶氣。所以吾國的學術思想，日見消沉，於是蛀書虫、腐

儒、學究、文妖等，便遍地皆是。因而吾國的學術思想，始終沒有脫去太古時代的神祕意味；而宗教呢，除稍高者外，一般民衆，始終只有一種原始的宗教！

在儒家中，除此以外，其有創造，或經世改用思想的，雖未嘗無人，但總是少數吧！

丁、民衆的無智識　吾國民衆，雖已長成四五萬萬人，因爲教育方面，毫無普及思想；小學教育，國家始終沒有顧問，所以識字的人，尚不過百分之幾。且因士大夫們，戴着一般的皇帝貴族，高高在上，雖受了二重的搾取，亦不知作有理性的暴動，與有秩序的反抗，這誠是可憐呵！

六　今後的趨勢

上面所述的，通是自第一期至第二期之末的現象。那時的現象，按照世俗的說法，便是文相武將；武將係無智識的野蠻化，文相係受教育的墮落；賸着最多數不文不武的農工商，——卽經濟上的生產者；國家的良民，橫伏於地面上被搾取。這也許是當時社會結構的眞理吧！

這種現象，到了明末的時候，高鼻子綠眼睛的人，自海上來了，於是便伏着了搖動的根

基，漸漸入於現在和將來的第三期，——即自海上來的商人、教士，一天比一天多；中國舊日的社會構造，便一天比一天動搖。雖始初的時候，尚藉着一個紙老虎的聲威，敷衍過了幾時。但到清代中葉以後，便大失敗，一直到今日，還是失敗。

在這一期變化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分爲幾點，如下、

甲、政治　這一期的政治變化，當然是歸於「由君主入民主」一個大名詞之下。但有如下三種阻礙，妨止民治的前進：

一種、是外來的掠奪勢力，——即帝國主義者。

二種、因爲我國的社會構造，接着第二期中的君主、官僚、武人的一切習氣太深了，所以滿淸雖倒，而官僚與武人，便狼狽爲奸的割據起來了。因爲民治始終沒有實現，祇是倒了一個君主的空殼，乃赤裸裸實現出舊日所謂「大亂時代」的武人政治與官僚政治，變成整千整百的皇帝，高壓於國民之上，於是政治愈壞。

三種呢、便是民衆的無理性舉動，因爲壓迫不得安生的緣故，便又來了。一方面有不解民治思想的老百姓們，以爲民國是不如前清，天天在着那裏焚香告天，束手焦心。另一方

面，則土匪遍地，張家老大、王家老三、涶去變匪而又變兵，希望發幾個洋財，做一個將軍。並且一般受教育的學生們，也是存着一個揚名聲、顯父母、作官僚的心思。於是層層的軍閥與官僚出來，此興彼仆，大家均放着正事不幹。以致變成社會上與政治上，天天是人浮於事；而一看到社會上與政治上的事，天天是百事不治。爲什麽呢？因爲民國之所以立國，根本上卽在於國民自治。如果國民沒有自治的能力，着實地拿出民治的精神來，以實行民治、而顧問政治、參加政治、及監督政治，便只算是張口說費神，毫無是處。這便是我國辛亥以後，民治失敗及法律無靈的由來；也便是中山先生要有軍政與訓政兩時期的由來。所以在這一期的政治形勢，是有三種最大的病源：

A、外人勢力乘機的掠奪政權；

B、軍閥官僚乘機的竊取政權；

C、民衆無智能舉行政權。

但是在趨勢上，全國民衆，因外來的掠奪，與內因的割據，所受的痛苦。雖然不少，然尙能於痛苦之中，千磨百練，依着中山先生的指導，漸漸的現出一線光明來！

乙、經濟　這一期的經濟，因爲我國的經濟，已入於停滯而流於腐朽的狀態，與外來的工商資本主義相遇，在一方面，固然是失敗；但另一方面，於失敗之中，便有幾種重要變遷的趨勢，如下：

A、農業的衰退

B、城市的發展

C、手工業的衰退

D、官僚軍閥變爲資本家

E、買辦階級的興起

F、外資的侵略

以上六項，在陶先生文中，已多論及。——並可參考日本同人社伊藤武雄著支那社會研究一書，恕未徵引。——

丙、思想　這一期的思想，因爲新舊衝突之故，甚爲混亂。所以在一方面，我們既見到了，東西洋各國的留學生，各以其所染，爭持掠奪於政治界與教育界；而在另一方面呢，我

們也見到了社會黨和共產黨，是與聖道會和禮制館，同樣的可憫而少趣。爲什麽呢？因爲舊者既不適於環境的生存；新者亦與環境過於懸殊。卽果係本其眞實的信仰，發爲運動，尙不可存於現在，何况尙雜有假號召以爭權利的關係嗎？

因爲上述的三者，其關係所至，遂使全盤皆壞，舊日的中國，乃不能統一。而現在呢？由上面觀察，可以知道是百孔千瘡，但究竟要怎麽辦呢？我請略述幾句於下，以作本文的結論。

七　國民黨的責任

由上面所述的許多，我們便知道中國舊日不能適於環境生存的社會，是缺乏些什麽？所以中山先生，他告訴我們要民族，又要民權，更要民生；並且告訴我們：一方面要心理的建設，一方面要物質的建設。這兩方面的建設，在手續上固然是軍政、訓政與憲政三個時期。但是中山先生的意見，在中國舊日的社會構造，壞處雖然甚多，然好處却也有些，不過比較的少罷了！因而在他的學說與主義上，曾表現不少的微意。——這種微意，如有暇時，將再寫些來請教讀者——

現在實行中山先生的學說與主義的責任，是誰負呢？所以我最末的一句話，是「國民黨的責任」。

（附註）本文所論，讀者並可參考日本參謀部編中國政治史綱領及加藤繁支那之社會組織，因其與本文多有互證之處。

第三章　資本主義社會說

中國社會的歷史的發展階段

杜頑庶

一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以經濟基礎的發展爲前提，這已經是成了人衆周知的事實了。但人類經濟的發展卻依他的工具的發展爲前提。大抵在人類只知道利用石器或用青銅器的時候，他的產業是只能限於漁獵和牧畜的，他所能加工於自然物的力量只能有這一點。當時的社會便是由動物般的羣居生活進化到以母系爲中心的氏族社會。

原始的人民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這在我們周秦之際的古人早已發見了這種現象。呂覽的『恃君覽』上說：『其民聚居羣處，知母而不知父，親戚夫婦無別。』這在歐洲是前世紀的後半期才發現了的學說，但在中國是已經老早有人倡道過了。所以這種學說在我們中國應該是

並不稀奇，並不是那樣可以使人驚駭的。不過中國的古人只知道有那種生活的現象而沒有人詳細地去研究過那種原始社會的各種結構，在這兒我們仍然不能不多謝近代的學者，特別是美國的 Morgan 與德國的 Engels 了。

Morgan 費了他畢生的精力研究美洲土人的生活而成『古代社會』("Ancient Sociaty," 1877)一書，Engels更依據Marx的遺囑把它縮寫成『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r Privateigentu ns und des Staats" 1884)。在Engels的書名上已經表得很明白的，這幾位先進是把古代社會的祕密——特別是由氏族社會轉移到國家組織的變遷，已經剔發出來了。這兩部書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有介紹到中國來的時候，我們只就在本文的前進上有幾個必需知道的準備智識，把它撮錄在下邊。

第一、婚姻的進化是由雜交而純粹的血族結婚而亞血族結婚而成最後的一夫一婦。在氏族社會的初期是純粹的血族結婚。就是在同一母系之下的一切男女自然成為配偶。這種交媾的方式，經過不知若干年辰的經驗，知道了會發生不良的種子，於是才漸漸的加以限制——含有優生學的意味的限制。起初大約以年齡為限，就是在同一儕輩的男女彼此配合，就是同

胞的兄弟姊妹自然成爲混合的夫婦。更進便成了有名的亞血族結婚，這在 Morgen 和 Engels 二氏的書中是稱爲『彭那魯亞家庭』(Punalua familio)。這是Morgan氏的最大的一個發現。

Morgan氏在研究美洲土人的家族制度的時候，他發現出他們有一種奇怪的遺習，便是父之兄弟與母之姊妹之子皆爲子，彼此間亦稱爲兄弟。父之姊妹與母之兄弟之子則皆爲猶子，彼此間亦稱爲從兄弟姊妹。而且母之姊妹之夫，母亦夫視之；父之兄弟之妻，父亦妻視之。美洲土人的生活早受歐洲人所同化，這種制度的遺留和實際的家庭組織不適合，Morgan 氏起初很苦於說明，後來在檀香山的土人中才實際現了這種實際的家庭組織。便是檀香山的土人一直到十九世紀的前半都還實行着異姓間的兄弟姊妹的羣婚，便是一切男子除開自己的同胞姊妹之外是一切女子的公夫，而一切女子除開自己的同胞兄弟之外是一切男子的公妻。這些成了公夫公妻的男女便不相謂爲兄弟姊妹，而只相謂爲『彭那魯亞』。這個現象一發現，那美洲土人的遺制便迎刃而解了，Morgan 氏便稱這樣的血族爲『彭魯亞家族』。我因爲我們中國的爾雅上有『兩壻相謂曰亞』的文獻，便雙關二意地譯爲『亞血族結婚』。

這種亞血族結婚一發現了後，實在是並不稀奇的現象，在現在的野蠻民族中很多還實行

着，我們中國的西藏人便是一例，而且各文明族的祖先都是經過了這個階段來的，這個階段事實上是氏族社會的典型的婚姻。

第二、氏族社會是以母系爲中心的，在當時男子要講『三從』，便是『在家從母，出嫁從妻，妻死從女』。當時的社會是沒有父子相承的習慣的，爲子的均要出嫁，所以不能承父。反是兄弟可以相承，因爲兄弟是連翩出嫁的。

第三、那種社會是沒有私有財產的，一族內的財物、都是共同享受，一族人都是相互扶持，但有一種民主的組織來管理族內的共同事務。大抵一姓(Gens)有一姓人的評議會，由評議會共選出一個酋長以掌理一姓的事務；遇有戰爭時更選出一個臨時的軍長。合數姓而爲一宗(Pratrie)，宗又有評議會，由各姓的酋長或軍長組織而成，以共裁一宗中各姓相關的事務。合數宗而爲一氏(Stamm)，氏亦有氏評議會，其組織成分完全相同。合二三氏而爲一族，族有最高的領袖，是以酋長中之一人兼任，其權力甚微。——這個組織是 Morgan 氏就 Ilocoi 人的研究所得的結果，這兒自然是已經經過相當的長久的進化的。

就這樣在以石器銅器爲工具，以漁獵牧畜爲生產本位的氏族社會，是以母系爲中心的原

始共產社會。

但這種社會可以說因爲鐵器的發明便完全破壞了。因爲鐵器的發明促進了農業的進化發展，母系中心的社會便不能不轉變爲父系中心的社會。

牧畜和農業的發明都是男子的事體。男子由漁獵中發明出牧畜的事業，由牧畜的芻秣中又發現出禾黍菽麥的種植，這是必然的經過。照原始的習慣，各人隨身的工具便是各人的私有，男子有漁獵用的弓矢，女子便有家庭。到牧畜種植一發明以後，男子也相沿地領有着六畜和五穀。這樣生產的力量愈見增加，女子的家庭便不能不降爲附庸，而女子也就由中心的地位一降而爲奴隸的地位。這在社會的表現上便是男權的抬頭、私有財產制的成立、奴隸的使用、階級的劃分、帝王和國家的出現。這兒是文明的開始，然而也就是人類搾取人類的悲劇的開始。

在國家初始成立的時候是純粹的一種奴隸制。奴隸的來源是甚麼？便是被征服的異民族和同族中的落伍的弱者。那時候的階級可以說就只有貴族和奴隸的兩種。貴族是奴隸的所有主，奴隸是貴族的所有物。貴族是支配階級、搾取階級；奴隸是被支配階級、被搾取階級。

這時候的氏族的成分可以說還是嚴密地保存着的，就是貴族階級至少是一氏一族。

但到鐵的冶金術愈見發達，農業愈見進展，而異民族的被同化者愈見加多，同族中的落伍者也愈見增劇，血族的成分漸漸稀薄了下來，以前的貴族習久於養尊處優的習慣，日見與產業相離；而產業的生產權却操縱在多量的奴隸階級的手裏。這已經成了太阿倒持的形勢，到這兒便不能不來一個第二次的社會變革，便是貴族的倒潰，奴隸階級中的狡黠者的抬頭，這自然會成爲一種分析的地方割據的形式。在農業上便有莊園制的產生，在工商業便有行幫制的出現，在政治的反映上便成爲封建諸侯，於是奴隸制的社會又一變而爲封建制的社會。

封建制的社會和奴隸制的社會並沒有多麼大的懸殊；不過奴隸制是氏族社會的孑遺，多量的含有血族的成分，而封建制則是多量地含有地域成分的奴隸制能了。農業上與地主對立的農夫上，行幫制下與師傅對立的徒弟，行政上與封建諸侯對立的臣庶，事實上只是變相的奴隸。

但自從蒸汽機關發明了以後，產業更進展到一種更新的階段；大規模的生產、大資本的集中、海外大殖民地的發現等等——在封建社會的胎內生出他怎麼也容納不下的一個胎兒，

於是社會上又來了一個第三次的革命。封建制度逐漸崩潰了，在那封建社會的廢墟中高聳出近代資本制度的組織。階級的分化成爲了資本家與勞動者尖銳的對立。

以往的社會的進展就是這樣，一切的社會現象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瞻往可以察來，這是一切科學的豫言的根本。社會科學也必然地能夠豫言着社會將來的進行。社會是要由最後的階級無產者超克那資本家的階級，同時也就超克了階級的對立，超克了自己的階級而成爲無階級的一個共同組織，這是明如觀火的事情，而且事實上已經在着着的實現了。現在是電氣的時代。電氣的生產力不能爲目前的資本制所包容，現在已經是長江快流到崇明島的時代了！

以上我把社會發展的階段的一般，簡略地敍述了出來。這兒當然有許多過於圖式化的地方，但大抵是現在一般新興科學的正確的縮寫。我們根據這個縮寫，回頭來看我們中國的社會發展的程序罷。

二

我們中國的歷史素來是沒有科學的敍述，一般的人多半據古代的神話傳說以爲正史，這

是最大的錯誤，最大的不合理。

我們要論中國的歷史先要弄明白中國的眞正的歷史時代究竟是從那兒開幕。這點如不弄明瞭，簡直等於是海中撈月一樣了。

我們中國的歷史起源於甚麽時候？尚書是開始於唐虞，史記是開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們根據最近考古學的智識所得的結果是：

一、中國的古物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銅器、青銅器，在商代的末年都還明明是金石並用的時期。

二、商代已有文字（二十年前在河南安陽縣有龜甲骨板上鍥刻着的貞卜文字出現），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極端的象形圖畫，而且寫法的不一定，一字有至四十五種寫法的，於字的構成上或倒書或横書，或左或右、或正或反、或數字合書、或一字拆書；而文字的構成上亦或横行或直行，横行亦或左讀或右讀，簡直是五花八門。可以知道那時文字的產生還不甚久，文字還在形成的途中。（關於此項的文獻，有志者可參看羅振玉氏做的『殷虛書契考釋』。）

三、商代的末年還是以牧畜爲主要的生產，農業雖已發明，但所有的耕器還顯然是蜃器或者石器（余有『殷虛書契中的古代社會』一書，不久將出單行本問世），所以農業在當時是很幼稚的。

我們就根據着這三個結論，可以斷言的是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的眞正的起頭！

在商代都還只是金石並用時代，那麼在商代以前的社會只是石器時代的原始未開的野蠻社會，那是可以斷言的。

在商代都只在文字構造的途中，那麼唐虞時代絕對做不出甚麼帝典臯陶謨禹貢，在黃帝時代更絕對做不出甚麼內經素問以及已經消滅的一切道書。更在以前的甚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那簡直是一篇鬼話了。

還有，在商代都只還是牧畜盛行的時代，那麼商代的社會必然還是一個原始共產制的氏族社會，只要是對於新興科學稍稍受過訓練的人；立刻便可以得到這個暗示。

事實上竟是這樣！

一、商代的王位是『兄終弟及』，這是從來的歷史上已經有明文的。

(hunalua familie)

二、據『殷虛書契』的研究，商人尊崇先妣，常常專爲先妣特祭（自周以後妣不特祭，須附於祖）。

三、『殷虛書契』據余所見在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的現象。

從這些事實上看來，商代不明明還是母系中心的社會，而且那時候的家庭不明明還是一種『彭那魯亞家庭』嗎？

在商代都還是這樣的社會，那以前的社會就不言可知了。所以黃帝以來的傳說五帝和三王的祖先都是一家，這正表明只是一個氏族。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誕生傳說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這正表明是母系中心。特別有趣味的是堯舜的傳說。

『有虞氏尚陶』、『有虞氏瓦棺』這是說當時還僅僅是土石器時代。

堯皇帝的兩個女兒同嫁給舜皇帝，舜皇帝和他的兄弟象，却又共妻這兩位姊妹。孟子上有象說的話，要『二嫂使治朕棲』；楚辭的天問篇上竟直說是『眩弟並淫』。所以舜與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與象的公妻。他們或她們正是互爲『彭那魯亞』。

更進，堯皇帝不能傳位給丹朱，舜皇帝不能傳位給商均，禹也不能逕直傳位給啓，這表

明是父權還沒有成立，父子還不能相承。

最後是那時候的禪讓了。堯舜禹都是由衆人公選出來的。我們在『典謨』中看那些『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二人在皇帝面前你推選一個人，我推選一個人，在那兒很客氣的討論。那不是一些各姓的酋長軍長在開氏族評議會，在推選新的酋長或軍長的嗎？

這些正是古代傳說上所保存着的一些氏族社會的影子。我們看在商代以前的社會不明明還是氏族社會嗎？

由氏族社會轉移到奴隸制國家的這個關鍵，古人也是注意到了的了，用古代的話說來便是『由帝而王』。古時的人以爲堯舜傳賢，夏禹傳子，是家天下的開始，所以貶稱帝號爲王。所以在夏禹以前都是帝，在夏禹以後便成了三王。但這帝王遞禪的時期，也有更說得遲一點的。據史記殷本紀的末尾說：

『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稱帝號爲王。』

荀子的議兵篇上也稱堯舜禹湯爲『四帝』，稱文王武王爲『二王』；這可見古人把那第一次的社會革命的時期也有看在殷周之際的時候的。這種見解據我們最近的研究可以說是得着

實物的佐證。便是由原始共產制到奴隸制的轉變，到殷周之際才眞正的完成。

本來一種自然發生的社會革命，是要經過很長久的一個時期的，有殷一代或者都可以看成是一個變革的時期，所以就在奴隸制全盛的周代初年都還有氏族社會的孑遺，關於這以後的論證，我們爲行文的簡便起見，暫且把它們省略了罷。

總之，中國的歷史是在商代才開幕，商代的產業是以牧畜爲本位，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共產社會，這是我們在這段裏得出的結論。

三

周代姬姓的這一個氏族大約是發明農業最早的氏族，我們看它以農神的『后稷』做自己的祖先便可以知道。它自己也有一個獨特的傳說系統的，我們從詩經上可以看出。遠的我們且不必說，但到了太公，就是那『瓜瓞』篇上所說的『古公亶父』，這是文王的祖父。大約到這時候才成了周室的眞正的歷史時期。但那古公亶父原本是一位穴居野處的牧人，他跟着河流西上走到岐山之下才嫁給一位姜姓的女酋長，到這兒才發起跡的。我們從這詩看來可以知道，周室到古公時都還是氏族社會。而且還要注意的，是周室本姓『姜』，自古公發跡以後不知不

覺之間便改姓起『姬』來，這正表現着周室本身的在那時的一個社會的變革。古公以後便成了一個男姓中心的社會了。

促進這個變革的原因當然是農業的發達，由古公而王季而文王，三代之間便轟轟烈烈的隆盛起來，接連的征服了昆夷、虞、芮、密、阮、共、崇等種族，竟鬧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終久把殷也滅了。農業的這樣驟然的發展又是甚麽原故呢？便是鐵器的發明！

中國的鐵器時代是有三個段落的：

第一次是用作耕器；

第二次是用作手工業的器具；

第三次是用作武器。

用作武器的第三次進化是自西漢以後才完成的。證明本來很多，我們在這兒只消引江淹的銅劍讚的序文來就夠了。

『古者以銅爲兵。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迄於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二漢之世，既見其微。』

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獻而且也是很正確的。鐵兵的發生是在春秋末年，發生在長江一帶的淮夷民族。北方的漢民族只用來做工具。國語上有管子的一句話：

『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斸斤試諸土壤。』

這所謂美金便是銅，所謂惡金便是鐵。管子的海王篇上也說：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

這至少是證明當時的鐵已經用到手工業上了。『管子』本來不必是管仲自己做的書，但那書當得是齊國的國史。我們從那文字的古樸、繁複、並無假託的必要上看來，大約它總不會是後人的僞託。

鐵要鍛鍊到能夠製鍼製刀製斤製鋸，那是要有相當的冶金術的進步的，所以在鐵能鍊爲鋼鐵應用到手工業之前，必有一個長時期的應用銑鐵或者毛鐵的時代。

周官的考工記上說：『攻金之工六：築、冶、鳧、栗、段、桃。』『段氏爲鎛器。』除這段氏以外，其他的五氏所做的削、殺矢、劍、鐘、升斗等都說明是青銅器，只有這段氏所做

的鑄器——就是耕器——沒有說明是用甚麼金屬，關於段氏的那一節文章可惜又殘闕了，我們雖然得不出一個堅決的結論，但從那『段』字本來有訓『鐵』的意義看來，那所做的鑄器一定是『鐵器』。

考工記這書本是古文學派的『孔壁圖書』之一，後人雖然很有人懷疑它，但從文字的古奧和製作的還表示着一個青銅器的時代上看來，那不僅不能看成僞書，而且還可斷定是周初的文獻。

又大雅的『公劉』篇有『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的兩句，厲是石器，鍛就是鐵器，這兒正表現着取石器和鐵器來大興土木開闢疆土。『公劉』這詩是周初的文字，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在周初的時候鐵的耕器是發現了！

就因爲有這鐵器的發現，所以在周初的時候，便急劇的把農業發達了起來，詩經上專門關於農業的詩便有『豳風』『豳雅』『豳頌』。從牧畜社會的經濟組織一變而爲農業的黃金時代，周室的乃至中國的所謂『文明』『文物』也就驟然的煥發起來了。這個產業革命在比較地研究過『殷虛書契』和周詩周書的人，一見便可以感覺着那天淵的懸隔。在比較地研究過周

易和周詩周書的人，也可以感覺它的差異。周易的年代較詩書早，那裏面說到農業的話，只有一句，其他多是牧畜和帝王的畋獵的享樂。

周代有那樣發達的農業，所以他終竟把殷室呑滅了，而且完成了一個新的社會。

那所完成了新的社會是甚麼呢？我們在書經詩經裏面不可以看見他使用着多量的奴隸來大興土木，開闢土地，供徭役征戰嗎？

周書的十八篇中（自『牧誓』至『文侯之命』的十八篇）有八篇便是專門對付殷人說的話（本文中所稱尚書，係據今文的二十九篇，其他的古文全係僞作）。我們看那周公罵殷人是『蠢殷』『戎殷』『庶殷』或者說『殷之頑民』，而且把那些『庶殷』徵發來作洛邑，用種種嚴厲的話去恫喝他們，那不完全是表示着把被征服了的民族當成奴隸使用嗎？

本來當時的階級的構成是分成『君子』和『小人』的，『君子』又叫作『百姓』，便是當時的貴族。『小人』又叫作『民』『庶民』『黎民』『羣黎』，實際就是當時的奴隸。這些黎民應該就和『庶殷』一樣的來源，不過是早歸化了的奴民。他們在平時做農夫百工，在戰時就當兵當伕，這在大雅和小雅的各詩中，敍述得最爲明白。並且如像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雲漢）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桑柔）

我們從這些話上看來，可以知道當時的奴隸是怎樣受着虐待了。

一方面在族內使用着奴隸，又一方面便向四方八面的異民族進攻。周初的局面被後人粉飾出來雖然很像一個極盛的封建時代，但那全盤是虛僞。我們由最可靠的信史——詩經——可以考查得的，直到周宣王時，漢民族都只僅僅跼居在黃河流域的中部，當時四方八面都還是比較落後的牧畜或漁獵的異民族。例如南方的長江流域，便有荊蠻、淮夷、徐戎，西方的有犬戎，北方的有蠻貊、狄人、玁狁，山東一帶還有所謂萊夷。所以事實上還是被四圍的氏族社會的民族圍繞着的，一個比較早進步了的一個奴隸制的社會。

所以我們在這一節的推論裏面，所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社會在西周的時候，剛好如古代的希臘羅馬一樣是一個純粹的奴隸制的國家。

四

奴隸制最盛的時期是在周穆王的時候，現在不能夠盡情的敘述，但在周穆王末年也就漸

林明慶の表紋

漸的衰落下來了。書經上周穆王所做的『呂刑』，便設出了以錢贖罪的制度，這換一句話說，就是奴隸的解放的表現。

奴隸在開墾一切的荒土中、在使用爲兵士向四方征服中、逐漸的得到自行製造私產的機會，所以奴隸也富庶到有錢來可以買贖刑戮了，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奴隸在經濟上已經逐漸的得到解放，但在政治法律上仍然沒有得到解放。這必然的要激起一個社會革命中的插話的政治革命。

這個革命便表現在周厲王的十二年，那時候首都起了暴動，庶民起來把厲王趕跑了，還圍着他的王宮，要殺他的兒子宣王，是召公把自己的兒子拿出來替了死。周厲王跑了之後，一般的人去歡迎共伯和來做皇帝，他做了十四年的皇帝，後來終竟被復辟派的周召二公把他推翻了。

這次的革命我們可以說是中國有史的第一次的平民暴動。在那當時的激烈的情形，我們想來總不會是亞於法蘭西巴黎暴動，和蘇俄的十月革命的。雖然那只在歷史上留着一個失敗了的插話式的痕跡，但周室的乃至中國的奴隸制是從那時在形式上推翻了的。從那時候起中

國的歷史上便起了一個很長久的變亂，社會的階級層、民族的分配、政治的組織，都起了一個天翻地覆的變更。奴隸主人的周室完全失掉了他的宗主的權威了。所以我們在東周前後在詩經中可以看出無數的『變風』『變雅』的制作，那實質都是表明着當時的經濟基礎的變革、社會關係的動搖、革命思想的勃發。

那時候有『富人』階級發生了出來，所謂『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只要多有錢的人便可以做三卿了；有又謂『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商賈那樣賤民的職業，貴族的『君子』也經營起來了。這些雖是很簡短的文獻，實是道破了當時的社會變革的機械。東周以後，我們看，如像管仲起於罪隸，甯戚起於牧豎，商人的弦高竟能干預軍國大事，不便是事實上的證明嗎？世卿制逐漸廢除，白衣可以爲卿相，這在奴隸制時是絕對沒有的。（雖然古時也有伊尹、傅說、姜太公等起於微賤的傳說，但那只是傳說。我們特別要注意是周室本姓姜，姜太公也不過是周室的一個支姓的酋長罷了。）

事實上周室東遷以後，中國的社會才由奴隸制轉入了眞正的封建制度。從那時以後在農業方面中國才有地主和農夫對立的莊園制的產生，在工商業方面也才有師傅和徒弟對立的行

郡制的出現。春秋的五伯、戰國的七雄，要那才是眞正的封建諸侯。

後來在秦統一了天下以後，在名目上雖然是廢封建而爲郡縣，其實中國的封建制度一直到最近百年，都是很巍然的存在着的。

我們不要爲文字所拘泥了。周室在古時雖號稱爲封建，但是事實上在周官有『鄉』『遂』『縣』『鄙』之分，並不是全無郡縣。秦以後雖然號稱爲郡縣制，但漢有諸王、唐有藩鎮、明末有三藩、淸初有年羹堯，就是一般的行省總督都號稱爲『封疆天子』，並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我們到了現在假使要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在秦時就崩潰了的話，那簡直是不可救藥的錯誤。

由奴隸社會變成封建社會的這個變革，中國的古人也是早認識着的。那用古代的話來表示時便是『由王而伯』。這個轉機剛好在周遷以後。從那時候一直到最近百年，中國儘管在改朝換代，但是生產的方法沒有發生過變革，所以社會的組織依然是舊態依然，沉滯了差不多將近二千年的光景。

歷代的改朝換代可以說本來都是奴隸的抗爭，特別鮮明的不是秦朝的滅亡嗎？

秦始皇不愧是中國社會史上完全了封建制的元勳，他把天下統一了，把天下的兵器都收沒了來做了十二個巨大的銅人。他以爲天下可以從此無事，秦家的江山可以至千世萬世君，然而那料得他敵不過的才是鋤頭呢？

在當時的兵器本來是銅做的，而耕器的鋤頭之類却是鐵器，這本是在上面已經說過的。陳涉、吳廣以鐵的鋤頭舉事，這是等於以鐵器去征服銅器時代的秦兵，所以一些的農民、佚徒、浪子、流氓，終竟把秦朝的大兵大將克服了，這不是很有趣味的一個插話嗎？

不過革命一次便受欺騙一次，奴隸革命一成功，狡黠者立刻又變成一種新的支配階級，所以儘管一部二十四史成爲流血革命的慘史，然而封建制度的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依然無恙。

重要的原因是甚麼？

一句話歸總：是沒有蒸汽機關的發現！

然而發現了蒸汽機關的洋鬼子終竟跑來了。儘管是怎樣堅固的萬里長城受不着資本主義的大炮的轟擊。幾千年殭定了的社會又起了天翻地覆的動搖，被人視爲『睡獅』的老大帝國成

爲被萬人宰割的肥豬。首先與資本勢力接近的南方，也就不能不早受傳染，在一八五二年公然有打着天父天兄的旗幟的代表市民意識的洪楊革命出現了。

一八五二年的革命，那使 Marx 先生高喊着在中國的萬里長城上已經打着：

『中華民國：

自由、平等、博愛。』

的招牌的，那雖然是終歸失敗了，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依然是由南方的市民階級所領導的革命，終竟把『中華民國』的招牌打出來了。黃色的大龍旗不能不變成五條顏色的外國式的旗幟，皇帝變爲了大總統，參議院衆議院也就成立起來，數千年的老大帝國公然也就一變而爲最新式的民主立憲的國家，雖然那以後還不免有好幾次的劇烈的動搖，然而資本制革命的形式總算是具備了。

中國的市民階級算也趕到了這步『由伯而大總統』的田地，但可惜世界資本主義的進展，已經達到了最後的階段，它老早已經把那國家的形式打破成國際的形式，把地方的形式打破成世界的形式；從前的一國一地方的自然發生的社會革命打破成最後階段的世界革命的形式

了。所以中國的市民階級儘管是怎樣追趕，但帝國資本主義等不及他們把自己的產業扶植起來，已經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化成了一個全無產者了。

電氣是已經早傳到了中國來的，『由大總統而委員長』的革命不是早就在醞釀之中了嗎？

好了，我好像坐起飛機的一樣把中國三千年的歷史展望了一次，我的結論可以歸納成下面的一個表式：

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階段

(時期)	(經濟組織)	(階級)	
一、西周以前	原始共產制	氏族社會　無階級	
二、西周時代	奴隸制	王族　百姓(貴族) 庶民(臣僕)	身分的階級
三、春秋以後	封建制	封疆天子——官僚 閥閱 地主——農夫 師傅——徒弟	

四、最近百年　資本制

帝國主義｜弱小民族‖資本家｜無產者……最後的階級對立

所以中國的社會也算經過了三次的社會革命，和這三次的社會革命相應的也就有三次的文化革命的時期。這最後的一個命題是我現在從事着的一部比較大規模的著作『國故揚棄』的主幹，要在那兒才能盡量的全部的展開（連本文所包含的問題，自然也在內），我現在就只提出一個暗示，也簡單的表列在下邊罷。

	中國的社會革命（性質）	（時期）	（文化的反映）
第一次	奴隸制的革命	殷周之際	詩書易諸書
第二次	封建制的革命	周秦之際	諸子百家
第三次	資本制的革命	滿清末年	科學輸入

28. Oct. 1928. Japan.

第四章　商業資本社會說

梅思平

一　中國社會變遷的概略

一　上古時代社會的變遷

希臘歷史，我們只曉得中古史；羅馬歷史，我們只曉得近世史。中國歷史，我們所切實知道的，也不過是近世史。因為中國的信史，至早只可算以春秋時代為開始。但是春秋以前的史跡，我們根據各種的傳說，也可以整理出四個時期來。

第一個時期，可叫做『氏族鬥爭時期』。凡關於黃帝炎帝蚩尤共工等的傳說，都是這時期的史跡。這時候的社會組織，大概都是『圖騰制度』，就是『氏族』(Clan)的組織。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說：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

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這種以動物或無生物作一氏族之名的，的確是圖騰社會一般的現象。圖騰社會是以血統爲聯結的基礎。至於有無階級的對立，乃視其生產的方法而異。如果爲漁獵民族，或單純的農業民族，則不至於發生階級的對抗。如果爲畜牧民族，則一定會發明奴隸制度。但是這方面的史料已經沒有，所以不能斷定。

第二時期，可名爲『原始封建時期』；就是一般人所謂唐虞時代。這時候，已經有一個民族（同血統的多數氏族所構成）戰勝其他民族，使其一部分降而爲農奴，一部分則爲朝貢的人民。這時候階級的對立，已經很顯明。尙書堯典中所說的，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三個階級：

一、九族（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二、百姓（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三、黎民（黎民於變時雍）

『九族』大概是貴族，和雅典的 Eupatrids 羅馬的 Patricians 相似。『百姓』大概是自由人和雅典的 Yeomen，羅馬的 Plebeians 相似。九族百姓大概原來是一個階級(戰勝的民族)，後來因逐漸的分化而成兩個階級。至於『九』『百』這些數目字，大概是經過人爲的分割，如雅典、羅馬的樣子。『黎民』大概是農奴，就是當時戰敗的九黎民族，和雅典的 Six thees 斯巴達的 Helots 相似。

當時政治的狀況，也和 Solon 以前的雅典，Servius Tullius 以前的羅馬極相似。君主是由各氏族(貴族的氏族)的酋長選舉而出（卽後世所謂堯舜讓位）。一切大事均由貴族會議處決(尚書所稱四岳大概是貴族會議的代表)。

總之，這時候的社會，已經很明顯的是一個封建社會。九族和百姓都是地主階級，在經濟上是剝削者，在政治上是治者。黎民是農奴階級，在經濟上是被剝削者，在政治上是被治者。

第三時期，是『原始帝國時期』，卽普通歷史上所謂夏商兩朝。這時期的特徵，就是中央政府的勢力逐漸擴大。但是社會的組織，仍然以封建制度爲基礎。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這明明是地租的制度。可見這時期內，地主階級與農奴階級的對抗，仍然是繼續存在着。

但是這時期內有兩個極可懷疑的現象。一、貨幣的發生（禹貢稱貢金三品，史記亦言虞夏之幣金爲三品，舜典稱金作贖刑），及市廛的設立（王制稱古者市廛而不稅，關幾而不征，鄭玄孔穎達都說指殷制，孟子亦言文王治岐，關市幾而不征）果爾，則當時必有『商人』階級的出現。二、往往有平民崛起爲卿相的傳說；如伊尹傅說等的故事。這種傳說，原是戰國時代一般官僚階級的宣傳資料。但其說決不能無因。大概夏殷兩朝君主權力已逐漸擴大，封建貴族已逐漸失勢，『官僚』階級遂因之而發生。至於君主、商人、官僚這三個階級究竟如何的關係；以及這三種勢力和地主階級的勢力如何互爲消長，則因史料的缺乏，實在難可臆斷。

總之，這時期內，階級的分化大概如下：

一、地主（君主及貴族）
二、商人
三、官僚

（以上三者）剝削者

四、農奴

五、手工業者因有市廛與貨幣必定有手工業者 } 被剝削者

第四時期，可以叫做『新封建時期』。這個時期的開始，是因周民族的東徙。夏殷兩朝的情形，和羅馬帝國極相似。周的東徙，和日耳曼的南徙極相似，周的民族本由中亞一帶而來。到了他們征服了東方帝國（殷）以後，於是舉行大規模的土地分贓，這就是後世所謂：『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這個時候，社會的變化，一定是很複雜。農奴的地位，大概是仍舊，不過換了地主。當時的地主階級，一部分也許能夠保存。新封建時期和原始封建時期及原始帝國時期的區別，大概在乎地主等級的增加與組織的嚴密；其情形也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相同。

這時期還有一個更特別的現象，就是古代文化的毀滅。大概民族戰爭的結果，如果是一個新來的民族戰勝了原來的民族，原來民族的文化，必定是遭一部分的毀滅。日耳曼民族的南遷，西羅馬帝國的文化即遭毀滅；土耳其民族的西徙，東羅馬帝國的文化也遭一部分的毀滅。據我的觀察，夏殷兩朝的文化，必定是很發達。後人所傳桀紂的奢侈淫亂，正足以表

示野蠻民族對文明民族之物質文明的驚異和羨慕。同時，我們可以看出周的文化程度是很幼穉的。(一)周民族東遷的時候，大概還是一種畜牧兼耜耕的生活。後人雖有后稷發明稼穡的傳說，但是這時候的稼穡，恐怕還是耜耕。到古公亶父的時候，生活的主要部分，依然是畜牧。『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這完全是畜牧時代遷徙無常的狀態。並且擄掠女子的風俗也是極盛。『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有邦子，俔天之妹，……親迎於渭，造舟於梁。』這種姦淫擄掠的情況，實在活躍於紙上。(二)周民族到了文王時候，大概還沒有文字。傳說，文王囚於羑里而演易。易的八卦是文字的起源。當時文王大概因戰敗而作俘虜，在作俘虜的時候，才學得中國的文字，乃傳之西方。(三)周民族東遷的時候，其戰爭是很殘暴的。相傳武王伐紂，血流漂杵；也可見其對文明民族殘酷的手段。並且他們的遷徙，是舉族而來，到處是紛擾。(四)到周公時候，周民族才盡量的吸收中國文化，以與自己原始的文化相調合。這些新吸收的中國文化，在周民族看去，當然是奇異；所以後人都稱周公為創作，其實周公不過以征服者的資格，吸收被征服者的文化而已。但是舊文化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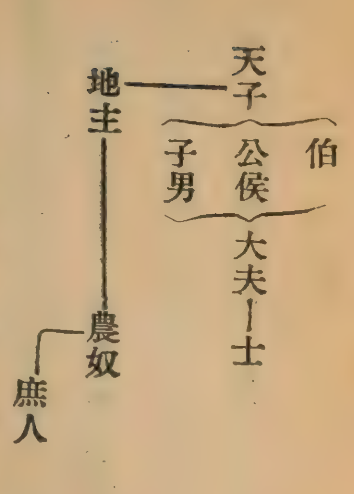
被毀滅者，已經是不少了。

在這文化毀滅的時期中，其受破壞最甚的，大概是手工業和商業。夏商時代，本有金屬貨幣；但是春秋初期，反是物物交換。這也可見商業文化的中衰。商業既衰，則手工業自然隨之衰落。這種現象是很不足怪的。馬其頓之於希臘各都市、羅馬之於加太基、希臘之於克利特島、都有毀滅工商業的結果。夏殷文化必定有一部分被周毀滅，乃是無疑的。

所以周初的社會，完全是農業的生產。其原來的畜牧生活，至此亦已放棄。傳說所謂：『縱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陰。』這或者是舍棄牧畜生活的一種紀念。因爲周的民族，征服了東方的農業國以後，其全民族都變爲地主，可以安坐而食，剝削被征服者的生產品，用不着自己再去勞動了。

至於井田制度，也是夏殷兩朝封建制度的舊法，周人不過稍稍修改而已。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因此，周初的時代，社會階級的對抗，倒比夏殷爲簡單。其表式如下：



主要的階級，就是地主和農奴的對抗。天子公侯伯子男大夫士，不過是地主中之等級而已。後來所謂『庶人』，是否即爲原來的農奴，或者爲農奴之解放者；這是不能斷定。

二　封建制度的衰落

春秋戰國五百餘年中，可總名之爲封建制度衰落的時期。這時期內社會的變化，可由下面四種現象表示之：

一、貴族的互相併吞——周初的土地分贓法，本來是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後來各貴族之間，互相併吞；至春秋初年，這種併吞的成績，已經大有可觀。併吞的形式，大概有兩種：第一是國內貴族互相吞併；第二是大國蠶食小國。因此，小區域的貴族政

治，遂逐漸地變為大區域的君主政治。這種現象，是封建制度必然的結果，用不着外來的原因作動機的。

二、商業的勃興　周初時候，商業雖然一時衰息。但是東方沿海一帶，其商業仍然不受影響。太公封齊，即收漁鹽之利。春秋初年，管仲治齊，亦因魚鹽之利。可見齊為當時的商業國。商業既盛，則手工業自然隨之發達。並且當時商人階級的勢力，確已不小。管仲劃分政治區域，竟爾把商業區域，另為一種。國語：

制國為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

士鄉十有五。

可見當時齊的工商業區域，竟佔全國四分之一；其發達已可想而知。更有奇怪的，國語說『士鄉』十五，分為三個統治權：『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至於其餘六個工商之鄉，則獨不言其歸何人統治。或者當時貴族的統治權，僅及於封建的農村（士鄉）。而工商所會集的都市則任其自治。如果是這樣，則當時齊國的情形，大概和中世紀的

法蘭西及德意志極相似。並且齊國的稱霸，也是很可懷疑的。管仲或者卽利用商人階級的勢力，以壓制國內國外的封建貴族。其所以必定向中部及南方發展，也或者是爲發展其商業的利益。管仲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後人都認爲託詞。據我觀察，這其中是大可研究的一件事。大概包茅爲楚的特產，是北方諸國所需要的。齊如果能得楚的包茅，則可以在北方操縱這種貿易的市場。可見齊桓的稱霸，或者完全是商業帝國主義的發展，也未可知。至於齊國內部的政治，大概歷代都隨商業資本階級的勢力爲轉移。陳敬仲奔齊，因作了上正的官，其勢力遂逐漸的發展。後來春秋末年，晏子所形容的陳氏勢力，也說：『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可見陳氏是一個大地主而兼爲資本家。戰國時孟嘗君亦以放債取利。可見齊的貴族，都是兼營商業。換言之，齊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確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魯因近齊，所以魯的商業，也很發達。孔子的名弟子、子貢，卽是一個大商人。可見魯在當時，也是一個著名的商業國。

齊魯可說是東方的商業國。中部方面，則以鄭爲商業國。鄭的地位正是交通的中心點，

所以商業自然發生。並且鄭的政府也向來與商人相聯結。鄭商人弦高能以片言退秦師；可見商人在政治上的活躍。後來鄭子產的話，是表示得更為明顯：『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共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寶財，我弗與知。』這完全是Laizer Faire 的主義。鄭在春秋初年，所以強盛，大概也是商業上的勢力。後來齊國（較強的商業國）勃興之後，鄭就衰微，結果反因商業上的財富，致為強盛的農業國所侵略。起初是秦晉爭鄭，後來是晉楚爭鄭。大概秦晉楚三國，都想以鄭為商業上的出路。在春秋下半期，鄭在商業上所得之利益，大半都是用朝貢的方式，以入於晉。三晉因此遂逐漸富裕。

第三個商業中心點，就是吳越。吳越的地位是和齊相同，所靠的也是魚鹽之利。計然、范蠡等在商業上的經營，也是很有名的。

春秋時代因有齊鄭吳越三個商業中心點，於是中部及北部各國都逐漸的受商業之影響，以致封建制度根本動搖。到了戰國時代，則各國都有大都市。戰國策中蘇秦、張儀們口中所描寫的都市生活，足令人想見當時商業的繁盛。

三、農奴的解放　商業的興盛，結果必使封建制度，根本動搖。春秋時代封建制度的破

壞，也是很顯明的跟着商業的勢力而移動。換言之，就是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其封建制度，必首先破壞。

齊是商業發達最早的國家，所以在春秋初年，齊的封建制度即已墮地。管仲治齊，分人民爲士農工商四級；又用作內政寄軍令的方法，以「鄉」「比」的制度作地方基礎。井田制度遂根本破壞。

其次爲鄭。左傳鄭子產作丘甲。

其次爲魯。春秋書「初稅畝」，「作丘賦」。

最後乃有商鞅的開阡陌。後人只曉得井爲商鞅所廢。其實齊魯鄭三商業國的廢井田，乃遠在商鞅之前。秦因受商業的影響最遲，所以廢井田的運動，也是最晚。

井田制度之下，人民是三十授田，六十歸田。在歸田之前，是離不開土地的。且土地不爲耕者所有，農夫僅有一種使用權。這和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度極相似。井田廢了之後，土地乃爲耕者所有，政府不過徵收田賦（所謂履畝而稅）而已。同時農夫的地位，也就自由。從此，可知廢井田的制度，實在是一種農奴解放運動。

四、官僚階級的發生　在封建制度極盛時代，政治卽爲地主階級所包辦。卽春秋時代，各國的公卿士大夫也大半是地主階級。到了戰國時代，則官僚階級一躍而操各國之政權。於此其中的變化，也是大可尋味的。

官僚階級的分子大概由下列數種人構成：

一、貴族鬥爭中的失敗者及其子孫；

二、由商人階級出身者——管仲百里奚甯戚；

三、由解放後的農奴出身者。

官僚在政治上的勢力，也是逐漸而來。第一時期、大概都爲大貴族作家臣。例如孔子自己及他的門生都是替季氏作過家臣的。第二時期、大概作地方官吏。因爲貴族互相併吞的結果，大貴族的土地非常廣大，不能直接統治，所以不得不派遣地方官吏去統治。這種地方官吏，魯國叫做「宰」、齊晉都叫「大夫」、楚稱爲「公」或稱爲「尹」。孔子弟子在魯國作地方官吏的也是很多。第三時期、則爲中央高級官吏。如管仲相齊，以官僚而爲卿相，在春秋初年，實在還是少見。孔子以布衣而爲魯司寇，在春秋末年也不多見。到戰國時代，則此風大盛。

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乃其最著者。於是地主在政治上之勢力，也就隨其在經濟上之勢力而俱倒。

遊宦的風氣也盛於春秋末年。孔子遍干諸侯不見用，困於魯衞，菜色於陳蔡；其一種窮途落魄的景象，蓋可想而知。張儀受鞭撻之辱，范雎則折脅折齒；當時官僚階級受大貴族的侮辱，可說是無所不至。但是官僚階級本身是不生產者，不得不依賴大貴族或君主以生活。所以「出疆必載贄」、「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孔子去魯，三宿而後出晝；孟子去齊「若有不豫色然」；其失業時的恐慌，乃是醜態畢露。孔子弟子中對這種寄生生活也頗有懷疑的，「夫子之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予之與？」即孔子自己爲這生活問題所迫，也是非常之急切；「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至於「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這些風涼話，也不過失業時發發牢騷能了。

著名的官僚們如孔子孟子墨子等，不但是自己的職業問題，還有許多的弟子們生（羣衆）跟他跑。所以來的總是大批。後來有野心的貴族，就把這批人豢養起來，以應不時之需。於是發生「食客」的風俗。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食客各數千人。而官僚的人格，也就越見

卑鄙。甚者則至於雞鳴狗盜。

三　社會階級的確定

以上四種的新變化，到了秦漢以後即凝固而成近世的中國社會。其階級的對抗，可用下圖表示之：

商人
官僚
軍閥
地主
政治勢力
自耕農
佃農
手工業勞動者

茲爲解釋如下：

二、新地主階級的型成　井田制度廢除之後。一切農奴本來都變爲自耕農。土地所有權已由封建領主移於農民。大貴族(君主)對於農民的剝削，不過變更原來的地租爲國稅而已。卽春秋戰國(以及後來)時代的采邑制度，也不過劃出國稅之一部分，以作官僚的報酬；土地所有權也仍然在於農民。後來因自耕農階級中自己生出貧富的差別來，於是極貧者乃變爲傭工(如陳涉爲人傭耕)。傭工如取得比較永久的使用權之後，則變爲佃農。於是原來僱用傭工的自耕農，卽逐漸取得地主的地位。同時自耕農因農具肥料等的需要，不得不借用資本，於是商人階級卽逐漸向農業上投資。最後則因債權或抵押等的關係，遂取得土地的所有權，而原來負債的自耕農乃變爲佃農。於是土地買賣的習慣，因之發生。而官僚階級因俸給所得的餘財，也逐漸投資於農業。總之，新地主階級乃由自耕農商人官僚三者所型成。換言之，新地主階級乃爲農業投資所造成。茲將封建時代的土地制度與秦漢以後土地制度的比較。列表於左——

	土地所有權	地租與租稅	
封建時代	封建領主	租稅即地租	單重剝削
秦漢以後	土地投資者或自耕農	土地投資者向佃農取地租國家向土地投資者取租稅	二重剝削

二、政治勢力的所在　秦漢以後最難說明的問題，就是政治勢力的所在。中國政治勢力的所在，可以有三個假設。第一個假設：就是認定中國社會統治的勢力在乎地主。因此便可斷定中國爲封建社會。第二個假設、即認定中國的政治勢力在乎官僚。因此便可指中國爲官僚政治。第三個假設、即認定中國的政治勢力在乎商人。因此，便可斷定中國爲商業資本主義的國家。

第一個假設，在表面上是很有力量。因爲中國的生產事業，大半尚爲農業；政治的威權似乎應該在乎地主階級。但是政治的權力即使在乎地主階級，這種地主政治的社會，也不能叫做封建社會。因爲中國地主的地位，至多只可說和歐洲農奴解放後的地主或美洲殖民時代

的地主相似。其基本勢力在乎土地投資；與春秋以前或歐洲中世紀時代的封建地主，迴乎不同。並且中國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封建制度的破壞，較之歐洲尤甚。所以中國的地主只可算爲土地投資者。既爲土地投資者，則其利益自然和商業資本階級相同。但是地租的所得，其性質極爲固定，所以極難累積。因此，中國的地主始終爲小地主。地主財富的累積，往往不能十分膨大。反之，商業資本的累積，其速度往往極快。史記：『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可見商業資本累積之迅速，在秦漢時候，已經極其顯明。因此，中國的地主階級，其膨大往往有限，而商業資本階級則可以無限量的膨大。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就因此決定。

秦漢以降，政治的形式，實在是一個官僚政治。但是官僚階級在生產上是沒有地位的。嚴格言之，他們不能算爲一個階級，只可算爲一種寄生的階級。但是他們的寄生生活，必待商業資本發達以後，才能成立。因爲在封建時代，地主自身，即爲官吏，所以用不着官僚。後來因爲商業發達，大貴族即利用商人階級之勢力以併吞小貴族。貴族土地增大以後，即不得不用官僚去統治。最後，則大貴族自身，也就變成官僚。因爲農奴解放之後，土地不爲貴

族所有；大貴族所保留者不過表面上的政權。這個政權的擁護者，就是商業資本階級。所以結果，不論大官僚小官僚，其根本的「所寄生」，總是商業資本階級。秦漢以後，皇帝宰相以下，都只可認為一種寄生於商業資本階級的官僚階級。至於軍閥，乃不過官僚之有武器者，其地位自然與官僚無異，茲不具論。

但是這個理論，如何得事實的證明呢？我們只用看秦漢間政治的變遷，就可明白了。秦的併吞六國，完全是商業上的力量。史記：

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遠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及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可見秦在戰國末年竟是一個最大的商業國。商鞅的時候，本有抑制商業的傾向，但是這個政策，結果是失敗的。後來司馬錯和張儀的辯論，就可見秦是不得不求商業上的發展。至

於最後統一的事業，則完全成於商人之手。呂不韋的相秦，歷史上說來，好像是一件滑稽小說。其實這就是商業資本階級搶奪政權的活動。李斯等的官僚都是依附呂不韋而起。呂不韋的食客也數千人。這都是官僚寄生於商業資本階級的鐵證。其統一的手段，也完全是以金融的勢力作基礎。秦始皇本紀說，尉繚說秦王用三十萬金，破壞六國的合縱；後來李斯即用其計謀，以併天下。可見秦的併吞六國，完全是商業資本階級政治的成績。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其與商業資本階級聯絡的痕跡也很顯明。烏氏倮、巴蜀寡婦清，都是最著名的。不過秦的亡國，其原因極不易探求。這時候並沒有水旱疾疫之災；而且暴動的發生，不在於農村，而在於都市。加入暴動者不是農民，大多數都是地方下級官吏（如會稽守通、東陽令史陳嬰、沛椽蕭何曹參、漢上亭長劉邦）。這其中究竟是如何的原因，一時尚不能臆斷。或者，即因趙高用事，法禁過嚴，不便於商業，以致商業資本階級利用都市小官僚及游民以暴動，亦未可知。史記中所稱「豪傑」「少年」等，是否有商業資本階級在背後鼓動，殊屬難必。史記貨殖傳：「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準書：「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

以穡市物。」從這些反證看起來，大概秦的失敗原因，就是不擁護商業資本階級的利益；漢的成功，就是保障商業資本階級的利益；其痕跡已極顯明。

高祖初年，本稍稍有點反動；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馬，重租稅以困辱之。」但這種政策仍然是失敗。所以「孝惠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並且事實上，商人的驕奢日甚一日，且看文帝時賈誼的話：「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這是和「不得衣絲乘馬」相去不知幾萬里。又如七國反時，條侯周亞夫至滎陽，見吳王舉兵不得劇孟，卽知其不能成功。劇孟爲游俠，其實是商人階級的工具。不得劇孟，卽不能得資本家之幫助，所以知其失敗。同時東征的貴族，又多借貸關中商人的資本。並且鼂錯是主張重農抑商之政策的，袁盎乃鉤結劇孟及東南商業資本階級的。景帝之斬鼂錯，也就是重農主義的失敗。可見七國之亂，其根本原因，還是經濟政策之不當。

漢武的帝國主義，後世史家都以「好大喜功」四個字了之。其實這個唯心的解釋，決不是

事實的眞相。據我觀察，武帝的侵略政策，的確是以商業的帝國主義作背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商人要向國外找市場，並吸收四夷的珍奇商品。我們只用看史漢兩書對於各外國的物產商業以及交通道路。都記載極詳；即可見當時調查的詳悉。而到處又多開關道路，增廣關市；決不是僅爲戰爭上之需要。並且在西北及西南兩方，又實行其殖民政策；這明明是爲商業上之利益。在這種侵略的殖民運動中，國庫雖受損失，而資本階級則大蒙其利。史記平準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這種情形，簡直和現代工業資本家的態度極相似。至於當時「帝國主義者」的經濟關係，也頗有線索可尋。嚴助朱買臣王恢張騫數人的經濟關係，已不可考。但嚴助朱買臣都是吳人，或者與東南方面的資本家有所鉤結，也未可知。司馬相如的經濟關係，則極其顯明。他自己本來已經是一巨富，又與他的親戚卓王孫等相鉤結。卓王孫在西南方面的商業勢力本已不小。相如所爲詞賦，無非用奢靡奇異之詞，以引誘君主的慾望。狗監楊德意的推薦，必定是先和司馬相如卓王孫等有所鉤結。告巴蜀父老的文，也完全用君主的威權以詐嚇農民。後來「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

受錢於都內。」司馬相如們的利益，大概卽在於此。至於國家的耗費，乃是他們所不管的；這也和現代的帝國主義者極相似。卜式的輸財助邊，後人傳爲美談，也傳爲奇談。其實絲毫不足爲奇。卜式是一個畜牧事業的投資者。當時侵略匈奴，唯一的虜掠品，就是牲畜。戰爭所得的牲畜，大概都由商人承賣。卜式的致富，卽由於此。所以卜式就變成一個極端的帝國主義者。其輸財助邊，實在是一本萬利的投資。至於當時中央政府的官吏，則有齊之大煮監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他們所管的都是財政，政府命脈都在其手。公孫弘爲宰相，不過備位而已。資本階級的政治，至此可謂極露骨的表現。其內政政策，也都赤裸的以資本階級之利益爲前提。所謂「鹽鐵國有」政策，表面上是防止「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役利細民。」但是實際上，乃是大資本家欲借國家的力量，造成「鹽鐵專利」的事業。所以「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這明明是大資本家併呑小資本家的策略。後來卜式與桑弘羊的爭論，也就是大資本家與小資本家的利益之爭。桑弘羊的鹽鐵均輸兩種政策，都想借國家的力量，以行專利。卜式則爲被排斥的一部分商人爭利益，以至於衝突。

從這樣分析起來，中國的政權，乃完全在資本階級的手中。爲資本階級所用的，乃是官僚。地主階級乃爲商業資本階級的別動隊。大概在中央政府或都市中，商人則利用官僚爲工具。在農村中，則地主操有較大之權威。可見中國社會，絕對不是封建的社會，乃完全是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

二　中國商業資本社會的原始

虎子

春秋戰國（公歷紀元前七二二——二四七）是中國從銅器過渡到鐵器的時代。那時生產器具改換了；經濟制度改換了；政治狀況和人民思想也改換了。在中國歷史上那時是社會變遷最劇烈的時代。春秋戰國時的中國社會和春秋戰國以前的可說是絕對不相同。春秋戰國以前的社會情形可以詩豳風七月所寫的來代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一）觱祭，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二）婦子，饁彼南畝，田畯（三）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陽載，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

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四)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揚，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於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五)，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六)。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七)；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八)！

當時社會分成貴族和田奴兩階級。貴族有土地，田奴替貴族耕種(九)。田奴對於貴族須

供給衣料糧食，爲它修蓋房屋，到年終還要去賀年。不過田奴的行動，並不像後來商業資本下的田奴一樣，還有相當的自由（一〇）。當時商業尚不甚發達（一一），貴族向田奴所要索取的只是它個人或它一家的生活資料，並沒有儘量掠取用作營利，所以田奴雖然「無衣無褐」，尚不甚怨毒。後來生產日見發達，營利漸成普遍，貴族和田奴的關係續漸惡化，詩國風伐檀碩鼠的冷譏熱笑怨罵貴族的話因此發生了（一二）。前漢書貨殖傳有一段記載，說明當時因爲這個生產發展而起的社會變化，現在節錄如下：

「昔先生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簒弑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禮義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

富者木土被衣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菽飲水（一三）。」

我們從上邊一段記載中可以知道中國在桓（公歷紀元前六八五——六四三）文（公歷紀元前六三五——六二八）以前，已漸入商業資本的時代，大多數的生產已不是爲着消費，而是爲着要做商品了。社會的分野，已漸漸爲金錢所支配。從貴賤對壘的形勢一變而爲貧富對壘的形勢。

社會上所以有這樣的變化，因爲生產的發展。那時生產發展的原因根本上有三種：一、耕牛的使用，二、鐵器的發明，三、灌漑的擴張。

中國最初耕地全用人力。兩個人拉着一個耒耜並排去耕種。詩載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一四）。」這是春秋以前的一幅農耕圖。

用牲口種地大約始於春秋時候（公歷紀元前七二二——四八一）。最初的耕畜便是牛。牛和耕地的發生關係古書中最初見到的是在論語雍也章。原文爲：「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一五）？」當時的牛有好幾種功用，祭祀用的牛須挑選紅色而角

生得端正的，拉犂的耕牛則任何顏色式樣的牛都可以；然而「犂牛之子」，只要他本身生得顏色合，而式樣好，祭祀時也可中選，決不因爲血統關係而被輕視，這是孔子說話的意思。我們由「犂牛」二字的連用，就可知當時已用牛耕地。同時孔子的學生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一六），也是當時牛和耕已經發生了關係的一個旁證。

春秋時代正是中國初入鐵器時代的時候。古書中最早見到「鐵」字的在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公歷紀元前五一三），說晉國以鐵鑄刑鼎（一七）。那時已經用鐵去鑄鼎，可見鐵的使用已長久了。然而記載仍然很少，鐵的使用，大概還不甚普遍。

到戰國時候（公歷紀元前四八〇——二四七）情形乃大改變，所有日用器具以及兵器等等都用鐵鑄造。墨子書中關於鐵的記載，也異常衆多。墨子備城門篇有「鐵鍱（一八）」、「鐵鈇（一九）」、「鐵鑽（二〇）」、「鐵纂（二一）」、「諸藉車皆鐵什（二二）」、備穴篇有「鐵鈇（二三）」、「鐵鉤鉅（二四）」、「鐵校（二五）」、備蛾傅篇有「鐵鏁（二六）」、雜守篇有「鐵錍（二七）」、孟子滕文公篇有「鐵耕（二八）」、荀子議兵篇有「宛鉅鐵釶（二九）」、韓非子南面篇有「鐵殳（三〇）」、內儲說上七術篇有「積鐵（三一）」、「鐵室（三二）」、八說篇有「鐵銛（三三）」、

五蠹篇有「鐵銛矩(三四)」、呂氏春秋貴卒篇有「衣鐵甲操鐵杖以戰(三五)」、戰國策韓策有「鐵幕(三六)」。管子上記載更多。海王篇說：『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能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三七)。』輕重乙篇齊桓公說：『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球，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三八)。」』可見鐵器在當時社會上所佔地位的重要。所以當時鑄鐵業盛行(三九)，所發現的鐵鑛既多(四〇)，採鑛術也有相當注意(四一)。政府對於冶鐵業也已設官課稅，列爲政府收入之一種(四二)。

因爲鐵器的發明，耕牛的使用，自然而然的促進農耕技術的改良。最顯然的就是農地的深耕。戰國時的作品中有許多地方可以見到關於深耕的記載；例如：

莊子則陽篇：「昔予爲禾稼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

而報予。予來年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四三)。」

孟子梁惠王篇：「深耕易耨」(四四)。

管子小匡篇：「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芨，及寒槖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壄。稅衣就功，別苗莠，列疏遬，首戴苧蒲，身開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四五)。」

深耕的有利於農作物，大家知道，不用我多說，不但能使農作物的根生得深，容易吸收養料；並且可以使雜草的根完全除掉，灌溉時水容易引入，已引入的水容易保存，這於農產上自然有極大的影響。

同時灌溉方面大見擴張。在西周時關於灌溉的記載，我們只在詩白華中一見(四六)。而到戰國時候四川陝西河南各處都興辦水利。秦國在成都穿鑿了兩條河，沿河的田地因此都獲得灌溉，人民極感利益；因此又鑿了許多專爲灌溉用的小河(四七)。又在陝西渭水流域開了一條三百餘里長專爲灌溉用的河，有四萬餘頃田畝，從前原是水蕩或者鹵瘠的地方，現在都

成了良田，因此關中成爲沃壤，從沒有凶荒的憂患（四八）。魏國在河南引導漳水的水灌漑鄴的田，因此河內的經濟情形，大爲改善（四九）。

當時長江以南的地方，尚未開闢，卽照史記貨殖列傳所述，自長江至廣州間的地方還是「地廣人稀」，大半是卑濕而沒有墾殖的樣子（五〇）。當時全國十六個大都會，只有兩個在長江以南（五一）。可見那時的經濟中心完全在現在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江北的一部分地方。這等地方雨量很少，一年說不定下幾次雨，在這種地方，灌漑自然更加需要。照山西北部的情形說，有灌漑和沒有灌漑的地方收成相差極多，成三與二的比例，這可見北方的灌漑對於農產的關係了。

幷且在北方雨量稀少地氣乾燥的地方，假使沒有灌漑，肥料也無從加起。中國耕田的肥料似乎也始於春秋戰國時代，在春秋以前所著的詩書中似乎都沒有看到關於這項的記載。然而到春秋戰國時代肥料確已爲人所使用。例如孟子中龍子說：「凶年糞其田而不足（五二）。」顯然耕地運用肥料的辦法已爲各地所通行，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鐵器發明，耕牛使用，因此可以深耕，幷且每人所能耕的面積，也因此而增加，灌漑擴

張，肥料施用，因此李悝能夠替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教」。李悝說：「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臣瓚曰：「當言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五三）。這就是表明因農作工具和技術的進步，而形成農產的發展，也可以說是全部生產的發展，因爲那時的生產完全是在農村。

生產發展後在社會上所發生的影響我們可以列舉如下：

第一點就是富商的勃興　上邊曾說過春秋以前，中國商業是不甚發達的，商人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地位。現在就不然，商人在社會上佔有很大的勢力。例如子貢是一個大富商，常在魯衛之間做生意；然而有時又在魯國衛國做宰相，各方面和諸侯交接，列國的君主，都禮以上賓（五四）。范蠡是越國的大臣，帮助越王勾踐成了霸業以後，就辭職回家，帶着他的「徒屬」，從事生產，齊國請他做宰相也不願去，他：「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他仍舊一方面耕畜，一方面經商，以大富商名於天下（五五）。這種「布衣」是生產發展後纔有的。這種「布衣」的豪語，也是從前所不會聽到的。呂不韋是一位陽翟大賈，居然運用陰謀，操縱秦的政治（五六）。這可見當時的富商在政治上和

社會上的勢力。董仲舒說：「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五七）。」當時的天下，已是富商們的天下，從前的封建貴族早已在商業資本的高潮中消隱了。那時陝西、河南、直隸、山東產生了許多大都會，例如咸陽大梁邯鄲臨淄等等。卽以臨淄一城而論，有「七萬戶」（五八）人家，平均每戶五人，就有三十五萬人。在二千三四百年以前有這樣的大都會，可見那時商業資本的勢力。

第二點就是佃戶的產生　從前的田地大半是田奴種的；現在因爲耕牛和鐵器的使用，耕地所需要的勞力比前減少。用過多的勞力——就是利用田奴——去耕種田地，反足以多消耗糧食；還不及把田出借，按年收租，所得的利益比較大些。所以地主方面歡迎佃戶的存在。同時因爲生產發展的關係，一部分田奴的經濟情形比以前良好，有財力能夠向地主租種。地主既然願意，田奴的經濟情形又能容許，因此佃戶就很自然的產生了。所以春秋戰國以前的田地大半是田奴種的，春秋戰國以後的田地就有佃戶耕種的了。西漢時董仲舒說：「……至秦則不然。……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五九）。」東漢時荀悅說：「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彊人占田踰侈，其賦大半官收

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六〇）。」在秦漢時代顯然已經有了佃戶，並且他們所處的環境是那樣不好的。

第三點就是自耕農所處環境的惡化　因為生產的發展，資本漸漸集中操於大富商的手掌之中。自耕農沒有資本去改良農耕，增加收穫，而各種支出比前增加，所以也處於困窮的地位。照戰國時李悝的計算：「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六一）。」一個「治田百畮」的自耕農，一年的收入，用以支付日常的消費，已經不夠開銷。何況據董仲舒所說：月為更率，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六二）。」他們還須受那額外的高度的剝削呢？

第四點就是商業資本奴隸的產生　戰國時的使用奴隸和以前不一樣。那時的使用奴隸完

全以營利爲目的。大多數的奴隸並不是耕地用的，是用來做耕地以外如經商開鑛等事情的。例如白圭刁間和蜀卓氏程氏的使用奴隸就是這樣的（六三）。凡是當時的大富商、大鑛主，都有一大羣的奴隸替他們生產販賣，而他們自己則「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六四）。」奴隸在當時是不算人的，是一種以手指爲計數單位的貨物（六五）。在富商鑛主看來，他們本和牛馬無異，所以他們也有同牛馬一樣的命運。有時碰到一位仁慈些，或者確切些說，精明些的主人，他們很能夠得到一種比佃戶甚至于比自耕農更好的生活（六六），因爲物質生活較好，生產能力也能提高的，然而假使一旦惹了主人的怒，那主人有專殺之權（六七）；就是立斃杖下，也無人過問的。這就是當時因生產發展的商業資本奴隸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

第五點就是高利貸的發現　高利貸的發現，必在資本已有相當累積之後。初時資本因爲生產的發展續漸集中，資本家運用這集中的資本去發展他的產業，因此生產愈發展，資本愈集中；資本愈集中，生產愈發展，資本集中和產業發展相互的迫促着進行。但一旦產業發展到某一程度因爲受了各種物質的限制暫時不能再發展的時候，資本家手中所剩餘的資本，就不得不另覓生路以求滋長，於是乎高利貸的制度，就在這時產生出來了。春秋時中國因鐵器

耕牛的使用生產漸見發展，然因爲剛在起始，還不能有高利貸的產生。所以雖然有齊國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六八）關於借貸行爲的記載，然而絕沒有利貸的痕跡。春秋以後經過戰國初年中年，產業盡量發展，資本盡量集中，高利貸在這時期中慢慢現出。到戰國末年高利貸已發達到比較極普徧的地位。我們可把管子輕重丁篇中的一段記載來作一說明。

『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泲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鍾伯二十也。受息之氓

九百餘家。」一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六九）。」

在這兒我們可以看到齊國的高利貸的普遍。利率的高昂和資本的集中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齊國本是中國商業資本首先發達的區域，當時別的區域大約不會有這樣的普遍。

第六點就是政權的集中　列國的數目愈變愈少，終成為一個，列國內部的政權也愈變愈集中。從前中央對于列國不過以朝覲巡狩許多虛文禮節互相聯絡，列國內部的政治也就是分操于各級卿大夫的手裏的；現在貴族的勢力倒了，列國都傾向中央集權和君主獨裁。這也是時勢的要求，商業資本社會的產生所最需要的就是政治的統一。

第七點就是人民思想的改變　從春秋初年起，人們的身分的觀念一天薄似一天，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漸漸的以自身的能力和財力決定，人民的思想漸漸趨重於以個人為單位。即以學問而論，春秋以前學問為貴族所專有，他人不得過問；到春秋戰國時代情形就不同，只要自己願意並且有財力有閒暇，任何人都可以讀書。例如顏濁聚禽滑釐都是大盜，然而一個是孔子的學生，一個是墨子的學生（七〇）。這種事情在春秋以前決難有的。像顏禽那樣的人，在封建制度底下可以有資格配讀書嗎？同時因為生產情形改變，人們到處遇到新奇的問題，

求知大爲發展，所以每一位大師總有好幾百人跟着他學，每一個大都會總有一大羣人聚在那裏討論談講些問題的（七一）。思想已不同從前那樣的仄狹呆滯了。他們對人們于天的觀念也和從前不一樣。從前對於天祇是敬畏，不敢絲毫違抗的，現在則不然。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不及也，何以知之？」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到戰國末年的荀子，則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七二）？」居然從服從天的一變而爲制裁天利用天了。這不能不說是個人勢力擴張的影響。商鞅在秦國強迫人民分居，各自謀生，削除沒有事功的秦王宗室的爵秩（七三）；狂矞華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陳仲不食兄祿，不居兄室（七四）；都可以見個人發展的痕跡。

以上七點大致說明春秋戰國時代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改變有怎樣的關係。在無論什麼地方從純粹的封建社會過渡到商業資本社會，這種關係是很普遍的。

附註：

一　即現今的十一月，以下類推。

二　本篇通體看來，是用奴家的家長口氣，「我」即是這位家長自稱。

三 監督農夫耕種的人

四 小主人也。當時的地主大牛是貴族，所以稱公，而小主人稱公子。

五 當時十月卽改歲，所以上邊註釋「一之日」爲十一月。

六 指耕讀的人，卽此田奴家的壯丁也。

七 卽地主的住房

八 見綠澗堂校正本詩經集傳卷三頁五二——五九

九 看參詩周頌噫嘻。原文爲：「噫嘻成王，旣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耕，十千維耦。」（見綠澗堂校正本詩經集傳卷八頁七）

一〇 參看詩國風碩鼠和小雅黃鳥（見綠澗堂校正本詩經集傳卷三頁二四和卷五頁一四——一五）

一一 中國商業在商代（——B. C. 1122）已有。甲骨文中已有舟車等字，盤庚已有「具乃貝玉」的說話。然而明明白白記載經商的則似乎要把書酒誥所記載的「肇牽牛車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算最早，但是經西周一代（B.C.1122—B.C.723）關於商業的記載，所見極少。可見當時的商業尙幼稚，不甚爲世人所注意。

一二 見綠澗堂校正本詩經集傳卷三頁二三和二四

一三 見乾隆四年校刊本前漢書卷九一頁一

一四 見綠澗堂校正本詩經集傳卷八頁一四——一五

一五 見袖海山房校印本十三經注疏論語六頁一六

一六 見乾隆四年校刊本史記卷六七頁二一和二七

一七 見杜林左傳卷四三頁五，原文爲：「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一八 原文爲：「門植關必環錮、以錮（孫詒讓疑係銅之誤）金者鐵鍱之。」見定本墨子閒詁卷一四頁一四。

一九 原文爲：「蓋（當爲盆字形之譌）求齊（疑當爲齎，同聲假借）鐵夫（當爲矢字之譌）」，見定本墨子閒詁卷一

四頁一五。

二〇　原文爲：『竈有鐵鐕（鐕鬵字假音）。說文云：「鬵，大鑊釜屬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讀若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鬵。」（太平御覽引作鑊）』見定本墨子間詁卷一四頁一六。

二一　原文爲「藉車必鐵爲纂」（畢云：『說文云：「籑，治車軸也」纂假音字也。』見定本墨子間詁卷一四頁一七。

二二　畢云：『什與鍇音近，說文云：「鍇以金有所冒也。」』詒讓案上文云：「藉車」必爲鐵纂即此。」見定本墨子間詁卷一四頁二七。

二三　鐵堊斫力也，原文見定本墨子間詁一四頁四四。

二四　見定本墨子間詁卷一四頁四四

二五　鐵校蓋鑄鐵爲闌校以禦敵，見定本墨子間詁卷一四，頁四六。

二六　原文爲「染其索塗中爲鐵鏁，（畢云：「據上文當爲鏁，鎖也。）」見定本墨子間詁卷一四頁四八。

二七　見定本墨子間詁卷一五頁四，原註：『方言云：「凡箭，其廣長而薄鎌，謂之錍。」郭璞註云：「江東呼錍箭鉼云錍」說文曰：「錍鏊斧也。」』

二八　見孟子集註卷三頁一六——一七

二九　原文爲：「楚人宛鉅鐵鉇，慘如蠭蠆。」章鴻釗在石雅中註：「案又見商君書弱民篇，鉇作鍦　疑鉅與鉇爲兩物」見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一頁一三

三〇　見圖書集成局刊本韓非子卷五頁二九

三一　見同上卷九頁一九，又卷九頁二一

三二　見同上卷九頁二一，原文爲：「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尾，無不有鐵故曰鐵室。

三三　見同上卷一　頁一五

三四　見同上卷一九頁二

三五　見湖北崇文書局刻本呂氏春秋卷二一頁六

三六　見文明書局印本戰國策評註卷二六頁二，鐵幕，鐵製之臂脛衣也。

三七　見湖北崇文書局刻本管子卷二二頁二

三八　見湖北崇文書局刻本管子卷二四頁一——二

三九　史記貨殖列傳說：「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四〇　管子地數篇說：「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銅之山三千六百九山。」（見湖北崇文書局刻本管子二三頁一）

四一　管子地數篇說：「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見湖北崇文書局刻本管子卷二三頁一）

四二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在秦者名錯……錯孫靳，……孫昌爲秦主鐵官。」（見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一三頁二○）管子海王篇說：「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前漢書食貨志說：「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田租田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見乾隆四年校刊本前漢書卷二四上頁四）

四三　見湖北崇文書局刻本莊子卷下頁一三

四四　見袖海山房校本十三經註疏孟子一下頁四

四五　見圖書集成局校本管子卷八頁一六

四六　見綠潤堂校正本詩經集傳卷五頁七八。原文爲：「滮池北流，浸彼稻田。」

四七　見乾隆四年校刊本史記卷二九頁三六。原文爲：「蜀守冰（註姓）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

然莫足數也。」

四八　見乾隆四年校正本史記卷二九頁三六。原文爲：「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使就渠。渠就，用注塡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幷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四九　見乾隆四年校正本史記卷二三九頁。原文爲：「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五〇　見百五十年名家評註史記卷一二九頁一五——一六

五一　見同上卷一二九頁一四——一六。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舉重要都會合之於現在的行政域區，約略如下：長安、楊、平陽（以上晉）；邯鄲、燕（以上直）；溫、軹、洛陽（以上豫）；臨淄、陶（以上魯）；睢陽、陳、壽春（以上皖北）江陵（鄂北）；吳（江南）番禺（粵）。

五二　見袖海山房校印本十三經註疏孟子五上頁九

三五　見乾隆四年校刊本前漢書卷二四頁二

五四　見百五十家評註史記卷六七頁二四和卷一二九頁一三

五五　見百五十家評註史記卷一二九頁一二——一三

五六　見百五十家評註史記卷八五頁三二——三三

五七　見乾隆四年校刊本前漢書卷二四上頁二七

五八　見文明書局印行本戰國策詳註卷八頁七

五九　見乾隆四年校刊本前漢書卷二四上頁二七

六〇　見江蘇書局刻本東漢會要卷三一頁三

六一　見乾隆四年校刊本前漢書卷二四上頁二五

六二　見同上卷二四上頁二七

六三　見百五十家評註史記卷一二九頁一三——一八

六四　見百五十家評註史記卷一二九頁一七

六五　見同上頁一七

六六　例如做白圭刁間的奴隸

六七　見乾隆四年校刊本前漢書卷二四上頁二七。原文爲：「董仲舒說上曰：……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

六八　見三味書室校刊本春秋左繡卷二頁二九

六九　見湖北崇文書局刻本管子卷二四頁六

七〇　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論第一章一〇四頁

七一　見同上

七二　見同上前論第一章頁四七——四八〇

七三　見百五十家評註史記卷六八頁三一

七四　見甘著先秦經濟思想史第六章頁七二——七四

第五章　小農商階級社會說

中國社會的基礎

梁園東

（上）

一　和陶希聖梅思平兩先生商榷

中國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支拄中國社會的中心勢力，究竟是那一些人，那一種階級？關于這個問題，近來陶希聖梅思平兩先生，都有很確實的意見發表。陶先生主張中國至現在還是宗法勢力封建勢力下的『地主階級社會』；梅先生主張中國自封建制度衰落後，卽轉入『商業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兩個結論，看去雖然不同，其實都有同樣的價值，兩先生的確把二千年來把持中國社會的兩種勢力指出來。據周佛海先生說，兩先生因為意見不同，一見而就要辯論，彷彿怕打起來的樣子，要教人加入討論。在我看其實不必的，兩先生只要

把這兩種勢力發展的階段，稍爲看短一點，這個問題，卽可解決。陶先生所指的『新地主階級』，絕不像封建時代一樣的有勢力，他不能單獨存在做社會的中心，他的性質，已完全是商業化的，其地主地位，全由資本買來，這和封建時代有領地權的諸侯地主完全不同。陶先生雖然會說，封建制度破後，封建勢力還存，後來的商業，卽爲這種勢力所桎梏。但其實新地主階級的構成，一半固由于封建勢力的存在，而一半卻是商業的發達所造成，假若秦漢以後完全沒有商業，或者只有很小的作用和封建時代一樣，那就以地主做基礎的封建制度且不會打破，不論其他。這樣就把秦漢以來的商業完全抹殺。陶先生有了這個漏洞，所以梅先生就乘隙而入，着眼在商業發達的情形上，主張中國是『商業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梅先生卻又把中國的商業看的位置太高，遽當作歐洲工場制度發生以後的商業資本主義，其實中國的商業只不過恰到了『交易』的分際，若說他能製造商品，有左右地方經濟支配國家的勢力，那他單獨還不夠。這就是說中國從前的社會，尙不需要這樣發達的商業，所以他也不能獨自做社會的中心。梅先生尤其錯誤的，是自己明把商人地位提得那麼高，而卻把商業的生命——工業——壓到最下；只吹噓商人投資的能力，而對於其資本得來的方法卻毫未提及。須知商

業若沒有大量的生產品供給他，那他的勢力，無論在資本方面或需要方面，都不能十分雄厚起來，那就支配小的國家如希臘之類也未必夠的上，何况這樣龐大的中國。但中國的工業發達過沒有，梅先生自己知道，所以把他壓到最下。梅先生的這樣看重商業，尚遠不如陶先生的看重新地主較眞一點，所以陶先生也不能承認他。

但我們要認清。陶梅兩先生的確把封建制度破後，支拄中國社會的兩種勢力指出來。不過這兩種勢力。各自都不能單獨存在。封建破後，新地主之能代替大地主的貴族階級，正因爲商業發達的原故，至於把地主的貴族階級打倒，而商業在秦漢以後的存在和發達，乃完全因爲新地主階級之產生和確立。在這種場合之內，一方面新地主不能擴大成封建時代的大地主——他獨自不夠存立，需要商業的存在——他方面商業不能發展成資本主義似的勢力——非地主階級所需要——所以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只成爲地主階級工商階級都不發達的『小資產階級社會』，換句話講，乃是既非純由地主做基礎的封建社會，也非工商業做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乃是小農、小商業、和一點小手工業、合組的社會。這些勢力看去雖是小，各不如他們的在封建時代和近代歐洲社會的勢力之大，但是合攏來普遍的都是小資產階級，

那末他們所需要的政府，所需要的思想學說，所需要的各種組織，就當然須按他們的口胃規定，才能存在。這就是說，自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除過小資產階級以外，再沒有大過小資產階級的勢力。所以中國的政府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政府，中國的思想學說，是適應小資產階級的產物，中國社會的各種組織，都是小資產階級活動的成績——小資產階級，是中國社會的中心勢力。

（附註）：本篇所謂『小資產階級』，自有他們的意義，絕不可與近來普通所謂小資產階級相混，這個名詞的用意，只是要指出中國社會從前那種生產和交換方法的經濟狀況。若只從他們的社會形態來說，似應稱為『農村商業社會』，若作一般應用，當以這個名稱為妥。

這話怎麼講呢？現在把我的理由簡單寫在下面，很誠懇地請陶梅兩先生和讀者指教。

二　封建社會成立的條件及其破裂

欲說明中國秦漢以來的社會，須先了解一點封建社會的成立和破裂。

所謂封建社會，卽是允許封建制度存在的一種社會。這種社會在人類各民族間，都曾經過或正在經歷，不過通常以紀元後八九世紀間的歐洲，和周時的中國，為最明顯。這種社會

的表徵，在普通歷史書上可以看到的是天子的分封宗室，公侯伯子男的諸侯，公卿大夫的食邑采邑，西洋史上又會看到什麼武士，Vassal, Subvassal 等，更詳細一點，可以看到他們的土地制，貴族和平民的階級制，以及嚴尊卑別上下的禮制，『愛民如子』和『臣服之禮』(Homage) 的封建組織 (Feudal bond)，也就是他們那時的思想學說等等。但不論這些表徵有多少，而這個社會之所以成立，却都依賴一個經濟條件，即是必須在一地域的經濟生活可以自足，他們的組織才可以成立。爲什麼要這樣說呢？我們如看比封建社會更前一點的『部落社會』，或說『原始共產社會』，他們大不同的地方，只在後者的生活，大都是游獵各處，無一定的住居，而在前者，却可以定居一個地方，終身生活下去。這個生活形式的不同，沒有別的，乃是由於他們生產方法的不同。封建社會，是農業發明以後的社會，他們可以用勢力向自然界生產以滿足需要，而在游牧時代，尚完全不知農業，他們生活的必需品，只有肉食和毛皮等，這些天然物，當然不能限於一個地方都有，必須這裏沒了，再向那裏找去。結果，那時的人，簡直不是生產，只是找產，曾有人計算，那時一個人的生活，必須有三十萬畝大的地方，才能滿足一生，這話並不過火，實際上那時一部落要限於一地方生活，無論如

何是只有滅亡的，所以必須找去。這就是說，那時的生產方法，不能使一地域經濟自足，故其現象爲游獵游牧，而牠的一切組織，也在這條件上建立，但到農業發明以後，一地方土地產出來的東西，顯然可以供給許多人，於是原先的部落，就不必再常時遷徙，四處去找，只要擇一肥沃地方住下，安心耕種就夠了。這許多部落住下以後，所生的文化又不同，普通稱作『氏族部落社會』。但這個社會，絕不會長久，環境不好一點，立刻就有較野蠻的部落侵入。這種部落侵入以後，他們自會覺着這個社會內的土地，是極重要的產業，而農民又是極重要的工具，於是就把各小部落征服，沒收其土地人民，做他的領地和奴隸，分封宗室到各地去就食，稱爲諸侯(Lord)，實際就是地主，以設立封建時代的國家。這種國家的特點，是並沒有政治上的統一組織，諸侯對天子的義務，只有朝覲、貢方物，此外各國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以及其他設施都不必相同，只是各自爲政。而且這個國家裏邊，尙顯然允許不同氏族的部落存在，而且這些部落，又顯然是從古代遺留下來的。從古代到那時並未移動過，如周時的唐杜六家陳宋等，所謂古帝後裔國，據顧棟高所考，在周時還有二十七國，不論這些國是不是都臣服於周，而他們那地域的經濟生活可以自足，遂能傳下來，這是無可疑的。

這種種事實，都可證明所謂封建時代的封建各邦，都只是一個經濟自足區域，由農業生活，使他那部落的人，都能足用，遂不必如游牧時代的常時遷徙。因這種原故，才能產生不變的世襲的諸侯，以管領那地域的土地人民，成立地主和農奴的關係，安心生活——這便是封建社會成立的基礎。

但是我們看封建社會的這種基礎，是很危險的，假使人口一多，需要增加，他那地域的產物，無論如何豐富，總末必能趕得上這種人口自然的膨脹力。況且他上邊又加上不勞動的貴族階級剝削，連帶的還要供養說是保護他們的兵士，結果，在那地域本已有經濟不能長久自足的危險，何況又加上許多剝削，加上剝削，沒有別的，只有促進那種不足的感覺立刻來到，於是一地域生產出來的東西不夠用了，米麥穀子不夠吃了，絲蔴不夠穿了。不夠了怎麼辦呢？按經驗說起來，他們只有仿照不會生產只會找產時代的老法子，四處遊稙去！但這個法子，在這時代已經用不通；這地方人口多，那地方人口也多；這地方有諸侯，那地方也有諸侯。初時或者還能稍為游稙一點不要緊，但是越游越擠，擠在一起都急了，不免打起來。這時的諸侯貴族呢？他們的龍子龍孫，自然也是越生越多，財用不足，更盡力剝削，「徹」不

足再二之，但『二吾尤不足』，眉頭也縐起來！于是也極力擴張地盤，試演梁山的火併，結果把周初所可考見的二百餘部落國家，併成十四個，十四個更又併成七個，終於合攏成一個。但是這麼一併，就可解決問題麼？不是的！在諸侯兼併小百姓相打的時候，固然死亡枕藉，可以減少許多啜飯的，但同時活的人也不能安心生產，所以要說戰爭能夠解決社會問題，那不只是獃子！實際上乃是在這種感覺不足生出困難中間，有許多人絞腦汁想法子。從來社會上聰明人多的很，有的說是我的地盤小所以不夠用，於是想出法子去吞併——這是齊晉秦楚的霸君。有的說是這算什麼不足，只是人心日趨詐僞，不安心做羊，於是想出法子鑄刑書、齊法度——這是子產管仲一般政治家。有的說這都是好好的老百姓，都被什麼聖智教壞了，假如『抛斗折衡』，讓他們老死勿相往來，還有什麼亂事——這是老子。又有的說，啊！你們都不對！這只是諸侯們不好的原故，假如都能效法堯舜文武，眞的愛民如子，各行仁政，不要過於剝削，『民豈好亂哉？』——這是孔孟一般人。如是如是的法子多的很，可惜藥性都走不到病上。霸君的法子自然痛快，可惜地方沒有無限大，人口却會無限的增；嚴刑峻法，倒不如與他們以餓死的權利好聽；老子讀的書多，經驗也富，知道封建初期一地域的經濟可以

自足，然而行不通了；孔家的話雖迂闊，倒還稍為對病，但是『百畝之田，勿奪其時』雖就是永久不擾他，也未必便能永久無饑饉？『八口之家，』乖乖多了怎麼辦？所以這許多法子，有的不能用，有的雖能相安一時，但時間來的快，馬上就是二時，於是霸君死了，大政治家也亡了，老子孔子都咳的一聲歸天去了，留下的仍然還是亂，老百姓依然還是受痛，眼看的這些醫生都不濟事，汗總得從病人身上出！於是有效的辦法出來了，問題解決了，社會也平安了！這個偉大的法子是什麼呢？原來是我們所認為極平常的而為那時許多小百姓漸漸試用有效而發展出來的『商業』。

三　商業的發達及封建制度的破壞

這個商業，在我們現在看起來固然極平常，而且有時候還厭他的敲詐剝削，從中漁利，然而他實在是救濟一地域經濟不能自足最好的辦法。在封建社會破裂以後，原先的游牧游獵既走不通。遊種更不成話，遂逼迫這一些人出來，專門把出產多的地方，搬到需要的地方，這樣互相交易，互相流通，有多餘的，既不至白費，感缺乏的，也不至困起，大部分人一點不用移動，只要少數人從事這種職業，自然可以使無論什麼地方的人，經濟上的需要都滿足

了。這個辦法，至現在全世界的人類都還用着，所差的是現在要格外來的凶點。不過，這種商業，雖是救濟封建社會的良藥，但却不可說在封建社會初期，就絕對沒有商業，春秋戰國時代商業雖盛，而他的許多發明者，恐怕還遠在夏商時代，前雖了萌芽，直到這時，需要增加，更發達起來罷了。

這個商業發達以後，自然社會上佔有很大勢力，對於封建社會的各種組織，必有一番改革，於是封建『制度』，即在這時破壞。

本來封建制度的基礎，就建在那種一地域經濟自足的封建社會上，某地域內的經濟既可自足，於是征服者，遂能把這個地域的土地人民霸佔起來，分封子弟家臣，令督促勞役徵收租稅——租稅已是後來的觀念，在初時實在的名目，只是貢方物耕公田出車馬供布帛甚至獻玉獻鵝等——這種狀況，完全和在地主對於佃戶的關係一樣，所以從政治學來看，那時有的是天子諸侯大夫等，而以經濟史來說，其實只是一般大地主，我們看了紅樓夢上莊頭烏進孝『回爺的話』；簡直不用再讀封建史！那末一地域的經濟永久能自足，這一般大地主自然也可以永久安享其福。可是經濟自足的條件，既不能存在，封建社會根本發生了問題，給他服役

的奴隸，都不得不跑開來另謀生活，這般地主又焉能安坐其位。等到這個社會的救星出來，商業發達了，這般地主天然的又來強迫商人，替他服役。可是這些商人，就和種地的人不同，首先的腿長，不必限于地域，諸侯們迫的他急了，他或者另到別處，或者根本歇業，結果諸侯們也是吃虧。而且假若就是他情願供養諸侯，但他所要的交換條件，却和農民不同。農民只要地主不勒索超過收穫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租稅就夠了，但是商民除過這個最低的條件以外，他還要求有往來各地的自由，有轉運貨物的自由，更需要諸侯們把往來的道路修理平坦，把可以被搶刼的種種危險免除。這種種嚕囌事情，使的他和諸侯的關係，已不能仍是佃戶對地主的關係，而是現在我們所習見的政治關係。我們不要疑惑這些要求太瑣碎，其實在那時是很重大的事體，試看十三世紀英國的封建制度將破裂時，商人強迫國王把這些條件都載在所謂『大憲章』(Great Charter)裏邊。這種關係的變動不打緊，恰使封建主的身分和地主的地位同時發生動搖。

首先封建主的分封子弟佔領各地，已完全失其效力，所有的地方未必都是商業發達的地方，封出去不見得就能養活了，假若坐領那裏，還得這裏供給，那就不啻是說不必去就食，

都在這裏靜候供給好了。於是諸侯們就不再去封建，只很省事的派幾員官吏，把守關市，或稽或征好了。這一下圖省事，他們不覺着，暗暗把自己封建主的身分給取消，同時自己已不純粹是地主，至多只是有政治權力的首領。以後漸次推廣，在農民的範圍以內，也設官取稅，或稱大夫或稱尹，或稱邑宰。總之地方制度發生了，封建制度就不得不退位。

但是這還不算，還有更利害的一着，假若事實上只如此簡單，那就有人會說，各處的地方官或收稅的官吏，都派他的貴族子弟終身做去，還不一樣也是封建。其實並不一樣，從前那樣封出去是地主，這回派出去是官僚，各地主領地經濟都可自足，故除過對最高的天子諸侯貢一點東西以外，互相誰都可以不管，政治上經濟上都可自由設施，而官吏的性質之下却不能。他的所以設官，正是因爲這地方征收可多、那地方沒有，遂須都集到一處，再行分別供給各地的需要，假若再像地主們的各自設施，自必會有的地方亂起來，所以不得不只派一種惟有服從命令沒有擅權性質的官吏去辦理不可。所謂派官吏者，正是因爲這種原故需要中央集權。這中央集權，是把各地的治理全權，都集到一個皇帝身上，於是封土建國，各自爲政的分權制度，更不能成立了。

但是這也不算，諸侯貴族子弟，照這樣說來，雖不能終身做地主，但是仍然可以專有做官的權利。誰知同在一個經濟條件之下生出來的東西，要倒都得倒，封建主的身分倒了，地主的地位倒了，封土建國的制度也倒了，這個封建社會中特有的貴族階級更須倒了。這時由大地主一變而爲政治首領的諸侯，他所需要的和部落時代不一樣，這時他決不怕他的貴族子弟餓起，而只在注意商人的偸漏，農民的暴動，尤其注意擴張地盤的有效。這樣他的選派官吏，自不必以貴族不貴族爲準，只要看辦事能不能有效，若非貴族的平民比貴族更能有效，那他的貴族子弟，同樣也可以舒服了。所以雖在春秋初年，齊桓公對管仲有射鈎之仇，都可用他，甚至聽到一個放牛小子歌唱的好，也能用他。可見他們雖在封建制度初破裂時候，也能知道用人的標準。這樣一來，貴族雖還可以有『羣公子』，但是他們只去納福好了，不必非上政治舞台不可。於是除過寡人一個以外，貴族階級也沒有地位了。說也可憐，這個階級一倒，由親疏的別禮，一別開來，竟有把原先的貴族逼的討飯的。

由以上三點，我們可以看出封建制度的破壞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們還應追回來問，這三件事，都是有利於諸侯的，諸侯自己情願去幹的，和商業勢力的興起有什麼關係呢？原來這

叫做『文化的經濟決定』。這種封建制變成地方制、地主制變成官吏制、分封制變成中央集權侯，都是因爲經濟生活改變的結果。從上邊已可看出封建社會經濟自足的條件不存在，逼出商業，由商業的發達，諸侯們爲取得供養計，不得不改變各種組織，遂把地主與佃戶的關係，一變而爲政治的關係，生出許多新現象。這種關係的變更，正是指出商業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和在社會上勢力的擴大，換句話說，卽是舊日封建社會中的地主貴族階級，已不能再做支配社會的中心勢力，代替之者，乃是新興的商人階級。

這種階級極端的發展，就是近代歐洲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但是這種階級的成立，要在社會上取得相當地位，固然容易，但若要額外的發展，卻是需要的條件很多。詳細說來卽是他在封建社會人口發展以後，救濟經濟不能自足的裂痕，稍爲把天產物富足的地方，轉運到缺乏之地方，固容易辦；但是如果需要太多，只一點天產物不夠，或是天產物實在稀少，都需要大量的製造品供給時，他就必須和另一種勢力合作，才能盡力發展。這另一種勢力，就是工業。所以商業只能暫時救濟，不能永滿慾壑，沒有工業，就把他的生命失掉，所以凡是說到商業的資本主義，社會上至少也有手工工場的發達，這是第一點。另外，還有根本的一點

是，商業的發達，固需以工業的發達與否去衡斷，但是無論工業或商業，他的發達與否，絕不是由商人或和工人的自由意志去決定，他究竟還須看社會上需要那末大量的生產和轉運不要。如果另一種生產方法產出來的東西，已可供給，自然就不需要十分凶的商業。這一點就很麻煩，使中國和歐洲，雖同樣在封建制度破後，而新成的社會，卻愈往後走愈不同。這個問題，還不是工業發達不發達的問題，乃是需要他不需要他的問題。怎樣說是不需要呢？現在且說中國封建制度破壞的另一種勢力。

四　封建制度破後農業生活的重新確定

原先在封建制度之下一地域經濟不自足時候，有商業起來爲之救濟。但我們試再進一層追問，究竟感覺不足的是什麼呢？雖詳細說來，也不過是些稻粱菽、麥黍稷、油鹽醬醋茶、煤炭布帛絲麻——肉類還未必需要——自然不是酒精硫酸單甯石油。但是這種缺乏，是古代一部落社會—一封建國家，限定於一地域內生活才感缺乏的。北方齊國臨海多產鹽，而河南各國大都不足；米麥絲麻，鄭衞楚宋多產，而齊魯卻感不足。倶如此類，若限定一個地域，老死不相往來，自感不足。但只要把這個地域擴大，自然就可足了，所以若把中國這個地方，

分爲不相知道的二百多個小國，自然要困難，卽併成各自獨立的十四個，也不便當，甚至只剩七個，也不能成爲什麼都豐富的經濟自足區域，所以最好是統爲一個。這樣兼併統一，實際上就有改變經濟不自足的一個小地域，變爲可以自足的一個大地域的意思在裏面。等到統一了，這個不自足的問題解決了，東西南北雖遼闊，自然有商業轉運。

但我們不要誤認這種由小變大的發展，是什麼齊桓晉文秦始皇的能力，實際乃是社會上經濟生活的要求。他們的混打混戰，只是這種要求時期的表徵。不然秦爲什麼不直向西，晉爲什麼不向北，楚爲什麼不向南，而都故意要往黃河流域擠呢？擠到這裏不爲別的，只是要『國富民康』！現在如再看他們擠的把政治區域減少了，而社會上的狀況又如何呢？首先，新興的是商業，定居很高的位置，這在前面已經說過。其次乃是舊有的農業生活，又得到確定的機會。農業的重新確定，實是天然的結果。本來從前那種不足，並不是沃土變成沙田，完全不產的不足；像古代的阿拉伯，水地變成大沙漠，逼的閃米特族一齊跑出來。他乃是經濟學上的不足，卽是：需要的或者產量很少，而不需要的倒反剩下來。這樣，多出的無用，不足的倒是眞的缺乏，所以那時的農業生活發生動搖。等到商業興起，經濟區域可以擴大，於

是不足的自可源源而來，多餘的也可藉商人轉運到別處，換回有用的東西。這樣農民就鼓舞起來，只儘管出產本地所能出產的東西好了，原先視爲無用的，現在認爲和必需品同樣的有用。於是農業在封建社會以後，仍然保有其勢力。

農業生活既經確定，也就是說一般人又感到農業的重要，自必仍在一地方安心住下，不像從前的棄農亂跑，有返到游牧時代的傾向，於是立刻發生了土地所有權的問題。這個『所有權』在從前本是不成問題的。封建時代，諸侯以勢力強佔土地，說是他的封土領地，領地內連土地和人民，都絕對屬他所有，自然不發生這個問題。那時的人民，雖不至眞如『二十受田六十還田』，這樣的純粹無產，但是的的確確人民不能自由使用，或支配他們所有的土地，實在千眞萬確的。但是這時諸侯既不封建，這些土地該屬誰所有呢？這個問題，若遇到『率爾而對』的子路來答，自然要說是天子的諸侯的，更聰明一點說是政治首領的。但是屬有固然是他們所屬有，而實在乃是要問支配權究竟該放在誰手裏呢？也放在政治手裏能，實行均產，固然是好，可是怕他們沒有現代的眼光，受不了那種嚕囌；子男五十里、伯七十里，至多公侯也不過百里，這樣雞犬之聲相聞的小國，那種受田還田的辦法還覺着是理想，何况

經濟不自足，需要區域擴大，人口也多，而且官僚組織又都簡單的古代國家，那能辦來呢？於是絞腦汁的結果，毅然從地主的諸侯手內，把這種支配權，交給老百姓。不過加上一種條件，無論老百姓怎樣去支配這塊土地，但是凡是一塊土地，雖不生產，也得按畝納稅，做他們養活的資料。這樣又生出一種新現象，打破地主制，生出『土地私有制』。不過這個私有制，也和商業一樣，當然也不絕對是始於封建破裂時代。大概古代自入農業社會，卽有了土地私有的觀念，只是那時的私有，未必是一個人或一家的私有，乃是一部落的私有。那末部落的酋長，支配這土地的權力，當然要比其他人大一點。等到封建時代，上有天子，中有諸侯，下有大夫，最下乃是平民，這樣把所有權瓜分開來，輪到平民頭上，雖不至零，也就少的可以了。因爲這種現象，在西洋和中國遂有兩種不同的解釋。西洋的學者以爲那時所有權的觀念是『重疊的』，卽是上自天子下至平民，都有一點私有的權利。但在中國，却說是『二十受田六十還田』，若照這樣，平民就毫無私有權利。這兩種解釋，儒家或者太理想，西洋的說法也許對。不過無論怎樣，在封建社會中，平民支配土地的權力，雖不至完全沒有，也是等於零的稀少。直等到這種社會要破裂，靠支配土地權力吃飯的地主諸侯，實際上單靠這

個已經不夠，而且另外又有了新的收入，遂把這種土地權完全交給平民。他只是如對待商業的一樣，只要徵收租稅坐着吃好了，這樣又把地主的身分自行取消，以後就活在這些納稅人的手中。

不說地主的糊塗，且說那時的平民，自得到這種權利，眞是歡喜無量，無怪乎後世要追念讚嘆，說是『農奴解放』。於是解放開來的農奴，遂努力耕作，以報效君父，眞如商君列傳所說：『廢井田開阡陌，聽民占田，任其所耕，世爲永業，務使地盡爲田，田皆出稅，於是秦國大富！』但是這種現象，日子久了，又生出變動來。一般農民，他的子孫，有的好吃懶做，就把土地換酒吃了，有的愛穿，也換緞子穿了，更有的嫌曬脊背苦，揀了其他職業。這樣一來，有許多農民，運用他的支配權，就把土地支配到別人家裏。而人裏面嗜好不同，有的却專門是土地迷，趁這些人放棄土地，他就盡力收買，結果他的土地積的很多。而一般放棄土地或從事其他職業的人，因流落與失敗的結果，眼看不能生活，遂不得不和這些土地多的人，訂立『契約』，替他耕種，以冀三一三十一分些糧食出來，以養活自己。這樣，那些土地多的人，就不必勞動，只坐收租仔，儼然又變成封建時代地主的位置，連田阡陌，呼三喝

四，居然又是一家小諸侯。那些替他耕地的人呢？我們現在稱作佃戶或租戶，其實那時恐怕比佃戶還要低一點，怕是買倒死契的奴隸！

自從封建社會發生動搖，以致商業興起，經濟區域擴大，農業生活，重新確定，又生出地主階級。這種過程，當然不是一時間的事，他們的關係一日安頓不好，社會也就一日的擾亂，於是由春秋而戰國，只有混亂。等到社會上這種關係，十分硬化，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組織，都能適應上來，才有了平安的希望。

五　新勢力的結合及小資產階級的確立

以上各節，我們只稍爲說了點商業農業兩種勢力的產生和確定，但是他們的地位確定以後，又要往什麼地方走呢？無疑的是往前發展。但是他們怎樣發展？發展的狀況又是如何？我們尤其應當加以注意。如若不明白他們發展的形式，往往會誤解他們所到的階段，這個階段，是直接能和現社會銜接的。換一方面說，我們只說些春秋戰國時代社會上的變動，而這個變動以後，那時所確定的社會，在秦漢以來情形又是怎樣呢？解答這個問題，是本節的主旨。

在未答這個問題之先，我要先說一點歐洲的情形，歐洲自從封建社會破後，也是商業興起，把封建制度打破，他們的商業，一直發達下來，純粹組成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更由工業的幫助，使這個勢力一發二發以至於無可再發！直到最近，居然要取消這麼勢力，主張『合作』，要使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聯絡，把這個中間者棄掉，商業勢力的衰頹眼看來到，這是不須說的。但是中國的情形，却完全不同。自從商業興起，他壓根就沒有十分發達過，他的勢力只澎漲到一個小規模的組織，勢力極其分散，資本既未集中，商品亦未增加，他不惟不會獨力支持，而且常受社會上的輕視，這個原故，並不是根於孟子什麼『賤丈夫也』一句話，乃是農業勢力的牽扯他。

至于農業方面，在封建社會以後，他的勢力的確定，在歐洲本來也有同樣的情形，但在歐洲早已被工商業排擠的無可存在，而在中國却仍然是社會上一個中心勢力。但要注意，他若沒有商業幫助，又早入了封建社會的恐慌。所以在中國封建以後的社會，並不是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也不是純粹地主階級的社會，乃是農業商業兩種勢力結合起來的社會。怎樣說是結合起來的呢？在這一節先說明他。

首先我們要認定人類社會的變動，某種社會的成立或改變，全看在那社會人們的生活需要是怎樣供給，就會有怎樣的社會；也就是看生產和生產物交換的方法是如何，他的社會也就是如何。再按我這篇文章所習用的一句粗淺話說來，也就是某地域內人的生活必須足用，但這個經濟的自足，看是怎樣使他自足，若是一個人須游獵於三十萬畝大的地方才能自足，這是部落時代的社會；若是住在一個小的地方，單由農業生產即可自足，這是封建時代的社會；若是單有這個小地方的農業產物也不夠用，必須把他的經濟區域擴大，並須由商人的轉輸才能足用時，這就是農業生產商業運產兩種方法合組的社會。這時的商業雖不直接是生產者，而却是直接供給需要者，同樣能使一地域內的生活滿足，而沒有時又能使感不足，所以他亦有左右社會的勢力，即是他亦有做社會基礎的資格。

但是這個社會內，農業既居生產者的地位，而同時他的產物又不能完全供給他的需要，必需依賴於商業，那末他的生活，一部分固然是代表生產者的，而另一部分却完全是消費別人生產出來的東西的。這一部分消費是誰供給呢？當然是其他地方的農業者，和很少的工業者，而商業給他們介紹，自然和他們有極大的關係。至於商業，他既能直接供給需要，我們

當然不能把他完全看作只是消費的貴族階級或治者階級；而同時他實際上乃是消費的。這個消費又是誰供給呢？當然是農業者和工業者。這樣說來，這個社會以內，農業和商業乃是互相依存而絕對不能分離開來的。這就是說，農業者之所以能生活，乃完全因了商業者之能爲他轉運介紹這地方的農業生產者，於那地方的農業消費者。假使不是如此，農業者雖都是生產，而却感經濟學上的不足，必要逼他不能生產而失却農業生活，這在前面已經說過。至於商業勢力的養成，更是因了農業，一方有這地方的農業者給他生產、供給商品，一方在另一地方承受消費。這樣兩種生活，互相帮忙，互相維持存在，漸漸發展互相增長勢力：這就是兩種勢力的結合。

但是社會上何以又非他兩個做基礎不可呢？這很明顯，農業既是專門生產者，而商業又有供給需用品的作用，那末假若把這個生產者和供給者完全取消，那社會上的人還靠什麼來生活，所以一切人們就非仰他們的鼻息不可了。說到這裏，必有人疑惑說，在歐洲那樣居重要地位的工業，在中國跑到那裏去了？其實並沒跑開，只是附寄在農業和商業的腋胯之下。因爲農業勢力的發達，商業的商品，只由農業供給而已有餘，工業除過爲農業者製造工具以

外，其他的一切製造品，在這個社會以內，簡直完全沒有也可以，他的存在，幾乎也全靠農業和商業的發達。所以在中國把這樣偉大的生產者，竟給屈駕了。這個理由，還要在下面詳說。

農業和商業既因經濟的關係而結合，但是最要緊的，還不在這一點，其所以使他們結合以至膠結而不可分離者，尚不是這種普遍稱謂的一般農業者和商業者，而是農業裏面居貴族地位的地主階級，和商業裏面居貴族地位的資本家。這兩種東西的實行結合，才是水乳交融的結合，眞的不可分離了。

前面已經說過，農民因得到土地支配權的結果，自由買賣，遂使有許多農民變爲佃戶式農奴，而他方面又有許多人變成地主。這種地主階級出世以後，他的收穫豐富，勢力雄厚。同時他又看見他的生活，有一部分是仰給於商人，就是他的財富，有一部分要被商人剝奪了去，他當然就不情願起來。於是就提一部分資本，投資商業，開商店、立字號，以地主而兼起財東來。不過我們不要誤會，他不是由農業生活而改職業，他的生活仍然重在農業，只是要借重商業以免去剝削，而充實他的勢力。而且他的廣大的土地，也是由土地企業而得來

的。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叫做農業的商業化，意思就說，地主借助於商業，地主的勢力愈偉大。

至於商業者呢？他們跑腿的結果，漸漸由挑擔變成商店了，由行商變成坐商了。再有左右望的本領，三年一算賬，不三賬就成了一個資本家！既成了一個資本家，錢多了做什麼用呢？在歐洲的商人，應當是做企業去，但要用這種眼光來觀察中國，却完全差了。中國的資本家，企業固然也做，但都是適可而止，然而却有一件事情非做不可，即是一定要拿一部分資本去置田買地！這種現象並不奇怪，第一他的資本多了實際也沒處用(理由見下)，第二他也是看見他的全家老幼，雖多金錢綢緞，却不能咀嚼，一部分財富都被農業者剝奪了去；加以旱潦不定，一遇凶荒，性命也被農人把持，遂不得不早作綢繆，大捧銀子，投資置田。等到幾頃幾十頃田地置足了，然後租與幾家佃戶種去，穩坐吃租，既免危險，又免剝削，一舉兩得，於是商業貴族的資本家，也地主化起來。這裏我們也要注意，這個資本家不是改行成了農夫，他的基礎事業，仍在商業。假若他時運好，十號八號還是從老店分出來，不過同時有了廣大的土地，使他們後路寬宏罷了。這樣資本家借助於農業，資本家的地位愈穩固。

這樣看來，中國社會上商業農業，從其底層的勢力分析，固是截然不同，而從農業上的領袖地主與商業上的領袖資本家看來，簡直是一個東西。若不揪住鬍子問到底，幾乎分別不出誰是資本家誰是地主來。這才是水乳交融眞的結合，這樣一結合，最可注意的結果，是使他們互相都感到極深切的關係，幾乎常是站在同一的利害觀點上，所以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組織常是同的，所表現出來的意識也是同的，遂在文化上結成的種種形態，幾乎完全是一個階級的，看不出有兩種勢力的區別——固然有的地方是可以看出——這樣結合成的社會，我們當然不能只舉出一個——或說是地主階級的，或說是商業資本主義的——做代表，甚至也不能說是地主和商業資本的二元社會，實際上乃是兩種勢力結合而成的『小資產階級社會』。

但是資產罷了，何以要說『小』呢？這個在下一節說明。

六　小資產階級的狀況

由商業和農業這樣結合組成的社會，我們說他是小資產階級社會，就是說他們的勢力，並不能擴張的很大，各自可以獨力支配整個的中國社會，其勢力乃是集分散的，並沒有統一的組織。其階級勢力的形成，亦只是由於這些分散勢力尙是在同一條件同一性質之下存在，

因而自然生出一種集合的勢力，遂組成這樣龐大的一個國家。若沒有這種同一性以生出同一的要求，那末中國也許早就如歐洲一樣的分裂了。但是我們應當再問，他的勢力何以不能集中，何以分散？這個現象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乃是他們本身的缺點。

（附註）：第二種原因，乃是因為他們勢力不能集中，遂使剝削者太多。由壓迫而更趨於薄弱，還在下篇詳說。

由上一節，我們看他們的結合，他們的相依存在，是必然的結果。因為這種結合，固然使他們的勢力格外穩固，但是同時也使他們受了這種結合的連鎖，不能自由發展。

首先，在農業方面，他的勢力本來可以盡量發展，由一個大的地主，支配全部土地，完全造成地主階級的社會。但這是封建時代的現象，封建社會一破裂，幾乎使農業生活根本不能成立，幸而有商業出來為之救濟，農業生活始稍稍確定，又能生出新地主，這一服續命湯的效力已經不小了。但是這些新地主，假若要變成和封建時代一樣有權有勢的大地主，那確是絕對不可能的。第一、這個社會的地主，和封建時代的地主，性質完全兩樣。封建時代的地主其地位是強力取來的，只要他的武力充足，能夠征服一切人民，他的地主位置之大，就可以變成全國的天子。但在這個社會裏邊，一般地主，都是由商業性的投資經營而買來的，

假使他要變成更偉大的地主，他也就非有更偉大的資本不可，但是這個資本的偉大，要有能夠購買全國土地的能力，這恐怕爲事實所不允許，即不論全國，雖一省一縣恐怕也絕對辦不到。這種辦不到，固然還有其他原故(見下)，而在農業本身的性質上，也決沒有積成這樣雄厚資本的可能。這個性質就是說，土地的價格，雖不確定，而較之其他貨物究確定的多，企業壟斷都不能擴大。

但是這一點不可能還不要緊，最不允許他這樣做的重要原因，乃是和他並存的商業，決不使他這樣偉大的去發展。商業只爲了怕被農民剝削的一點小事，尚且要和他爭勢，發了財准要以資本家而兼做地主，何況農業有變成他的支配階級之趨勢，他焉能不和他去分爭。結果，若在地主有收買土地的機會時，資本家當然也必去購買，這樣自必與地主發展上一個打擊，這就是說：社會上的資本，不全在地主階級，至少有一半是在資本家手中；所以無論地主怎樣發展，永久沒有獨立支持這個社會的可能——這是地主階級不能發展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第二個原因，乃是因爲這個地主的階級性雖是確定的，而地主者或階級的代表人，却當是變動的很少固定，他不能像封建時代的地主一樣，可以子子孫孫永久世襲。假若眞能

『五世同堂』，『效張公九世不分居』，已經是社會上認爲很可驚異很難能的事了。若這個地主的代表人其他位不能固定，則他的勢力自是常趨於分散而不能統一。至其所以不能固定的原故，仍然因爲他是買來的，一遇人口上自然的變故——即使把其他原因除外——就非賣去不可。這個性質的重要，是(一)可以說明他的勢力不易澎漲，(二)兼可以了解他的勢力不能集中而只是分散的。

封建社會以後的地主階級，既包含有這兩種不能分離的性質，遂使他絕無變成偉大地主的可能，結果，只成了一些分散在各地，聊作幾十畝、幾百畝，甚至幾千畝的小地主，以過癮而已。假若我們再推原他這種倒霉性質的所自，最切近的一個原因，仍然是由於農業不得不和商業結合的結果。

至於在商業方面呢？他的不能無限發展，也是受了農業的牽掣。首先我們要知道商業在封建社會以後出生的價值，本在救濟一地域農業者的經濟不自足，農業者得到他的救濟，立刻恢復原狀，馬上產出新地主。這樣農業離開商業，更要困難，而商業若沒有這些農業者需要他，他也非關門大吉不可。所以他存在的價值，是在農業上，他的大部分利益，也建在農

業上，他的最大的主顧，就是分散在各處的小地主和無數的小農佃農。這樣他的組織，就不得不適合這種情形，也分散在各處：只是城市鄉鎮，到處商店林立，若要造一個紐約倫敦，那是這種性質的商業所不需要的。

只這一點，我們已可以瞭然於商業勢力的不集中，然而尚不止此。假如只這一個原因，那就也可以走出幾個資本家，在武昌漢口組織一個大公司，分店北至北京、南至廣州、東至烟台、西至打箭爐，再分設於無數無數的農村中，也可以適應農民的需要。但是商業這樣的發展，事實上也不允許。這個不允許，並不是說中國土地廣大，交通不便，絕難辦到。而其實，若果是社會上眞的需要發展的商業，那交通是不成問題的，須知歐美的鐵道縱橫，也只是因爲社會上迫切需要，才有科學家絞腦汁發明出來的。假若中國需要這樣的商業，豈中國人的腦筋眞個愚蠢，便不會有一點發明麼！若更有人說這是因爲孟子『賤丈夫也』一句話的結果，那更是浮淺的觀察。實際上乃是因爲農業在這個經濟組織中，也佔重要位置的影響。換句話說，就是社會上固需要商業的發展，而同時也需要農業的發展。這樣所謂社會，乃是構成這個經濟組織的團體——即是需要商業發展的，不是別人，正在農業者，而需要農業發展

的，也不是別人正是商店者。他兩家不惟在社會上佔絕對的大多數，而且都是居於生產者或供給者地位的。除他們以外，不論王侯公子，誰都是靠他們的勞力生活，他們一歇業，不論午門衙門軍門朱門，都得倒閉。他兩家既是互相需要，而且是迫切的需要，那末商業者這樣擴大起來，他是要做什麽呢？不外是要獨握經濟全權，以左右社會，說得淺一點，只是要從他的顧主身上，多榨取些利益。前面說過，商業者的利益，都建築在農業者的地主小農等身上，這時的農業者，假若都是不生產吃閒飯的治者階級，那末物價貴賤，只好一任商人，聽其剝削。不料農業者却不是如此，他在這個經濟組織中，至少居二分之一的地位，商業的出生，尚完全是因爲他的需要，即是說這個社會中商業者所做買賣，除一部分是取給於工業者作其他的供給外，而最大部分，乃是取商品於一地方的農業生産者，——如絲麻油鹽布帛五穀等——而供給於另一地方的農業消費者。他的買賣既建築在這種情况上，那末他要生出野心，大規模的剝削農民，試問農民也有一部分經濟勢力，也握一部分資本，允許他不允許？必然的是逼成各地地主去兼領資本家——即是農業者若看見資本家剝削得太利害時，他們當然會拿出資本，自行作小規模的轉運，以滿足他們最大量的需要而止。這樣，各地的小規模

商店既紛紛成立，試問在武昌漢口設立的那個大公司，還做什麽買賣？當然又只有關門大吉了！

由上一段話看來，中國商業的不能發達，並不是什麽奇怪事實，實際上就是因爲這種專門爲救濟農業而始成立的商業，絕不能在農業者不需要之下額外發展起來。因爲這種原故，使商業者不惟不能獨力支配全國，完全組成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即在特殊的一省一縣，也沒有純粹的商業區域。這個原因，就是因爲農業者的地主勢力，本是分散的，不集中的，當然依賴農業存在的商業，也不能集中起來，只好隨農村的分散而亦趨於分散了。於是農業的產物，到處都有，不是米穀積於天南，絲麻積於地北，農民的需要，雖各以特殊環境而有不足，但只要這個經濟區域稍爲擴大，即可供給，亦並不是非天南地北，東洋西海，大規模的轉運不可。這樣使商業的性質，亦只好讓各地農村的稠密，而組織小規模的商店好了。所以我們從這種社會的形態上看，應當稱爲『農村商業社會』。因爲這種現象，使中國的商業者，只由以物易物，進到笨重的現金貨幣而止，信託公司，如果不是海外貿易，那是永久不會有的。即以紙幣論，雖萌芽於南宋，而實只盛行於明室中葉，以匯兌論，有名的山西票莊，最

早也不過始於淸初，而眞正的銀行組織，尙在民國成立以後。除這些最近事實以外，鏢客銀鞘騾馱，是商業上唯一的組織，而上海規元制的改革，至現在尙成爲問題。這種種事實，正足以說明中國雖至最近，尙不足成爲商業的資本社會，何況從前！而這只是根於商業的不能發達，其所以不能發達，只是構成他的勢力的資本不能集中，而其所以不能集中，又只是不需要，非不能也！所謂不需要者，乃是掌握另一部分財富的農業者，不允許他，不需要他。受這種束縛的商業，雖欲脫去桎梏，獨自發展，但是又從那裏去找商品，那裏去找市場呢？於是自不得不和農業結合，而只做有利於農業的小商業了！

看了以上情形，我們可以知道商業和農業的勢力，都不能十分發展，只有互相結合，互相依賴，共同構成他們的經濟的組織，構成他們的『農村商業社會』。這種不能十分發展，就是他們的資財，不能十分雄厚，作什麽土地大王商業大王，他們裏面的地主式資本家，都不過擁有一些『小』的資產——這就是所以要稱爲『小資產階級』的意思。

七 結論

以上數節大略的敍述，我們只可了然於小資產階級發生的情形和其狀況，至於這個階級

怎樣構成中國的社會，怎樣把那種分散勢力積起來而發生效力，在地上面有沒有其他勢力支配，和他們產生出來的文化狀況又是如何，以及用這種觀察，能把中國歷史上的現象說明若干，這幾個問題，我都留在下篇去解答。現在還有急應當說明的一點，卽是同在封建社會以後的近代歐洲，何以和中國相差有如是之遠？人類社會固然不必有什麼目標，但是歐洲社會顯然是進化的，而且是進步的，如果我的見解不至十分錯，那中國的社會，何以停滯了有如是之久？關於這個問題，在這裏我也想努力與以解答，當然，和前邊一切敍述都一樣，是預備好要承認自己是錯的。

首先，我們要承認中國的這個小資產階級社會，其代替封建社會而存在，並不是特有的現象，在歐洲也有同樣的情形。歐洲自封建制度破裂以後，代替貴族階級與起的，也是小資產階級社會——多一點說是中產。不過這個小資產階級社會繼續沒有幾年，卽爲商業資本主義所代替。但歐洲商業的發達，是自有他的原因。歐洲在十字軍以前，查理曼(Chalemagne)子孫統馭之下的社會，已有到東方貿易的需求，至十字軍以後，因爲地中海東岸阻於回教徒的結果，要找尋到印度到中國的新路，是他們不得已之舉，因而有新大陸的發現，我們不必

問自己這個新陸發現以後對歐洲商業上有什麼影響，也不必問自指南針航海術發明以後，對商業上有什麼幫助，而這麼何以歐洲人要找尋東方貿易有這樣的熱烈？這顯然可以看出他們社會上經濟力的不足。那時的歐洲人要 On board 的追求，和現在的歐洲人實毫無二致，所差的是那時歐洲人怕的是自己餓，這時的歐洲人怕的是別人不餓。歐洲經濟力的不足，並不是現在的英法德意諸文明國人告訴我們，乃是他們的祖先，希里尼人、拉丁人、高特人、萬達人，等等告訴我們的，而其中知道的最清楚的，怕是曾經游歷過各地的日耳曼人。他們這種不足，並不是限於多腦河、萊茵河一地域的不足，怕是遷到希臘，遷到第比河旁，遷到塞因河旁、遷到泰晤士河旁，都是不久就會餓起來的。所以歐洲人得意的說，在十四世紀時，他們的威尼斯（Venic）已成為二十萬人的大都市了！其實威尼斯的意義，我們是曉得的；不幸的米麥絲麻香料食鹽，有的是從大洋來了，還得老遠地到巴塞爾（Lasel）、威斯卑（wisby）去旅行，一直到瑞典、丹麥、俄羅斯、英格蘭，才能到他們所應當到的地方。這種事實所包含的意義，是不須解說。所以自十四五世紀以後，商業的勢力就立刻飛漲，於是從城市工商業、工場工業、機器工業、一直造現代的社會。

但是在中國却不然。這個社會，一直從封建時代以後，繼續到最近。這個歷史演進的不同，並不是中國社會內，除農業和商業兩種勢力外，尚有其他勢力來「維持」他，其實只是來剝削他！實際的原因，乃是由於這兩個勢力所構成的經濟組織，在中國這個自然環境(Natural Condition)內，實有這樣長久存在的可能。要知道這個社會存在的基本條件，仍然在於一地域的經濟自足。封建社會的不足，是由於封建制度之下經濟區域的窄狹，由商業的興起，把地主的性質改過，使這個經濟區域擴大，那末，只要擴大的這個經濟區域，永久能滿足需要，這個性質的地主、這個性質的商業，自亦會永久存在下來。於此試先勿問中國的社會，何以和歐洲演進的不同，而只先問中國這樣大的一個經濟區域，能不能夠使這種社會長久自足，長久存在。我們只要稍爲分析中國歷史演變的痕跡，即可知每一時期的變動，只是對這個經濟自足區域擴大的追求，而每在擴大以後，即有一時期的安穩，自可證明。

最初春秋戰國時代，那時來往最複雜的，只不過是臨近黃河兩岸和淮河流域的各國。江浙的吳越，實際在經濟的需要上，只應和楚國來往，他和中原發生關係尚不必要，所以不論夫差句踐，要和齊晉爭霸，都無下場。直到漢時，才有從黃河兩岸伸入長江以南的必要。這

個較大的經濟區域，在漢時沒有確定，一直擾亂到三國，孫吳開闢江浙，後來經過南北朝的民族遷徙，隋煬帝開掘運河，才把這個經濟區域確實劃通，遂立唐室三百年的天下。唐末，北方民族又不斷的侵入，人口過多的關係，使這個經濟區域更有擴大的必要，於是經過南宋的民族遷移，珠江流域也開發了，中國的版圖，漸次確定。自明清以來，已受歐洲近代社會的影響，他所感困難的，已不是這個經濟自足區域擴大的追求，當然另有方向，這且不說。只說中國歷來那種擾亂，既都由於原始的絕對的人口過多關係——或由外族侵入，或由自然發展——以引起不足，生出騷亂，而其結果又都是政治的版圖擴大，即是經濟自足區域的擴大，而却並沒有社會上的根本改變，如春秋戰國時代和秦漢以後不同的一樣。這種現象，自可證明中國的社會，經過二千年的時間雖長，却並沒有根本的改變(自然是簡單說來)，即是中國歷史上每一期擴大的經濟區域，都可以使那時的這種社會滿足，於是代替封建社會的商業農業結合而成的小資產階級社會，遂這樣長久地存在下來。

這個歷史和歐洲演進的不同，只好供作環境主義(Environontalism)的解釋。

其次，若把這個社會再和歐洲比較，我們在一般歐洲人所著的文化史上看下來，他們是

稱爲「城市商業社會」或「手工工業社會」。這就是說，他們所指的小資產或中產階級，彷彿只包有商人和工人，而却沒有農人；但如此篇所述，農人反居重要的地位。這個社會的基礎，似乎兩歧！其實並沒差異。我們應當了解，在封建社會以後，必然的是商業興起，而又必然的是農業復活和地主階級的復生，這兩種勢力更必然的結合。試看英國的男爵諸侯，兩次逼迫英王約翰(John)和亨利第三(Henry III)，都是地主和商人聯合起來的行動，而他們的結果，是鄉紳和城市商人在國會中取得地位。這種現象正足以表明在封建以後，社會上不單是商人的勢力。不過歐洲各國經濟自足的區域，無論如何擴大，也很有限。即使全歐洲也如中國一樣，同在一個統一組織之下，也未能自足，所以十五世紀以後，找尋原料地找尋商場，是歐洲各國普遍的要求，這種要求實使歐洲社會，向外發展的需要大，向外團結的需要小，於是羅馬大帝國再不能實現，拿破崙、威廉第二只做了一場統一的夢，而分裂開來的歐洲各國，更不足成爲一個自足區域，商人無論如何能力大，只得到海外去找，你們的文明，正是他們的困難的結果。這種現象所包含的事實，當然是農業者的顯然無力，他不能互相供給滿足，逼的商業者非從外洲找尋不可，這樣他的自身價值已衰落，當然沒有禁止商業發展的能

力，遂使商業連帶引起工業，獨自發展，農業只得偃旗息鼓銷聲匿跡了！但是雖然如此，雖在歐洲至亞當斯密，仍然是以「重農主義」(Physiocrate) 和「重商主義」(Merchanticism) 並重，即可見農業勢力並不是完全可以抹殺的。然而歐洲的農業，天然不如中國一樣的有雄厚勢力，遂由不能盡量供給的缺點而退休，只好讓工商去發展。

但是，這種現象，是演變的結果，至少也是在人口格外的發展以後，而却不是最初的現象。但近代歐洲的經濟學者和歷史學者，只看到現代機器工業和國際貿易的發達，是從封建時代以後的城市商業和手工業發達下來的，遂謂此兩者也爲那時社會的基礎。其實，遺漏了農業，至少在封建社會以後緊接的時代是不確的。若用了歐洲人這種錯誤的觀察，冒然來解釋中國社會，當然也會把農業的地主除外；只拿史記貨殖列傳做代表，認中國社會爲商業的資本主義社會。或者從另一方面看到地主階級勢力之偉大，而在歐洲人所敍述的人類文化史上，在封建以後找不出地主階級在社會的地位，遂不得不說中國社會仍在封建時代留戀。其實，同樣似都未得眞象。

(下)

一　小資產階級的農村商業社會

把上篇的意思總括起來說，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乃是以農業經濟做基礎，構成地主和佃農，資本家和小商業者的經濟關係，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邊，既不是商業的資本所能夠獨力支配，也不是純粹的地主階級所能支拄。商人只賴地主階級所剝削的剩餘勞動，供給商品，他不能使全部生產完全商品化，所以他的資本勢力，永久不能擴大起來；而農業者又必須互相交換其生產品，才能使其產物有價值，離開商人、地主的勢力，必會根本破裂，如封建社會的末期一樣。所以，農業者和商業者，地主和資本家，在這個經濟關係裏邊，其結合是必然的，各自要獨立發展，絕不可能。所以商業的發達，每依農村的稠密繁盛與否而決定，而繁盛的農村，有地主階級存在時，其商業的活動亦必興盛。根據這種關係而成立的社會，既不是封建的，也不是商業資本的，按照他們的基本組織，只是一種農村商業社會。

我們稱這個社會爲農村商業社會，並不是說這個社會是獨立的二元組織。他的表面，雖是農業者和商業者、資本家和地主、兩種勞力的結合。但他們的結合，顯然是不可分離的生

產關係。在這個關係的外形，雖有農業者和商業者的不同，但其內部，同受這個社會的生產力支配，同爲一種生產力法下的經濟活動。在這種支配下，使一個農業者，同時就是製造商品的營利者。而一個商業者，其資本的運用，又只在於農業、地主和資本家；在他們最後的結構，實際上是不能分別也不可分別。因爲這種關係，使他們的勢力，各自都不能發展，各自都不能有統一的組織，而只成爲分散的小勢力的結合。所以這個農村商業社會的代表階級，只是一般小資產者——沒有幾個地方或幾種經營或幾個人，能夠支配全社會的經濟。他們所以能造成這樣廣大的一個社會，乃是由這些普遍存在的小資產者，因共同的條件、共同的利益，產生一個共同的國家制度而建立起來的。因爲這種原故，使中國社會，和歐美各國演進的方面完全不同；這就是說，『農村商業社會』的進化，絕走不到『城市工商業社會』所到的階段上。最近中國受到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他的演進，當然也不能用歐美一般的情形來觀察，這是另一個問題，暫且不說。現在先把這個社會的組織，以及其在歷史上的狀況；略爲與以敍述和解釋。

據我們所知，一個社會集團，純粹由他們的經濟關係建立，而且能自行處理他們社會的

公共生活，實在再沒有中國社會這樣的顯明。中國社會差不多不需要任何上層的組織——國家政治法律等——，他們自身卽有極堅固而完備的組織，這種組織，亘數千年也未嘗破裂。除過近來資本主義的侵略以外，在從前無論那一種民族，或那一種政治勢力侵入，也絲毫不能搖動。（資本主義的侵略，也是最近金融資本的影響最甚，若在前期的資本主義，爲害亦小，這是另一問題，當再詳論。）而且必須服從中國的社會，才能保存其政治勢力，這是從歷史上異族的同化可以完全看出的。所以中國的國家和政府，在經濟的組織裏面，幾乎完全是一個無用的廢物。中國人常說：『那個皇帝手裏不納糧！』可見他們和國家的關係！中國人沒國家觀念麼？不是的，乃是歐美人所認爲國家的職務，在中國社會上，幾乎可以完全自行處理。這個代表國家行政的中心，一個是在農村的『公社』和『宗祠』，一個是商業的『公行』或『公會』。

農村的結合，第一個條件，當然是土地；由土地的廣狹肥瘠，決定一個幾千幾百或幾十家戶口的農村時，卽由闔村的農民，建立廟宇，組織公社於其中。社有『社首』（或名糾首），社首一人或三四人不等，大約看村中的姓氏如何決定，如一村是張王李三大姓時，卽由三大

姓各舉社首一人組織。社首以下有『鄉約』有『保甲』；社中職務，雖以爲國家計算徵納糧銀爲主，但其實，鄉間的道路、溝渠、看田、冬防（打更下夜）、娛樂（迎神跳戲），乃實際爲社中主要事務。其中最要者爲修治溝渠，每當夏秋河水或山水漲時，必預先集合全村力量，共同修治，或備灌溉、或防潰決。其次爲看田、冬防、或僱傭或募村民，以防竊盜；此種組織，幾乎爲任何農村所必備者。社中經費，向例村中農民除向國家納稅外，另有村中『攤派』，有地者按地畝出錢，無地者出力，爲社中經費和力役；有時遇重大事務，幾乎全村農民，皆須分派工作。其出錢之家，名爲『花戶』，花戶顯然爲一村之政治單位，遠如管仲商鞅之鄉里連坐，近如王安石之保甲諸法，實際皆以此花戶爲基礎。

鄉間之道路溝渠，爲一村所有者，即由一村社治理。然事實上河流決不止屬於一村，故傍河流之各村，必共同更有一較大之公社，其社多在此河源共同所建立的廟宇上。此社每年必有一較大之集會，除迎神演戲以外，關於堤岸的修築，灌溉用水先後次序的分配，以及冬防看田等，皆於會後決定。

農村政治單位之花戶，在社會單位，即爲屬有一定土地之『家庭』，此家庭完全具有宗法

社會性質。家有家長，子弟行爲負絕對的責任；故一家之事，全由家長管理之。聯絡同姓之各個家庭爲『族』，族有『宗祠』或稱『家廟』，族中事務，族長有管理之權。但此種組織，雖爲宗法社會遺物，而其組織意義，已不全爲分別宗系而設，實際乃亦爲具有致治勢力之機關。俱凡農村有鬥毆，或房產土地之爭執，婚姻分炊之處理，皆由雙方之家長族長解決，有時農村公社亦共同參加。此種解決，效力甚大，每有極糾紛之事，亦全賴宗祠或公社解決之，雖至涉訟，而官庭亦多委托其族長或社首和解，其在政治上的效力與價值，實較官庭爲大。若較小的農村，或較單薄的族姓，雖無宗祠，其家長族長仍有實際權力。

農村與農村間，產物上之交換，由商業的組織分配之，商業者之組織，較爲複雜。農村與農村相互間除爲農業上之公共事務集會外，另有爲交換產物之集會，名爲『趕集』。此種集會，較農業上之集會爲多，一年中大約分數季行之。俱凡生活用品，會中無不畢陳，在城市不發達的地方，農民用品，大率須待會中置備，每遇亂事，此種集會不能舉行時，其於農民生活之影響概可想見。

若在農村繁盛頗有地主階級存在之區域，必有以商業爲中心之城鎮。城鎮之商業者，其

聯絡各地農村之距離，自較趕集爲遠。商業者之組織，其同業之間，有『行』、有『所』、有『會』、性質皆同。行有行董、會有會長皆、由同業者公舉。其作用大率爲規定物價，限制同業競爭。在舊日行會最發達之商業爲錢行、糧行及當行，以利息之高低、糧價之疲漲，最易伸縮而不一律，故其組織亦極嚴密，甚且有監察罰款之規定。行會成立以後，每舖戶按資本多寡上捐，如不上捐者，即摒出同行以外，且必受排擠而不能立足。除同業之行會以外，又有同地域之『幇商』，如廣東、雲、貴、四川之商人貿易於內地者，有廣幇、川幇之名稱，其具體組織之見於近代者爲『同鄉會』，此種組織之作用，大率爲聯絡感情結合勢力而設。一因遠道轉徙，非大股結合共同行動不可，正如古代西亞與歐洲十字軍時代之『商人隊』同。一因不有結合，多受本地商人之排擠，其名稱至今仍有存者。

農業者和商業者之此種『社會的』組織，看去雖甚完備，但有一大缺點，使牠們的社會生出幾種不能救治的弊病。即是農業者和商業者，只有各自獨立的組織，而沒有共同的聯絡。他們中間並沒有組織上的連繫，遂常生出利害的衝突，以阻礙他們的發展。在商人之間，以自己利益的關係，對於農民常是壟斷把持、盡量剝削，殊不知農民不惟是他的購買者，而且

是他的商品供給者。農民既常受商人的剝削，當然視商人如蛇蝎，非必不得已時，絕不肯與之交易。結果，農民總是首先出產自己所需要的，以避免剩餘的要賤賣，缺乏的要貴買。這樣，有的農民固以商人的剝削而流於貧困，而商人卻亦因商品不能盡量發展，和農民的購買力薄弱，商業亦因以不能發達！這種利害的衝突，在中國歷史上是常常看到的。一般人遂集矢於商人，常予以壓制，遂生出重農輕商的觀念。其實，在這種沒有組織的狀況之下，不論農業商業，實在是同受其害，都不能為大規模的發展。中國的『園耕』(Horticulture)，很為歐洲人所驚異，十口之家，種三十畝地，桑棉五穀，即取之不盡。但這種自足的生活，究屬少數。大多數地方必是富此缺彼。於是剩餘的便箱萬倉千的積起來，甚至把廣大的土地荒廢了，而不足的卻終是不足。所以園耕的技術，雖再發展，於全部社會的利益計，亦必無多少好處；這就是說，農民只為了自己的利益，不肯為製造商品而生產。其結果是農業和商業都不能發達，社會的發展，同樣要受阻礙。農村商業社會停頓有二千年之久，這種組織上的缺點，或亦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農業者與商業者之間，不惟沒有相互聯絡的組織，即他們自身的組織，也只是限

於那麼狹小而止。不論農村的公社或商人的公行，都只是限於地域，各自零零碎碎的活動，絕沒有較大的組織。在農村之間，除一村之公社外，至多只能聯絡依傍河流之數村爲更大之組織；若不屬一河流，即永久可以不相聞問。而中國的河流，又不像埃及尼羅河的樣子，全國共守一河，休戚相關，遂能組織一個河流國家。中國的河流，幾乎遍地皆是，除過『江淮河漢』幾條大水以外，過是河身極短，流域極小的小河，河流分散。依傍河流而生的農村，當然也就分散開來，不必要共同的組織。結束，農民的勢力，是分散的，是不集中的。

農村的組織既分散，依賴農村而生的商業，當然亦趨於分散。農村之間，沒有城鎮，在同一城鎮的商業者雖有組織，而城鎮之間，却和農村一樣，也無較大的組織。商人所及的地域，本較農民爲闊，但商人對較遠貨物之轉徙，是行使『買客』制度，即按本地的出產和需要，只派一個買客到地頭司買賣而已。這種買客和資本主義者在中國所用的『買辦』，其作用相差不啻天壤，另外就是商人隊似的『幇商』。此兩種商人所及之範圍雖廣，而却都是各自獨立的活動，絕無組織上之聯絡。結果，商人之勢力，也是分散的不集中的。

農業者和商業者的組織既狹小、勢力既分散，這就是證明中國的社會，絕無社會勢力，

農村與城鎮，大規模的公共活動，絕對沒有，結果，因爲社會勢力單薄，遂爲他們被剝削的根源，常爲野心家所趁。以勢力征服各地，强收租稅，做其皇帝——這是中國國家的構成。

二　中國國家的性質

歷史上國家的性質不外三種：一種是有勢力的部落，沒收其他土地，封土建國，做地主資格的天子諸侯，這是封建社會所允許的國家。一種是由社會上有勢力的階級，共同聯絡組織政府，設立代議士，代表社會立法，政府不過是奉行憲法的工具，這是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所謂民主國家。另外一種介於此兩者之間的是君主專制國家，專制國家君主的權力，不惟是超過民主的政府，即封建時代的天子亦遠不如。如推考這種君主地位和其權力的來源，並不是社會付與的，很顯明的乃是封建社會的地主階級化來的，如英法德俄日本的國王，無一不是中世紀的君主和諸侯直接傳演下來；這些國王最初所以能得到君主的地位，乃完全是掠奪來的。其尊嚴的身分，私什世襲的地位，和絕對的權力，種種特殊權利的構成，都是因爲這個國家，乃是他自己用武力征服取來，所有的人民都是被克服的，是奴隸，只有他和他的子孫是貴族，是主人。他和封建天子的分別，只是不去封建，而以政治的組織代替，所以有人

稱呼專制國家是『半封建的國家』，實亦不爲無理。

這裏半封建的國家性質，若以秦漢以後的中國國家來說，尤其明顯。

第一、中國的皇帝，雖不如英法德俄的國王，直接就是封建君主或諸侯的後代，但是歷代皇帝的代興，尤其可以看出完全是封建掠奪的形式，中國皇帝的產生地，一種是方鎮大帥(晉隋唐宋)、一種是草澤英雄(漢明及南北朝五代各帝)、一種是異族部落(北朝遼金元淸)。這三種的性質，都和夏商周封建國家獲得的形式一樣，都是於羣雄逐鹿中，漸漸征服各地，削平海內，建起私有的國家。在他們隻手打天下的時候，實際的社會羣衆，一點也不去參加也不能參加，只知道被征服以後服服貼貼做『氓』！因爲國家是皇帝自己打來的，人民是被征服的，所以皇帝的身分，仍然和封建時代的君主完全一樣；而又因爲運用政治組織的關係，實比封建君主的權力還要大。這種政治權力的所以能任意運用，就是因爲皇帝是主人，人民是奴隸。

第二、中國的皇帝，沒有一代不行封建，漢初的郡國並行，雖然失敗，但這件事實，只是告訴出來，地主治理農奴的方法應當改變罷了；却不是對於皇帝封建權力的警告。所以封

建制度，雖絕跡於『廢封建立郡縣』以後，但是封建的『事實』，却是沒一代沒有，大封同姓子弟爲王、爲公、爲侯、任意劃分土地爲食邑、采邑、爲湯沐邑，都是皇帝的自由，絕沒有道德上、法律上、習慣上的不合。這就是證明皇帝的『封建身分』，並不減於封建時代，只是社會生活已改變，完全的封建制度不需要能了（義見上篇）。但是卽使如此，最近淸代的綠營子弟，仍然完全是封建時代分土就食的意義。

第三、若再進一步的說來，中國的社會，尙不只是允許封建身分的空名存在，卽封建的『實質』，實際亦保存下來；這個實質，名義上是稱作『郡縣制度』。考中國的郡縣制度，表面雖是一種『政治的組織』，異乎封建時代的『身分組織』，而且是『廢井田開阡陌』以後的一大變動。但我們看封建制度的特點，就在於劃分土地的『所有權』，實現其『階級的支配權力』，而郡縣制度的基礎，亦在這一點上。郡縣制度，根本是一種土地的支配，以領有土地的大小，決定權力的大小，非如近代國家，佔據幾個海口卽可支配全世界；佔據上海一處，卽可致全中國的死命。這種以土地支配權做基礎的郡縣制度，和純粹封建制度的不同。只在於一個的治理者是諸侯，一個的治理者是官吏，和吏的不同，是對於封建天子的關係不同；一個是名

分的，一個是政治的。若把官吏和天子中間的政治系統取消，馬上就會變出諸侯的本色。這就是說，天子的劃分郡縣設官治理，已經是封建身分的行使，而郡縣官吏的身分和地位，也是等於諸侯——一種地主。所以每代末造，政府失權，各地的郡守藩鎮，即獨立稱王，樹兵相爭，宛若春秋戰國的狀況，這就是郡縣制度實際相同於封建制度的表現。所以若把中國的郡縣制度，看成近代民主國家的『地方制度』一樣，要因利乘便，行使地方自治，那只有造成割據的機會。

第四、中國人民向國家納稅的法理，並不是法律上的『義務』，實在是一種『租糧』的繳納。納租雖也一是種義務，但義務應當是情願盡的一種責任，露骨說來，如果不滿意僱來的政府人員或現在的法律時，即可以不情願盡這責任，拒絕納稅。這時只有撤換官吏或改訂法律，如果拒絕的行為不錯誤時，絕沒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不合理。這是因為財產的所有者乃是納稅人自己，當然不允許別人不合理的強索。但在中國人民納的稅，向來沒有這種權利。無論因賦或貨物稅，既沒有一定的名目，也沒有一定的數目，都可由治理階級任意增添。因賦可以『預徵』十年二十年，其實預徵也是官話，只是今年『要』你出這麼多能了，明年後年需

要時還只是『徵』，無所謂預不預。貨物稅的釐金統捐雜色捐，都可任意的增加，絕沒有法律上的不合，也沒有什麼理由來干涉他，只是在受不住時，要求『憐憫』減少罷了。這種納稅的理由，就是因爲他所納的稅是一種『租糧』，納稅人的財產，不能看成是納稅人自己的，他乃是向地主階級『租』來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民的耕種貿易，都是借皇帝家物爲生。納稅人的財產既都不是自己的，當然只好一任地主的規定。再露骨說來，人民如果不願納稅時，只好把原物交還地主，自己另覓生路，正如佃戶對於地主剝削太利害時的態度一樣。若佃戶因不出過重的『租糧』，就聯合起來反抗地主，這當然是法律和道德都不允許的，同樣，人民要對於國家的賦稅反抗，自然也是爲法律和道德不允許。所以在這時只有拋棄土地和停業，另圖生活，絕沒有別的行動。若再利害時，便只有希望『愛民如子』的『眞龍天子』出來『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果眞龍天子等不出來，那他們就只有最後一條路，有認爲是眞龍天子起來愛民，這時大的就是『五百年王者興』的時候了！所以從中國人納稅的意義上說，更可以證明中國國家的封建性質——國家『是』——不只是『代表』——地主階級的集團，普通社會是農奴的集團。

從以上四點，都可證明中國國家的封建性質。這種性質自然不只是中國，一切君主專制國家都有，如大革命前的法國，和威廉氏家的德國。因爲他們君主的地位是直接從中世紀傳下來，其封建色彩更格外濃厚一點。君主專制國家所以具有這樣濃厚的封建性質，並不可誤認爲是君主權力伸張的結果，實在乃是專制國家的社會，尚沒有完全脫離封建社會的性質。因爲社會的本身，尚保存封建時代的經濟關係，當然就能允許封建勢力的存在，中國的農村商業社會就是這樣。秦漢以後的商業雖然發達，但商業的活動，仍以農村爲中心；商業的製造，仍以農業爲基礎。農業有商業的調劑，雖較封建時代家族經濟自足的社會關係爲複雜擴大。但這種改變，也不過只是變家族爲農村的，變小地域爲較大地域的，使家族的自足，成爲農村的自足，使一個封建邦的自足，成爲聯合數個封建邦的自足。結果，封建社會末期所發展的生產力，只構成這種關係而止。於是農村雖較家族爲大，而以經濟區域擴大的關係，農業的組織，並沒有較家族組織增大了多少；所以農村和依賴農村存在的商業，其組織仍然是分散的，不集中的。社會的組織，既分散而不集中，當然易爲有權力者（方鎮大帥、異族部落）和能製造權力者（草澤英雄）所征服，這是允許專制君主存在的主要原因。加以社會的

經濟生活，完全還是農業和農業製造的；土地的佔有，仍是構造權力的基礎。所以專制君主仍然能兼領封建時代大地主的資格，劃分郡縣，設官治理，構成地主階級的集團；人民對於國家的關係，當然仍只是封建時代的關係了。凡這些農業的經濟特出，土地所有權的勢力，社會組織的不能統一，一地域經濟的可以自足，都是構成封建制度的根源。農村商業社會既都具此特點，所以他的社會和國家，都脫不了封建的色彩！

說中國的國家，首先是建在封建時代的剝削階級上；國家的組織裏面，並沒有社會勢力參加，這種觀察，或許有人認爲不對。最近凡爾加氏(E. Varga)，指出中國的農業是灌漑農耕，灌漑農耕的經濟須『組織化』，須由地域之『共同協力』始可能，這是不錯的。但他却因此以爲中國的國家：『具有廣及全領域的重大機能——卽全領域內米之配給的組織化，最重要地方水利經濟之組織化與監督等與之相應的，故在中國有國家官吏這樣的特殊階級……（見所著中國革命之諸根本問題）。』這却把中國國家看的太有用處了；而且官吏階級，也不是『相應』『水利經濟之組織』化來的。中國的農業雖是灌漑農耕，但中國的灌漑除過很多地方是用『井水』外，所有的河流都是短小分散，他和埃及人共守一條尼羅河不同。埃及的農業都是

依賴尼羅河和尼羅河的溝渠，所以埃及人有共同的活動，需要共同的組織。這是埃及國家的基礎。但在中國除過原始的黃河流域時代，幾乎從來沒有過水利經濟上的共同組織。分散於各地的河流，都是隨河流而居的農村，自行管理，以實地考查農村的溝渠，都是民間自行開掘，堤防是民間自行修築，這種河流的管理，是農村公社最大的事務，也是農村各花戶最大的攤派。這種農村組織，是唯一的水利經濟組織，而河流的短小分散，正是使農村與農村的組織分散不能集中的原故。社會上既有了這種組織，所以中國政府，除過黃河淮河以外，對於水利經濟上所盡的職務幾乎沒有。而且治理黃河，也是百年不遇的大事！因為這種特殊情形，所以中國的河流恰好發展出些發散的社會組織，而沒有發展出國家組織；這種分散的社會組織，仍然允許剝削階級的國家存在，和封建時代一樣，不能構成有社會機能的國家。

這樣說來，秦漢以後的國家，應當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何以他們的政治組織又決不一樣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因商業在經濟組織中的地位，較封建社會重要，他所需要的組織，和單是農業經濟的不一樣，這在本文的上篇說過，商業是推翻封建制度的主要原因。第二、因土地制度的改變，和生產技術的進步，使自耕自足的家族經濟活動，變為農村經濟的

社會活動。這種農村組織的性質，雖不足自行組織更大的國家組織，也不足抵抗有權威者的征服。但是征服者的國家建起來以後，至少也須保存這種組織，破壞農村經濟，不啻破壞他的地位，所以農村的組織雖小，却有普遍的勢力。無論什麼地方的農村，所要求的條件都一樣，在這種共同要求無形中集合的普遍勢力之下，不得不也納入國家的組織中，爲國家的次一等性質，這是秦漢以來國家不能同於封建國家的第二個原因。適應這兩個原因的組織，一是『官吏制度』的產生，一是『科舉制度』的產生。

三　科舉制度的意義

官吏制度以一種意義說起來，是直接代替封建制度的；封建制下無官，官隨世祿決定，有世祿者亦世世襲其官，『世祿』就是有封土和食邑采邑的。各封土既有領主——諸侯大夫等——做主人，當然要不着官吏。及商業發達以後，商業區域不是到處都有，有的地方便因利于商業發達而興盛，有的地方，不免窮困，遂發生兼併，使許多領主夷爲平民。那些得勢的領主，本來再可封建，但是商業區域既不一定，若把商業發達的地方，仍封土另建一國，不由自己統率，豈不也要失勢，所以這時的諸侯就不再去封建，而只派遣只有奉行命令設有專

擅性質的官吏去收稅，同樣的理，在土地制度改變以後的農業，也是如此。農民有了土地支配權以後，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變成貨物一樣，正如商業的貨物，收稅者不必自行經理作商店的老闆，只索按貨抽稅，地主對于土地，當然也不必封土建國自行管理，更不必計口授田分配耕地，只要派遣官吏按畝徵租就夠了。

所以封建以後官吏制度的發生，純粹是因爲地主階級剝削土地人民財產的方法不同，不得不把官吏來代替封建。似看齊晉秦楚幾個官吏發生最早也最多的國家，都是幾個最能兼併的國家。他們兼併以後不再封建而創行郡縣的原故，並看不出是社會的需要。比方商人因需要平治道路保護轉運的共同組織，農民也需要治理河流懲治盜賊的共同組織，但這種作用至多是一種希望或偶然的事實，羅馬皇帝戴克利先（Deoletion）曾以平治道路保護商旅的政績著名，中國皇帝和官吏有時也能如此，但却並不能單以這種政績的考核，撤換官吏。他不是官吏制度的主要屬性，從官吏的作用和其發生的意義上說，都不是因爲社會的需要——或如凡爾加所說是相應『水利經濟之組織化』來的——他的實際，是爲代替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很明白的是地主階級爲行使剝削權力和剝削方法的一種制度，所以春秋戰國時代官吏的升進，

都是以能否替封建諸侯『富國強兵』做標準，凡有『殊才異能』的，片言可致卿相。這種原故，就是因爲諸侯只站在封建階級的地位上，以官吏做他的僱傭，在他不直接去做各地的領主以後，僱來替他剝削、替他擴張權力的——（爲了這種需要，使做官的才不分貴族與平民的階級，這個改變，普通說來是『貴族階級的打破』這在本文上篇也說過，但仔細研究，平民獲得做官權利，未必便是打破封建階級的表徵。他的能做官，只是封建階級的僱傭，並不是社會的僱傭，他的權力，並不是社會付與，乃是皇帝付與，官吏的任免升降，都是皇帝私有的權力，社會並無法權干涉。這個分別，正好比『郡縣制度』下郡縣的劃分，仍是封建階級勢力範圍的劃分，和封土建國一樣，並不是『地方制度』，爲保有地方自治權的社會勢力集團，所以秦漢以後官吏制度和郡縣制度，都應認作是行使封建權力的另一種方式，須先肯定封建階級的確實存在，決不能與法國大革命以後的政治組織一樣看待。）

封建制度，到了需要這樣性質的官吏制度代替時，這突然需要的大批官吏如何產生呢？產生的方法就是『貢舉』『選舉』，或『科舉』的制度。

由貢舉或科舉制度考取官吏的方法，是歐洲各專制國所沒有的。這種制度，在中國向來

認爲是以官爵餌人的一種政策，除貢舉和選舉外，隋唐以下的科舉，誠如唐人所言：『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但我們看這種制度的本身，實不只這樣簡單，他的發生和存在，都含有極重大的意義。他的作用，雖只在考取官吏，但另外還有更重要的一種作用，是封建階級的國家和農村商業社會所共同需要的。

二、在一個國家，無論他的立足點和社會的需要怎樣相違背，但是他至少必須維持社會生活的安全，才能保持他的地位。因爲這種需要，國家和社會中間常有一種連繫的『紐帶』以相適應。這種紐帶最明顯的是近代國家的『代議制度』。人民所要求的利益，能直接選舉代議士，訂定憲法，命令政府機關遵行；這種紐帶的產生，是因爲近代社會有集中的勢力和統一組織的結果。但在古代，社會組織既那樣分散，至能使另外一種勢力來征服統馭，他的要求，當然不能直接遞達政府，可是，封建階級爲他的利益計，也不能不有一種紐帶的設施，以和社會適應。比方封建社會是家族自足的農業經濟，封建階級固然是爲向農業經濟剝削而建立國家，但他同時必須保全家族的組織和生活做才有剝削的可能，所以那時國的組織，也變爲一個家的組織，完全以『嚴尊卑別上下』的禮制，和『忠孝節義』的道德，以及種種家法制度的維

繫。在秦漢以後的農村商業社會，他的組織仍然是極其分散，沒有近代社會的統一勢力，不能直接組織自己的國家，同時又不完全是家族的生活，不能以家國合一的組織維繫。他的生活怎樣？他所需求的是什麼？在國家和社會中間，都非有一種紐帶的設施以相適應不可。這個紐帶，具體說來，是須有實際社會的代表勢力，加入國家的組織，作國家和社會中間的媒介，一方面維持農村的組織，也就是維持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一方面維持國家的地位。這種實際社會代表勢力的取得，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村商業社會和封建階級的國家同樣都需要的，其取得的方法，也就是『貢舉』或『科舉』的制度。這種制度的產生和其在中國這樣長久的存在，爲考取官吏固然是一個原因，而爲取得這種社會勢力，更是他的重大原因。而且這種代表取得以後，實際仍然是國家的官吏，所以，科舉制度下考取的官吏，一方面須『才能幹練』『辦事敏捷』，以利國家，一方面須『諳達民情』『熟知民間疾苦』『爲民父母』；一方面他須是地主階級的『僱傭』，以『整飭綱紀』；一方面他又須是農村商業社會的『代表』，以維持農村的組織和生活。在這種制度下取來的人員，實兼有近代『國家官僚』和『代議士』的兩重資格。

這種作用的制度，是封建性質的國家，極不易發現的，封建階級只站在他們自己的地位上，對官吏只知道一種僱傭的性質，首先准承受『責效計能』的法家學說，而不能注意社會的利益。比方秦的富強，很明白的是在他能有計畫的改革土地制度以後，但是他於土地制度改革以後，却不知道農業復興以後的結果。那時不只是秦，各地的農業生活已漸確定，試看秦始皇的遷徙『豪富』和『大姓』能那麼多，動輒十幾萬戶，幾十萬人，卽可見農業經濟的恢復。農業經濟的恢復和繁盛，是秦富強的基礎，而『豪富』乃是農業繁盛的結晶——農村的地主——秦始皇不了解這一點，反恐『豪富』叛亂，而又措施無方，只把他遷移徙徙，不惟不能維持他的生活，反加以破壞，使社會根本搖動，秦那得不亡；所以秦的滅亡，直接是破壞農村的組織和生活，以致引起農民的『揭竿而起』，間接說來，乃是只知道需要僱傭性質的官吏，而却不知道吸收維持農村生活的人員，以致沒有具足封建以後國家的性質。及漢代秦以後，漢高祖聽信陸賈『馬上得天下不能仍以馬上治之』的道理，漸能引用儒生，更令郡國選舉『賢良方正茂才直言』，自此以後，選舉始成爲一種制度。

自這種制度發生以後，一直到清末，曾經過四次的改變，他的作用，從這種改變上更可

以看出來；每次的改變，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爲適應社會的代表勢力。這個實際社會的代表勢力是什麼呢？就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村商業社會，因共同的條件共同的利益，無形中集合起來的共同『意識』。科舉制度就是爲攝取這個意識以加入國家的組織。

四　士大夫階級的構成及其轉變

小資產階級農村商業社會勢力的分散，在本文已很多說過，但這種分散，是指他們的相互關係說，若個別分開，他們存在的條件，和所要求的利益，卻無論什麼地方都是一樣。明白說來，即是甘肅的農民，雖可以和江蘇的農民不相關連，山西的土著，雖可以不知道廣東廣西是中國的領土；但因爲他們的生活，同樣都是農村商業的經濟活動，所以至少也有一個共同點在他們的『意識』裏邊存在。即必須要求有農村商業經濟活動的可能與安全，和因爲這種活動而有的組織，如家族農村城鎮商店等的維持；因爲這種要求相同，遂自然的集合成一個『共同意識』。這個共同意識，本來也是分散的，但在春秋戰國間，經儒家的收集，把他具體化起來，變成一種硬性的學說。這個學說的成分，是不是完全適合這種社會，現在不必去管他，但他的性質，有一大半確實是這種社會意識的結果，是不待細說的。這個學說，既能

代表社會的共同意識，所以他在這個沒組織的社會中，隱隱然變爲小資產階級的惟一共同組織；不論什麼地方他們的方言習慣可以任意不同，而對于應用的文字書藉，却都是一樣。所遵守的道德，所有的信仰，也幾乎都一樣。農村商業社會，既有這麼一個共同的上層組織，所以儒家學說，在這個社會就握有絕大的『權威』；凡不能『孝弟力田』和『紊亂綱常』的，都是儒家的罪人，實際即是社會的罪人，因爲他能破壞農業生活和家族組織。凡不能『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孝友睦淵任恤』的，都不是儒家的君子，即不是社會的正人；凡『橫征暴斂』『肆行殺戮』的，都是桀紂，社會就應當起來用湯武的方法處置他。諸如此類，儒家這種『權威』，常能代表社會的需要和利益，以維持社會的生活和組織；而這個『權威』，又顯然是社會付與，是社會意識的結果，並不是儒家強力取來。

農村商業社會既有這麼一個共同的組織，所以封建階級都以攝取這個勢力爲首要政策。在漢初儒家學說尚未確定以前，所選舉來的賢良方正能言極諫之士，大都已是儒生，可見他們在社會的勢力，而賈誼朝錯董仲舒一般人，也確實能代表實際生活，訂定許多利于社會的政策。及武帝以後，這種意識，已確實插入國家組織，『罷黜百家，專尊儒術。』儒家的士

人，遂以代表社會意識的資格，由選舉制度，取得封建階級官吏的特權。

但在儒生取得官吏特權以後，他在社會的性質，都完全改變。原先他不過是純粹的意識工作者——維持風化等——是依賴產業者的意識、需要而存在，假若產業者——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改變，他們的思想學說也會相應的改變，正如資本主義下的智識階級一樣，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工具。但在中國的儒生不同，他在漢武帝以前，還可以和近代的智識階級一樣看待，但他取得官吏特權以後，他已不只是工具的，而同時只有一部分支配權力，這部分權力，雖不是他自己具有，是由封建階級付與，而却因這種權力和農業的小資產階級顯然分別開來，卽在後者，是完全被支配的，而前者都實際握有支配『權力』，或能支配的『身分』，由這個權力和身分，遂在社會上構成一個特殊的階級——同時具有統一社會意識的權威和支配階級的身分——士人——或其權力——大夫——的階級；簡單說來，是立在封建階級的國家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中間的一個『中間階級』。

這個中間階級構成以後，當然的又有這個階級自己的特殊條件和特殊利益，由這種特殊利益，常常和實際社會分開，不足代表社會的共同意識。這種分離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中間

階級自己意識的發展，他們意識的發展，約有兩個方向，一方面是智識階級一般的本性，爲保持他們意識工作者的特殊身分，專門作離開實際生活的學術研究，如詩賦、文章、理學、漢學等製作，是爲智識階級特有的意識，爲一般人所不暇過問。他們常能由這些工具，保持他們的地位。另一方面，是爲保持取得支配階級地位的技術和方法，專門作特殊的練習和發展，如清議、帖括、八股等，結果也造成一種離開實際社會的意識。這個階級的這兩種意識發展到相當程度時候，很顯然的發生出一種現象是這個階級無形中作極度的分裂；一方有文人、學士、隱逸等等，專門作階級（中間階級）意識的工作；一方有經生、帖括之士專門作做官的技術練習，等到這樣分裂以後，卽刻使他們會受到一種打擊，卽無論他們的意識工作做的怎樣精巧，但他們和實際社會的分離已經愈趨愈遠，卽是已經失掉代表社會共同意識的資格，或成爲特殊的『士族』、或成爲風流名士、或成爲世外高人、或成爲碩學鴻儒、或成爲腐儒學究，所造愈精，其在社會的實際勢力亦愈小。這時需要社會共同意識的封建階級，就不得不另改方法，以攝取社會上極普遍的意識勢力，結果，就另有一部分中間階級的代表人出來。這部分人出來以後，又按他的利益作階級意識的發展，前一時代的階級意識，遂爲這種

意識所代替，而他所發展的意識，最後仍要和社會共同意識離開，又爲別一種代替的機會，如此輾轉不已。

這種輾轉的現象，是中國歷史上幾件重要事實的背景，第一、中國的社會自秦漢以來未嘗改變，他是有一個共同的儒家學說意識，但這個意識的外形，都是漢晉唐宋明清，幾乎歷代不同，每代都有他自己的學風和好尚。第二、同一種作用的科舉制度，却自漢以來，幾乎有四次決然不同的改變，這種不同和改變，既不能說是爲社會基礎演變的結果，也不能認爲是國家性質的改變，從根本說來，實際乃是『士大夫階級』本身意識轉變的結果。士大夫階級的性質，雖是確定的——是一種中間階級——但他的本身，却無定型：漢代是『儒生』、魏晉是『士大夫』、唐宋是『文人』『學士』、明清是『舉人』『進士』，這是不同的形式，就是他的階級意識的轉變，結果，選舉或科舉的方法，也不能不隨之改變。由這種方法的改變，又造成一種特殊的意識，這就是歷代學說，除却以儒家的意識作基礎外，而又必有特殊意識的根源。從這一點說來，士大夫階級的第一個性質，是一種『意識階級』。

這種轉變的事實，從歷史上都可以顯然看出來。

士大夫階級的第一個轉變時期，是在漢末。漢初定制以『賢良方正』『孝廉』和『博士弟子』三種取士，其法由郡國評定儒生，有能合乎四科者，即選取之，如『德行高妙』，或『剛毅多略』，或『學通行修』『法令明習』等，皆先評定其人之學行，以定去取。這種『評定』的方法，沿至漢末，遂弄成一種『批評』的學風，無論對人對事，雖不選舉，亦必互相『月旦』，以爲高尙。其結果除王充仲長統一般人應用在思想方面有較好的結果外，其他文有文『品』，詩有詩『品』，而尤以社會上的『清議』，佔絕大勢力。這般人一方面是社會信仰的中心，具有社會的權威，遂能『褒貶朝政』、『裁量公卿』，一方面又具有士大夫的身分或權力，在鄉間標榜，『覈論人物』，作『天下模楷』；每一議論出，至可以使人終身廢棄（如黃允陳壽等）。社會的『淸議』，既具有如是勢力，所以至魏時，就把漢代的選舉制，直接改爲一種『九品官人』法。其法乃是不用郡國的評定，而直以鄉間評議爲準，由郡邑的中正，按其人鄉評的高下，決定上上或上中上下等，再送至大中正用同樣的方法考核，如是『中正』雖爲品第人才之官，而其實其品第的方法和品第的基礎，都是建在鄉評的淸議上，這就是說，漢初的郡國選舉，已不能取得社會勢力——當時的說法，是因爲『夤緣勢力』有猥濫的流弊——所以遂由佔有社

會勢力的『清議』代替。後來主持清議的『士人』，都得到『大夫』的地位，遂漸漸把『鄉評』的勢力，移到『士族』上邊，士族不惟是大夫，而且是社會的『清流』，於是主持清議掌握社會勢力的，已經不是鄉間的士人，而是在朝的大夫。這樣一來，『士族』就造成一種特別勢力，在社會上顯然為一個特殊階級。

士大夫階級實以兩晉南北朝為最明顯，當時的大族王球且說：『士庶區別，國之章也！』士大夫的勢力既如此，所以那種『九品官人』的方法之下，不惟是用清議的方法評定上下，而且在吏部選用時，『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以為品狀，不惟官人是如此，即普通生活的婚姻交際，亦以士族為準。若不是士族，雖皇帝亦只得說『我便無如此何』！（宋文帝語）可見他們在社會的勢力。由清議和士族的勢力，即可知『九品官人』法所以要代替郡國選舉法的意思。

但是兩晉南北朝的長期喪亂，到了後來，使這些士族，漸漸的陵夷衰落，如東晉：『王謝盛時，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梁陳之間，南朝除王謝朱張數族而外，已不多見；北朝亦止崔盧李鄭，韋裴柳薛幾家可數。這些士族的零落，喪亂固是一因，而其自視高

貢，不相阿合，能及者自然愈趨愈少。結果，士族的階級意識愈濃厚，其勢力範圍亦愈小，其代表社會共同意識的資格亦愈減低；於是當時的人就不滿意『九品中正』的選舉法說：『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員，私無告訴之忌。』（劉毅）這是普遍所謂九品官人法的流弊。但其實，與其說是這種方法的流弊，毋甯說是士族不能代表社會勢力以後，另外一種能代表社會共同意識的勢力，激起的表徵。總之，無論怎樣，自士族勢力衰落以後，同時九品官人法也就廢除，而以另外一種方法代替。

士族勢力的衰落，並不是士大夫的階級勢力的衰落，他不過是由一部分有特殊階級意識的人手裏轉移到沒有特殊階級意識只有共同意識的人手裏能了。所以在六朝末年的隋初，就另用一種更通行更普遍的『詩賦策問』取士。這種方法，就是表明『詩賦』乃是比較的屬於社會意識的共同趨勢，他不是『士族』或『士大夫』的特殊意識，而是在當時爲一般意識工作者共有的傾向，所以封建階級就利用他以攝取社會勢力，遂在隋唐以後有開科考試詩賦策問的『科舉制度』。

唐代的科舉，雖有『生徒』與『鄉貢』，和『制舉』的三種分別，但實際上是以鄉貢的『明經』

『進士』兩科爲主。鄉貢的士子，都是由民間的儒家學者或同情於儒家的，懷牒自到州縣以受考試。其考試的方法在最初時極簡單，比方試『進士』時，有所謂『帖經』者，卽取士子所習的經書，掩其兩端，中留一行，復裁紙爲『帖』，帖去數字，令受試的人讀出之。這種簡單的方法，在進士以下的明經秀才，尙不及此。考試的方法雖不止此一端，但他所以用這些方法代替九品中正的原故，只是要避免士大夫的特殊意識，而極力與社會的共同意識接近。所以其士子不論貧富，都可自詣州縣受考，而考試的方法，亦是採取一般意識工作者的共同傾向，如經書、文章、詩賦等。

但自這種科舉制度確定以後，士大夫階級的意識，又隨着這種制度的方法轉變。一方面有作詩賦文章的進求，造成許多文人學士；一方面有作『帖括』『舊策』的記誦，造出許多帖括之士。帖括之士，在唐時已有人不滿其意識，如劉思立所說：『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亡實才，而有司以入數充第！』，這個『實才』，究竟是什麽雖不必問，而帖括意識的非實際社會所需要，固甚顯然。詩詞文章，至唐末兩宋而極盛，其結果，詩詞文章，原不過是試驗社會意識的考試方法。而自盛唐以後，研究詩詞文章，都成爲文人學士間之目的，他

的發展，不論如何華美偉大，而只是文人學士的意識，非實際社會所需要亦很顯明。所以至宋神宗時，並不以詩詞文章的精美而擴大其應用，都以『詩賦之弊，流于浮華；帖經之弊，陷于記誦。』的考語，而摒斥不用，完全以『經義』『策論』，代替詩賦，以考取官吏；這就是說，詩詞文章，至唐末兩宋而至乎其極。然愈至其極，愈爲少數文人學士之部分意識，毫不足以代表社會共同的意識勢力，所以雖以極精美之唐詩宋詞，亦不能代替幾部經書，作科舉制度的工具。

自北宋確定以經義策論取士以後，沿至明清，遂專門四書五經的『制藝』，爲考試方法。明清的『八股』，若不了解科舉制度的意義，幾乎是毫不可解的謎語。若如普通所謂是帝王籠絡士人的一種方法，亦屬同樣不可了解，這種籠絡方法且非太滑稽而技巧，假若離開儒家意識，而用同樣的技巧用在數學或圖畫方面，以籠絡明清的士人，其結果將如何？其實，他是一種最簡單最無意義的測驗意識的方法，他只是限定士人專門作經義的探討，以表明他的考試是意識有無和正確與否的測驗，而不是文章精美深奧與否的測驗，他正是力避唐宋以來『文人意識』的考取，而欲極力接近大多數的社會共同意識。由這種無意義的方法，正可表明

明清的社會，仍然需要儒家的意識，仍然是以儒家學說佔極大的意識勢力，既不是兩晉『士族』的社會，也不是唐宋文人的社會，也沒有到了承受西洋意識的時代，仍然是秦漢以來的社會和其意識——至少也可以說：即使社會已經有變動，而社會意識，尚沒有能如儒家的能夠代表較大的部分——所以仍能容讓專以測驗儒家意識的『八股制藝』存在。及到清中葉時，社會已深刻的受有歐洲資本主義及其意識的影響，已不完全是儒家意識所能限制，遂有『博學鴻詞』，以及更後有『經濟特科』之設，以攝取另一部分意識。這個演變的詳情，當另爲文敍述，現在暫且不論。

說到這裏，我們不禁要問，假定儒家學說就是農村商業社會的共同意識，但是由科舉制度取來的『士大夫階級』，究竟能不能眞的是農村商業社會的代表呢？很明白的是不能。第一在士大夫的一部分人變成一種意識階級以後，他和社會的分離，已如上述；第二另一部分不做意識階級的却完全變成『官吏』的性質，即是爲封建階級做僱傭，行使剝削權力，或在不做官吏以後，行使士大夫階級的身分和權威，做社會上的『豪紳』，以統轄社會——也可以說就是『士大夫』本身。所以士大夫的本性雖是一個『中間階級』，但在這個階級構成以後，却由意

識的轉變，或變爲『意識階級』，或變爲『官吏』或『豪紳』，都和社會離開，甚至于背叛社會，這是小資產階級社會，沒有自己共同具體組織的苦楚！

五　中國社會的侵蝕及其階級層的轉變

以上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和國家組織，已經大略解釋，如果只是這樣分別敍述，單指出他們各個階級的特殊性質，就很容易誤會。這個國家的構造，只是這樣的簡單，只是一個封建階級，對於一個小資產階級剝削的結構。這樣就彷彿兩個人鬥毆似的，一直等到一個人被另一個人打倒時爲止，只有一個人存在的世界！若果如此，我們的解釋不惟違背歷史演變的原則，而且中國歷史上那種錯綜複雜的事實，亦將由這種解釋抹殺！其實，各個階級固有其特殊性質，但在各個階級互相關連發生關係以後却是不停的發生變化，其階級性質，雖可以永久存在——從秦漢一直到現在——但其堆積的階級層，却常常的要改移轉變：一個階級堆積到相當程度時，其實際的數量和意識的勢力必格外膨脹。別的階級，就必受這種膨脹勢力的侵蝕而衰落，衰落的結果，必愈積愈厚，而又造成一個新的階級層。這樣轉變不已，就是社會上錯綜複雜的現象，歷史的事實，直接由這種轉變造成。中國各階級的構造和其轉變，

草澤英雄　異族部落　方鎮大帥
封建階級
(國家)
(軍閥官僚)
意識階級
士大夫階級
儒家意識
農村商業社會
士大夫　小資本家　小地主　豪紳
行販　小商業者　小手工業　工匠　自耕農　半佃農　佃農　農奴
土匪　兵士　游民　　游民　兵士　土匪

——→表示經濟關係或構造關係

可如上表所示：

首先應當注意，這個社會『封建階級』的地位，並不是如封建時代一樣，直接由剝削土地和勞力造成，他乃是以地主階級的身分，間接向小地主和小資本家剝削田租和貨物稅而造成，既是這樣間接的，所以他的地位，不必等待另一個國家侵入佔據他的領土以後才可以推翻，而是只要被他所剝削的小地主和小資本家，不能供給他以大量的租稅時，同樣也使他失掉剝削的基礎，正如領土被別的國家搶走一樣，立刻也可以推翻他的地位。所以每在封建階級的剝削到了相當時期，社會上已經受了過度的侵蝕，能供給他的地主和資本家愈趨愈少，而最下層的無產者愈積愈多時，這最下層的階級膨脹，結果最高的封建階級就不得不為這層階級所代替。這就是秦漢以來歷代的變更，其代興者，既

不是素在社會上有勢力的地主和資本家，也不一定是另有土地人民的異族部落，而多半乃是原來社會上絕無勢力的下層階級。下層階級所以能有這樣的勢力，卽是階級層轉變的結果。

其次，同樣的道理，作社會中心勢力的地主和資本家，其階級地位，亦常常轉變而不固定，地主和資本家雖是被封建所剝削的，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剝削階級，他的地位和對於封建階級所納的租稅，都是剝削剩餘階級的勞動而來，其剝削的方法不外三種：一是『剩餘勞動』，卽剝削奴隸、僱農、佃戶、長工、小手工藝等；一是『土地資本』和『商業資本』，如地主出租土地於佃農，而收其十分之五甚至十分之六七以上的地租；至於商人的剝削，更屬顯然。一是『高利貸資本』，高利貸資本的勢力最大，其爲害亦最烈；他不只是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方法，而且是通行於各階級間的剝削方法，其結果常常促進階級層的轉變。這種資本的構成，是因爲小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使他們的勢力發展到相當限度時，卽不能再爲產業方面的發展——如社會平靜時，土地的買賣和商業的投機都甚少——結果地主和資本家，都有多量的剩餘資本。這些資本既不能用作生產，而同時却有許多貧農式小商人手工業者，因爲要購買工具肥料或貨物——有時純粹是爲納地租或貨物稅——需要資本，於是地主和資本家

就把他們剩餘的或不剩餘的資本，按需要的程度，以最高的利息——百分之二三十或四五十等——放給他們生息，同時又以房產或地契作抵押。結果一般貧農或小商人的收入漸被這種利息剝盡，以至於不能償還時，其抵押的財產卽被沒收，而流入最下層的僱農或工匠，其子女甚或賣爲奴隸！這種資本運用愈廣，地主和資本家的勢力亦愈增加，而同時最低層的下層階級數量亦日增。這些下層階級的數量增加以後，其出路有兩個方向，一面有的是改作其他職業由過度的勞動和儉約，漸漸復積成少數資本，最可駭的是這些純粹勞動者竟能以極少數資本，由高利貸的生息，出放於較小的地主或商人或自耕農等，居然也能致富，變成地主和資本家。而原先的地主和資本家，因爲人口增多或其他需要，不得不擔負高利息時，慢慢也會被侵蝕而墮入下層階級！這是社會階級層的第一種轉變；這個轉變，有的固然極速，而普通多是極其緩慢，非經兩代三代不能看出。另外被剝削的下層階級另一個出路，是流入無一定職業的兵士、游民、地痞、賣藝、走江湖，若更多時卽爲土匪。這種游民階級，隨着人口發展和剝削階級的進程，其數量的增加極速，增加至若干程度時，卽爲另一種轉變的原因。

至於地主和資本家，他們除向下層剝削以外，另外還有兩個發展的出路，一即令子弟讀書應考，以追求士大夫階級『支持門戶』，一即納粟入官或納貲入官。

士大夫階級，大半分是由小資產階級的子弟或世家大族或專門意識工作爲職業的貧士寒儒等構成，其由下層階級加入者甚少。這些人等到由科舉制度加入士大夫階級以後，若作官吏，自不用說是地主兼鄉紳，勢力愈大。而更常常有的，却是由考試的失敗，漸漸變成貧士寒儒，或轉入純粹的『意識階級』，變爲文人學士。這種轉變以後，每每落入專門意識工作的一階級，依賴領薪生活——坐館，作官吏的幕客等——而把原來的小資產階級的地位失掉，這是這個社會階級層的又一個轉變。

至於直接由納粟或納貲入官的，自漢以來實佔官吏的大多數，這種官吏的意識和士大夫階級的當然不同。所以有人說中國官吏是一個特殊的『官僚階級』，其實並不然。中國的官吏，乃是由各色人等湊成，並沒有獨立的階級意識。考取官吏的方法雖只是一個科舉制度，但其所取的是士大夫，地主資本家的子弟，和其他人等，另外官吏的來源，除納粟納貲的不算外，還有由下等階級兵士的敍升，或由土匪游民的招撫（軍閥一部分，常是由這種下層階

級構成）等等，這些都不是例外，無論什麼時侯，都是官吏的主要分子。官吏集團既是這樣一個複合體，所以其意識極不一致。比方，由士大夫階級來的，即以維持風化，獎勵忠孝節義的意識爲主；由地主和資本家子弟考取或納粟納貲入官的，都以其各自的意識爲主，如歷來鹽政，多是鹽商把持，其職權幾乎是階級的世襲；至於以游民入官的，其意識更是不同。所以官吏的構造和意識，都不一定，他只是一個代表各階級意識的集合體，當然不足成爲一個獨立階級。這樣複雜的官吏構成以後，其轉變亦是各隨其所代表的階級而不同。比方，原來的兵士游民或地主富商，爲仰慕風雅，漸漸轉入士大夫階級，而更有的乃是各種官吏運用其剝削搜括的權力，以及使薪俸變成高利貸資本——有時是被禁止的——漸漸使貧士寒儒、土匪游民，變成豪紳、地主、資本家，也加入上層組織，而原先的地主資本家，或反被剝削侵蝕而零落，這是小資產階級社會各階級層，最有效的一種轉變。

社會上各階級層，除由以上種種原故轉變以外，還有天災人禍，兵匪年荒等等意外的侵蝕。中國社會上有兩句古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又說：『沒有萬年的天子！』這就是說權勢富貴，都靠不住，三十年就會一變，雖皇帝也是要倒的。這就是階級層轉變的現

象：或急進、或遲緩、或明顯、或潛伏，刻刻不停的轉變，遂造成社會各色職業的人等，錯綜複雜的現象，和歷史上五光十色的變化。但不論怎樣轉變，而其社會，仍然是以農村商業的經濟活動為基礎，所以其社會形態，永久還是一樣——還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村商業社會。

六、結論

本文所要說的意見，大略如上所述，另外還有幾點，以篇幅關係，暫時不說，現在引別人的幾段話來作本文的總結：

『既然這幾百萬戶的人民，有相同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命方式，教育程度及經濟利益，都和其他階級不相同，甚至於和其他階級相敵：那麼這幾百萬戶的人民，便組成一個階級。但是在這些田地很少的農民之間，只有地方聯繫，沒有全國的結合；而且他們的利益雖然相同，却不是共同的利益。既沒有共同的利益，便不能造成任何政治組織；因此，這幾百萬戶人民同時又不組織一個階級。他們因此不能用自己的名義在國會裏或國民會議裏，擁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應當請別人來代表；他們的代表，應當同時就是他們的主人；他們所信仰的威權者，應當有無限制的國家政權，替他們盡保護之責，而防

禦其他階級——（在中國是其他國家）——彷彿能從天上落下雨，射下日光來給他們似的，所以田地少的農民之政治勢力，最能完全表現於以行政權強制全社會的現象裏。』——路易拿破崙之霧月十八

這一段話，本來不是爲中國說，但除過應用于中國社會和國家以外，幾乎再不能得到同樣的確當。這裏我們只要指出中國社會上是否只爲『幾百萬戶』『田地很少的農民』？如果本文所斷定：『中國社會只是一些沒有雄厚勢力的小地主和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做基礎。』這話若有詞句上的錯誤時，可再引另一個人的話來做參考：

『且卽就中國的大土地所有言，其土地面積，也不如歐洲般的是幾萬頃，而至多之數，只爲數百頃，且大多數還不過數十頃……』——中國革命根本問題

其實『數十頃』也是極稀少的事，這個事實，可由幾個統計確實證明：

據北京農商部的調查，耕田未滿十畝的農家，要佔全體農戶的三分之一以上，而百畝以上的農家，只佔全體農戶的百分之五，介在中間的，以十畝到三十畝，和三十畝到五十畝的農家爲最多——表在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中全引

又據武漢政府時代中央農民部的統計，全國農民和土地的分配如下：

	畝數	人數	占有數
(一)小農	一——一〇	四四%	六%
(二)中農	一〇——三〇	二四%	一三%
(三)富農	三〇——五〇	一六%	一七%
小地主	五〇——一〇〇	九%	一九%
大地主	一〇〇以上	五%	四三%

據這個統計所示，從一畝地到五十畝地的農民，要占全體的百分之八十四，而五十畝以上的地主，只占百分之十四，可見是田地很少的農民爲最多。又五十畝到一百畝以上的地主，要佔全體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二，卽在一半以上，可見還是地主的勢力大。但占有耕地一半以上的地主，如果只是一兩個人，那就幾幾乎中國領土的一大半，都握於這一兩個人的手中，這一兩個人，純粹組織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也不是不可能。但其實，這一半以上的土地，還須有全體農民中百分之十四的人數來分配，這就是說：假定中國的全體農民數爲三億

三千六百萬人，則其中至少應有三千四百萬人來分配這百分之六十二的耕地，這豈不是地主的勢力也剩的很可憐了麽？其結果，恐怕能作『數百頃』的較大地主，也是『鳳毛麟角』。而且再把這些地主，東西南北分散開，老死不相往來，他們除過一點共同的意識以外，恐怕永不會有共同的團結！這就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只是小資產階級，而小資產階級又無雄厚勢力和共同組織的事實。

以上雖只是農業方面，商業者資本分散的情形沒證據，但是我們看中國農民既佔這樣鉅大的數額，在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到商業者的存在，若不是依賴農民，幾乎不可解釋，商業者既是以農民作他的唯一主顧——雖然不是唯一的——則商業者的勢力要超過農民以上，恐怕也是絕不可能。這就是說，農民並不是不生產的，而且是自己屬有生產工具和資本，他當然不能一任商業的剝削以助長其勢力；況且這樣鉅額的農民數目，另外還包含一個統計的意義，是農產物的豐富——否則農業勞動者絕不能這樣衆多，而必有大部分從事其他的生產——農產物的豐富——就是說，商業者商品，必是由農業勞動者供給，而不是由資本家的工具——工業——製造。有這兩種事實——農業者既是商品的購買者，又是商品的製造

——則所謂商業者，不過是地主與地主，農民與農民，交換其產物的一個工具機關，他的勢力不惟不能超過農民，而且是依賴農民的；那他的存在和繁盛，必然是隨著農民的狀況而決定。那末，農業的勢力既是分散而不集中，則商業勢力也是分散而不集中，自然就不必待統計的證據，已可推知無誤了！不過——我們不必再詳說——農業的產物，也是非有商業者的交換不能發生價值，即是農業地位和其地主的地位，也是必須依賴商業的——這是所以使小資產階級只能構成農村商業社會，而不能單獨構成完全地主階級社會的主要原因。

這樣小資產階級和農村商業社會的其他形態和組織，也須都是必然的。

第六章　亞細亞生產方法說

中國革命與農業問題

王志澄

一　農業問題的意義

在中國農民的數目實占一個極大的多數。無論何種運動倘若不能爭取農民的贊助，就會得不到成功。

據『中國土地調查』所載：『全國農戶總數爲五六、〇〇〇、〇〇〇戶（包含地主在內），每戶平均以六人計，農民總人數就有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以農民占百分之八〇的比例計算之，則中國全部人口當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然怎樣可以得到農民的贊助呢？那非驅逐封建的農民搾取之代理人，從這種搾取底下把農民解放出來不可。而這種驅逐封建的搾取者之工作，不是別的，却正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是封建制度的推翻；若在如歐羅巴的封建制度，它的社會發展爲正常的形態之時，資產階級

即得成爲這種工作的擔當者，而且資產階級還得先從封建的榨取底下把農民解放出來。

可是在中國，它的社會發展是不取正常形態的。因此，在這兒便發生中國資產階級能不能爲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者，即能不能爭取農民在自己周圍的這個重要問題。

『在中國資產階級方面，有沒有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之上解決農民問題之可能性呢？

『這個問題，照我們想來，是個對於中國革命今後運命之核心問題。這個問題的檢討，照我們想來，是個不得不成爲對中國革命諸問題一一加以分析的根柢之問題。倘若資產階級能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之上解決農民問題而獲成功的話，那麼中國工業無產階級就將在爭取龐大的農民大衆於自己周圍的工作上宣告失敗。但若沒有農民階級的贊助——自然更不必說與農民層相鬥爭——則在數量上微弱而幼稚的工業無產階級(中國及外國的)要打倒資產階級與軍閥之支配，就不可能。所以農業問題實成爲中國請勢的核心問題。』

——Uarga的『一九二八年上半期世界經濟年報』

所謂中國之不正常的社會發展究如何？以下試略述其理由。

二　中國的封建制度

科學的社會主義對於中國不正常的社會制度，不說是封建的，而說是「亞細亞的生產方法」。這裏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在本質上雖立於封建的搾取關係之上，但與歐羅巴的封建制度却多少有些不同的性質的。

（一）像在歐羅巴那樣的土地支配制，在中國是沒有的。在歐羅巴領主由君主分受土地，以後代代世襲而支配之，但在中國，是由國家來支配土地。在歐羅巴的封建時代，沒有國家這個機關，國是被分割占領，而在這些封建的領有者之下聯合起來的。

國家支配土地的結果，就有了為這種支配以盡種種職能的特殊階級即官吏存在。他們受了一定規則的試驗，造就為具有封建性質的有學識的官僚貴族階級。這種官僚貴族階級散處各地，以後有許多人逐漸變成土著，支配鄉村的政治行政，形成為所謂家長的支配之基礎。他們即由這種家長的支配，向農民刼奪，變為特殊的封建的土豪；這種封建的家長制實為中國農村所特有。

（二）在中國土地被零碎地割裂，不絕地用貨幣賣買，故祇稍有貨幣就可成地主；因此，地主與商人階級及高利貸階級就發生了密接關係。這種事情，在歐羅巴封建制度下是全然不

可能的。

(三)在中國沒有歐羅巴的農奴制。在歐羅巴因爲勞動力異常缺乏，故土地支配者即領主要用暴力把這種勞動力緊縛在土地上。但在中國恰恰相反，勞動力是過剩的，只爲了貧窮與缺乏土地，須向地主借錢；就是爲了這個原故，遂隸屬于地主而變爲農奴。這種事情同時又使得地主兼有高利貸的商人性質。

我們在這兒，便不得不說在中國是不能有資產階級與農民的共同革命的。爲什麼？因在中國是沒有歐羅巴的土地支配制的，故對於這種的革命，是不得有的；又因在中國資產階級大都是地主，是地租收入者，故在本質上，也是不得與農民相共同的。

『這個差異(與歐羅巴的)，一見雖像不是本質的；但對於中國革命今後的運動，却有根本的重要關係。由資產階級所指導的農業革命『第三階級』之革命，即對于封建的土地支配制之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之共同革命(法蘭西式的革命)，在中國是不可能的。這樣的革命是不可能的，爲什麼？因爲沒有封建的土地支配制之故，爲什麼？因爲資產階級的各層同時是地租收入者；所以他們對於自己不能舉行革命！在事實上的農奴存在之限度內，資

產階級要從這種事實上的農奴性中解放出農民來是不可能的。爲什麼？因爲正是這個資產階級，正是與土地所有相結合的高利貸資本，已使農民陷落爲借金奴隸之故。』——Uarga的『世界經濟年報』

（四）中國的農業是灌漑農耕，而歐羅巴的農業大都是乾燥農耕。這對於中國社會制度，實與以非常特殊的影響；原來在中國，因爲大河流多，而且這種河流的河床常比耕地爲高，故容易發生大洪水。一個堤防的潰決，即是使養活幾千萬生命的耕地一旦化爲泥土，所以爲維持這種大地堤防起見，常需要非常之大的力量以從事；因此就以國家的力量爲必要，或者說，是以許多農民共同維持的制度爲必要。

此外因無許多耕地，容易招致水之過多或不足，故運河的開鑿，是泉水及貯水池等的設備，就有必要。而從此等設備的關係中，更發生共同經營或國家經營之形態。這種國家經營共同經營之形態在歐羅巴的封建時代，是完全不存在的。再由於中國這種的關係，那些負直接管理的人就受人迷信的尊崇，以至具有特殊的權力。如上述中國特殊的家長制度之發生，蓋與這種迷信力有密接關連的。而這類情形，在歐羅巴的封建時代中，就不容易見到。

三　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

關於中國之變態的社會制度，曾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以爲既不是封建的，自然更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完全基於某個獨立的生產方法所生的社會制度，而另有人則肯定它是封建的，並不認爲是一種獨立的別個形態。

前者在原則上視「亞細亞的生產方法」爲與封建的生產方法有差異的別個形態；因之他們主張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在於破壞與這種封建的生產方法相異的遺物。

但立於這種「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上之制度，究竟怎樣得與封建制度有差異呢？這一點是須得詳爲探討的。

「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之主要特徵，是在國家的土地所有，共同體的土地所有，以及由此所生之私的土地所有之缺如。

惟爲明瞭這種形態，先當認清楚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之本質，要是這種本質果與「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之本質有異，那麼它自將成爲別個的獨立的形態了。故我們當進而檢討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之本質。

在封建時代土地所有關係，是隸農關係。就是地主強制地，不，甯是暴力地將農民緊縛於土地以搾取農民的「經濟以外的強制」搾取，是農奴的主從關係。

現在試問中國之變態的立於「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之上的國家土地所有，共同體土地所有，又以甚麼做基礎呢？

『土地所有主，同時又是主權者而直接與農民相對立者，若不是私的地主，而是如在亞細亞所見的國家，那麼在這時候，地租稅是歸於一的。其實與其這樣說，還不如說是與這種地租形態相異的租稅，是無論怎樣不會存在的。……在這時候，國家便是最高的地主。』

——『資本論』第三卷下第四十七章(二)

在中國確乎是沒有私的土地所有的，所以一見猶似沒有地主；但實在，它是以國家的形式而存在，以租稅的形式強制地徵收地租。從而在農民的搾取者之關係上，並不因爲搾取者是國家而有些微的變更。還有，因爲中國之特殊的灌溉農耕等的事情，雖說也有多少共同體之土地所有存在；但地主對小農之強制搾取關係，也是不會變更的。

如是，不管中國也有變態的國家之土地所有關係，共同體之土地所有關係，但決不是與

封建的所有關係，封建的社會關係有什麼本質的差異而得成爲獨立者的，祇不過封建的生產關係受了種種自然的條件及歷史的影響所表現的『現象上無限的變異與濃淡』罷了。

由此可見中國從前所存在以及目下猶在存在中的社會制度，實是封建制度，卽爲「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之本質的特徵之封建的榨取。

故現實的鬥爭，是對這種封建的遺物，封建的榨取之鬥爭；它的口號便該是土地之國有化。

四　半殖民的中國與農民

中國自古便有了高利貸與商人。他們在中國之所謂變態的「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中，成爲地主的存在，有如寄生蟲般吸取小農民的膏血。這種情形之足以阻滯中國經濟之發展，自無待言。

由於這種關係，中國經濟要用獨力轉向到資本主義，就不可能。他們只有依靠外國帝國主義之力，以漸漸地開始它的轉向。如是，這就不得不使他們屈服於外國帝國主義之下，不得不引起帝國主義諸列強使中國淪落爲殖民地。這也便是中國資產階級當作半殖民地的資產

階級而發展的原因。

我們討論中國之半殖民地化時，最須注意如下一點：就是這個半殖民地中國，不單是由於一國的殖民地化，而是由於英美日法等等相互對立競爭，而後殖民地化的。然因此，遂使隸屬於此等帝國主義的中國資產階級，也必然地趨於對立競爭。

這種競爭即成爲今日軍閥間的競爭。且正是這種競爭，才最劇烈地破壞了農民層，日甚一日的將農民投於飢餓的深淵中。

殖民地中國的特質，概括地起來說，可以如次：

因爲半殖民地中國的資產階級是隸屬於外國帝國主義的，故一般都隸屬於外國帝國主義，他們對於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固然要與其鬥爭，但是這種鬥爭，非使正在逼迫中的中國農民及勞動者益發趨於逼迫不止。而這種逼迫，又非使農民及勞苦民衆必然地奮起，自覺到自己的階級及自己的歷史使命不止。這種階級的自覺就要使得中國資產階級益發向着有共通利害的外國資產階級屈服，且結爲同盟。

即他們祇有當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保有資產階級的性質之限度內，又祇有這種運動可

不轉化爲反資本主義運動及階級鬥爭之限度內，才得站在此等運動的前頭。而且這批資產階級本來是地主，是農民之直接的搾取者，即是農民之直接的敵人，故中國資產階級能否爭取農民成爲革命勢力，便不能不有問題了。

五　中國農民怎樣受苦呢？

中國資產階級之具有地主的性質，已在前面爲我們所屢述。如今且看構成資產階級的分子，則爲土豪、劣紳、銀行家、高利貸、商人等，而以軍閥爲他們的代表。軍閥間原無什麼本質的階級的差異，惟由如何隸屬於帝國主義，以及隸屬於如何帝國主義，遂有一部分含有較多的資本家性，一部分含有較多的地主性。換言之，他們的差異，只不過資產階級化有多有少之差異而已。

當資本主義沒落期中各帝國主義間之爭奪市場的狂暴鬥爭，如今正在中國舞台上白熱地表演。因此，隸屬於此等帝國主義的中國資產階級，也必然地捲入鬥爭的旋渦中，呈現混亂紛糾的極態。此等的混亂紛糾，一般的要使農民飢餓、要使農民屑破壞、要引起深刻的階級分化，自是顯然之理。這兒且省略農民屑破壞與階級分化之敍述，祇就被破壞的一般情勢及

破壞方法中之具有特徵者略述一二。

一　水利經濟的破壞　中國農耕之爲灌溉農耕且特別需要河流的調節以及它對於中國社會制度的關係，是已在前面說過了的。軍閥間的戰爭以及緣此而起的掠奪，使得水利經濟愈益破壞，愈益荒廢，於是飢饉的慘狀就無可避免。

二　肥料經濟的破壞　在中國差不多是不用人造肥料的，所用者大都是人糞尿、泥、麥藁、樹葉、灰等；但爲了兵亂，肥料的搬運中絕，有機物的成分也爲了兵火而喪失。

三　軍閥傭兵的誅求　一方是苛捐雜稅，層出不窮；他方是無價值的紙幣，強制使用；再加以耕作用的家畜、農具，以至人夫，都被徵發，連種子也被奪去了。

如今遍中國各地，莫不有災荒發生，尤以西北諸省爲甚。玆就報紙所載，約記災地（凡十四省）及災民（凡五千六百萬人）之數如下：

陝西	一二、五三〇、〇〇〇人
甘肅	四、八五四　九〇五

省別	災民數
河南	一一、〇〇二、〇〇〇
河北	一〇、〇六二、五〇〇
山東	三、七二〇、〇〇〇
山西	四八〇、〇〇〇
綏遠	四〇六、〇〇〇
察哈爾	一、二〇〇、〇〇〇
江蘇	二〇八、三五〇
廣東	二四五、〇〇〇
湖南	四、六三〇、〇〇〇
湖北	五〇〇、四〇〇
浙江	二〇〇、〇〇〇
江西	六、五二〇、〇〇〇
合計	五六、五五九、一五〇

至於災民的苦況，自然悲慘到了極頂。試略舉幾端：

西安通信：災害極大，殆難形容。各縣災民死亡續出，大部分係自殺。……不堪飢餓，特從鳥糞中尋出消化未盡之穀類，將可食者種之。……懷抱幼兒以求售者遍街皆是。又有沽

埋子女者，其後或者自縊、或者投井、或者逃往他鄉。全家燒死或服毒者，不計其數。

綏遠某地牧師通信：死骸滿地，運往城外，任犬狼爭食，骸骨爲之到處皆是。

中央社通信：甘肅陝西的食糧，已只有草根樹皮而已。

華洋義賑會自陝西來報告：西安於一月十五日降雪，寒風狂吹中，饑寒之災民死於路上者相繼不絕。現在市民皆以油滓及糖，混草根以爲食。

河南通信：死屍遍地，生者皆逃往他鄉。據各縣報告，自殺者爲數甚多，樹皮草根殆亦食盡，雞犬牛馬殆已宰完。在郾城車站，降雪中有災民羣集，其慘狀不忍正視。一婦人倒地，旁有小孩二，相向而泣。詢之，則謂已六日不得食。又有七八歲之兒童伏地而泣，據謂一家七人皆已餓死。

衞生部長薛篤弼的陝西甘肅災情視察報告：在乾縣、永壽縣、邠縣各農村，農民所貯藏食糧已盡，近正以野生之草根樹皮爲食。有爲得穀而賣幼兒者。七八歲之兒祇値二元。

其他各地尙有許多慘聞，今姑至此爲止。然有一語不得不說，即此等慘狀，無一不是上述諸種關係之直接的或間接的結果。

六　結語

中國農民的這種可驚的窮迫，一方是由變態的地主的搾取所生，他方則由帝國主義侵略與軍閥禍亂所致。故中國農民不是一方絕滅地主的搾取，他方絕滅帝國主義，就將不得解放自己。而對於封建勢力與對於帝國主義之革命，爲了這個原故，也就必然地聯合在一起。

最後指導農民從事於這個革命運動的，是誰？不消說，是中國國民黨！

第二編　農民與土地問題

一　中國農民問題

愈之

一　理論上的夾攻形勢

『夾攻』（或是『被夾攻』），眞可以說明目前中國革命者所處的地位。在行動上如此，在理論上也是如此。腐化的反革命派，言必仁義而行同盜賊，他們無論高談什麼主義，用意只是欺騙民衆，以竊取權位，復運用權位，以剝削民衆。惡化的反革命派，是奉蘇俄若神明。事事必迷信蘇俄，盲目仿效蘇俄，而盲目聽從蘇俄，愚蠢而囂張，淺薄而武斷；他們惟一的目的，是破壞中國的革命勢力。中國的眞正革命者，遇見一切問題，都要受上稱兩種（腐化與惡化）勢力的夾攻。自然，中國的農民問題（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也是不能逃出這個被夾攻之例的。

在腐化的反革命派看，中國沒有農民問題。談農民問題的人，都是共產黨或準共產黨。

在惡化的反革命派看，中國革命若想成功，非學蘇俄實行土地革命不可，非使農民暴動自動的沒收地主的土地不可。腐化的反革命派，既是否認中國有農民問題，甚至（除去他們本身和親友的陞官發財的問題之外）否認一切問題，我們此地暫置不問。現在我們要與駁辯的是惡化的反革命派。

二　俄國共產黨對於中國農民問題的意見

所謂第三國際的意見，就可以說是俄國共產黨的意見。中國共產黨自己沒有意見，不過是接受俄國共產黨的命令行事而已。俄國共產黨以爲中國的土地情形和俄國革命前的土地情形一樣，這是可以由第三國際關於中國的決議與綱領看出來的。最清楚的是鄧演達的顧問岳爾克的話。據鄧演達說：『我們聽見岳爾克同志報告以後，我們知道蘇俄的土地問題是怎樣解決的。……他並說俄國與中國的情形相同。從比較出租的田地這方面說，蘇俄爲百分之五十，中國爲百分之六十二，故以土地面積說，大部份在地主手裏，這是相同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前，地主三萬戶，與農民相差五六倍。中國地主的土地與佃戶的土地爲百分之十四與百分之八十六之比。因此岳爾克同志判斷中國的土地問題，與蘇俄無大差別。』（以上是鄧演達

在武漢土地委員會中的演說）

以上中俄兩國土地問題的比較，和事實到底相符與否，關係甚為重要。這一點待下文考查，此時暫且擱起。

第三國際的人們還有一層意見，比較更為嚴重，就是他們認中國農民解放問題，是推翻封建制度，不但和俄國革命情形相同，并且和法國革命情形相似。第三國際的人們說，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三層的：即一、是半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二、是農民對殘餘的封建制度的鬥爭，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關於一、三、兩點，我們此時暫置不論，專論第二、點。中國的土地問題，到底和法國俄國的情形，相同或相似否？如果和俄國情形相同，當然就有農民暴動占據土地的可能。如果和法國的情形相同，當然有考慮法國革命方法的必要：法國的方法，也是農民暴動占據土地。不但此也，如果和法國當時情形相同，還有一種更嚴重的意義。法國革命是所謂資產階級革命。不經過這個革命，封建制度不能推翻，封建制度不推翻，近代的自由政治，以及近代的工業，都沒有建設起來的可能。所以這一層：中國情形到底是否如俄人所說，與法國當時情形相似，特別是中國現在是否有封建制度，這個

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十二分注意而要求我們切實的答復。

三　中國現在是否有封建制度或殘餘的封建制度

法國一七八九年以前的土地情形，俄國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土地情形，不但是分配不均；分配不均，不過是其中的一種現象罷了。最要緊的，當時的土地，在政治上是和封建制度不可分離的。名義上法國雖然很早已取消了封建制度，但是實際上則一七八九年封建制度仍然存在。尤之俄國雖然已於一八六一年廢止了農奴制度，而實際上封建制度直延長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西洋封建制度的特徵，大致如下：

一、農民是土地的附屬品。土地爲地主所有，所以農民也爲地主所有。封建制度下的農民是農奴，農奴有守土的義務。

二、土地所有權和統治權是連帶的，地主對於居住他的土地上的農民有統治之權（土地統治權）。

三、農民對地主有種種義務的力役。

以上三條是主要的條件，此外還有：

四　農民須向地主納種種之租稅；

五　農民往往須使用地主的度量衡器、市場、磨坊、烤爐等而納一定之租金；

六　地主時常有在鄰近農民的田地上狩獵之權。

以上是西洋的封建制度。凡是明眼的人，看見這些條件，便可斷定中國現在沒有這種封建制度。無論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制度，沒有西洋封建制度這樣嚴酷，而中國的封建制度早已消滅，沒有復活的希望，則是明顯的事實。封建制度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是一個完全的系統；而牠的基礎，乃在土地制度。現在中國的割據軍閥，雖然在那裏努力恢復封建制度，但是封建制度存在的條件，中國不具備；封建制度的基礎（封建的土地制度），在中國早已消滅。中國現在的割據軍閥，是缺乏封建基礎的封建諸侯，所以這些封建諸侯的命運是不能長久的。前些日子，上海字林西報（英帝國主義機關報）登載一段廣東通信，題目是『廣東的封建制度』牠說：『李濟深要報酬各將領戰敗張黃的功績，把廣東劃作四區，每將領分給一區，享受該區的財富。』這通信的大意是不錯的，裂土而治，祇在封建制度下可能的事。但是字林西報所稱的『廣東封建制度』，是殘缺不完的。這是祇有上層建築而無下層基礎的封

建制度。秦漢以後的封建，都是這樣的。所以，秦漢以後的封建，永遠沒有長久過。唐宋以來有許多學者總在那裏詫異，爲什麼秦以後不能復行封建，他們的解說也有很多。但是，封建制度所以不能復行的原故，我們上文的解答要算是最正確的；祇有上層建築沒有下層基礎的封建，是不能持久的。

在俄國共產黨以內，中國革命問題，特別是中國農民問題，也曾惹起很大的紛爭。反對派的杜洛斯基等，不但否認中國的農民革命有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並且否認中國有封建制度。杜洛斯基的意思，以爲中國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關稅自主後建設本國的工業。這種辯論，大約在去年（一九二七年）春夏間最爲熱烈。到了現在，杜洛斯基在政權上是失敗了，在主張上却是勝利了。我們看得見在第三國際方面，確有對於中國問題重新思索重新考慮的表現。瓦爾加（匈牙利人，第三國際的經濟專家）最近作了中國革命之根本問題一文，把第三國際從前的錯誤指出來不少。雖然瓦氏的觀察和結論，仍有不少錯誤的地方，我們都可把他的糾正從前共產黨錯誤的幾句話寫出來，供我們的參考：

「我們想，爲了解中國的農業問題，當時用了封建制度這個名詞來形容中國情形，是有

損無益的。用這個名詞來形容中國眞相中一定的事實雖然不錯，然而這個名詞可以引誘許多人以爲歐洲封建制度的要素也存在於中國。這便與眞相不符而曾經造成了許多的糾紛。』

（按：這個『糾紛』的表現，就是在兩湖廣東殺人放火，掛紅旗，組織蘇維埃。）

『歐洲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土地統治權（按：土地統治權的解釋見上文）和農奴。……中國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按：然則第三國際的人也『反革命』了。）

『中國的社會構造，是一種比封建制度較進步的構造。』

（按：換句話說，不是封建制度，從前第三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的口號錯了。）

四　中國的經濟的與社會的構造

中國現在的社會的經濟的構造，既不是封建制度，然則究竟是甚麼？封建制度所以崩潰與消滅，是因爲錢幣的普及與商品的流通。錢幣普及商品流通之後，封建制度的經濟，必不能抵抗而迅被淘汰；這是因爲封建制度的生產，決不能和商品經濟的生活競爭。這是中國與西洋歷史所同的。不過在西洋歷史裏，封建制度崩潰與消滅之後，城市的工商業者，一定起

來代替封建階級而掌握政權；同時政治上一定趨向民主政治。中國封建制度消滅之後，乃成了一個統一的專制的農民國家。在這個國家裏，官僚政治代替了封建制度的諸侯，官僚自成一個社會，這固然又是和西洋歷史相同的。然而西洋封建制度崩潰之後，政治的勢力，移到城市；城市的工商業者的勢力，壓倒鄉間的封建殘餘勢力。所以西洋封建制度破壞之後，所產生的是一個以城市工商業爲中心的國家。中國的封建制度崩潰之後，經濟的政治的基礎是鄉村的農民。在這農民之上，有官僚紳士，是政治上的統治者與經濟上的剝削者。然而他們和農民的關係，却又不是封建的關係。

中國社會的這種與西洋不同的發展，有牠特別的歷史上的原因，此地不能詳述。此地要確認的是：中國自封建制度崩潰以後，直到現在，社會的構造沒有改變。這個構造的特徵，乃是：

一　不發達的錢幣經濟。中國的錢幣，不但未經國家嚴格的支配，仍是以重量通用（唐以後國家對錢幣的支配只限於銅錢），並且錢幣經濟和天然經濟還是併行着。

二　資本的主要形式是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很少工業資本。

三　土地價値的流動化，購殖土地成爲最重要最普遍的投資（這一層很重要，詳見下）。

以上所舉的特徵，自封建制度崩潰直至現在，沒有改變。最奇怪的，就是雖然和西洋通商將近百年，政治上經濟上受了很大很深的影響，而中國的社會的經濟的構造，依然沒有根本改變。這個構造，可以叫作一個『爲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資本主義』。思想是封建的，保存這個思想的有傳統的聖經賢傳。經濟與社會到是初期資本主義的。

五　中國的土地問題

要了解中國土地問題的性質，一定先要明瞭中國整個的社會的經濟的構造。上面已經說過，中國現在的社會構造，並非封建制度，而是一個爲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資本主義。我們要曉得，土地問題，祇是某一時期社會經濟全構造的一部份。土地問題，是受當時整個的社會經濟的制度所支配的。因爲土地問題，是農業問題的一部份；而農業問題，又爲全社會經濟的一部份。所以某一時期的土地情形，一定要帶着當時全社會經濟的色彩。

上段已經說過中國的經濟構造的一個特徵，是土地價値的流動化，購殖土地成爲最重要最普通的投資。中國的土地問題的性質，不是封建制度的而是資本主義的。我們雖然不否認

中國地主與農民間以及中國業主與傭工間，還保存着多少封建的意識，却是實際上中國地主與農民的關係，不類似封建主人與農奴的關係，而近於一種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這個分別，是非常重要的。封建主人對於農民的權利是『封建權利』(feudal rights)，地主對農民的權利是『財產權利』(property rights)。封建權利是比較的容易取消的，財產權利，則關係較為複雜。同時，中國的地主與農民，並不是顯然劃分的兩個階級。

以上是中國土地問題的質的方面，然而同樣重要的是量的方面。兩三年以來，最使一般革命者迷惑不知所從，而造成無窮之糾紛與犧牲者，便是共產黨所製造的關於中國土地分配情形的所謂『統計』。在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方面的宣傳，說是關於中國的農業與土地的情形，莫斯科知之最詳，備有很精確的材料。這個話不但有些中國人相信，就是帝國主義者中也有很多人相信。他們所公布的最使人驚駭的材料，要算去年譚平山在漢口土地委員會的報告。我們把他所宣布的兩個表，抄錄於下：

『按百分計算各層的農戶，其結果如下：

a. 一至十畝的農戶有百分之……四四・四五

b.十至三十畝的農戶有百分之……二四・七三
c.三十至五十畝的農戶有百分之……一六・二一
d.五十至一百畝的農戶有百分之……九・五七
e.百畝以上的農戶有百分之……五・三三』

『按百分計算各種農戶的土地分配，其結果如下：

a.平均有五畝地的佔土地百分之……六・一六
b.平均有二十畝地的佔土地百分之……一三・二六
c.平均有四十畝地的佔土地百分之……一七・四四
d.平均有七十五畝地的佔土地百分之……一九・四〇
e.有百畝以上的佔土地百分之……四三・〇〇』

宣布以上的『統計表』之後，於是當然的結論，就是中國土地的分配，非常不均。因爲百分之五的農戶，要佔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而一畝至十畝的農戶，雖然居全農戶的百分之四十四，却祇佔百分之六的土地！

中國的土地情形，果眞如此嗎？果眞如此，中國的土地問題，要算非常嚴重了。以前共產黨在兩湖廣東的試驗，和第三黨所主張的以暴動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大概都是根據這個『統計』罷？然而我們確實知道，這個『統計』完全是假造的，與事實相去不知幾千萬里！

我們雖然相信莫斯科的人們對於農民問題有些經驗，我們從來却很懷疑他們眞如外間所傳說，備有關於中國土地問題的精確材料。自譚平山的『統計』宣布以後，我們再不相信莫斯科對於中國土地問題比我們知道淸楚了。不過，製造統計，與根據所製造的統計作種種的結論與議決案；這種本領，莫斯科是高過我們千倍萬倍。

祇可憐那些奔走呼號中國共產黨小卒，奉到莫斯科的命令，力行唯謹，爲無益之犧牲。然而莫斯科關於中國土地問題的材料果然都是假造的嗎？這也不然，完全假造，是不會的。瓦爾加最近說出來了：『可惜布哈林同志所用的根據是北京農商部的統計。』我們想，大概一部份是取材於農商部的統計，一部份是任意製造的——多半是中國共產黨製造出來報告第三國際的。

關於中國耕地的分配，日本東亞同文會也有一個估計，抄錄於下：

『所有面積	共占全耕地百分之幾
十畝未滿的	四二・三
十畝以上的	二六・六
三十畝以上的	一五・八

五十畝以上的……………………………………九・七

百畝以上的……………………………………六・六

共一〇〇」

這個估計，自然也不可信。然而最滑稽的是牠與共產黨的『統計』恰巧相反。共產黨說有百畝以上的農戶佔土地百分四十三，而十畝以下的農戶佔百分之六。日本人則說十畝以下的農戶佔土地百分之四十二，而百畝以上的農戶佔百分之六。這正是兩個相反的極端！兩種數字雖然都不可信，都是錯誤；然而我們與其說共產黨的數字近於事實，無甯說東亞同文會的數字比較的近於事實。不過，爲免除誤會計，我們要立刻聲明：農戶耕地的分配，並不能表示所有權的分配。農戶耕地的分配與土地所有權的分配是不同的，尤其在中國是有很大的區別。中國的農作方法，是園圃式的栽種，用人工很多，有時僅輔以少數的家畜。牠的原則是『盡地力』，儘土地可能生產的範圍，使土地生產。這種方法，每戶農民，盡一家之力，祇能耕種很有限的土地。因此，稍大的地主，多半是把土地分租給佃戶，而自己作大規模農業經營者很少。這是和西洋大不同的地方。西洋的較大的地主，自己作大規模經營者很多，所以純粹爲市場生產的田地很多；不但此也，中國家有幾十畝地的地主，也常有自己不耕而招佃

者，這是因爲中國人工太廉的原故。因以上的種種情形，中國農業很少大規模的經營，大地主的田地，也是一樣用小農制去經營。所以農戶耕地的分配，決不能表示所有權的分配。

據我們搜集的各處的材料，以農戶耕地分配而論，南方每農戶所耕種的土地較少，大約平均每戶十幾畝；北方每農戶所耕種的土地較多，大約平均每戶二三十畝（無論在南方或北方，各省的情形當然不同）。這是因爲(一)南方的田地需人較多，(二)南方的田地出產較多。有許多歐美專家，曾在中國內地調查者，也證實以上的數字最近於事實。一般的（除去共產黨以外的）調查與報告，都說中國很少大地主，這幾乎是公認的事實了。

我們知道，凡是共產黨宣傳的關於中國大地主的材料都完全不可靠，這是我對於河南信陽的情形曾經考查比較過的。去年武漢北伐軍所受紅槍會的打擊，也完全是共產黨的不確實的宣傳製造出來的。共產黨妄說紅槍會是貧農的結合，於是想利用紅槍會反對地主；其實紅槍會正是地主所領導的組織。還有共產黨關於湖南廣東大地主所報告的數字，也完全是任意假造的。

中國雖然很少大地主，却是一切地主所佔的土地確是不少。同時，地租很高，佃戶和農業工人所受的壓迫很重。這不但是我們自己所熟知，也是許多歐美人的調查所證明的。

綜合許多材料，可以說中國全國的耕地，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佃田；俄國人的數字是百分之八十六，自然又是放大的（見上）。而地租平均總在耕地收穫的百分之五十，在南方較重，在北方較輕。除去英美人的調查外，德國農學家維格納在中國調查頗久，也是這個意見。俄人達哈諸夫說：『據普通的估計，廣東省有百分之八十五爲租田，湖南省有百分之六十四爲租田，湖北省有百分之五十五爲租田，河南省有百分之三十或四十爲租田。』這個估計，大約是離事實不遠的。

六　中國土地問題嚴重的原因

在上段裏，我們一方面考核了各方面關於土地問題的材料，一方面根據可靠的調查，斷定中國佃田的比例和地租的比例。

由這種數字上看來，中國的土地問題，要算是很嚴重的。全國耕田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佃田，地租平均占耕地收穫的百分之五十。這是何等嚴重的情形！（況且越是東南富庶地方，

佃農的比例越大。）假定中國全國已闢的耕地，有十萬三千萬畝，平均每畝的一年收穫爲六元，則每年土地收穫的總價值有七十八萬萬元。依據上面的數字，全國耕地一半是佃田（其實尙不止一半），而地租平均占收穫的百分之五十計算，則每年地主所收地租的總値，約爲二十萬萬元。

中國的國民經濟，逐漸衰微，而上等社會表面上尙能維持比較優裕等生活；且近年外國奢侈品的輸入，也逐年增加。凡此享受，其最後的淵源，多半就是這二十萬萬元的地租。

復次，中國的鄕村那樣極端的貧乏，極端的困苦，而城市裏（特別是沿江海的商埠和租界），却表現可驚的奢侈；這個現象，也要在地租裏求得解釋。比較稍大的地主，並不住在鄕間，或遷居最近的省城商埠，或直遷居到沿江海的租界。所以鄕村收來的地租，多半是消耗在城市裏面。

中國土地問題，爲什麼有這種情形，分別來說：(一)爲什麼佃田的比例這樣大，(二)爲什麼地租這樣高；這是亟要分辨淸晰的一件事。凡事，在討論解決方法以前，先要明白這事的原因，正和醫病者一樣，診斷正確，才能決定醫治的方法。

第一個問題，爲什麼佃田的比例這樣大：最要的原故，就是上文第四段所說的，土地價值的流動化，購殖土地成爲最重要的最普遍的投資。在停頓於初期資本主義的中國，一方面商業資本及暴利資本，甚形發達；一方面因爲技術落後，政治紊亂，工業沒有組織，進步遲滯；工業投資，多屬冒險。所以購殖土地乃成了最重要最普遍的投資。中國的官僚、軍閥、巨商，在聚積巨額財富之後，多半是回到故鄉，購置土地，而經營商業者，要算少數。最近北洋軍閥，如各省的督軍等等，退職之後多半是在其故鄉廣置田園（大約不出山東、河南、直隸、安徽數省）。廣東華僑，每年由海外匯回故鄉六七千萬元，安置方法，也是用一大部份在本省購買田產。東南富庶各省，地價非常之高，投資土地所得的利息，比較甚微。如係招佃，所生利息，在許多地方不過六七釐；有時還不到六釐。其在內地，越是世家豪富多的地方，土地的分配越不均勻，而地價也越貴。總之，中國的官僚，軍閥和巨商，自農民身上所剝削者，還以購置田地之方法，復去剝削農民。爲保存其所貯蓄之資本計，祇有購置田產是最穩當的辦法。城市中工業投資，多帶冒險性質，商業投資，則須自己經營，至少要自己照料。中國的工商業中，投資與經營，尚未分開，這是初期資本主義最明顯的徵候。一方面

商業資本與暴利資本那樣發達，一方面官僚與商業的餘利，無處投置，仍不能不輾轉回到土地上去，這是很明顯的表示中國經濟停頓，資本主義不能前進的景象。此外還有封建思想，牢不可拔，占有田產，成了一種關係榮譽的事，這也是佃田多的一個原故。

說到中國地租之高，誠然在世界上要首屈一指。不但東南各省，地租恆占土地收穫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並且地租之外，還有押租，這是一種最苛酷的制度。押租額數，多半是占土地價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佃戶自己是出不起押租的，所以普通的例，交付押租，總是要由佃戶借貸。借貸的利息，自然又是非常之高。有時出借者就是地主本身。這樣，佃戶一方面受地主的剝削，一方面受高利貸的剝削。兩種剝削，都是取資本與利息的形式，於此也可看清中國土地問題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押租的效用，實際上是把原有的地租更加擴大。譬如，土地價值每畝一百元，押租三十元。押租由借貸而來，每年須付二分的利息，計爲六元。若假定遇見豐收，同時農產品的市價也頗高，一畝田的產品，價值十八元；再假定地租已折合六元，則佃戶所應付出者如下：

產品價值	一八
押租利息	六
地　租	六
佃戶共應付出	一二
佃戶自得	六

這樣，因爲要付押租的利息，所以就把原來地租的額數加倍了。押租在歐洲完全是封建時代的制度，現在早已剷除。在法國，則大革命時卽已完全剷除，這是要注意的。

中國地租什麽這樣高？中國地租的額數，由何而定？這也是應當明瞭的問題。我們由種種方面推算，可以簡單的講一句話，中國的佃戶，每年除去交付地租和利息及應付其他種種勒索敲詐以外，所剩餘的，僅夠延長生命。在大多數的地方，佃戶終身勞苦，沒有自立的希望。

所以中國雖然沒有封建制度，多數農民的生活，却與農奴沒有很大的區別。這種剝削的結果：第一是農業退步，農產品漸漸減少，因爲在這種情形之下，耕種都是掠奪地力，沒有改良土地的可能。第二是拋荒，拋荒大半是農民所得不能維持最低生活的結果。尋常地租的訂定，總是以農民所得剛剛能維持其牛馬的生活爲度。

南方地租最高，北方地租較低，也可在此得到一個解釋。南方的土地收穫較豐，一戶農民所能產生的農品較多，除去維持其最低之生活外，要全歸於地主，所以地主的百分率就大了。

人口的情形，也是和土地問題有關係的。中國許多省分之內，人口異常稠密。沿江海的各省，如江蘇、山東、浙江每方邁羅都有五六百的人口，這比英國、德國、義大利的人口密度，還要超過，和統治剝削比本國幾倍大的殖民地的荷蘭與比利時密度相等。在這種人口稠密的情形之下，農民沒有組織，而土地又成了普遍的投資，當然結果，地主對於租出土地，實際上是獨占；而佃戶對於售賣勞力，是毫無限制的相互競爭。同時，國家對於佃戶及農業勞動者又毫無保護的辦法。

總之，中國農民極端貧窮與極端困苦的原因，有以下的幾種：

一　官僚軍閥等用政治手段的剝削：包括苛捐、雜稅、勒索、綁票、以及其他一切的舞弊方法。

二　兵匪的騷擾，包括因破壞秩序與阻礙交通所生的一切障礙（農民因此不能依時耕種

依時售賣）；

三　水利廢棄，水旱災普遍；

四　幣制上的剝削，軍閥濫鑄銅幣，濫發紙幣，使農民擔負幣制『充脹』(inflation)的損失。

以上四項是外來的原因，以下兩項則是內在的，關於土地問題本身的原因：

一　因帝國主義之侵略，手工業無改進之機會，新式工業無建設之可能；官僚聚斂的財富及商業聚積的資本，沒有穩當的投放途徑，所以都用在購置土地上面。資本的壓力，不斷的把小地主驅逐開，使大部份土地成為投資營利的工具。

二　因為農民沒有組織，所以地主對於租出土地是居獨占的地位，而農民對於售賣工作力則無限制的互相競爭。所以農業勞動者的工資和佃戶的所得，祇能以延長生命為度。超過此數，全歸地主所得。

七　中國土地問題的前途

我在討論本問題——中國土地問題的前途——之前，先要貢獻一點意見。許多熱心而力

行的革命同志們，對於一切事情，最急切要求的是『辦法』。『有辦法然後可以行動，沒有辦法則一切都是空論。』這話當然有一部份的眞理。不但表示意見，並且要即刻行動，這是近年中國青年的大進步。祇是我要補充一句話，就是『辦法』要由『認識』得來，『認識』不淸，則『辦法』必不能儌倖免於錯誤。一切『辦法』，一定要順應事物發展的自然趨勢。如果違背這個趨勢，一切辦法，不但是空論，並且貽下極大的錯誤，造成極大的失敗。

中國的土地問題，究竟如何解決，這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一定要注意以下的兩點：

一　要認識清楚現在土地問題的性質和造成現在土地問題的原因；

二　要知道土地問題是農業問題的一部份，而農業問題又是國民經濟問題的一部份；所以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法，與整個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能違背的。

以上第(一)點，可以指示我們解決土地問題要利用何種力量。這個力量一定是經濟發展中自然的力量。第(二)點是指示我們土地問題用某種方法解決之後，新的土地制度，在現行的經濟制度之下是否可以維持得住。

在討論如何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的時候，要以上稱兩點爲指導的原則。具體的說，要判斷中國土地問題是否可以農民暴動解決，還是要另用一種適應經濟環境與經濟發展趨勢的方法去解決，就要以這兩個指導原則作判斷的根據。

以農民暴動重新分配土地，有以下的各種困難與障礙：

一　中國土地制度不是封建的，因此中國沒有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如法國革命時的情形。在法國革命時，打倒封建階級，是於資產階級有利的，所以資產階級並不反對農村革命與農民暴動。但是後來沒收的土地，經中產階級大宗的收買之後，他們的態度便完全變了。在中國有田產者，遍於全社會，土地並非集中於少數地主之手。所以以暴動沒收土地，難免惹起很普遍的反動。

二　人口稠密與小農制度，又是一個以農民暴動解決土地問題的障礙。假定中國的耕地有一千三百兆畝（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畝），人口有四百兆，則每人平均分配，不過三畝餘。沿江海一帶人口稠密的省份，平均分配，每人僅得一二畝。這種情形，是以農民暴動從新分配土地的一個大障礙。在俄國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的時候，農民平均每人分

得土地約有五十畝之多。革命後，除去少數無土地的貧農以外，所謂小農，每戶占有至六十畝的土地；所謂中農，每戶占有六十畝至一百二十畝的土地；所謂富農，每戶占有一百二十畝以上的土地。固然，俄國的耕種方法，和中國不同，不能專以耕地的面積，互相比擬。但是無論用何種耕種方法，每人平均兩三畝以至一二畝的土地，很難有圓滿分配的可能。

三　再由革命的力量上看，農民暴動，如果是單獨的，而無革命的城市做領導，沒有不失敗的，這是在中古時代德國的所謂農民戰爭很可以看得清楚的。經濟政治的中心是在城市，以現在中國情形說，是在沿江沿海的商埠。所以沿江海的商埠，如果不能完全拿在革命勢力的手裏，內地的農民暴動，雖然彼仆此興，是很難形成政治中心的。沿江海商埠的居民，除去依附於帝國主義者的反動勢力外，大多數與土地財產有利害的關係。譬如城市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及自由職業者，大部份同時是鄉村的自耕農或小地主。他們果能贊成農民暴動重新分配鄉間的土地麼？退一步說，城市的工人、雇員和一部份自由職業者都贊成了，還要問，他們是否有力量幫助暴動的農民。在鄉村暴動擴大的時期，不但不能以榖

糧及其他農業品供給城市（去年湖南已有這種情形），反要求城市以工業品供給鄉村。在現在這樣工業極端落後而完全以剝削農村而生存的中國城市，處於農民暴動的四週之中，根本很難維持自己的生存，更難以貨品接濟鄉村。這是由革命力量上觀察以農民暴動解決土地問題的障礙。

四 我們在上文說過，在討論『辦法』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事情發展的趨勢。『辦法』如果不是玄想，一定要運用事情發展的趨勢。在現在中國的政治的與社會的不甯狀態之下，比較大規模的普遍的農民暴動，不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兵匪的騷擾，不能在最近的時期內停止；苛捐雜稅勒索等等，不能在最近時期內禁絕；則普遍的農民暴動，反抗地主、反抗官廳、甚至於夥同一部份叛變的軍隊，共同動作，這都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的。在政治組織完全解體、經濟生活完全擾亂的現狀之下，這也是無足奇怪的事。但是這種暴動，雖然在政治上，可以有很嚴重的結果，却是不能根本解決土地問題。我們要重復聲明的：土地問題，祗是農民問題的一部份，農民問題的內容，決不止於土地問題。譬如，耕畜及流動資本，在農業裏一樣重要。如果忽略這些問題，而以為以暴動分配了土地，農民問題，便可

解決，那便是很大的錯誤。俄國的土地革命，雖然把土地分配過好幾次（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不能不算澈底；然而至今絕對平等的理想，還是未曾實現。據一九二五年農業人民委員會及財政人民委員會的報告，全國土地及牲畜的分配，有如以下的情形：

農民種類	小農（每戶占有六十畝以下）	中農（每戶占有六十畝至一百二十畝）	富農（每戶占有一百二十畝以上）
占全國農戶百分之幾	三一・三	四九・五	一九・二
占全國耕地百分之幾	一一・七	四六・三	四〇・〇
占全國耕畜百分之幾	一九・一	四六・〇	三四・九

看上表小農與富農的比例，可知分配土地，並未將平等的理想完全實現。由一九二五年到現在，祇有更向不平等方面走去。這是什麼原故呢？一方面俄國的工業，既不能促成農業的社會主義化；一方面農業中流動資本的問題並未解決。所以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允許傭工和開放了糧食貿易以來，資本充足的富農，就有逐日發展的可能。由此可見，機械式的分配土地，是不能完全解決農民問題的。

中國土地問題若要解決，必須由革命的政府積極干涉。一方面要組織農民以抵抗反動勢力，一方面不可過於急進，逼迫一般小地主向反革命的道路上去。在現在豪紳統治下的鄉村裏，任何關於土地改革的辦法是不能實行的。必農民普遍的組織起來，一面爭得若干根本的經濟權利（如減租及廢除苛捐雜稅等），一面握到鄉村的自治權，然後土地問題才有解決的機會。至於解決的辦法，則地主之土地（最小地主除外），由政府強迫訂價收買，賣與農民耕種，並發行債票以爲收買之用。農民購買土地之價，則分期於五十年至七十年償淸，每年償還購價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這個方法，去年武漢政府，本已籌議過，可惜後來湖南的共產黨蓄意破壞，未能實行。這個方法，是西洋許多國家用過的，特別在土地問題很嚴重的愛爾蘭，曾行過幾十年之久。十九世紀末愛爾蘭的『土地委員會』（由地主與佃戶共同組織的），是要做到三件事情，即：

一 Fixity of tenure, 保護佃農，使地主不得無故辭佃。

這個問題，已是一八七〇年格蘭斯頓的關於愛爾蘭的土地法的對象。佃農的勢力薄弱，不能抵抗地主，所以需要國家的保護。佃農與地主之間的合同，是不能完全任自由訂定

的，這個原則，在上稱一八七〇年的土地法已經確定了。本黨第二屆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的農民問題決議案第四條云：『應由政府下令准許親自耕種之佃農，有永久使用土地權，非地主收回親自耕種，不得調田另佃。』這和愛爾蘭的土地法是同一用意的，不過愛爾蘭的土地法，規定地主退佃時要擔負很重的費用，間接的阻礙其辭佃；而本黨的決議，則是直接阻止其辭佃。

二　土地可以自由買賣。

此層在中國很重要，因爲中國的地主，是決不情願出賣田地的。是宜倣英國獎勵小農的方法，使分配土地的機關，有強迫收買土地之權。

三　實現公平地租（Fair Rents）。

這是中國目前的大問題，所以我們很有參考愛爾蘭的辦法的必要。愛爾蘭的辦法，是由地主與佃農共同組織『土地委員會』。土地委員會訂定地租，有效十五年。十五年後，重新訂定。這是調劑地主與佃農勢力不平的辦法。——地主的地位實際上是獨占的，佃農的地位實際上是互相競爭的，這是愛爾蘭與中國相同的情形。

這個制度實行以後（自一八八一年起），愛爾蘭的地租，曾經減輕過三次。第一次，平均減輕原租的百分之二〇・七；第二次，減輕第一次租額的百分之一九・三；第三次，減輕第二次租額的百分之九・二。於此可見巨額的減租，並不是稀奇的事情，更不是赤化的勾當。而本黨十五年中央各省聯席會議的決議案，要減輕佃農田租原額的百分之二十五，原來是一種很緩和的辦法。

再總括的說一次，我們以爲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應當採取以下的步驟：

一　普遍的組織農民協會；

二　以農民協會爲基礎，促辦鄉村自治，使農民握有鄉村自治的實權；

三　勵行本黨的決議案，特別是：

一、減租——須做一種大規模的減租運動，至少要實現聯席會議關於減租之決議；

二、地主之土地（三十畝或五十畝以下除外），由政府強迫訂價收買，廉價賣給農民耕種，並發行債票，以爲收買之用。農民購買土地之價，分期於五十年至七十年內償清。每年償還購價之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

以上兩項，由政府委托鄉村自治機關執行之。

其餘詳細的辦法，此時可以不必敍述，此時要確定者是乃原則。

以上我們以爲是解決中國土地問題最適宜的方法。如果不能實行，其結果不出兩種，其一，農民淪於極端的貧乏，不能挽救，同時農業亦日益衰敗。農業與農民是中國人力物力的本源，如果農民墮落，農業頹壞，中國新國家的物質的與精神的基礎就完全喪失，中國沒有不滅亡的道理。不然，則第二個結果，農民不能忍受，起來暴動，這是在現在很可能的事。農民迫於生活的要求，至於普遍的暴動，這是很不幸的事。尤其不幸的，是這種暴動，並不能根本解決農民問題。但是農民暴動起來，就決不是什麼理由所能勸止的。防止殺人流血的唯一方法，祇有減輕農民的實際的痛苦。本黨的政府，是否能擔負這個任務，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減租案至今未實行，兩湖當局且認爲共產黨的手段，下令取消；四次會議把此事也完全擱置未提，這都是很不好的徵兆。一般忠實黨員應當趕緊起來，督促政府去解決土地問題。

中國土地問題

李鏡如

一　土地問題之由來

中國的土地問題，自從周朝末年土地歸於個人私有，形成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土無立錐』現象以後，就已經發生了。歷史上如漢代王莽之實行王田制度、如北魏北齊唐初之實行授田制度、如南宋之實行官田制度、如歷代學者之倡導限田制度、都是為了解決土地問題而發的。時至今日，土地問題愈形嚴重，其急待解決，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了。至於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却是要依據時代性和社會性而定的。現在的土地問題，和歷史上的土地問題不同；歷史上土地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封建政治和土豪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現在的土地問題，除了那兩種剝削之外，還有帝國主義之侵略；而且封建政治和土豪地主的剝削之中，也含有帝國主義侵略的成分。所以現在的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法，和歷史上的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法是不同的。又如中國的土地問題，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問題也有些不同。資本主義國家土地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大地主和農業資本家對於中小農和農業勞動者的剝削；中國土地

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土豪地主、封建政治、帝國主義對於一般農民的壓迫和剝削。所以中國土地問題解決的步驟和資本主義國家土地問題解決的步驟，必然也不相同。因此，我們要研究土地問題及其解決方法，必先分析土地問題之原因；其次說明土地問題的現狀，然後假定土地問題解決的原則。

土地問題之所以日形嚴重的原因很多，歸結起來，可以分爲下列三項說明。

第一　帝國主義的侵略

中國本是一個農業國，在海禁未開以前，人民的生活資料，大都取之於土地以自給；但自帝國主義侵入以後，這自給的農業經濟就漸被破壞，農民的苦痛也日見增加。茲就其顯然的事實，逐條列舉如下：

一　賠款及外債之負擔　從滿清末年到現在，中國對帝國主義國家所認的賠款和向帝國主義國家所借的外債，合計已達二十二億以上；這項賠款和借款，直接或間接都是由農民負擔的。

二　經濟的掠奪之負擔　海通以後，中國對外貿易總是入超，最近四五十年以來，每年進

貢於帝國主義者的金錢，由一萬萬增至數萬萬。再加別的方面，如孫中山先生所估算，總計每年進貢於帝國主義者的金錢，要達十二萬萬元。這大宗的進貢錢，也都是直接或間接由農民來負擔的。

三　帝國主義商品的掠奪　帝國主義商品，由都市侵入農村，現在已是普遍的侵入於窮鄉僻壤了。農民所消費的東西，除了農產物和一部分的家具之外；其他服用品大都是由帝國主義者供給的。我是一個偏僻地方的農家子，記得二十年前在鄉下的時候，穿洋布、點洋燈、用洋瓷面盆和毛手巾的，只有上等的人家；中等的人家多不用洋貨，只是穿土布、點油盞、用木面盆和粗布面巾，頂多不過用點洋火柴。但到近年已是大不相同，中等的人家用這類洋貨的只是很平常的事；就是佃農和雇農，也要穿洋布衣裳，甚至乞丐身上也帶有帝國主義商品的成分。舊式手工業破產的結果，農民只能拿農產物去換用帝國主義的商品。這類商品，又是由洋商買辦經手販賣的；經過無數曲折，運到窮鄉僻壤的附近市場時，價目已經高到極度。農民拿農產物到市場出售，只得到市價以下的價格；再拿出這樣得來的金錢，去購用帝國主義的商品，一出一進，要受居間人的兩重剝

削。簡單的說，農民每年勞苦的所得，除了吃一點粗茶淡飯以外，其餘都換成金錢，直接或間接的送到帝國主義者的錢袋裏，這種情事，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不必多說。

四　農民副業的衰退　養蠶、採茶、紡紗、織布等項，都是農民的副業，這些很可以貼補農家的家用的。但自帝國主義侵入以後，農村婦女紡紗的工作完全廢止，織布的也改用洋紗；但終日勞苦的所得很少，大都也停止不做了。只有絲茶兩項，雖然還可維持，但現在也大不如前。絲茶本為中國出口貨的大宗，如茶一項，在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以前，出口額達三萬萬磅之多，差不多供給全世界的消費之用；後來印度茶錫蘭茶日本茶起而競爭，出口額逐漸減少，民國四年以後每年平均不過一億九千萬磅。而且有印度茶和錫蘭茶進口，其額且達三千萬磅之多。其次如絲一項，在五六十年以前，殆占全世界絲業之半額，但到後來，東則見奪於日本，西則見奪於意大利，至一九一六年，生絲額已減至世界總額百分之二十七。至於絲之出口額，亦逐漸衰退，合各種絲類計算，在民國元年為三二〇、七九六擔，至民國十年減為二七五、七八九擔，即此可以想見。農民副業的衰退，也是農村經濟破產的原因。

五　農村生活的提高　農村生活提高的主要原因，也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最近數十年來，農產物的價格雖比較增加，而帝國主義商品價格的增高率則超乎其上。這兩者的距離，在交通比較便利的大都市附近農村還少，在窮鄉僻壤的農村則更大。農民用低價的農產物，換用高價的商品，其結果遂使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的生活，愈覺苦痛；而尤以雇農爲最甚。就雇農說，據我所知道的，二十年以前，我鄉雇農每月的工資，雖不過民錢一千二百文，却可以買米六斗（斗米二百文），能養活三人；現在每月工資銅元錢六千文，只能買米一斗半（斗米四千文），要養活一個人還不夠。即此可見一班。

六　農村金融的困難　農民每年要進貢大宗金錢給帝國主義者，農村金融的困難，乃是必然的結果；加以封建政治的剝削，更替土豪地主造出剝削的機會，農民那能不入於枯魚之肆呢。

第二　封建政治的剝削

封建政治的剝削，古來也是有的，但決沒有像最近幾十年來這樣厲害，這是因爲這種剝削中含有帝國主義侵略的成分。封建階級因爲要維持自身的地位和利益，不得不承認帝國主

義者所要求的賠款，不得不向帝國主義者借款；這賠款和借款，是封建階級開銷的，却要農民來償還。而且承受帝國主義者的命令稱兵倡亂的時候，更不得不向農民加緊搜括以自肥。所以農民所受封建政治的剝削之賜，也可以分為下列五條。

一　苛捐雜稅　關於農業方面的，有附加稅、警捐、學捐、水利捐、牛捐、戶籍捐、屋樑捐、沙田捐、穀米捐、畝捐、自治捐、屠宰捐等等；名目繁多，不勝條舉。這些都是直接取之於農民的。關於商業方面的，有種種釐金關卡，多至無窮，幾於十里一關，五里一卡；這些雖是直接取之於商民的，而間接却是取之於農民。

二　預征錢糧　軍閥救濟財政的困難方法，莫如預征錢糧。有些省分，現已預征至民國三十多年（如四川），也有些省分是預征一兩年的。最奇怪的，甲軍閥預征錢糧之後，乙軍閥如起而代之，他並不承認前屆軍閥預征的有效，必得從新征收起來。農民除了在以前繳納的預征錢糧之外，還要從新繳納一次，所以農民往往有一年繳納錢糧兩次或三次的事情。

三　勒種鴉片及鴉片稅　販賣鴉片和抽收鴉片稅，是軍閥搜括的最好方法。軍閥的勢力，

有好些是靠鴉片維持的；所以有些省分的軍閥，勒逼農民栽種鴉片，農民也因爲有利可圖，樂於栽種，且可免罪。於是所謂烟苗捐、烟燈捐、吸戶捐種種奇重的捐稅，無不應有盡有。好好的農田，不種五穀種鴉片，以致食糧騰貴，農民飽於鴉片，而餓死於食糧的，處處皆是（如湖南之西部）。同時軍閥間因互爭鴉片而起戰爭的也很多，常常發生內國的鴉片戰爭。

四　銀行票幣倒賬　發行軍用票，及省庫劵或銀行劵，乃軍閥籌款之妙法。這類票幣之發行，絕無基金可言，只是強迫人民使用，否則軍法從事。軍閥以之散布於市面，商民以之流通於農村；到了倒賬的時候，商民中之狡黠者尚可利用特殊勢力，用以完納別種釐金稅項，而農民則叫苦連天，無可如何。

五　戰時的犧牲　每一次的軍閥戰爭，受痛苦最重的莫如農民，尤其是戰爭區域以內的農民；田園被踐踏，屋宇被燒燬，食物牲畜被搶掠，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每一次戰爭中的損失，無慮數萬萬元，其大部分都是由農民擔負的。

第三　土豪地主的剝削

上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剝削，在土豪和地主，當然也是不能倖免的，不過他們的資財比較雄厚，還不至影響於他們的生存，而且他們更可以利用這些原因，來加緊對於農民的剝削，把那些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去。他們是農村中間的大戶、是紳士階級的分子、是官吏和農民的中間人；他們或者自己充當團紳，或者和團紳相勾結。軍閥政府有什麼捐項要農民擔負的時候，縣官總是要他們去派捐，他們當派捐的時候，總故意把捐房的資格降低，把捐項的實額擴大，儘先向一般農民勒派，結果捐數已經超過預定的實額，他們便在這中間上下其手，或者故意將自身所認捐項多開一點，而實際上自己不但不拿出錢來，（即使拿出來，實數也是很少的，農民也不能指摘他們。）反可以借此發一點小財。質言之，軍閥逼迫農民的苛捐，土豪地主總要把自己的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的。轉嫁的方法，還有加重佃租和重利盤剝。茲分別略述於下。

一　加重佃租　農村經濟敗壞的結果，農民生活困難，失掉土地的人也就多起來；失掉土地的農民，大多數都不能另覓生活（在目前都市的工廠很少，要做工人也不容易），只有仍舊向土豪地主佃種土地。但佃種土地的人不很多的，因爲需給的關係，土豪地主便可

以乘機增加佃租，那失掉土地的人，爲了要過動物生活起見，只有承認他們的要求。母牛總要被榨取乳汁的，但有乳汁可榨的時候，這母牛總還有維持生命的飼料可以攝取，這是佃農肯出高價佃租的原因。我在鄉下常常聽見地主對着佃戶說：『租穀是不能減少的，你要知道，我現在每年要完納兩年糧餉，還要認米捐和富戶捐；若再減租穀，就連完納國課和認捐的錢都不夠了。你如果眞要短少租穀，我只有撥佃的一法；東村的張老二、西村的陳老九、他們情願先付一年的押金來佃種我的田呢？』這可以說是一般土豪地主對付佃農的普遍方法。所謂「倒三七」「倒二八」「倒四六」的租額，就是這樣弄成功的。此外什麼例外的常規敬禮，竟多至不可勝數；總之，佃農該死。

二　重利盤剝　農民在好幾重的剝削之下，每年的虧欠和賠累；乃是必然的結果，而尤以佃農爲最苦。我們在鄉下常常看見種過二三十畝田的人家，一到秋穫完了的時候，穀倉中就不能存放一粒穀子，竟應了「放下鐮刀無飯吃」的一句俗話。他們大約從夏歷九月或十月的時候起，就要向富戶借錢用、借米吃，借錢的月息照例是百分之三四十；借米的月息，照例百分之五十，有田的多半拿田契作抵押。到了春二三月，又要向富戶借米

吃、辦穀種、辦器具、俗名「下脚糧」；這種「下脚糧」的利息更重。到了五六月青黃不接的時候，又要向富戶借米吃，這時候的利息，往往是對本對利，借一月要還一年的利息，俗名「納新穀」。這樣一來，等到秋穫的時候，除了償清積欠，自然沒有飯吃了。所以自己有田的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便這樣把田算給土豪地主；自己沒有田的佃戶，要想繼續做佃戶，只有賣兒女來還賬，否則溜之大吉，或做游民乞丐。

以上三大項，是目前中國農民問題發生的原因，也就是土地問題所以日形嚴重的原因。

二　土地問題之現狀

基於上述的原因，說明土地問題的現狀。

一　耕地面積　中國的耕地面積，據前清戶部的推算，共有二十萬萬畝，但據從前北京農商部的統計，只有十五億四千五百七十三萬畝。

二　耕地面積的分配　據前述農商部民國七年的統計，耕地面積的分配，約如下表：

所有面積	總面積	百分率
十畝以下	一七、九一四、二三一	四二・三%

十畝以上	一一、三〇三、五七〇	二六・六
三十畝以上	六、七一二、三六六	一五・八
五十畝以上	四、一三七、一三六	九・七
百畝以上	二、二七三、三五五	六・六
合　計	四二、三四五、六五八	一〇〇・〇

照前表看來，十畝以下的小農經營，約占百分之四十二強；其次是十畝到三十畝的小農經營，約占百分之二十六強；這兩項合計起來，約有百分之七十是歸於中小農經營的。

茲更進而考察耕地所有的傾向，採用民國六年以後至民國九年的四年間的京兆以下十省區的統計，表示如左：

省區	年次	十畝以下	十畝以上	三十畝以上	五十畝以上	百畝以上（單位千戶）
河北	民國六年	一、三六四	一、〇八七	七九七	五〇二	二一六
	民國七年	一、三七三	一、〇八一	七九七	五〇九	二二四
	民國八年	一、三五五	一、〇九四	八〇二	五〇九	二二三
	民國九年	一、三六五	一、一〇一	八一七	五二二	二三一
	民國六年	五二	九七	一一〇	一二二	一五八

吉林	民國七年	四四	九八	一六一	一三二	一五三
	民國八年	一三八	一二三	一九四	一七一	一七五
	民國九年	四五	一〇七	一七七	一三一	一一六
山東	民國六年	二、一〇七	一、五五二	九五八	四九七	三四一
	民國七年	三、一八五	一、五三八	九三三	四八八	二〇八
	民國八年	二、三九〇	一、五〇三	八八四	四三九	一五一
	民國九年	二、二六〇	一、六八六	八九六	四四七	一九九
河南	民國六年	一、五九七	一、五六九	一、五二五	八七七	五六二
	民國七年	一、八三〇	一、一一九	七九九	四九〇	三二九
	民國八年	二、五六〇	一、六五二	一、〇八六	六五四	三五九
	民國九年	二、五三二	一、六三〇	一、〇八八	六八六	三五八
山西	民國六年	二八三	三六〇	三九八	三三八	一五二
	民國七年	三八四	三九四	三六二	三三七	一五二
	民國八年	二八三	三六〇	三九八	三三八	一五二
	民國九年	二八三	三六〇	三九七	三三八	一五二
陝西	民國六年	六一八	三六九	一八九	八九	六四
	民國七年	四九六	四四四	二一四	九九	五六

	民國八年	三九八	四五二	二五三	一四七	五八
	民國九年	三八〇	四五二	三六三	一九〇	五五
江蘇	民國六年	二、七二六	一、三一二	四八七	二六〇	八七
	民國七年	二、三一五	一、二九四	五六七	二七一	九五
	民國八年	二、二八八	一、三三二	五〇〇	二五三	八七
	民國九年	二、二二四	一、三五七	五三四	二八二	一〇五
安徽	民國六年	一、一三一	九八七	三三四	二〇九	一七六
	民國七年	一、〇三八	九三二	四〇五	三〇〇	一九九
	民國八年	一、一二五	九四二	三八七	二二二	六六
	民國九年	一、一三五	八九四	四〇三	二二〇	九七
察哈爾	民國六年	一三	一四	二四	二九	三六
	民國七年	一三	一四	二四	二九	三六
	民國八年	一二四	一三	一二	一八	三六
	民國九年	一二	一三	一二	一九	六九

據右表，十畝至三十畝以下的小農戶數增加，三十畝至五十畝的中農戶數也略見增加。

至於五十畝及百畝以上的戶數，除河北、河南、察哈爾以外，則呈減少之傾向。這些都是表

示農民方面因前節所述的原因而由大農降為中農，中農降為小農的徑路。

又據去年武漢中央委員會的調査，土地分配的狀態，有如下表。

有地農民總數	人數	畝數
十畝以下	四四%	六%
十畝以上	二四%	一三%
三十畝以上	一六%	一七%
五十畝以上	九%	一九%
百畝以上	五%	四三%

三　佃農的增加　據日本東亞同文會支那年鑑的統計，全國佃農的戶數，在民國七年為百分之二十六，到民國八年增至百分之三十二；一年之間，佃農竟增加到這個比例，也可以推想其一斑了。佃農數目的增加，在大都市附近的交通便利的區域，尤為顯著。據嚴仲達君所著「耕者要有田』書中所引的南通和崑山兩處佃農增加的情形，有如下表：

南通	佃農的比例
一九〇五年	五六・九%
一九一四年	六一・五%

	佃農的比例
一九二四年	六五・四%
崑山	
一九〇五年	五七・四%
一九一四年	七一・七%
一九二四年	七七・六%

這兩處地方佃農增加的速度，是很可驚異的。又如廣東的佃戶數目也不少，廣東農家戶數共計三、九二五、二〇七戶之中，有佃戶一、四六三、七五一戶；佃戶兼自耕農一、一四四、八四二戶。佃戶占約百分之四十。這是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地方，土地易為地主兼併的例子。

佃農的數目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總要占居多數。如前引「支那年鑑」所轉載華洋義賑會的參考資料，在浙江之鄞縣，佃戶占百分之六十七以上；江蘇之儀徵，佃戶占百分之四十八以上；江陰佃戶占百分之六十九以上，吳江佃戶占百分六十七以上。這些都是很零碎的統計，固然不能適用於其他的省分，但也可以作為推測的標準。

四　荒地之增加　中國荒地面積之增加，也是土地問題所發生出來的。據日本人伊藤武

雄所著「現代支那社會研究」書中所載，民三至民七年間的荒地增加情形，有如下表：

年次	荒地面積　畝
民國三年	三五八・二三五、八六七
民國四年	四〇四、三六九、九四八
民國五年	三九〇、三六三、〇二一
民國六年	九二四、五八三、八九九
民國七年	八四八、九三五、七四八

據上表，四年之間，荒地的面積，竟增加四萬萬畝以上，這固然是多由於天災、兵禍而起；而農村經濟破產，佃農苦於種種剝削以至不能不放棄其佃耕之土地而不耕，也是一個大原因。

五　食糧的不足　由於土地問題而發生出來的現象，也可以由食糧不足一事證明出來。比方中國對外貿易中的食糧進口額，到最近竟增至一萬萬海關兩以上；即如去年，也達一萬萬三千萬海關兩以上。農業國的中國，食糧竟要仰給於外國，這固然是農村經濟破產的現象，同時也是土地問題所生的現象。

以上是土地問題的現狀。

三　土地問題之解決

農民問題是一般民生問題中的主要問題，土地問題又是農民問題中的中心問題。中國的農民數目，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國的革命也可以說是農民的革命。中山先生說：『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革命的基礎。』又，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說：『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及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卽爲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卽農夫工人爲自身而奮鬥也。』中國革命爲什麼要用農民做基礎？就是因爲占全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所受的痛苦最大。因爲農民受了帝國主義、軍閥、以及土豪、地主等特殊階級所侵略所剝削，以至於失掉土地，淪爲佃戶，以至於失掉謀生機會變爲衣食無靠的人。革命黨所以要爲農民而奮鬥，就是要把他們從帝國主義、軍閥和特殊階級的侵略當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有土地的人不至於失掉土地，使他們沒有土地的人取得土地；質言之就是要使耕者有其田，就是要農民得到自

己勞苦的結果，要這種勞苦的結果不令別人奪去。農民爲什麼最需要革命，就是因爲不堪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地主等特殊階級的侵略和剝削，以致有土地的失掉土地成爲佃戶，沒有土地的不能生存。他們之所以要爲自身而奮鬥，就是要打破那些侵略和剝削，使他們中有土地的不至失掉土地，沒有土地的能夠得到土地。詳細點說，大部分沒有土地的佃戶和失業的農民，要能夠得到土地，次多數的純自耕農要不至再失掉土地，就是種田的人要自己有田地，不使自己勞苦的結果讓別人奪去。所以革命黨的目的和農民的目的是一致的，革命的利益和農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中國革命要爲農民解決土地問題，已是既定的根本方針，無須再加研究。這裏所要研究的。還是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

關於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依據中山先生的主張和國民黨的政綱，是「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卽是由國家設法將土地收歸公有，由國家授與農民耕種，向農民征收地稅。若單就『土地收歸公有，由國家授與農民耕種，向農民征收地稅』一點說起來，可以說這是各國農工政黨共同的主張，所不同的地方，只在於由國家收回土地的方法。關於收回土地的方法，依

據平均地權的要旨，是：『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由此可知中山先生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是在於必要時由國家收買土地授與農民耕種而向農民徵收地稅的了。

這裏有一個客觀的事實問題應當要考慮的，當農民組織起來參加革命，他們爲了自己切身的利害，以至對於土地發生很迫切的需要時，國家能否拿出大宗的金錢收買許多土地授與農民呢？關於這一點，中山先生未曾明言。實際上中國農運的發展以至於急要解決的土地問題，還是中山先生去世以後的事情。當前年國民革命的勢力發展到長江以後，兩湖的農民運動如春潮怒湧一般的發展起來，做農民運動工作的人，也都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去指導。一般農民聽了這個口號，馬上如實的行動起來，如湖南省長沙附近的幾個縣分，在去年二三月的時候，早就自動的把地主的土地沒收起來，並且均分好了。那時的共產黨也不能指導他們，共產黨之決定土地政策，還是去年五六月間的事情，好像是跟着農民向前跑的。這種情形，雖然可以說是由於共產黨的辦法不對纔釀成的，雖然可以說當時國民黨也擔負一部分責

任，但農民一到起來參加革命，必然是要求土地的，這也是一個大原因。本來農民之中最能跑到革命的前線的，自然是一部分的雇農和失業農民；其次是佃農，再其次纔是純自耕農。純自耕農在革命中的希望，在於不失掉已有的土地，在於免除種種特殊勢力所加的侵略和剝削；而佃農、雇農和失業農民的希望，則在於獲得土地。所以到了他們組織起來的時候，必然是求土地，何况革命黨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來啓發他們呢？兩湖農民在去年那時候所作的超時代要求雖然歸於失敗，而他們的這種要求，仍然存留在他們的腦海中。所以那時以後仍跟着共產黨去暴動。這類農民的暴動，固然是受了共產黨的利用和煽動，但假如他們完全不作取得土地的夢，共產黨要利用煽動也是不能夠的。所以農民到了組織起來參加革命的時候，必然要求解决土地問題，必然要求代表他們利益而且豫約了「耕者有其田」的革命黨給他們的土地。農民本來也和他們所栽種的植物一樣，是好靜而不好動的；但他們若動起來，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也不會靜下來。農民的要求是現在不是將來，他們來參加革命是爲了自身的利益，决不是爲了別人的利益，這是農民的性格，也許是農民沒有受過教育的結果，凡是實際與農民接近過的人，一定能夠了解。若是只給農民豫約劵而不兌現，不如簡截的不用

『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去號召他們，免得他們起來要求兌現的時候，反要加以紅帽子的頭銜而煩勞用革命軍隊去勦滅他們。或者不如更簡截的停止民衆運動，可以免去農民與革命黨的糾紛。但這些辦法，又豈是革命黨的初衷嗎？

中山先生說：『我們現在革命，要倣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納田租，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耕者有其田的意義如此，至於如何使耕者有其田的辦法，中山先生以爲俄國那種急進辦法，在目前不能實行，因爲還沒有預備。他說：『中國的人民本來分作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民，除農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們沒有豫備，就倣效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的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由此可知中山先生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最注重的是豫備，而這種豫備卽是農民的團結。所以他又說：『農民是多數，地主是少數，實在的權力，還是在農民的手內。如果由一省的農民推到全國的農民，都能夠聯絡起來，有很好的團體，農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辦法。政府便可以靠農民做基礎，對於地主要解決農民問題，便可以照地價

去抽重稅。如果地主不納稅，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來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納租到私人，要納稅到公家。』可知中山先生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最注重農民自身的力量，他這裏所說「充公」的意思，就是無條件沒收的意思，不說「收買」而說「充公」，乃是農民自身力量強了以後的例外的辦法。實際說起來，農民自身如果沒有力量，政府就是要照價抽重稅也難辦到；因爲農民不團結，政府便不能靠農民做基礎。

綜合以上的研究，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法，可以假定爲下列七項。

一　土地以收歸公有爲原則，由國家授與農民以永久之使用權，向農民征收地稅；

二　沒收大小軍閥及土豪之土地，但爲資其家屬生存起見，得保留相當之額；

三　純自耕農之土地不沒收，由國家征收同一比率之地稅；

四　地主的土地之收買或沒收，依據農民之需要決定之，在未決定以前，由國家征收累進稅；

五　依據工業發展之程序，勵行農業之社會化；

六　由國家保留若干大土地或新墾之公地，辦理新式大規模模範農場，以爲促進農業社

會化之準備；

七　在土地未經分授於農民之前，由政府辦理土地之整理及調查等事項。

三　中國農業人口之階級的分析

李銳如

一　中國農業組織及其推移的趨勢

我們要進行中國農業人口之階級的分析，首先要說明中國農業組織及其推移的趨勢。不過在這裏應當聲明的，關於中國農業組織及其推移的趨勢的統計材料，本是很不完全的，但我們爲說明起見，却又不能不用這些不完全的統計材料做基礎。因爲已有的統計材料雖不完全，却比較沒有總要好些，而且在這斷片的材料之中，也可以推定中國農業組織及其推移的大概，對於農業人口之階級的分析上，也不至漫無根據。

一　中國的耕地面積　中國全體的耕地面積，據前北京政府農商部的統計，有如下表：

省別	耕地面積（單位千畝）
直隸（北京在內）	九四、三九七
山東	四九、八二一
河南	三四八、二六一（?）

山西	四九、八二一
江蘇	七八、〇四八
浙江	二六、九九四
安徽	四〇、六四六
江西	三六、三一五
湖北	一五四、八八七
湖南	一八、七〇五
陝西	二七、六四三
甘肅	二六、四九九
四川	一二四、八八四
福建	二二、四五七
廣東	一三六、八七七
廣西	八二、四七四
雲南	一一、四七一
貴州	一、四七一
奉天	四四、七四八
吉林	四四、二一六

黑龍江	三五、八七三
熱河	一六、二七八
察哈爾	一一、〇九一
新疆	一〇、七二六
總計	一、五四五、七三八

據右表，全國耕地面積共爲十五億四千五百七十三萬八千畝。

二　耕地面積與農家戶口之關係　耕地之中，分爲栽種五穀的農田和栽培桑麻茶疏菜等的農地二類。茲列舉兩者與農家戶數的累年比較表如下：

年次	農家戶數	農田（畝）	農地（畝）	田地共計（畝）
民國三年	五〇、四〇二、三一五	一、三九四、一四六、四一八	一八四、二〇一、五〇七	一、五七八、三四七、九二五
民國四年	四六、七六六、二五〇	一、三二九、五二一、一九一	一一三、八一八、四九七	一、四四二、三三三、六八八
民國五年	五九、三三二、五〇四	一、三八四、九三七、七〇一	一二五、〇三七、七六〇	一、五〇九、九七五、四六一
民國六年	四八、九〇七、八五三	一、二二八、三六四、四三六	一〇六、八二二、六六四	一、三六五、一八六、一〇〇
民國七年	四三、九三五、四七八	一、二二七、二九七、二九八	九七、一九二、八九二	一、三二四、四七二、一九〇

據上表，中國的農家戶數大約由四千二百萬戶至五千九百萬戶。前年國民黨農民部所調

查的農家戶數爲五千六百萬戶，大致近似；又實行耕種的田地爲十三億畝以上，其未經計入的，大致是荒棄未種的土地了。

三　農業經營的形態　據前北京農商部第六年的統計表，中國的農業經營，以小農爲最多，其次爲中農，茲列其統計表如左：

省區	十畝未滿	十畝以上	三十畝以上	五十畝以上	百畝以上	共計
京兆	一二五、〇一三	一六、五三四	一四八、三三七	一三、八二三	八六、〇八〇	五八七、七六七
直隸	一、三六四、一六五	一、〇八七、一〇九	七九七、四一七	五〇一、六五五	二二六、三一五	三、九六六、七六一
奉天	三三五、九五四	三五七、八七六	四〇一、六三三	三三六、七三一	二五四、四五二	一、六八六、六四六
吉林	五二、四七五	九六、八九一	一〇九、七七五	一三一、九〇一	一五七、八五六	五四八、八九八
黑龍江	一四、九六二	三〇、九九九	五七、九八五	六七、〇九二	一四、三二七	三二四、一五五
山東	二、一〇三、九七〇	一、五五二、六一一	九五七、六四〇	四九七、四一三	三四一、〇九六	五、四五四、七三〇
河南	一、五九七、一六五	一、五六八、九八四	一、五二四、九一六	八七六、七二六	五六二、五二四	六、一三〇、四一五
山西	一六二、七八七	三五九、六八五	三九七、七八〇	三三七、五〇五	一五一、七八九	一、五三九、四四六
江蘇	二、七二六、〇〇一	一、三三三、一六八	四八七、〇一七	一二〇、〇一四	八六、六七四	四、八七一、九八四
安徽	一、一三〇、七七五	九八七、一〇八	三四三、六九二	一〇八、六〇四	一七五、八一五	二、八四六、〇一四

江西	三三六、三三六	九六四、八一九	二、一七四、〇七三	五〇七、〇〇七	六二一、六三三	五、〇六四、八四七
福建	八七〇、六〇九	五〇八、九八八	一六七、〇一五	三三六、七三三	九、〇一八	一、六二一、三五一
浙江	一、六六九、九四〇	九九九、〇四五	三七五、三六九	一五〇、八七八	三九、九六二	三、二三五、二二五
湖北	一、四八五、七〇〇	九九四、六九七	六五一、五三四	三九一、五八三	一四七、二五七	三、六七〇、七七一
湖南	三五四、八六二	三四六、三三一	三八五、九八七	二四四、九二〇	一〇五、七〇七	一、四三七、八〇七
陝西	六一五、八四八	三六八、七七七	一八八、五二九	九八、〇三八	六三、九八四	一、三三五、一七六
甘肅	一六四、九五七	二三一、八一六	一六二、五六八	一二五、七九五	六九、八八一	八六五、一一七
廣東	二、〇八三、二五二	九六二、一〇七	五五四、三三三	二四三、〇四〇	八三、五六六	三、九二五、二〇七
新疆	一五六、五五九	一七七、四八四	六三、七二六	三六、三三一	一七、六六八	四五一、七六八
熱河	一六〇、三〇〇	一九九、一九九	一二六、一四六	九九、七三三	二六、二三〇	六一五、四三七
綏遠	七、六九二	一〇、〇一七	一三、一五八	一五、六九九	一八、〇三二	六四、五九七
察哈爾	三、八三三	一四、三九九	二三、六二七	二九、〇五五	三五、八四七	一二五、四二一
總計	一七、八〇五、一二五	一三、一四八、四七四	一〇、一三二、二二四	五、三三六、三二四	二、八三五、四六四	四九、二五九、七九一

〔附記〕表中湖北湖南廣東之統計不完全，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四省無報告，故未列入。

據上表，耕地未滿十畝的農家，占全體戶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內地各省除山西江西四川雲南廣西貴州六省以外，也是未滿十畝的農家占最多數；其次要算是十畝到三十畝和三十畝

到五十畝的農家了。至於五十畝以上農家，自耕農很少，佃農居多，百畝以上的農家戶數，只占全體農家之數的百分之五。由此可知中國農業的經營是小農和中農的經營占最大勢力。

四　農業經營形態的推移　就農家經營的推移狀況說，大有富農降爲中農，中農降爲小農的趨勢。關於這方面的統計表，我曾經在「土地問題研究」一文中列舉過，（見本書二九七——二九九頁）請閱者對照。據該項統計表看來，自民國六年至民國九年之間，十畝未滿的和十畝以上的農戶，都顯出增加的傾向；此外如五十畝至百畝以上的農戶，除直隸河南察哈爾等處以外，則略呈減少的傾向。像這種十畝以上的小地主和十畝未滿的小農增加的原因，不外下列四點：

一　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

二　中國南部都市的工商業較爲發達，農村因受經濟的壓迫，以引起土地的分裂；

三　內亂不靖，引起富農之中農化；

四　中農不能保持土地，以致化爲小農。

由這種情形看來，這農業經營的推移狀況中，同時又含有耕地所有的推移的趨勢了。

五　耕地分配的形態　全部農業人口中，有田地的究有多少，沒有田地的究有多少，這裏應當加以說明。據民國六年前北京農商部的統計，耕地的分配狀態，有如左表：

省區	自耕戶數	佃農戶數	自耕兼佃耕戶數	共計
京兆	三〇七、八七四	一二五、三四八	一五四、五四五	五八七、七六七
直隸	二、八九〇、八九七	五二三、〇〇三	五五二、八六一	三、九六六、七六一
奉天	六八六、二八一	五〇一、七三一	四九八、六三四	一、六八六、六四六
吉林	三五一、六七六	一六五、〇七九	一二二、一四三	五三八、八九八
黑龍江	一八〇、六九八	八二、〇九八	六一、三六八	三二四、一五五
山東	三、八一九、一三五	七一七、六三二	九一七、九六三	三、四五四、七三〇
河南	三、四五三、五五二	一、五九六、九三七	一、〇七九、九二六	六、一三〇、四一五
山西	一、〇七八、六九七	二三八、六九八	二一二、一五一	一、五二九、五四六
江蘇	二、二三四、二七八	一、五四一、二一一	一、〇九六、四九五	四、八七一、九八四
安徽	一、三一四、三一一	九八三、八八八	五四七、八一五	二、八四六、〇一四
江西	一、七一四、四〇一	一、二四一、二〇二	一、一〇九、二四四	四、〇六四、八四七
福建	五五三、八〇七	五五四、九四一	五一二、六〇四	一、六二一、三五二
浙江	一、〇七三、三八七	一、一五八、七八三	一、〇二三、〇四五	三、二五五、二一五

湖北	一、五六一、一三七	一、三三九、三〇七	七七〇、三三七	三、六七〇、七七一
湖南	二八七、五五三	一、〇〇六、四五三	一四三、七九四	一、四三七、七九七
陝西	七七一、二四七	三〇四、九七五	二五八、九五四	一、三三五、一七六
甘肅	五五六、七八〇	一五一、五五四	一五六、八〇三	八六五、一三七
新疆	三四三、九九八	六二、六〇六	四五、一三四	四五一、七三八
廣東	一、三一六、五〇〇	一、四六三、八六五	一、一四四、八四二	三、九二五、二〇七
熱河	四一六、九六二	九五、一三五	一〇三、三四〇	六一五、四三七
綏遠	三五、三三二	一四、八八四	一四、三七一	六四、五八七
察哈爾	八三、〇九九	一八、八二二	一三、四九〇	一一五、四一一
合計	一四、五八七、五八五	一三、八二五、五四六	一〇、四九四、七二二	四八、九〇七、八五三

「附記」上表中湖北湖南兩省之調查不完全，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四省無報告，故未列入。

據上表，在全體農戶中，自耕農約占百分之五十，佃農約占百分之二十八，自耕兼佃農約占百分之二十二，在福建浙江湖南廣東諸省，佃農多於自耕農，在奉天吉林江蘇安徽江西湖北諸省，佃農要占三分之一。實際上所謂自耕農之中，除三十畝以下者外，不自耕的地主要占居多數。非自耕的地主亦列入自耕農之中，是前北京農商部一種含糊的調查方法，我們應加以注意。

六　自耕農與佃農之消長　在農村經濟破產正在繼續進行的狀況中，自耕農中之中小農降而爲佃農，乃必然之趨勢。據日本東亞同文學會所出版之中國年鑑所載，民國七八兩年自耕農和佃雇的消長，有如下表。

年度	自耕農	自耕兼佃耕	佃農	合計
民國七年	五三%	二一%	二六%	一〇〇
民國八年	四九%	一九%	三二%	一〇〇

上表雖然是一年的比較，而自耕農及自耕兼佃農之減少，和佃農之增加，其比率已是非常可驚。這個原因，天災兵禍固然也有一部分，而資本主義的發展，總不失爲一個主要的原因。比方廣東，佃農之數多於自耕農，卽如自耕兼佃農之數也相差不遠。又如華洋義賑會所發行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把這個原因也解釋了出來，試看下表：

省縣別	調查地總面積（單位數）	所有者家族之自耕地	使用雇農之自耕地	自耕地	佃耕地	發佃之村民所有地	由其他農村地主發出佃耕地
浙江省							

鄞縣	四、七六四	一七、〇	五、六	三二、六	六七、四	三二、一	三五、三
江蘇省							
儀徵	四、一二一	四一、九	一〇、一	五二、〇	四八、〇	一〇、〇	三八、〇
江陰	一四、三九一	二八、七	一、四	三〇、一	六九、九	五八、〇	一一、七
吳江	四、九三一	一九、六	四、二	二三、八	六七、二	一八、八	五七、四
江蘇省農村平均		二九、一	三、五	二二、六	六七、四	四一、五	二五、九
安徽省							
宿縣	二八、八四三	四二、九	七、二	五〇、一	四九、九	三六、三	一三、六
山東省							
霑化	二、八六七	九六、三	三、三	九九、六	〇、四	〇、三	〇、一
直隸省							
遵化	二四、三六九	七一、二	一五、五	八六、七	一三、三	二、〇	一一、三
唐縣	二〇、〇七三	七八、二	四、三	八二、五	一七、五	五、三	一二、一
邯鄲	二五、五〇七	七〇、〇	二七、一	九七、一	二、九	〇、九	二、〇
直隸省農村平均		七二、八	一六、五	八九、三	一〇、七	二、五	八、二

上表雖然是一些零碎的材料，但也可以看出一種傾向來，即是在所謂物質文明比較接近

的浙江江蘇安徽的農村，其自耕則多於佃農，這個原因，或許有大部分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

關於中農減少佃農增多的傾向，還有一點零碎的統計材料可以做參考列舉於左：

（據耕者要有其田）

南通	佃農的百分比
民國四年	五六・九
民國十三年	六一・五
民國十四年	六四・四
崑山	佃農的百分比
民國四年	五七・四
民國十三年	七一・七
民國十四年	七七・六

南通和崑山，是和工業城市相接近的區域，十年間佃農增加的比例竟是這樣，也很值得注意了。

七　耕地所有的實際狀態

耕地所有的實際狀況，依以上各項統計材料，大致可以看得

出來。茲為具體的說明起見，特引用武漢中央農民部所調查的全國有地農民的統計表如下：

	畝數	人數	占有數
(一)小農	一——一〇	四四%	六%
(二)中農	一〇——三〇	二四%	一三%
(三)富農	三〇——五〇	一六%	一七%
小地主	五〇——一〇〇	九%	一九%
大地主	一〇〇以上	五%	四三%

以上的有地農民中，由一畝到三十畝的小農和中農，要占全體百分之六十六，而其所有之耕地，僅占全體耕地百分之十九；土地之集中的狀態，由此可見一斑。

又據調查，中國農家的戶數，約為五千六百萬戶，每戶平均以六人計數，中國的農業人口，共約有三億三千六百萬人；其中有地的農民為一億五千萬，佃農為一億三千六百萬，無地雇農為三千萬，游民為二千萬。這個調查，當然是一種估計，不能說是正確，但是在大體上也不能說是差怎樣遠。至於說到有地農民的土地的分配狀態，和上面所列舉的前北京農商部的統計，又大致不差，所以這裏只得這樣引用了。

以上是中國農業的組織及其推移的趨勢。

二　中國農業人口之階級的分析

基於上述農業組織及其推移的趨勢，再進行農業人口之階級的分析。

農業人口的階級層非常複雜，遠不如工業人口階級區別的明顯，這無論在什麼國家都是一樣，不過中國方面的更爲模糊一些罷了。由上段所述的情形，中國農業人口的階級，大致可以分爲上中下三層來說明。

第一　上層階級　凡是專靠收取佃租或農業利潤過活的人，都屬於這個階級，其成分如左：

一　地主　不論大小，凡有田五十畝以上而專靠收取佃租過活的人都是。

二　兼營農業的地主　過常有四五十畝以上的地主，雇用工人二三人以上自行耕種，每年收穫的結果，除掉開銷工錢和資本的利息外，可以收回其即不自行耕種亦可收得的佃租，可以取得贏餘之利益作爲自己經營農業之報酬(雇農之剩餘價值包括在內。)

三　農業企業家　凡用資本向地主租種大宗土地，雇用工人數人，從事經營農業，每年

收穫的結果，除還納地主的佃租及所投資本之利息和所雇工人的工錢以外，可以收得企業的贏利。這種人在中國各地農村也不少(往往有租種一百畝以上者)，和各國的農業資本家大致相似，不過農耕技術很幼稚罷了。

四　大農　凡自己有田三五十畝而兼租種他人若干田地的人，除了使用自己家屬的勞動以外，更雇用一二工人的勞動，每年收穫的結果，除付出他人的佃租和雇農的工錢外，可以收得自己田地的佃租，更可以收得若干的贏利。這種人和自耕的地主不同，和純粹的自耕農也不同，在自己從事勞動的關係上是和純自耕農相同的，在雇用工人的關係上是和雇人耕種的地主相同的。不過這個階級和中農階級沒有很明確的境界線，最貧的大農，很容易變爲裕富的中農。

第二　中層階級　這個階級的人的所得是自己所有地的佃租、贏利、和勞動報酬三者。

一　中農　有田十畝以至三十畝而用自己的勞動耕種的人，都屬於這個階級。他們的所得，一部分是自己田地所有的佃租，一部分是從事企業的贏利，一部分是從事勞動的工錢。中農和大農小農的界限不甚明顯，他們對於雇農，利害是有衝突的，同時對於土地

的需要却又很大，當着要向地主租種土地或通融資本的時候，又很感覺佃租和利息過重的苦痛，所以又和地主的利害相衝突的。在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幾層的壓迫之下，他們時時感受要失掉土地的危險，因此這個階級的人升到大農或地主地位的很少，降到小農地位的很少，這在前一節的統計表中已經表明過了。

二　小農　十畝以下的自耕農或半自耕農，都屬於這個階級，他們的所得雖也是由佃租贏利和工銀三部分構成的，但是實際上要以自己的勞動報酬爲主體，他們所有的小土地和勞動要具，只不過是使自己的勞動力成爲有用的自然條件罷了。他們很感覺土地的缺乏，很感覺借用土地或資本的佃租或利息過重，和佃農的地位相差不遠。在帝國主義者軍閥土豪重重剝削之下的今日，他們大多數常因失掉土地而淪爲佃農，這在前節統計表中也表現得很明白。

第三　下層階級　專靠自己的勞動過活的農人，都屬於這個階級。

一　佃農　他們的所得，一部分是相當於工銀的租種土地的報酬，一部分是藉幫工或從事手工所得的收入。從他們所得和生活標準說，和雇農相差無幾，和小農却是有區別

的。佃農在全體農業的人口中，差不多要占三分之一，他們租種他人的田地，雖然多少還有點金錢可以憑藉，但很有限，在數重的剝削之下，只要略略出一點亂子，就不能做佃農而至於降為雇農。

二　雇農　這等人是農業勞動者，是純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的佃農差不多是一樣。但是這階級之中也有好幾種區別，有長年雇工、有短期雇工、有計月數的雇工、有計日數的雇工、還有寄食於雇主家中的奴婢等。

三　各階級相互間的共同利害

中國農人口之階級的分析，已如上述，茲更進為說明各階級相互間的共同利害。

一　出租田地的地主和佃耕田地的農民　各階級之間，除了純粹的地主、租地的農業企業家、和雇農之外，有出租土地的地主和佃耕土地的農民。一方面是收取佃租的人，一方面是納付佃租的人。關於佃租的收付，兩方面的利害互相衝突的。

二　雇主與雇農　凡使用雇農的各階級與雇農，幫工的佃農之間，關於工錢的規定，兩方面的利害是互相衝突的。但純粹自耕的中小農，不在其內。

三　農產物的出賣者與購買者　農產物價格騰貴，佃租可以增加，反是佃租卽當減低，關於這一點。凡是收取佃租的各階級，其利害是相同的。不過這些階級之中，中農小農等也以其農業生產能夠供給其家族的消費而有餘者爲限，否則對於農產物價格的高低，和上層階級的利害是不同的，至於農業的無產者（雇農）和半無產者（佃農），他們是農產物的購買者，却希望農產物價格的低廉，和別的階級的利害相衝突。實在的說起來，關於農產物價格的高低，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之於上層階級，其利害互相衝突，中農和小農，卽使有些小的剩餘農產物出賣，也不見得重要。

再就農業和工業兩方面說，關於農產物價格的高低，農業生產者和工業勞動者的利害互相衝突的，但在這個利害衝突中，工業勞動者和農業勞動者一致。那和工農勞動者的利害相衝突的，還是有多餘穀物出賣的地主、農業企業家、和大農；至於一般中小農能有剩餘穀物出賣的還是少數，而且爲量不多，對於農產物價格的高低，不感受多大影響。

四　農業人口與工商業資本家　工業資本家是工業品的生產者，農業人口是工業品的消

費者，其利害是互相衝突的。商業資本家是商品的販賣者，農業人口是商品的購買者，利害也互相衝突。商業資本家用低廉價格收買農民的農產物，農民更以如此得來的貨幣購入商品，一進一出，農民大受剝削。而且商業資本家，往往在收穫之前的青黃不接時代，預先用貨幣定購農民的農產物，其價格更是低廉。這在富裕的農民或地主還不受影響，而在較貧苦的中小農，却要大吃其虧。此外無產或半無產的農民，在購用商品一事上，其所受商業資本家的敲剝，更感苦痛。還有一層，商業資本家所販售於農村的商品多是洋貨，而向農村收買的農產物，又多是販運於外洋的工業原料，這是帝國主義商品破壞農村經濟的媒介，所以農業人口和商業資本家是利害衝突的。

五　農民與貸金業資本家　農業缺乏資金而要借錢經營農業的人，常受貸金業資本家的重利盤剝，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這種貸金業資本家，多是豪紳地主，農民向他們借錢，多以田地爲抵押，往往因債務不能履行而被沒收了田地，這是有地的中小農失掉田地的一個原因。

六　農業人口與帝國主義　農業人口所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可以分爲六項：(一)賠款及

外債之負擔；（二）經濟的掠奪之負擔；（三）帝國主義商品的掠奪；（四）農民副業的衰退；（五）農村生活的提高；（六）農村金融的困難。（說明見拙著「土地問題研究」一文）

七　農業人口與軍閥　農業人口所受封建軍閥的剝削，如苛導雜稅、預征銀糧、勒種鴉片和征收鴉片稅、政府銀行票幣倒帳，以及戰時的犧牲等等。（說明見前文）

八　農民與豪紳地主　農民所受豪紳地主的削剝，如加重佃租和重利盤剝等。（說明見前文）

總括起來說，地主、雇人耕種的地主、農業企業家、大農等上層階級、他們是有共同的利害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的下層階級，他們也是有共同的利害的。所以上層和下層兩個階級，是互相敵對的階級。至於中小農的中層階級，由以上的說明，他們和下層階級大致是接近的，尤其是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和剷除土豪劣紳的利害關係之下，他們毋寧是要站在下層階級一方面。

四　中國農村經濟現狀的分析

余佩我

無疑的，農民問題是目前中國社會問題的中心；一切革命理論的鬥爭，大都也是以農民問題爲鬥爭的焦點。因此，要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第一必先着眼於農民問題；要明瞭中國革命的正確的路綫，最先就要明瞭中國農村經濟的現狀，這是非常必要的！

農民問題的重要，可以從農民的數量及生產方面看出。中國農民的數量，據一九一六年北京農商部調查，計全國農民爲五九、四〇二、三一五戶，平均每戶以六人計算，則中國農民爲三六六、四一三、八九〇人。另據一九二七年武漢土地委員會調查，全國農戶爲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家，約爲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自然這兩個數目都不見得十分正確，但是大致近似；中國農民的數量，當在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左右。至於全國的總人口數，據一九一六年北京國務院統計局調查，爲三七七、六七三、四二四人；但這個統計並不完全，直隸省之承德等十四縣未列入，四川省的一部份，及蒙古亦未列入；所以人口總數，實際當不祇此。另據一九二一年海關的調查，全國人口爲四四三、三八二、〇〇〇人；又一

九二二年郵政總調查則爲四四七、一五四、九五三人。這三個統計中以後者兩個較正確。是則農民的數量，在全國總人口中佔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八十一左右；單是這個數目，已可表示出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了。

其次，在生產方面，誰都知道中國的工業非常落後；中國工業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是非常之低下的。可是農業方面，在世界經濟中却占很重的地位。就主要的幾項農產品來說：茶的產量占着世界的第一位。中國茶的產量，在這幾年來總是占着世界總產額的一半。例如一九一三年世界主要產茶國的產額，計印度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錫蘭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日本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爪哇爲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磅，而中國却占七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磅。棉的產量占世界第三位，世界四大產棉國每年產量的估計，大約爲美國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包，印度四、〇〇〇、〇〇〇包，中國二、〇〇〇、〇〇〇包，埃及一、五〇〇、〇〇〇包，(註：每包約四擔)絲的產量本占世界第一，近年以來，爲日本所奪，占第二位。小麥的產量也占世界第一位。據一九一八年統計，是年世界重重要產麥國的產量（單位蒲式耳約合中國二斗）如下：中國一、七八三、七四〇、一六

〇，美國（冬）五五七、二八七、四二六，及（春）三五七、九〇五、〇〇五，印度三七九、〇三二、九四四，俄國（亞洲）一四三、九九六、〇七四，及（歐洲）二五一、一八〇、三七六，法國二三四、六六六、六六六，加拿大二〇九、八七八、一四四，意國一七六、〇〇〇、〇〇〇。米的產量占世界第二位，據一九一六年的統計，是年世界產米最多的國家的印度，計七六、三三六、九六〇、〇〇〇磅，其次爲中國，計四六、四五〇、〇二八、三一一磅。豆及豆餅的產量，也是占着世界的第一位，每年的輸出，總是千萬擔以上。此外，如毛革、畜類、木材、藥材、菸草等等，產量都很豐富。

如果翻開對外貿易的表册來看，則更可知對外的輸出，幾乎全是農產品。總之，農業生產在全國生產總額中所占的比例，總在百分之九五以上。

就上面農民的人口及生產來看，就可以知道農民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中心這句話，是很正確的。

因爲中國的物質生產非常豐富，所以農民的生活，很容易滿足；這種自足自給的農業經濟一方面阻礙了國內企業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一遇到資本主義先進國——帝國主義的侵

略，就開始崩潰。

在十九世紀初葉以前，數千年來的中國的社會狀況，都是在自足自給的農業經濟狀態之下。但是十九世紀初葉以後，因其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侵入，這一世紀來，特別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是在農業經濟崩潰的過程中；這種農業經濟崩潰的趨勢，在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後，特別是近幾年來，愈趨嚴重。

在這裏應該加一點說明的，就是一般人以爲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是在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以後。其實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遠在鴉片戰爭以前，不過鴉片戰爭以後，侵略成了突飛猛進的趨勢。據英人摩斯所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史所載，在一六八一年，有英船四艘進口，貨物總值爲四二、五九九鎊。這自然還不算什麼，實際上帝國主義對華侵略，開始於十九世紀初期。據同書所載，在一八一七年，單是廣東一省，鴉片進口數值已達四百十八餘萬兩，而是年銀兩出口爲三、九二〇、〇〇〇元。在鴉片戰爭以前，外貨輸入以鴉片爲大宗，年有增加，其數如下：

年份	進口箱數
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	三、二一〇
一八二〇年	四、七七〇
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	九、六二〇
一八三〇年	一八、七五〇
一八三五年	二三、六七〇
一八三六年	二七、一一〇

此項鴉片的進口，國內財源外溢，以致社會經濟開始動搖。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清鴻臚寺卿黃爵滋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中，有：『……外洋來煙日多，另有躉船載煙，不進虎門海口，停泊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海等船，運銀出洋，運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如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塡海外無窮之壑，易此無用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

鴉片戰爭以前，尚且如此；鴉片戰爭以後的帝國主義的侵略，自然更不用說了。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直接從農村中剝削得來的，第一是各項鉅額的賠款。鴉片戰爭後重要的賠款如下：

鴉片戰爭之役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兩
英法聯軍之役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兩
中俄伊犂交涉	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甲午中日之役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庚子八國聯軍之役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第二是鉅額的入超。歷年入超數如下：（單位海關兩）

一八六五年	一、七八九、五三四	一八六六年	一八、四〇一、八六七
一八六七年	一四、四三四、〇二八	一八六八年	一、四五五、五二九
一八六九年	六、九六九、二九六	一八七〇年	八、三九八、四〇三
一八七一年	三、二四九、九一六	一八七七年	五、七八八、八七四
一八七八年	三、六三一、八四八	一八七九年	九、九四六、一六二
一八八〇年	一、四〇九、八六五	一八八一年	二〇、四五七、九〇三

年		年	
一八八二年	一〇、三八七、三八二	一八八三年	三、三七〇、〇〇九
一八八四年	五、六一三、〇七八	一八八五年	二三、一九四、三〇七
一八八六年	一〇、二七二、七五九	一八八七年	一六、四〇三、八二六
一八八八年	三二、三八一、八二六	一八八九年	一三、九三六、五二七
一八九〇年	三九、九四九、〇〇一	一八九一年	三三、〇五六、〇一四
一八九二年	三二、五一七、六七三	一八九三年	三四、七三〇、五〇八
一八九四年	三三、九九八、九八九	一八九五年	二八、四〇三、五〇四
一八九六年	七一、五〇八、五七三	一八九七年	三九、三二七、三六七
一八九八年	五〇、五四二、一八五	一八九九年	六八、九六三、六二四
一九〇〇年	五二、〇七三、六七〇	一九〇一年	九八、六四六、一六一
一九〇二年	一〇一、一八二、三二一	一九〇三年	一一二、三八六、六六六
一九〇四年	一〇四、五七三、九二五	一九〇五年	二一九、二一二、五五四
一九〇六年	一七三、八一三、三四三	一九〇七年	一五二、〇二〇、六七二
一九〇八年	一一七、八四五、〇七五	一九〇九年	七九、一六五、二五三
一九一〇年	八二、一三一、五六六	一九一一年	九四、一六五、七七七
一九一二年	一〇二、五七六、六二七	一九一三年	一六六、八五七、〇一一
一九一四年	二一二、〇一四、五五五	一九一五年	三五、六一四、五五五

年份	數額	年份	數額
一九一六年	三四、六〇九、六二九	一九一七年	八六、五八七、一四四
一九一八年	六九、〇一〇、〇五一	一九一九年	一六、一八八、二六九
一九二〇年	二二〇、六一八、二六九	一九二一年	三〇四、八六六、九〇三
一九二二年	二九〇、一五七、七一七	一九二三年	一七〇、四八五、四七一
一九二四年	二四六、四二七、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一六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九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二六六、〇〇〇、〇〇〇		

這鉅額的剝削，都是加在農民身上。本來自足自給的農業經濟受了這樣鉅大的剝削，自然要開始崩潰了。幾十年來的各種偉大的農民暴動，如太平天國運動、廣東順德的平英團運動、義和團運動等等，都是因爲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以致農村經濟破產；破產失業的農民日多，自然激成原始的羣衆暴動。

促進農業經濟崩潰的速度的，是封建軍閥的剝削。民國以來，在軍閥的鐵蹄之下的重重剝削，以致農業經濟崩潰的形勢愈趨嚴重。尤其是近年因爲戰爭不絕，農村的破壞，更不堪設想。下面的幾個統計，就可證明農村經濟之日就衰落。

第一是荒地的增加　年來全國荒地增加的趨勢，有如左表：

一九一四年　三五八、二三五　八六七畝
一九一五年　四〇四、三六九、九四八畝
一九一六年　三九〇、三六一、〇二一畝
一九一七年　九二四、五八三、八九九畝
一九一八年　八四八、九三五、七四八畝

第二是農產品的減少　米麥等主要糧食在這幾年來的產量減少了很多，雖然因為中國缺之統計；但看了對外貿易中輸出的減少與輸入的增加，就可知道了。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這六年間主要糧食的出口如左：

年份	米		麥		麵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貨量	價額
一九二〇年	三一二	一、〇五九	八、四三一	二五、三九五	三、九六一	一八、二五二
一九二一年	三五	一三三	五、一九四	一六、八八六	二、〇四七	九、三六六
一九二二年	四五	二二二	一、一五一	四、二三五	五九三	三、六五五
一九二三年	六三	二三七	六四〇	二、一七三	一三一	七八三
一九二四年	四二	二二五	一四〇	五四一	一五七	七一四
一九二五年	三五	二二〇	二〇七	八二五	二八八	一、三〇三

進口數如左：

一九二〇年	一、一五二	五、三六二	五	三三	五一一	二、三三〇
一九二一年	一〇、六二九	四一、二二一	八一	三〇二	七五三	三、五〇五
一九二二年	一九、一五六	七九、八七五	八七二	三、〇五八	三、六〇一	一六、七四〇
一九二三年	二二、四三五	九八、一九八	二、五九五	九、〇九六	五、八二九	二七、二三四
一九二四年	一三、一九八	六三、二四九	五、一四五	一七、六九〇	六、六五九	三〇、〇九八
一九二五年	一二、六三五	六一、〇四一	七〇〇	二、六〇五	二、八一一	一四、九〇五

以上貨量單位千擔，價額單位千海關兩

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中國，主要糧食尙且要仰給於國外，農業經濟的衰落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絲茶是主要的農產品，而且在對外貿易上占重要的地位，不幸也日漸衰落。絲類的產額及輸出的減少，有如左表：

年份	所產數量(斤)	價值(圓)	輸出數量(擔)
一九一五年	五〇四、三二八、二四〇	一、九四九、四七六、九九〇	三三七、二八四
一九一六年	五四、五三七、八五一	一九二、二〇五、九五九	三三五、五〇四

一九一七年	三五、八三八、五九六	二〇五、七八〇、八二〇	三〇二、〇七九
一九一八年	三〇、二四九、五五一	一九三、二四〇、三七一	三二九、五五七
一九一九年	—	—	三四五、六〇八
一九二〇年	—	—	二二九、七九九
一九二一年	—	—	二七五、七八九

茶的產量及輸出的減少如下：

年份	種茶戶數	收穫量(斤)	輸出數(擔)
一九一四年	九三五、三三七	七二六、七七〇、〇四九	一、四九五、七九九
一九一五年	一、四八七、五七六	四六九、四三七、一二〇	一、七八二、三五三
一九一六年	九七一、七一四	一九九、六〇一、五四四	一、五四二、六三三
一九一七年	八六八、三一九	一四一、一六五、〇二四	一、一二五、五三五
一九一八年	六四五、八五三	一三二、八六一、四三四	四〇四、二一七

最近十年來的產量統計還沒有得到，但輸出則也是逐年減少。

荒地之增多，生產的減少，固然一部份是由於天災，但這是非常之小的部份；大部份是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封建軍閥的剝削，驅迫成千成萬農民淪於破產，而離開了土地。而且所謂天災，差不多都是『人禍』所引起；例如今年北方的水荒，如果北方當局能夠早爲預

防，如修築河堤等，至少不致像現在那麼嚴重。

成千成萬的農民被迫離開了土地，同時都市裏又沒有工廠可以收容，結果，這羣破產失業的農民，多數流而爲匪，造成了遍地皆匪羣盜如毛的今日的現象。另一部失業的農民，趨向於一種原始暴動的方法，武裝的占據地方，公然與官兵對抗，如北方的紅槍會大刀會等。

這一方面是土匪的騷擾，農民的原始暴動；另一方面，則因農業經濟的衰落——主要的是糧食生產的減少，以致物價騰貴，尤其是糧食價格飛漲。加以時局不靖，戰亂不斷，捐稅繁重，以致商市彫零，中小商人及小手工業者的破產，也和中小農民破產一樣，發展得非常之快。破產失業的人一天天多起來，即是兵匪盜賊一天天多起來，社會秩序一天天的更陷於極度的混亂狀態之中。

這種形勢——農村經濟的破產，社會秩序之極度的不安，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宰割之下，只有一天天地更嚴重化。

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的一點，現在有一部份人甚至外國的一部份學者，以爲中國的農村經濟已經完全資本主義化；這完全是不合事實的猜想！中國農村經濟的現狀，離開資本主義

化不知還有幾千萬里遠！

中國的農村經濟雖然是在崩潰的過程中，但是現在主宰着農村社會的，無疑的依然是封建勢力。我們無論跑到那一個農村，或是內地的城市中去看，就可以知道，在這些地方，封建勢力是唯一的統治者。代表封建勢力的豪紳地主是地方上的皇帝，他們是用一種最殘酷的方法，剝削一般農民。他們可以任意制定法律，任意屠殺反抗自己的人。

本來，農村經濟的衰落，是封建勢力衰弱的象徵。但這裏有一個事實應該認識：在帝國主義破壞農村經濟的侵略的發展過程中，一方面是中小農民的破產，成羣的離開土地；另一方面是土地集中於少數地主之手，而這代表封建勢力的地主階級，很快地投降於帝國主義。所以目前的農村爭鬥，是反帝國主義，也是反封建勢力。應該認識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農業經濟的崩潰，是小地主及一般自耕農的破產，並不是整個農民份子的沒落。——地主階級的勢力，在目前農村鬥爭沒有發展到相當程度的時候，並沒有衰弱；反而是更加強，更加反動了。

再來檢閱農民鬥爭的方法，也可以知道離開所謂『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還很遠。目前

的農村鬥爭，雖然很普遍的發展，但大部份是沒有脫離原始暴動的領域。例如北方的紅槍會等，無疑的是破產農民的集團，但是他們的鬥爭方法完全是原始的暴動。所謂意識的覺悟，在他們主觀上是完全不懂得的，他們所恃爲鬥爭的武具的，還是畫符念咒——在客觀上自然是羣衆的集團的力量。

現在的農村鬥爭，在客觀上，主要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要求取得土地——不僅現在的農村鬥爭如此，幾十年來，中國的農民的暴動，例如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平英團運動，都是如此。太平天國運動是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以致破產的農民之最初爆發的原始暴動，這個運動雖然以滿清政府（封建勢力的代表）爲對象，同時對於帝國主義也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不管太平軍的將領表示對外親善，而客觀上無疑的是反帝國主義的，所以帝國主義要幫助滿清政府襲擊太平軍。至於太平天國運動的反封建勢力色彩，自然更明顯——雖然太平天國運動自身帶着許多封建宗法的色彩，但這是原始運動的本色；太平天國運動的反封建勢力性是非常明顯的，這在曾國藩討粵匪檄中指示得很明白：『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

（按即指太平軍）……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農不能自耕以納稅，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觀此，可知當時封建勢力者是如何痛恨太平軍。至於義和團與平英團之反帝國主義性，自然更不用說了。義和團運動雖以『扶清滅洋』相號召，但決不能說是忠於封建勢力，反之，義和團運動也是反要封建勢力的。義和團勢力發展的地方，官僚地主很受他們壓迫這一點就可知道。至於『扶清』原不過是爲滅洋，客觀上是鬥爭中的一種策略。至於歷來的一切農民騷動，都是爲爭取土地，這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爲騷動的起因，是沒有土地的農民所激起。太平天國運動的中心意義，是爲解決土地問題，這是鐵一樣的事實所證明：起初太平軍所過的地方，無條件的沒收土地，後來又頒佈『天朝田畝制度』。田畝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也。……』目前各處的農村鬥爭，雖然用各種不同的形式發展，但主要的對象也是一樣。但是這種鬥爭的

前途是怎樣呢？是建設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還是朝着非資本主義前進？這是目前理論爭執的中心。

要答覆這個問題，必須先檢查農民運動的現狀。

現在的農村騷動由三種不同的形式發展開來：一種是帶有很濃厚的宗法神祕色彩的原始武裝暴動，如北方的紅槍會等；一種是有組織有步驟的反抗運動，這種運動在南方各省普遍的發展，主要地是廣東和兩湖；還有一種完全是土匪。

這三種不同的騷動，在形式上雖然各有各的特色，而實質上，都是破產的農民。同樣破產的農民，所以用三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原因是各有各的特殊背景。不過因爲其成分同樣是破產的農民，所以雖然在目前因爲各有各的特殊背景，而用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結果，這三種不同的騷動會趨向於一條路的。

北方的紅槍會——紅槍會一類的名詞很多，有綠槍會、黃槍會、黑槍會、藍槍會、白槍會、天門會、孔明會等等，不過名稱雖不同而性質是一樣的，所以這裏統指爲紅槍會。——這幾年來發展得很快。牠的祖先本來是白蓮教一派，年來因爲北方的戰爭，以及駐軍的過度

的剝削，使農村經濟破壞不堪，農民忍無可忍，於是挺而走險，紛起武裝自衛。紅槍會的組織，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普遍地在北方發展起來。紅槍會的任務，最初是武裝自衛，反抗軍隊。

紅槍會的普遍的發展，是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奉直戰爭以後，尤其是在河南發展更普遍。因為第二次奉直戰爭結果，北方各省尤其是河南各地蹂躪不堪。戰後河南駐軍的紀律，又非常之壞，所以紅槍會的組織就風起雲湧，當時豫南和豫東一帶，常常有幾萬乃至幾十萬的紅槍會羣衆與當地駐軍武裝衝突，往往有成團成旅的軍隊被紅槍會繳械。一九二五年吳佩孚之所以能夠東山再起，長驅入豫，重要的原因是由於紅槍會的幫助。當時河南的駐軍足足有二十萬，而吳佩孚的基本部隊則不足二萬；如果沒有紅槍會的幫助，決不能取得河南。紅槍會的力量，在這裏就可以看出來了。紅槍會幫助吳佩孚打倒河南駐軍，是因為河南駐軍剝削他們。可是吳佩孚來了以後，還不是一樣？而且比原定的駐軍更壞，所以紅槍會又起來反對吳佩孚。起初是抗捐，豫西的新安、宜陽、洛甯、登封、偃師各縣反抗尤烈，後來終於在許多地方與駐軍發生武裝衝突，繳了不少軍隊的械，終於使吳佩孚不能在河南立脚。

在直隸、山東以及山西之一部份，紅槍會的勢力也很發展，常常與駐軍爲難。

紅槍會雖然是一種封建色彩很濃的集團，但是牠的動機還是革命的。封建宗法的色彩，是一切沒有脫離原始運動領域的本色。然對於帝國主義亦可給與以莫大的打擊。

關於第二種方式的運動，自然是北方的原始運動進展了一個更高的階段。這一種農民運動之盛大的發展，始於五卅運動及香港罷工。

香港罷工經過了十八個月之久。這十八個月的對香港帝國主義的封鎖，不僅使香港每天受數百萬元的損失，不僅使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威望因而動搖，最偉大的意義，是啓發了南方諸省的盛大的農民運動。

香港不僅是中國西南五省的一個總口岸，而且長江一帶，甚至西北一部份的原料也要從此出口，最重要的自然是西南諸省。十八個月的長期封鎖的結果，這幾省的原料不能出口，外貨也不能進來。這一個結果，使農村經濟開始鉅大的變動。在中國農村中，尤其是在與國外貿易最早的廣東的農村中，地主買辦階級頗占優勢。這班地主買辦階級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媒介，他經手收買原料運到外國，又經售外國運來的工業品。他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中得到一筆利潤，所以他的利益完全是和帝國主義一致的。他一方面為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利器，使一般農民破產，一方面收買其土地。十八個月封鎖的結果，這班地主買辦階級首先受到嚴重的打擊，他們平常的利潤收入完全失去了。因此他們不得不在土地方面加重對農民的剝削。偉大的羣衆運動已經誘發了農民的火一般的革命情緒，加以地主買辦階級的嚴重的剝削，自然益發促進農村革命的爆發。南方的農民運動，就是這樣，以廣東為中心，普遍的發展於各省。因為北伐軍的勝利，使農民運動發展得更快。

這兩種運動的方式顯然是不同的，這原因很容易明白。農民因為經濟條件的關係，沒有獨立的階級意識，不能成為一種中心的領導力量。更具體的說，農民運動必須在城市革命運動領導之下，方能走入正軌。沒有城市革命勢力的領導，總不能脫去原始運動的色彩。北方農民運動之所以由原始運動的方式發展起來，固然一方面是因為北方的文化程度較南方的低下，而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北方城市革命勢力的發展不及南方。南方農民運動之所以由最高的形式發展，決不是因為南方人聰明，而是因為南方的城市革命勢力較北方發展。

北方的農民運動雖然比較落後，可是決不是永久的現象。南方農民運動的發展與北方城

市革命勢力的發展，可以影響北方的農民運動，發展到與南方農民運動一樣的程度。事實明確的證明了靠近武漢的河南之確山信陽一帶以及靠近天津寧山的津東各縣的農民運動發展，較北方其他各地有顯著的進步，就是一個實例。

至於第三種方式，完全是土匪。自然我們決不能像封建勢力下的道德家那樣，板起了面孔來咒咀土匪，土匪不過社會現象中的一種。牠的本身就是破產的農民。這種份子雖然目前沒有自覺的意識，但是革命運動的發展，他們必然的而不是也許的要捲到革命的隊伍裏去。所以總括起來，這三種不同的運動，實際是只有一種。而一種運動的發展，無疑的必然的要在城市革命勢力的領導之下。在這裏，我們可以很明白看出農民運動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的，因爲城市革命勢力之中，工人階級自然是主要的成份，這一種革命勢力的發展，無疑的是朝着民生主義的路前進。

中國農村經濟的現狀，就是這樣：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封建勢力的剝削，使農業經濟崩潰的危機，日甚一日的嚴重的發展；農村革命之發展，將由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而轉入於民生主義的前途。」

第三編　資本問題

一　中國經濟之路

孫　愈

一

中國的政治改革，將把中國的國民經濟引到那一條路上去，這是革命的人們最要注意的問題。現在解釋主義的人們所預許於我們者，固然盡善盡美：自『家給人足』一直『到大同共產社會』，據說，都可經這次革命依次而實現。

以我們看來，一切關於中國經濟前途（民生問題）的主張和期望，一定要根據現代經濟發展的趨勢。離開經濟事實，對於中國將來的經濟制度，專憑個人心願，發爲主張，這雖然不失爲一種理想，但是於人民生活，是不會發生影響的。況且世界上那許多的主義與制度，都各有一定的特徵，不能兼收幷容，更不能倣照『三教一道』之例『治爲一爐』。這是一點。還有一點，一定的經濟制度是和一定的政治制度，相爲表裏的。一定的經濟制度，需要一定的政

治權力的分配。如果政治上人民沒有自由，經濟上的自由，豈非夢想？如果行爲上把民權人權，剝削淨盡；而口裏却標榜社會、共產、世界、大同主義、這徒然是搖惑民衆的意向，增加無窮的糾紛。

二

中國的國民經濟，到底向那一條路上去，這個問題，應當用兩個標準去判斷。第（一）是中外經濟發展的趨勢——經濟事實。無論我們說什麼高尚的主義，抱什麼完美的理想，如果違背經濟事實，那些主義，便都是妄想。第（二）經濟趨勢經濟制度，在相當範圍內，是可以用人力改變或轉移的。然而打算改變或轉移經濟趨勢與制度，一定有相當的政治力量。民衆的政治力量，便是改變或轉移經濟趨勢與制度的唯一力量（一面高唱主義，一面不要民衆，當然是不可解的矛盾）。我們應當測驗現在的與將來的民衆的政治力量，是否可以改變或轉移經濟趨勢與制度。且改變或轉移到何程度。經濟事實的根本原則，是絕對不能改變的。同時，以人力支配經濟事實，轉移經濟趨勢，改造經濟制度，是我們將來主要的努力。

中國現代的國民經濟，有三個主要的問題，就是：

一　工業化問題

殖民地的經濟特徵，是祇准產生食品和原料，不准發展工業。所謂『殖民地』，在經濟上講，是工業先進國的附庸，原料的府庫與熟貨的銷場。而殖民地求得獨立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正是工業化。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否往工業化一條路上去的，這是第一個要解答的問題。

二　民族的工業

中國如果工業化，這工業是中國人自己所支配，還是在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標語之下，成爲各帝國主義者公共的投資市場？在第二個場合下，表面上或保有獨立國家的資格，然而實際上，中國的政治，必然受各國的支配，換言之，仍舊要保持原有的半殖民地位。如果中國的工業是外國人管轄的，則中國的政治必爲外國人所支配，決不容疑；工業國際化與半殖民地化，是有連帶關係的。而中國到底能否建起民族的工業，這是第二個要解答的問題。

三　勞苦民衆的利益

中國若能建起民族的，完全受本國人支配的工業，這工業的發展，和相關聯的經濟進步，於中國的勞苦民衆有什麼影響？中國的勞苦民衆，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可以得到什麼利益？這是第三個要解答的問題。這個問題，關係方面較多，暫不論述，本文先解答第一個與第二個問題。

四

關於第一個問題——中國工業化問題——我們要知道，所謂『工業化』有一定的意義，並非泛指工業進步而言。任何經濟落後的殖民地，都要漸漸採用機器，改良生產方法，但這祇能稱爲『工業發展』，不能稱爲『工業化』。所謂『工業化』者，是一國在世界經濟上，工業的需要，趨向自給之境，漸漸脫離爲工業先進國作原料府庫與熟貨銷場的地位。所以，所謂『工業化』，一定要以世界經濟作衡量的準則，要以一國對外的經濟關係判定。

中國在世界經濟的關係上，到底是向着『工業化』的方向走，還是向着『殖民地化』的方向走，這要在工業上和國際貿易上求得徵候。

在工業上，機器的應用，可算是工業化的一種徵候。據德國機器工廠協會作給國際聯盟的報告，歐戰前（一九一三年）和歐戰後（一九二五年）工業後進各國購置的機器，有以下的價值。

購置機器的價值

國別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五年
拉丁美洲	一七九、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五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	五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六二、〇〇〇、〇〇〇
中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
英屬印度	六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澳洲	七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

以上的數字，是專指由英、德、美三國所購買的機器而言，全世界所造的機器，英、德、美三國約佔百分之八十五，所以由三國所購買的機器數量，大致可以表示所有新置機器的數量。雖日本、印度、澳洲、都已自造機器，實際上該三處所新置的機器，不止此數；但自造機器之數有限，上面的數字，正可以表示機器應用的大概了。

依上面的數字，以日本、中國、印度三國比較，日本的工業化，在機器應用上表現得很明顯；印度的機器應用，也在歐戰後有相當的緩慢的進步（歐戰後機器的售價已高漲甚多），而中國則居日本與印度之間。

重工業基礎是煤與鐵。中國和其他幾個工業後進國石煤與生鐵的生產，有如下所示：

一　石煤的生產

國別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五年
日本	二一、三一六、〇〇〇噸	三一、四五九、〇〇〇噸
中國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〇〇〇
英屬印度	一六、四六八、〇〇〇	二一、二四〇、〇〇〇
澳洲	一二、六一七、〇〇〇	一四、七三九、〇〇〇

據此表，中國在石煤的生產上，表示長足的進步，在各煤鑛中，以英日資本支配的開灤撫順的產額最大，其一九二五年的產額佔全國百分之四十。

生鐵的生產（一九二四年）

日本	三五六、〇〇〇噸

中國	三八一、〇〇〇
英屬印度	五五八、〇〇〇
澳洲	三〇五、〇〇〇

但是在農業國的中國，以及在一切工業後進國裏，煤鐵業並不能作工業發展的標準；而紡織業代表工業的狀態，則較爲正確。以下是中國和幾個工業後進國紡織業的比較：

中國和其他工業後進國的棉紗錠數。

國別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六年
日本	二、三〇〇、〇〇〇錠	五、五七三、〇〇〇錠
中國	八四四、〇〇〇	三、四二六、〇〇〇
英屬印度	六、〇八四、〇〇〇	八、五一〇、〇〇〇
巴西	一、二〇〇、〇〇〇	二、四九三、〇〇〇
墨西哥	七〇〇、〇〇〇	八三〇、〇〇〇

由上表，可知中國的紡織業，在歐戰時及歐戰後曾有長足的進展。這紡織業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外人經營的。紡織業如此，其他工業，情形相類。在國際資本之下工業化，這是半殖民地的一個特徵。

五

以上是由工業方面，解答本文的第一個問題。然而欲解答此問題，在國際商業方面，也可找得明顯的標識。我們要知道，殖民地、半殖民地、獨立國、在國際貿易上，各有一定的特徵。先就殖民地論，牠是由『母國』用來作原料採集地與熟貨銷售場的。所以，母國爲長久剝削殖民地計，一定要用種種方法，防止殖民地的工業發展。凡母國對於殖民地的政策，都是如此，而現代最彰明顯著的實例，莫過於英屬印度。『母國』英國經營殖民地印度的方法，固然是以武力與陰謀抑制印度的民衆，一面挑撥印度各宗教間與各種族間的鬥爭，一面用軍警的暴力鎮壓，然而最重要而有效的方法，還要算是防止印度工業的發展。在歐戰期內，爲應付一時的需要，印度的工業，特別是紡織業，雖然也曾經相當的擴充；但是歐戰之後，英國仍是勵行牠傳統的防止印度工業化的政策以保持印度的殖民地性。英帝國主義者看清印度工業化的結果，是養成印度的反抗力，所以用種種方法防止印度的工業化。因此印度在國際貿易上的表現，永遠是輸出原料食品，輸入熟貨；兩種的比例，雖經過歐戰中劇烈的經濟變化，迄未改變。同時，印度的輸出與輸入的貨量，幾乎未見增加，這就證明工業進步停頓的

國，國際貿易也是停頓的。其實，不止國際貿易，被剝削的，集合無數農村而成的殖民地，決無發展經濟的可能。

中國現在的國際貿易，是不是有與印度同樣的趨向？中國國際貿易的數字如下：

輸入(單位海關兩)

年別	輸入價值	輸出價值
一九一三年	五、八六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一九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九、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八四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九、四八六、〇〇〇、〇〇〇	七、七八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一〇、三九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九二七、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九、六五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九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一一、四四六、〇〇〇、〇〇〇	八、六四三、〇〇〇、〇〇〇

據上表，輸出入的增加，在數字上約為一倍。然而若顧慮這時期幣價的低落，則輸出輸入的貨量，皆大致增加百分之五十。這是與殖民地對外貿易不同之點。殖民地之對外貿易，為母國所壟斷，殖民地的工業，受母國的故意的有計畫的防止與破壞，不使發展，所以殖民

地對外貿易，進步遲緩。中國情形，則不盡然。固然，英日帝國主義者之希望，也無非使中國成一個純粹的殖民地，作他們的原料採集地與熟貨銷售場。不平等條約的種種特權，其主要目的，即在於是。但中國國際貿易，據以上所述，確不斷的逐年增進。以日本、印度、中國、相互比較(是把幣價低落折算後)，則歐戰以後，日本的國際貿易，增加一倍，印度幾乎未有增加，而中國則增加百分之五十。三國都是工業後進國，這個差別，就很可以表示三國政治地位的不同。而印度與中國之異，是反映着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之分。

半殖民地的特徵，是受許多強國的剝削，與殖民地之專供奉一個母國者不同。於此，我們又可舉印度爲例，以明殖民地之性質。印度的國際貿易，幾乎是英國獨占的。雖然經過歐戰後世界經濟的大變化，日本與美國部份，略有增加，英國部份略有縮減，但是比較起來，英國在印度對外貿易上，仍舊占主要位置。以輸入論，日本美國往印度的輸入，合併起來，僅佔英國往印度的輸入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這足以描寫母國與殖民地的關係。

中國的情形，則與此殊有不同。半殖民地是受列強共同剝削的，是在列強相互競爭之下而被剝削的。把這個事實繙譯成國際政治的公用語，便是所謂『開放門戶』『機會均等』。『開

放門戶』『機會均等』，便是大家在相等條件之下，共同剝削、公平競爭、不使任何一國壟斷。在共同剝削、公平競爭之下，那一國可以佔取優勢，多分利潤，就要看牠工商業的實力如何。而時代遷移中，各國內部經濟變化的結果，自然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上，其勢力是互為消長。

在中國對外貿易上最重要的英、日、美三國所佔的地位，其近年變化之劇，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惟中國海關統計，是把香港與各國並列的。香港來去的貨物，不能知其從何處而來，向何處而去，這是向來中國海關統計的一個大缺點。在香港的商業上，英國當然占主要地位；但香港與中國各口來去的貨物，美國部份究占若干，是我們無從知曉的。

雖然有這層困難，近年的變動，也很可以由統計的數字看得清楚。英、美、日各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上所占成份，有如下表：

輸入（單位百萬海關兩）

國別	一九一三	占輸入總額百分之幾	一九二四	占輸入總額百分之幾	一九二五	占輸入總額百分之幾	一九二六	占輸入總額百分之幾
英國	九六、九	一六・五	一二六、〇	一二・一	九三、一	九・六	一一六、二	一〇・二

美國	三五、四	六・〇	一九一、〇	一八・四	一四二、五	一四・八	一八七、六	一六・四
日本	一一九、三	二〇・三	二三四、八	二二・六	二九九、八	三一・一	三三六、九	二九・四
香港	一七一、六	二九・三	二四三、九	二三・五	一七六、三	一八・三	一二四、四	一〇・九

輸出(單位百萬海關兩)

國別	一九一三	占輸出總額百分之幾	一九二四	占輸出總額百分之幾	一九二五	占輸出總額百分之幾	一九二六	占輸出總額百分之幾
英國	一六、六	四・〇	五一、〇	六・四	四八、三	六・一	五五、九	六・五
美國	三七、九	九・〇	一〇五、三	一三・三	一四七、一	一八・五	一五〇、一	一七・四
日本	六六、八	一五・九	二〇六、一	二六・〇	一八九、八	二三・九	二一一、七	二四・五
香港	一二五、二	二九・九	一七八、八	二二・六	一一八、二	一四・九	九三、八	一〇・九

以上最可注意的，是香港在中國國際貿易上地位的暴落。以輸入論，由一九一三年百分之二九・三，至一九二六年落到百分之一〇・九，祇殘留歐戰前原額的三分之一，這完全是省港罷工的影響。此外，英國的部分，也由一九一三年百分之一六・五至一九二六年落至百分之一〇・二，減少原額的三分之一，其原因大半在中國自五卅沙基慘案以來的反英運動，小半在英國本身經濟的不振。日本與美國各有極強烈的增加。美國由一九一三年百分之六至

一九二六年增至百分之一六・四。日本由一九一三年百分之二〇・三至一九二五年與二六年增至百分之三十。輸出上的變動，大致相同。一九二七年尚無正式的數字，但據各方調查，則英國的部份又大有縮減，香港大有增加，日本與美國亦各有增加。

總之，由以上的觀察，可以斷定英國在華經濟地位的根本搖動，可以斷定在一定的情形之下中國能以政治與經濟的力量，決定香港的經濟命運，可斷定美國日本已代取以往英國在華的優越地位。各帝國主義者一面以不平等條約共同阻礙中國的工業化，一面在這機會均等的條件之下，共同剝削、相互競爭，因此演成各國勢力的相互消長、相互遞嬗，這是中國半殖民地的又一特徵。

六

中國一向是入超的國，同時是沒有對外投資的國；所以中國的入超，要每年輸入外資抵補。這入超額數，在一九一三年有二萬六千萬元、一九二二年有五萬萬元、一九二三年有二萬八千萬元、一九二四年有四萬二千萬元、一九二五年有三萬萬元、一九二六年有四萬九千萬元；這些巨額的入超，除一小部份由華僑匯款等項抵補外，大部份是要輸入外資清結的。

輸入外資的方式，多半是用以擴充外國人的經濟支配權與政治支配業權。中國新式工業，大半是外人經營的。束縛中國最甚的所謂最惠國條款，在新訂的協定裏已經沿例承認。所謂最惠國條款，用於現在的中國，祇是確定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是『開放門戶』『機會均等』在條約上的表現，在最惠國條款普偏維持之下，中國人自營的工業，很少有建立與發達的可能。

由以上的觀察，可以知道：

一　中國的工業，據近年的事實，已在開始發展。中國的工業化，是很可能的事。

二　在中國的國際貿易上，也表示出與純粹的殖民地不同之點。中國的國際貿易，不是爲一國所壟斷的，而列強所占的成份，時有變化。

三　但無論在工業上，還是在國際貿易上，都明顯的表現出中國的半殖民地性。中國的工業，大半是外國人經營的。中國的國際貿易，其作用是作各國的原料採集地與熟貨銷售場。

四　半殖民地的特徵，是列強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標語之下，一面共同剝削，一面相互競爭。因此各國在華的勢力，互爲消長。『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在條約上的

表現是普徧的最惠國待遇。

五　最惠國條款，是構成各帝國主義者聯合戰綫的樞紐。在帝國主義者中最凶惡的一個未放棄其在華特權以前，其他帝國主義者得根據最惠國待遇的條款，利益均霑。

六　在中國對內未眞正統一，對外未將帝國主義者中最凶惡一個打倒之前，中國很難建設起由本國人管轄的工業，而新興的工業必完全爲國際資本所支配。這些爲國際資本所支配的工業，將來必完全操縱中國的政治，而中國半殖地地位，乃無從脫免。故中國欲建起民族的工業，祗有與帝國主義者中最凶惡的一個作不間斷的激烈的鬥爭，直至完全取消其在華的特權。

二　由中國社會的現階段說明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

薩孟武

小引

甚麼叫做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換句話說：「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而實現「經濟地位平等」。

如何而能達到這個目的？

用「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個方法。

這兩個方法，是馬上推翻私有權制度，把一切土地和資本，盡集中於國家麼？抑或漸次進行，一步一步的接近於最後的目的呢？

是漸次進行的，所以　總理說：「我們實行民生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喫飯問題，對於資本制度，祇可以逐漸改良，不能夠馬上推翻。」關於進行的步驟，我在新生命月刊第二卷第一號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一文中已有詳細說明了，而周佛海同志在第二卷第三號中國經濟問題

之三民主義的考察一文中，亦把民生主義實現的步驟，分做三期：第一期是私營工業爲主，國營工業爲副；第二期是私營國營同時幷重；第三期是國營工業爲主，私營工爲副。

反動的主張！右傾的主張！妥協的主張！有了這個主張，最少要把民生主義的最後的目的，延期到半世紀之後，才能實現了。

急性兒不要急性。經濟組織的變遷，是隨歷史的進行，漸次發展，不能突然使其變動，更不能用人的暴力，促其造成。時機未到，雖然犧牲了無數的人命，而犧牲者的血和肉，也不能培養出共產主義之花。時期已到，雖用暴力壓迫，而共產主義之花，亦必自然而然的開放出來。所以總理說：「純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釋經濟問題。」我現在試說明其理由如左。

一　中國社會是甚麼社會

社會的發展，是有一定程序的，若據各國經濟史所示，則社會的發展過程，大約是由原始共產社會，進爲奴隸社會、農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才達到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我們要知道中國此後的經濟組織，不可不先知道中國現在的社會情形。本刊(新生命月刊)近來

多發表關於中國社會的文章，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中國現在的社會，是屬於那一階級的社會？若綜合各種學說看來，可以分做二種：第一主張中國自秦以來，便是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第二主張中國到了現在，還是封建社會。第一說的錯誤，在於誤認交換經濟就是商業資本主義。其實，交換經濟的目的，在於有無相通，長短相補；商業資本主義的目的，在於增殖資本。若用公式表現出來，則二者區別，如次：

交換經濟 { 第一種物物交換時代：W(貨物)——W(貨物)
第二種以貨幣為媒介而行交換的時代：W(貨物)——G(貨幣)——W(貨物) }

商業資本主義：G(貨幣)——W(貨物)——G，{ G(原本)
g(利潤) }

第二說固然不十分錯，但我們也不能滿意。其中比較的可以使人滿意者，則為E, Varga的主張。Varga在一九二八年上半期世界經濟年報一書中，說明現在中國是以單純再生產為基礎，其中含着許多封建的要素，而屬於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他雖然主張中國現在的社會，還含着許多封建的要素；但同時他又指出中國現在的封建構造，又與歐洲中世的封建制度，

不同。他說：

『歐洲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是土地支配制度與農奴制度。土地支配制度，是領主由君主領受土地，而代代世襲之。但領主所得的土地生產物的分量，不是由領地的面積而定，乃是由農奴的人數而定。所以他們對於土地的支配，不是決定的，而對於勞動力的支配，則才是決定的。因此他們所登錄的，不是領地的畝數，乃是人的口數！……

『但在中國，却完全不同。封建制度固有的經濟的基礎之土地支配制度，雖然曾存在於過去；但因爲過去各種的農業革命，早已完全破壞了。所以地主對於勞動力的支配，不是固定的；而對於土地的支配，則在中國本土，自遠昔以來，即是決定的。……在這個地域之內，老早就沒有像歐洲封建那樣的土地支配制度和農奴制度。

『爲免去誤解和曲解起見，一言以蔽之，中國雖有大土地私有，但却沒有土地支配制度。雖然在中國亦有以地租而生活的階級。但其地租，多數還是現物地租，這與封建的支配地租，亦不相同。且在中國的土地所有，又當細分爲數塊，用貨幣而行買賣。受到地租的階級，與歐洲封建制度土地支配的貴族不同，就是不是特權階級，而是與商人

階級和高利貸階級，有密切的關係。人們由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而得到的利益，與因爲供給國家使用而蒐集起來的財產，自古以來，常投於土地之上。只要有了貨幣，便可求得土地，或加入地主階級的隊伍。這種情形在歐洲封建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

『現今中國雖然尚有農奴制度，但這個農奴制度却不帶有眞正封建的性質。其經濟的本質，不像封建制度那樣，領主——他雖支配許多的土地，但他所支配的勞動力，却是很少，——用暴力，把勞動力束縛於土地之上。在中國因爲勞動力的過剩，所以不要採取這個強制。中國的農奴制，是由下述的事情而發生，即窮貧的佃農，因爲土地的缺乏，乃束縛於地主；又因爲常向地主借債，以致於本來的地租之外，不能不以工資的大部分，歸於地主。由是在事實上，遂把自己的身分引渡於地主，而舉其全部身靈，隸屬於地主。但是這對農奴制度之經濟的基礎，又與眞正封建的農奴制度有別；在某種意義上，且可說是相對立的經濟的基礎。』

E, Varga 把中國現在的封建制度的特徵與歐洲的封建制度區別了之後，又接着說道：

『我們現在再回來講歐洲及中國的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歐洲的農業，是乾燥農

耕，故其各個的土地支配，可以明白的與鄰接地區劃境界線，而有獨立的可能。反之，中國農業自古以來，即以灌漑農耕爲主，因此，水利經濟之組織化，是死活問題。這個水利經濟，只有集合大小的地域，共同協力，而後才有可能性。……所以雖含有封建的要素，但其性能又與歐洲的封建制度不同。故而歐洲封建制度的國家與中國比較起來，其國家的機能亦有很大的差別。在封建時代，本來沒有國家這個機關的。國家是分割爲個個土地支配制度，其封建的領主，則常領率其軍隊，於統治者指揮之下，而作軍事行爲或互相戰爭。行政司法便是土地支配制度的機能。反之，在中國，則國家的機能，乃擴張於全部領域之上——就是配給全部領域內的米，組織幷監督最重要地方的水利經濟等。因此，所以中國又有官吏這個特殊階級；他們受過考試，而爲帶有封建性質而又具有學識的官僚貴族階級。但是歐洲的封建領主，則普通大約不會讀書寫字，他們除土地支配制度之外，對於國務，幾乎是不放在心上的。』

Varga 區別出兩者的特徵之餘，對於中國現在的社會，又斷定爲有二種特徵。

『第一，中國之社會制度，現在還是由前資本主義的制度，繼續轉換爲資本主義的

制度。但是這個轉換過程，不是由於土民自己來發展，乃是在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影響之下，而進行的。就是當中國社會轉換為資本主義的時候，同時又使中國屈服於外國資本之下，而轉換為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

『第二，這個轉換又行於資本主義沒落的時候。就是資本主義在地球上，已經傾壞其一部。而帝國主義者在世界市場上，又因為爭奪販路，而作鬥爭；由這鬥爭，又謀世界的再分割，而將爆發為新戰爭的時候。』（參看樊仲雲同志編的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第一章）

Varga 這樣的解剖中國社會，我是很同意的；所以我暫借Varga之筆，以說明中國的現社會。

總而言之，中國的社會，是在資本主義將次沒落的時候，因受帝國主義的壓迫，由封建社會，而過渡為資本主義社會。

二　中國經濟的現階段

中國社會，既然包含了封建的要素；那末，中國經濟的現狀，自然可想而知了。關於中

國經濟的現狀，在新生命月刊上，已有很多人用數字說明，現在可以不必再提。其應當鄭重說明者，則爲中國的經濟，還是地域經濟，而非國民經濟，我們不看別的，只看下列各項事情，便可知道。

一　各地有各地的貨幣；

二　各地有各地的度量衡；

三　各地有各地的風俗習慣；

四　各地有各地的關稅障壁。

以上各項，我們不必說明，一切事實已經排在我們的眼前，替我們來說明了。因爲經濟還是地域經濟，所以全國不能由經濟的連鎖，而結合爲一體；其結果，則在人民方面，尚有種族思想、部落思想、而不能統一爲一個民族。各省同鄉會的組織，就是這個思想的表現，所謂聯省自治，也不外出於排斥「外江人」的意識。

人民方面，既然沒有民族意識；那末，在政治上自然容易爲軍閥所乘，而呈出割據的現象了。民國以來，所謂直系、皖系等等，都是以同鄉爲基礎；糾合同鄉的力量，在政治舞台

之上，爭奪權利的。這個現象，不是種族思想的表現而何？不是部落思想的表現而何？在政治上是割據的局面，在經濟上又有地域經濟與其相適應；那末，封建制度，自然更不容易打破了。

以上只說明中國經濟是地域經濟，至於中國產業的幼稚，則我們若把中國與歐美列強比較一下，便可明白。

中國的領土、人口、以及富源，差不多都甲於各國；所以中國產業，若與歐美各國的產業，比較起來，應該勝過數倍而後可。但在實際上，則中國產業，尚甚幼稚，我們若看下列數項，便可知道。

一　鐵路是一國產業的基礎，一國有若干的鐵路，實可表示該國的資本主義發達到如何程度。中國與資本主義國的鐵路可比較如次：（一九二四年日本內閣統計局調查）

國名	延長粁	延長哩	面積每平方粁有若干	人口每萬人有若干
英國	三九、〇一五	二四、二四三	一五、三粁	八、八
美國	四〇二、五八四	二五〇、一五五	五、二	三八、一

法國	五三、五六〇	三三、二八一	九、七	一三、八
日本	二二、〇六〇	一三、七〇七	三、三	二、六
意國	二〇、六六四	一二、八四〇	六、七	五、三
德國	五五、五九九	三四、五四八	一一、九	八、九
俄國	六七、七九七	四二、一二七	〇、三	五、一
中國	一一、五四四	七、一七三	〇、一	〇、三

二　紡織工業，是輕工業的重心，所以牠的發達程度，又可表示工業化的程度。中國及列強的紡織工業的發達狀況如次：（一九二七年世界紡織聯合會調查）

國名	錠子數	建設中
英國	五七、五四八、〇〇〇	二四一、〇〇〇
美國	三七、三七四、〇〇〇	——
法國	九、五二二、〇〇〇	八五、〇〇〇
日本	五、六八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意國	四、九四一、〇〇〇	五七、〇〇〇
德國	一〇、九〇〇、〇〇〇	一〇七、〇〇〇
俄國	六、九四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中國	三、四三三、〇〇〇	八、〇〇〇

三　工業化的程度，又可以使用動力的程度來測量。動力可以分做兩種，一是水力，二是火力，火力的材料便是煤炭；所以由煤炭的額產，又可推測工業化的程度。中國和列強的煤炭產額可比較如次：（一九二四年日本內閣統計局調查）

國名	煤炭生產額	煤油生產額
英國	二七一、四〇五、〇〇〇噸	—
美國	五二〇、二七〇、〇〇〇	一〇一、九九一、〇〇〇
法國	四四、〇一〇、〇〇〇	七一、〇〇〇
日本	三二、二五五、〇〇〇	二六六、〇〇〇
德國	一一八、八二九、〇〇〇	五九、〇〇〇
俄國	一六、一九九、〇〇〇	六、一八九、〇〇〇
中國	二〇、五〇〇、〇〇〇	—

四　再從重工業觀察，重工業的材料是鐵，所以由鐵的生產額，便可知道重工業發達到如何程度。中國與列強鐵的生產額可比較如次：（一九二五年國際聯盟調查）

國名	銑鐵	鋼鐵

英國	七、四二五、〇〇〇噸	六、三三六、〇〇〇噸
美國	三一、九一〇、〇〇〇	三六、九八八、〇〇〇
法國	七、六九三、〇〇〇	八、四七二、〇〇〇
日本	一四七、〇〇〇	九三六、〇〇〇
德國	七、八一二、〇〇〇	一〇、一七七、〇〇〇
俄國	七六〇、〇〇〇	一、二八九、〇〇〇
中國	三八一、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〇

五　一國工業化的程度，又可從機器的消費來推測。我們中國固然不敢與英美德法各國相比較，若與其他各國相比較，則可列表如次：（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二五年的機器消費量，德國機器製造聯合會調查）

	消費額單位百萬馬克		對於世界消費額的百分比	
	一九一三	一九二五	一九一三	一九二五
拉丁亞美利加	三五八	五〇五	二·六	二·三
日本	一〇九	三二四	〇·八	一·五
中國	二〇	五四	〇·二	〇·二

印度	一三九	二二五	一・〇	一・〇
亞洲其他部分	七五	七六	〇・五	〇・四
澳洲	一五二	二九二	一・一	一・三
南斐聯邦	六四	九九	〇・五	〇・四
斐洲其他部分	四三	六八	〇・三	〇・三

由這數項看來，可以知道中國產業如何幼稚了。在這樣幼稚的產業基礎之上，果然能夠實現社會主義麼？

三　蘇俄的教訓

誰都知道俄國是社會革命的先驅，誰都知道俄國的社會革命已經失敗，所以現在試述蘇俄革命的經過如次：

俄國的經濟組織，與西歐各國比較起來，是很落後的。西歐各國資本主義已經由萌芽而發展的時候，俄國才於一八六一年解放農民，而開始其資本主義化。幷且俄國的資本主義，就其本質說，亦與西歐各國不同；就是西歐各國的資本主義，是發生於民間，而俄國的資本主義，則最初乃由代表皇帝的國家來實行。詳細說，彼得大帝因鑒西歐工業的發達，乃注其

全力，獎勵工業，用巨金補助貴族和商人，設立各種會社，到了一八五〇年庫利米亞戰爭的時候，又由軍事上的必要，布鐵路網於全國，而設立軍需品工塲，由是俄國的資本主義愈見發達。因此之故，俄國的資本主義，當其「開步走」的時候，便是大資本主義。由大資本主義所製造出來的階級關係，自然只有大資本家與無產者的對立，沒有甚麼中產階級，在中活動。俄國社會的不健全，這可算是原因之一。

俄國資本主義的第二特徵，則為外國資本的源源輸入，而致全部的產業，都受外國金融資本的支配；其中資本輸入於俄國最多的，便是法國。

這二種特徵很與中國相似，中國的工業化，也是由國家開始，如鐵路如、漢冶萍公司，都可視為中國最初的資本主義的經營。至於外國金融資本的勢力，則大家已經明白，不必再贅。但俄國能夠由產業幼稚的國家，一躍而進入共產主義的革命者，又有一個重大原因；這個原因，便是農民渴望土地。

如前所言，俄國於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但其所解放者，不過表面上名義而已；其實，農民對於地主的土地，乃當支給賠償金。農民無力支給，則由國家代出，但農民當於五十年

內，用年賦的方法，還償國家。若并此亦不可能，則土地的所有權，仍在舊地主的手上，農民只可占有其一部，而有用益權，對此則當於二十年內，年出十分二以下的租金給地主。所以農奴制度雖然破壞了，而農民則由農奴變爲債奴。現在試把解放當時的分與地面積和農奴人數，列表於左：

種類	一八六〇年男農奴數（人）	分與地全面積（臺刹聽）	男農一人所得的土地（臺刹聽）
地主私有地	一一、九〇七、〇〇〇	三七、七五八、〇〇〇	三、一七
國有地	一〇、三四七、〇〇〇	六九、七一二、〇〇〇	六、七四
皇領地	八七〇、〇〇〇	四、二六〇、〇〇〇	四、九〇
合計	二三、一二四、〇〇〇	一一一、七三〇、〇〇〇	四、八〇

這樣看來，可以知道除國有地的農民每人可得六、七四臺刹聽，尚可養活其一家之外，其他農民實不能養生送死了。在這樣情形之下，農民自然渴望土地，而欲暴動了。到了一九〇五年俄國土地的分配，大約如次：

農民分與地　一一二、〇〇〇、〇〇〇臺刹聽（每人只有三、一臺刹聽）
地主私有地　一〇一、七〇〇、〇〇〇

國有地及皇領地	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寺領地	八、八〇〇、〇〇〇

俄國土地分配的不平均，觀上表便可知道；反之中國土地的分配，則如下。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十畝以下戶數	一七、八〇五、一二五	一七、九一四、二三一	一一、八二九、一二三
十畝以上戶數	一三、二四八、四七四	一一、三〇三、五七〇	八、二八一、一八七
三十畝以上戶數	一〇、一二二、二一四	六、七一二、三六六	四、九五九、八九九
五十畝以上戶數	五、三四八、三一四	四、一三七、一三六	三、〇二二、一〇一
百畝以上戶數	二、八三五、四六四	二、二七三、三五五	一一、四五六、二一九

可知中國土地的分配，尙甚平均；土地的分配既甚平均，則我們希望農民暴動，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俄國的階級，既然尖銳化，則社會革命自然有可能性。不過社會革命不但要破壞舊經濟組織，且須建設新經濟組織。舊經濟組織的破壞，雖然可由無產階級的暴動而實行，至於新經濟組織的建設，則須以產業的發達爲前提。因此，我們更須觀察俄國在革命前產業的情

形。

俄國於農奴解放之後，產業年年發達，今試將解放前後的大工廠發達的形勢，列表如左：

年次	工廠數	勞動者人數	生產額
一七六五	二六二	三七、八六二	五、〇〇〇千盧布
一八〇一	二、四二三	九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一八二五	五、二六一	二〇二、〇〇〇	四六、五〇〇
一八五四	九、九四四	四五九、六三七	一五九、九八五
一八八一	三一、一七三	七七〇、八四二	九九七、九三三
一八九三	二二、四八三	一、四〇六、七九二	一、七五九、四三一
一八九六	三八、四〇一	一、七四二、一八一	二、七四五、三四五

到了一八九七年，施行金本位，產業愈益發達。至一八九二年止，服份公司資本共九億九千九百萬盧布，一九〇二年又增加爲二十一億盧布。若由其生產方面說，則一八九〇年，全俄工廠生產共十五億盧布，一九〇〇年增至二十五億乃至三十億盧布。工業勞動者亦由一百四十萬人增至二百四十萬人。我們現在再把一九〇五年的產業情形，列表如次：

鑛業及工業	經營數	勞動者總數 單位千人	%
勞動者一〇人以下	一七、四三六	六五、〇	二・五
一〇——四九	一〇、五八六	二三六、五	九・二
五〇——九九	二、五五一	一七五、二	六・八
一〇〇——四九九	二、七七九	六〇八、〇	二三・八
五〇〇——九九九	五五六	三八一、一	一四・九
一〇〇〇人以上	四五三	一、〇九七、〇	四二・八
計	三四、三六一	二、五六二、八	一〇〇・〇

由此觀之，可知俄國的大工廠是占優勢的地位了。若就其收益方面說，則(一)企業有一千乃至二千盧布的收益的，共三萬七千(占全企業之四四・五%)，其總收益共五千六百萬盧布(占全收益之八・六%)。(二)企業有五千盧布以上收入的，共一千四百(占全企業之一・七%)，其總收益共二億九千一百萬盧布(占全收益之四五・%)，可見俄國的利潤如何集中於少數的大經營了。因此，貧富對立，愈見厲害，終而勃發爲一九一七年的革命。

此外，俄國產業的發達程度又可由鐵路所運輸貨物的分量推測之。

年次	運輸總量(單位千渡特)
一八九五	二、五九三、五四三
一八九六	二、七四六、八二三
一八九七	二、九五四、一一二
一八九八	三、二七七、一九六
一八九九	三、六九七、六二八
一九〇〇	三、九五八、三八五
一九〇一	三、九九一、一八三
一九〇二	四、一七三、〇〇〇
一九〇三	四、五五九、三三六
一九〇四	四、五六九、五四一
一九〇五	四、二一六、四二七
一九〇六	四、九一五、九〇二
一九〇七	五、二〇〇、二一九
一九〇八	四、二四七、七五六
一九〇九	五、六一九、五九〇
一九一〇	六、〇五八、七四〇

一九一一　　六、八一〇、一八八

一九一二　　七、一〇九、七一八

一九一三　　七、九八一、〇一九

在鐵路運輸的貨物之中，最多的是穀物；其次是煤炭、木材、鋼製製品、砂糖、纖維工業品、棉花、農具、及其他機器。但穀物逐年減少（一九〇三年占全部之二二・%，一九一三年則減至一六・三%），反之，製造工業品，則逐年增加，可知俄國漸由農業國而變爲工業國了。

對外貿易亦逐年增加如次：

年次	金盧布（百萬）輸入	金盧布（百萬）輸出
一八〇二	四〇、九	四五、八
一八〇三——〇七平均	三八、六	四〇、八
一八一二——二〇平均	三八、一	五三、五
一八二一——三〇平均	五一、一	五八、三
一八三一——四〇年均	六三、四	七六、二
一八四一——五〇平均	八五、二	九七、二

一八五一——六〇平均	一一三、一	一二三、五
一八六一——七〇平均	一八四、五	一八四、九
一八七一——八〇平均	三六七、七	三三九、三
一八八一——九〇平均	三四九、九	三九二、一
一八九一——九五平均	三〇四、〇	四一五、四
一八九六	三九三、二	四五九、一
一八九七	三七三、三	四八四、四
一八九八	四一一、七	四八九、六

國外貿易的興隆，自然可使國內商業化，而助資本主義的發達。

俄國在這樣的產業基礎之上，實行革命；革命當時，是以共產主義相標榜，其結果如何，實可供為我們的教訓，所以不惜詳細說明一下。最初則把國立銀行移於新政府之手，其次又宣言一切銀行都歸為國有。其後的進行，則可列表如次：

一九一八年二月　沒收商船及穀倉為國有

五月　沒收製糖業為國有

六月　沒收煤油業為國有，火柴、咖啡、香料、絲織等的商業，以及外國貿

易歸於國營。更宣布凡工廠公司有一百萬以上之資本者，都編入國有財產之內。

一九二〇年六月　凡企業使用機器而有五人以上的勞動者，或不使用機器而有十人以上的勞動者，都收歸國有。

十一月　使用十人以下勞動者的小工業及家內工業亦收歸國有。

由是全部工業的十分之九，都集中於國家了。徹底！的確徹底！但其結局如何呢？人民不肯努力了！生產力破壞了！飢饉發生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所開的第八次蘇維埃大會，不能不變更政策，而決議實行新經濟政策了！由新經濟政策的實行，俄國經濟又由共產主義而退回爲資本主義，牠的進行如次：

一九二一年三月　廢止農業的國家監督及農產物國有，幷恢復小工業及農業，爲個人的經營。又改業農物的強制徵收爲食糧現物稅，幷許可個人經營商業。

十二月　二十人以下的小企業，及事實上尚未國有化的大企業，皆歸私人經營。

一九二三年三月　把國營大企業的一部，用所有權讓與的形式，移爲個人經營。

形勢逆轉了！個人資本主義又開始了！俄國產業的發達，勝過我國數倍，然犧牲了無數的人命，尚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可知經濟組織，是比鐵還硬的，時機未至，卽欲實行社會主義，一定失敗。但是何以社會主義不能實行呢？我們更非說明不可。

四　產業社會化的前提條件

任何組織，不是從空掉下來的，牠能夠成立於世上，一定先有成立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雖費盡工夫，也不能創造出來。資本主義所以能夠產生，乃是因爲在封建制度之下，採用了新技術，生產力天天發展，由是逐蓄積了原始的資本；又因爲人口的增加，而有了過剩的勞動力；更因爲社會上種種的必要，而發明了各種的機器，因此，手工業的生產，遂見破壞，終而成立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

但資本主義發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在牠的體內，又培養出新社會的種子。何以呢？

第一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新式的生產，先由機器的採用，打破一切手工業者，而集中資本於少數資本家。在這些少數資本家之中，又由自由競爭的結果，而出大魚吞小魚的現

象，使資本愈見集中。卽如　總理所說：『機器發明了之後，世界的生產力，便生出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成機器占了人工，有機器的人，便把無機器的人的錢，都賺去了。』『大資本家還能吞併小資本家，好像大魚吃小魚一樣。弄到結果，社會上只有大資本家和勞動者兩種人；換句話說，就是工商業極發達之後，祇有大富人和窮人兩種。』一切資本既能集中於少數資本家，則把這些資本，移歸社會公有，自然是很容易實行的。反之，資本若尚散在於各人的手上，則不但不容易把零碎的資本，移爲公有，而且各人有多少資本，也不容易調查出來。

第二　資本主義愈發展，則企業形式，由個人經營，變爲股份公司。這個時候，資本雖在少數資本家的手上，利益雖歸於少數資本家的囊中，但股東所支配的，不過股票，并不是企業本身；企業的進行，則由高級勞動者管理，并由低級勞動者實行。所以資本家和企業，已沒有甚麼直接關係；換句話說：資本家在經濟生活之上，已經沒有甚麼人的作用。這同小規模企業時代的營業主相比較，眞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因爲小規模的營業主，常自己指揮企業的進行，且由自己的利己心，使營業能夠天天發展；反之，大公司則不過委託經理，按照

章程進行，所以把大公司移爲公有，不過更換股東，即變更少數人的股東，而使大衆同爲股東能了。因此，大公司移爲公有，是很容易實現的。

第三　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由勞動大衆，自己管理產業，所以勞動大衆須有管理的能力而後可。如前所言，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大規模的生產，因爲牠是大規模的生產，所以勞動大衆也隨着資本的集中，而集中於少數的工廠或公司之中。他們既有了接觸的機會，遂生出共同感情和共同意識，而有團結的可能。幷且資本主義的生產，就其全部說，雖然是無政府的、是無組織的、若僅就其局部說，則秩序整然，一絲不亂；勞動大衆既然受了資本主義的訓練，自然可以養成組織的能力，這也是產業社會化的必須條件之一。

第四　社會革命，與過去政治上的革命，完全不同。過去革命的對象，是政府，政府不過代表極少數榨取階級的利益，而孤立於民衆之外，所以民衆可用暴力，顚覆政府。反之，社會革命，則須變更與民衆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經濟組織，所以非等到民衆生活巳經漸次變更之後，實在不容易變更。原來在資本主義之下，政府不是榨取階級的本身，乃榨取階級的一個機關；即如　總理所說：『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

中把持。』所以社會革命，非以政府爲對象，乃以榨取階級爲對象。推倒政府雖可利用暴力實行；推倒榨取階級，則暴力未必有功効。如果榨取階級的人數尚存，換句話說，如果資本尙未集中於少數人，則無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這樣的大力量，能夠剷除比較的多數的榨取階級。俄國共產黨的力量，不可謂不大，其殘殺的資本家，不可謂不多，然據各種調查，則亦不過限於大都市方面，至於其他各地，則多數的資本家，尙殘存着。由此可知資本若不集中，雖用虐殺的手段，也是沒有効果的。

這樣看來，產業社會化的條件，乃是孕育於資本主義的母體之內，資本主義不發達，產業社會化是無從實現的。那末，中國要想產業社會化，必須先發展資本主義麼？這個問題，除應該不應該之外，尙有可能不可能的疑問；因此我們須要討論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五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現在經濟是世界經濟，一國的經濟情形，不能不受他國經濟的影響。現在世界經濟是屬於如何階段呢？若據各種事實所示，則如 Varga 所說：是資本主義將次沒落的時候，是帝國主義者在世界市場上，因爲爭奪販路，而作鬥爭，由這鬥爭，又謀世界的再分割，而將爆發

爲新戰爭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我們中國要想發展資本主義，果有可能性麼？

固然國內有不少的學者主張其可能。其惟一理由，大約如次：就是帝國主義者的產業，可以分做二種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是以輕工業爲中心，他的出產，主要是日用所必需的消費品，這個時候，帝國主義者一面當以殖民地爲原料供給地，同時又以殖民地爲商品的銷售場。帝國主義者要使殖民地永久爲其原料供給地，必使殖民地本身，沒有利用其原料的機會；要使殖民地永久爲其商品銷售場，必使殖民地本身沒有生產商品能力。因此在第一階段，帝國主義常用種種方法，防止殖民地的工業化；到了第二階段，則資本主義國的主要工業，已由輕工業進爲重工業，又由產業資本進化爲金融資本。帝國主義者既注重生產鋼鐵製的機器，那末必須殖民地開始工業化，而後才會發生機器的需要，所以在第二階段，資本主義的國家，爲維持和發展其重工業，對於殖民地的工業化，決不純取抑制的政策。而且帝國主義者既由產業資本，進爲金融資本，則爲投資起見，亦不能不希望殖民地工業化了。因爲殖民地需要資本的程度，是和其工業化的程度，以同一比例而增加。工業化越發展，所需的資本亦必增加，帝國主義者要輸出其過剩的資本，自然不願阻止殖民地的工業化了。

這個主張，是有相當理由的，不過一切帝國主義者都已開始其資本主義的第二階段麼？而開始的程度，又是一樣麼？我現在試由貿易方面，先觀察那一個帝國主義者與中國最有關係。據海關稅務司的計算，一九二五年中國對外貿易，如左：（單位百萬海關兩）

	輸出	輸入	共計	%
英國及其殖民地	二〇一、三	三三六、九	五三八、二	三〇・九
日本及台灣朝鮮	二二一、一	三〇九、八	五三〇、九	三〇・五
美國及布哇菲律濱	一四七、九	一四七、九	二九五、八	一七・〇
法國及印度支那	七二、八	二八、二	一〇一、〇	五・八
俄國	四八、〇	一三、五	六一、五	三・五
荷蘭	二〇、九	四八、五	六九、四	四・〇
德國	一六、四	三二、五	四八、九	二・八
其他	四八、〇	四七、八	九五、八	五・五
計	七七六、四	九六五、一	一、七四一、五	一〇〇・〇

由這一表看來，可知與中國最有關係的帝國主義者，是英日美三國了。我們現在再觀察牠們三國輸入中國的貨物，到底是輕工業居多麼？抑或重工業居多麼？（單位百萬海關兩）

日本的輸入(除朝鮮外)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紡織物	一一二、九	一二三、三	一六一、八
砂糖	一〇、二	一八、八	二二、七
煤炭	八、五	一一、四	二一、二
魚及魚製品	八、三	一〇、三	一〇、二
金屬商品	七、〇	八、二	八、四
米及小麥粉	二、九	一、二	七、七
紙	五、六	五、三	七、六
化學的製品	四、五	五、三	六、二
運輸及電氣材料	四、〇	四、三	四、一
建築材料	二、一	二、七	四、〇
機器	一、九	二、三	二、〇
其他	四三、一	四〇、七	四三、九
共計	二一一、〇	二三四、八	二九九、八

美國的輸入(單位百萬海關兩)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礦物性油	四四、六	四三、一	五二、二
菸草及菸草生產物	三一、四	四三、〇	二九、五
金屬商品	一二、四	二三、四	八、八
紡織物	三、八	五、九	八、〇
小麥粉	一六、四	一八、〇	五、一
化學製造物	五、一	五、二	四、七
機器	四、三	四、八	二、九
其他生產物	三六、五	四七、六	三一、三
計	一五四、五	一九一、〇	一四二、五

英國的輸入(單位百萬海關兩)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紡織物	七三、一	七〇、八	五七、七
金屬商品	一〇、〇	一〇、一	七、三
化學生產品	四、五	五、四	五、五
機器	一〇、四	六、八	五、一
煙草製品	三、八	三、九	三、四
運輸 電氣及電話材料	三、一	三、四	三、六

紙	二、三	三、六	一、三
其他生產物	一二、二	二二、〇	一〇、八
計	一二〇、四	一二六、〇	九三、一

我們若看上列三表，便知道英日二國輸入中國的貨物，仍以紡織物爲最多，英國雖年年有減少的傾向，反之，日本及美國，則年年增加起來。至於機械一項：由英國輸入的，年年減少，由日本及美國輸入的，雖然於一九二四年稍見增加，但一九二五年又復減少，由此可知帝國主義者與中國通商，仍是以輕工業爲中心。

這樣的證明，我們還不滿意，我們更要看帝國主義者本國的輕工業，是否年年退步，如果年年退步，則輕工業自然要讓給產業後進國去經營，如果不然，則產業後進國受了產業先進國的壓迫，何能發達起來。據國際統計年鑑所載，日本紡織錠子的增加如左。（單位一〇〇〇）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二、三〇〇	四、一二六	四、八二五	五、二九一	五、五七三

就是輸出紡織物於中國最多的日本，牠的國內紡織業，竟然年年發達起來，牠的紡織業

既然年年發達，則為維持自己的市場起見，又何能不壓迫中國輕工業的發展呢？

我們再看日英美三國所消費的棉花罷！（日本銀行調查，單位千俵，每俵約二四七八磅）

	一九二〇—二一	一九二一—二二	一九二二—二三	一九二三—二四	一九二四—二五	一九二五—二六
日本	一、七〇五	一、九六五	二、一〇〇	一、八〇〇	二、〇四〇	二、四〇〇
英國	二、一〇〇	二、八〇〇	二、七五〇	二、七五〇	三、一五〇	三、〇〇〇
美國	二、〇九一	二、三二八	二、六八九	二、〇九八	二、三三〇	二、四九六

由上表看來，亦可知道帝國主義者的輕工業，并不年年減少，而乃年年發達了。

這樣一來，則上面所述的論者之言，又可反證中國工業化的艱難了。質言之，惟帝國主義者，不輸出紡織物而輸出機器於殖民地，而後殖民地的產業，才能發達。現在日英美三國所輸入於中國的貨物，仍舊是以紡織物為中心，至於機器，則不過占極少數，那末，中國產業又何能發達呢？

六　民生主義實現的前提條件

民生主義的目的，是要達成產業的社會化；產業的社會化，須以大規模的生產為前提條

件。然在帝國主義鐵蹄之下，中國產業又沒有發達的希望，那末，要怎樣辦呢？

這個問題，的確是極困難的問題。惟一解決的方法，恐怕除了打倒帝國主義之外，沒有別的辦法罷！所以 總理說：『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著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著手，打破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外國貨物不能侵入，本國的工業，自然可以發達。』

但是打倒帝國主義，又是一種極艱難的工作。打倒帝國主義，不是空論的問題，乃是實力的問題，沒有實力，空喊打倒，不但不會發生効果，而且可引起帝國主義者的干涉，而使中國愈陷入難關。然既如前所言，帝國主義不打倒，中國民生問題，無從解決，所以我們與其坐而待亡，不如起來與帝國主義者拚個彼死我活。

與帝國主義者拚命的方法， 總理於遺囑上，曾決定兩個方針，給與我們，第一是對內喚起民衆，第二是對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喚起民衆，便是要喚起民族意識。原來民族的發達，好像階級的發達，可以分做前後二

期。在第一期內，一個民族對於別的民族，雖可說是民族，而對於自己，却不算得一個民族，換句話說，就是對外可算是民族，而對內還不算民族。到了第二期，對內對外，都可算是民族了。然而以甚麼爲標準，來決定民族發達的時期呢？一個民族是否成熟，須看該民族內的分子，有沒有民族意識而定。所謂民族意識，就是一民族內的分子，覺得自己民族的利害，和別民族的利害，若不相容，而相衝突，則當戮力協心，出來反抗。屬於一民族的人，若有這種自覺，則該民族無論對內對外，都可算是一民族了。

現在中國民族，是不是對內對外，都可算是民族麼？不，要明白其中理由，當先知道民族是甚麼？又須知道民族成立的過程。

要解決這兩個問題，不但不是這篇短短的文章，所能寫盡，而且過於討論這個問題，又與本篇的宗旨不合。要之，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天然力是甚麼？第一是血統，第二是生活，第三是言語，第四是宗教，第五是風習（可參看民族主義第一講）。這一切則由共同經濟生活，鑄造而成的。換句話說，必須一國經濟進爲國民經濟的時候，而後全國人民，才有共同的血統、生活、言語、宗教、風習、而成爲整個的民族。不然，則不過是零碎的種族，

并不能算為民族。

如前所言，中國現在的經濟，還是地域經濟，所以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還是很薄弱；因此，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須先喚起民族意識。

但是只惟喚起民族意識，也是無用的，因為帝國主義者的力量，是很大的，我們要想單獨抵抗他們，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所以　總理又主張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因此，『民族運動與國際運動，實為相須，而民族主義與國際革命主義，其內容實為一致。』現在，『被壓迫的民族已開始覺悟其所處地位之不平等，已認識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之種種壓迫及掠奪，故民族革命運動，已普及於全世界。』不過，『民族革命運動，欲求成功，』『必須明瞭共同之敵人為誰，對於共同之敵人，為共同奮鬥，自助與互助，切勿異致；所以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之革命運動，有聯合戰綫之必要。』

一切弱小民族，若能聯合，則帝國主義必能打倒，何況在帝國主義相互之間，又復互相猜忌。而帝國主義者的內部，又有階級鬥爭呢？所以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各個帝國主義者間之衝突，及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人民之憤激與怨望，實為與世界上被壓迫民

族以推倒帝國主義完成民族獨立之良好機會。」

打倒帝國主義之後，中國的產業問題，才有辦法，其辦法如何，在本誌（新生命月刊）上已有很多人討論了，所以現在不必再說。

三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

朱佩我

占世界陸地十五分之一，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其在世界經濟上的重要，是不言可知的。就中國的富源說，近代工業中最重要的煤鐵鑛，都非常豐富。煤的總儲量據歐、美、日本專家的估計，至少在一萬萬噸以上，實占世界第二位，祇不及美國。鐵的儲量約占世界第五；歐洲大戰前世界各大國鐵的儲量如左：

美國	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
德國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法國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英國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中國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石油的儲量，雖然還沒有正確的估計，但中國石油儲量的豐富，是誰都知道的；據歐美專家的估計，中國的石油儲量至少當在美國石油總儲量十分之三以上。錫的產量約占世界第三，就一九一八年統計，世界最多的產錫國，是馬來及波利維亞；是年波利維亞的產額爲二

八、〇〇〇噸，約占世界總產額百分之二一・五〇；中國的產額爲一二、〇〇〇噸，約占世界總產額百分之九・五〇。銅的產量在一九一八年雖僅占世界第十二位——是年世界總產量爲一、三五四、五四八噸，中國產量爲六六八噸，約占總產額百分之〇・〇五——但中國銅的儲量確也非常豐富，不過缺乏正確的統計而已。銻的產量占世界第一位，自一九〇七年以後，中國銻的產量已超過全世界總產額的一半；一九一三年之產量占世界總量百分之五一・四，一九一七年之產量爲百分之五七・〇。其歷年輸出量如左：(單位噸)

種類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三年
純銻	一〇、六三七	一五、九八五	七、〇〇三	一二、五六六	一一、五八七
生銻	一一、八七九	一、六九一	二、一一八	二、五一六	一一、九〇四

中國金鑛也很豐富，一九一七年產額價值美金三、六〇〇、〇〇〇元，約占世界總產額百分之〇・八四。是年世界重要產金國如左：

國別	產金總值(美金元)	百分率
英國	二六八、四七七、六七九	六三・〇〇
美國	九八、一三三、一八五	二三・〇〇

法國	二三、八〇〇、〇〇〇	五・六〇
俄國	九、〇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
日本	七、五三九、二〇〇	一・七〇
中國	三、六〇〇、〇〇〇	〇・八四
德國	三、四六七、八〇〇	〇・八一

鎢的產量，歷年增加，非常迅速，到現在已占世界第一位。歷年中國鎢的產量與世界鎢的總產量比較如左：（單位噸）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二年
中國	二〇	二〇	一〇、五〇〇	四、七五〇	七、〇〇〇
世界	八、一九八	二二、九九九	三五、八三二	一一、〇〇〇	一〇、七〇〇

此外，錳、銻、鉛、鋅等，也都非常豐富而為世所豔羨。

中國的森林也是非常豐富，木材的產量，全世界除了俄羅斯以外，差不多要推中國最多了。農業方面，棉的產量占世界第三位；除了美國和印度外，中國是產棉最多的國家了。茶的產量占世界第一。一九一三年世界重要產茶國的產額，計印度約三億萬磅、錫蘭約二億萬磅、日本約一億萬磅、爪哇約七千萬磅，總計不過六億七千萬磅；合全世界總產額計之，中

國約占一半。絲的產量本占世界第一，現爲日本所奪，降居第二。大豆的產量，也占世界第一；世界豆產品百分之七十五是中國的。此外如米、麥、蔴、糖、菸草、毛革等，也有極豐富的產量。單就對外輸出而論，一九二一年主要農業生產品的輸出，有如左表：(單位海關兩)

品名	輸出額
絲經	一二一、二八七、一二七
茶	二二、六〇五、七八八
棉花	一七、二五六、九五三
豆餅	四九、五二四、八五二
豆油	九、七三五、七九一
黃豆	二八、四六二、〇二九
生牛皮	六、五三二、九五七
羊毛駱駝毛	一三、二九八、一九〇
芝麻	八、八一一、六二六
蛋白蛋黃	一一、七五八、〇九三
麵粉	一一、二二七、五一五
花生油	四、五一三、〇〇七

豬鬃	四、二七九、四七八
繭衣	一三、一七七、二一七
桐油	五、四六六、四三〇
草帽緶	三、四五一、五七九
小麥	一六、八八六、〇九〇

看了上面這些統計，可以知道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意義的重大了。但是在世界經濟上這樣重要的中國，在這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帝國主義階段的二十世紀，社會經濟還停滯在農業手工業經濟的狀態之下，對於歐、美、日本的產業先進國的比較，是很落後的。事實是毋庸掩飾的，中國現在名義上是自由獨立的國家，而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先進國統治下的半殖民地。

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究竟能不能發展到歐、美、日本現在的階段？換一句話說：中國經濟的發展，究竟能不能造成一個中國帝國主義？

在解答這個問題以前，應該先研究人口衆多、地大物博的中國，經濟的發展何以落後？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一必先經過「資本之原始的蓄積」的階段。原始蓄積有兩個條件：第

一必須能夠有自由出賣勞動力，而且非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的階級存在；第二能夠收買勞動力的大量資本的存在。這兩個條件，在西歐資本主義初期發展時的中國，是完全沒有的。

正因爲中國地大物博，物質條件豐富，所以經濟不易發展。因爲中國國內寒溫熱三帶的產物都很豐富，適宜於自給自立，客觀上沒有向外發展的要求。又因爲經濟能夠自給自立，沒有非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的階級存在；而且在自給自立的狀態之下，大量資本的集中很不容易。這就是中國經濟不能發展的原因。

中國經濟雖然不能發展，但因爲富源充足的原故，成了帝國主義國家眼中的一塊肥肉。他們掠奪非洲、掠奪印度和東印度羣島、掠奪美洲殖民地等，還嫌不夠，就來掠奪中國。

帝國主義最初到中國來時，是要求通商。但是經濟能夠自給自立的中國，沒有感覺與外通商的必要。而且從前與中國來往貿易的，都是鄰近小邦，和善易與；而新來的西洋人，則獰惡可怕，且多挾有礮艦利器，使中國當局感覺不安。例如康熙時代大員藍玉林論南洋事件書有云：『紅毛乃西島番統名，其中有英圭黎、于絲蠟、佛蘭西、荷蘭、大西洋、小西洋諸國，皆兇悍異常。其舟堅固，不畏颶風礮火。軍械精於中土，性情陰險叵測；到處窺覘，圖

謀入國。統計天下海島諸番，惟紅毛、西洋、日本三者可慮耳。噶囉吧乃巫來由地方，緣與紅毛交易，遂被侵佔爲紅毛市舶之所。呂宋亦巫來由分族，緣習天主一教，亦被西洋佔奪爲西洋市舶之所。日本明時作亂，閩、廣、江、浙皆遭蹂躪；至今數省人民，言倭寇者皆痛心疾首。』因爲這種種的原因，中國對於外國來要求通商貿易，一概拒絕。

中國雖然拒絕了帝國主義國家的通商要求，但是帝國主義要掠奪中國，決不肯因此而中止，所以通商要求經過中國幾次拒絕以後，就毫不客氣的用武力解決；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就在這樣狀態之下發生了。鴉片戰爭表面上是爲鴉片問題，而實際上，是帝國主義要屈服殖民地所通行的方法。

鴉片戰爭的結果，中國不僅須出鉅額的賠款，而且開始訂立了各種不平等條約。從此以後，又經過了幾次的戰敗，中國就完全成了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半殖民地，中國的經濟命脈也完全爲帝國主義所操縱了。

雖然在近年來，中國實業有了相當的發展，但這是非常遲緩的，而且始終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照現在狀況而論，不僅沒有達到工業國家的階段，而且前途也沒有希望。

人們曾經引用唯物史觀的理論，以爲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規律；資本主義社會是社會進化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封建制度沒落以後，代之而興的，必然是資本主義制度。中國自然也不能逃出社會進化的鐵律，現在的中國，是在封建的農業經濟崩壞的過程中；未來的中國，必然是資本主義的中國。

這種似是而非的議論，不是根據唯物史觀而成了機械的唯物論者。

誠然社會進化有一定的規律，不是人爲的力量可以任意左右。但是唯物史觀的公式，是指一般的社會進化而言。唯物史觀的理論，證明社會的進化，必然要經過資本主義制度一個階段，這是正確的，而且已經實驗了——我們現在生活着的時代，正是資本主義的時代，而且是資本主義將要沒落的時代。唯物史觀論者更指出資本主義之必然沒落，而且快要沒落，代之而興的，必然的是非資本主義社會。以爲中國的資本主義一定會發展，像歐、美、日本一樣成爲帝國主義，這是把唯物史觀所指的一般的社會進化的原則，誤作機械的解釋。這個機械的解釋，不僅以爲中國要經過私有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階段；而且像更落後的外蒙古、非洲、澳洲等一切停滯在游牧時代的部落發展起來。就是說：歐、美、日本先進國資本主義的

發展，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位，已快要崩潰，而代以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印度的經濟條件，比歐美日本爲落後，所以中國印度現在是在封建制度沒落的過程中，繼之而興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非洲澳洲外蒙古等的經濟，現在比中國印度更爲落後，所以未來的非洲澳洲外蒙古的社會制度是封建制度。試問這樣的解釋，唯物史觀還成個什麽東西？機械的唯物論者把社會進化之一般的原則誤解作機械的，每一部落的鐵案，這種根本是不懂得唯物史觀。

中國經濟現在完全是在帝國主義操縱之下。對於中國的經濟的掠奪，是帝國主義維持其垂危統治的一種必要手段。帝國主義的勢力存在一刻，就要維持一刻對中國的掠奪。在帝國主義之經濟的掠奪之下，中國資本主義永遠不能發展。因爲不僅有許多條文——如各種不平等條約緊緊的束縛着中國產業的發展，而且在實際上，中國的各種重要產業，大都是在帝國主義的直接支配之下。

帝國主義勢力不能消滅，就不能阻止其對中國的掠奪；換句話說，帝國主義勢力存在一天，中國產業就一天不能發展。自然，帝國主義的勢力是必然會崩潰的，而且是不遠的將來的事。但是帝國主義崩潰以後，整個的世界都將向着非資本主義發展，決不容許中國單獨來

發展資本主義。所以帝國主義勢力存在的時候，中國資本主義固然沒有發展的餘地；而在帝國主義崩潰以後，整個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死滅了。

也有人以爲中國的富源充足，物質條件異常豐富，這是發展資本主義的先天基礎。現在雖然還很落後，但因爲先天基礎的豐富，所以將來一定可以發展。還有人說，中國有廉價的勞動力，這也是資本主義發展可能性的一點。其實，中國富源雖然充足，但大半已經在帝國主義的操縱之下，而且因爲不平等條約及其他種種的關係，絕無發展的可能。至於廉價的勞動力，固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條件，但單是這個條件而缺乏其他，不用說是不夠的。

更有人以爲中國產業之不能發展，是因爲缺乏資本，但這問題是容易解決的。現在美國正有許多資本沒有找到債戶，所以中國可以從美國借資本來開發實業。這顯然是更錯誤的。誠然，美國有大量的資本閒放着，而且美國正想在中國投資；但美國在中國投資的結果，不過使中國經濟奴服於美國。

我們否定中國私有資本主義有充分發展的可能性，並不是主觀的，而是客觀的。這可以舉事實來證明。

發展產業最重要的，是需要大量的資本，金融事業是發展產業的基礎。中國國內主要的金融機關是外國人的，所以中國的金融事業幾乎完全在帝國主義操縱之下。

幾個在華的外國銀行，是中國一切企業的主宰，中國本國的銀行，不過成了他們的附屬品。

在華主要的外國銀行如下：

華文行名	總行地點	國籍	在華設立年
匯豐銀行	香港	英	一八六五年
麥加利銀行	倫敦	英	一八五七年
有利銀行	倫敦	英	一八七五年
東方匯利銀行	巴黎	法	一八七五年
花旗銀行	紐約	美	一九〇一年
大通銀行	紐約	美	
運通銀行	紐約	美	
正金銀行	橫濱	日本	一八八〇年
台灣銀行	台北	日本	一八九六年
朝鮮銀行	京城	日本	一九〇九年

住友銀行　大阪　日本

三井銀行　東京　日本

三菱銀行　東京　日本

荷蘭銀行　阿姆斯特丹　荷蘭　一九〇二年

麥加利銀行（即喳打銀行）初成立的時候，範圍很小，後來業務非常發達；據該行報告，一九一八年度之純益金，爲四十一萬零九千二百二十一磅。匯豐銀行初成立時，資本僅五百萬元，繳足半額，即二百五十萬元。積至今日，已逾二千萬元。該行外來存款，非常之多；中國的軍閥官僚大資本家等，幾乎沒有一人不在該行有存款。至放出的款項，據一九一四年報告，已達一億四千一百萬元。營業一項，一九一六年度報告，其純益金合前年度之滾存金三、一六六、五七八、八五元計之，共爲九、八二〇、一八〇、三三三元。有利銀行於一九二〇年的報告，該期總利益爲五十四萬九千一百二十三磅。東方匯利銀行是法國在華經濟侵略的總機關；花旗銀行是美國在華經濟侵略的總機關；也是支配中國金融的權威。日本則有正金、台灣、朝鮮、三友、三井、住友等銀行，在中國金融界更有無上的權威。正金銀行單是在中國發出的鈔票，在一九一七年即有二千〇二萬餘元；又至一九一八年調查，該行投資中

國，合計有日幣一億五千五百十餘萬元。台灣銀行對中國投資總額合歷年大小借款計之，共一億〇七百二十萬元，又銀八十八萬八千五百兩。朝鮮銀行則在東三省方面握有經濟上之最高權威。

這些主要的外國銀行，不僅支配着中國的金融、支配着中國的企業，而且支配着中國的政治。此外，還有許多在名義上是中外合辦，而實際上是外資獨辦的銀行，在中國金融也很有勢力，至於中國本國銀行，大都是資本短少，信用不孚；而且中國銀行家大都是爲某一個大軍人所利用，所以常常因政治關係而使銀行受很大的損失，甚至根本覆滅。中國本國銀行所發出的鈔票，時常不能通用；至於這地方所發行的鈔票，到了那地方不通用的現象，更是很普遍的。因此中國人總不能信托本國銀行。有錢的華人，願意以極薄的利息，存款在外國銀行。中國本國銀行現在完全不能與外國銀行競爭，國內一切的企業都爲外國銀行所獨自操縱，本國銀行不過做些投機事業，尤其是政治的投機事業。經營政治的投機事業的結果，銀行的信用愈壞，營業也愈陷於「野雞式」的不堪的狀態。

爲企業基礎之金融事業的現狀，尚且如此，中國企業前途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現在

再就交通方面看。交通方面最重要的當然是鐵路和航業了。中國鐵路的情形眞是可憐！寥寥幾條鐵路，幾乎還都是外國資本所築成的。據一九二三年調查中國鐵路借款有如下表：

借款名稱	債權者	訂借期	原借債額	利息	現欠額
京奉	英國中英公司	一八九八年	英金二、三〇〇、〇〇〇	五釐	一、三二二、〇〇〇
仝	仝	一九二一年	五〇〇、〇〇〇	八釐	五〇〇、〇〇〇
仝	仝	仝	二、〇〇〇、〇〇〇	仝	二、〇〇〇、〇〇〇
新奉	日本南滿公司	一九〇九年	日金三二〇、〇〇〇	五釐	七七七
正太	道勝銀行	一九〇二年	德金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仝	二四、七八五、〇〇〇
汴洛	比國鐵路公司	一九〇三年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仝	三九、七六〇、〇〇〇
滬寧	英國中英公司	仝	英金二、九〇〇、〇〇〇	仝	六〇、〇〇〇
仝	仝	一九一三年	一五〇、〇〇〇	六釐	六三五、六〇〇
道清	英國福公司	一九〇五年	八〇〇、〇〇〇	五釐	六〇、〇〇〇
仝	仝	一九一八年	一二六、八三八	八釐	一〇一、四七一
仝	仝	一九一九年	仝	七釐半	一二六、〇〇〇
廣九	英國中英公司	一九一八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	五釐	一、五〇〇、〇〇〇

津浦	德國德華銀行 英國華中公司	一九〇八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	仝	二、八五〇、〇〇〇
津浦續借	仝	一九一〇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仝	仝
仝	德國德華銀行	一九一二年	九〇〇、四二四	七釐	九〇〇、〇〇〇
滬杭甬	英國中英公司	一九一八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	五釐	一、二〇〇、〇〇〇
實業借款	英國匯豐銀行 法國匯利銀行	仝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五四釐半	四、二五〇、〇〇〇
郵傳部	日本正金銀行	一九一一年	日金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釐	九、一二四、〇〇〇
川粵	英法德美銀團	仝	英金 六、〇〇〇、〇〇〇	仝	五、九〇八、六九一
湘鄂	英國中英公司	一九一九年	銀元 二、〇〇〇、〇〇〇	八釐	一〇〇、〇〇〇
隴海	比國鐵路公司	一九一二年	英金 四、〇〇〇、〇〇〇	五釐	四、〇〇〇、〇〇〇
仝	仝	一九一九年	德金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釐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仝	仝	一九二〇年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八釐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仝	荷蘭銀行	仝	荷金 一六、六六七、〇〇〇	仝	一六、六六七、〇〇〇
浦信墊款	英國華中公司	一九一三年	英金 一九八、七九二	六釐	一九八、七九二

仝	仝	仝	八、四六三	七釐	八、四六三
同成墊款	德比兩國鐵路公司	仝	各七七〇、三七一	六釐	一、二三五、三八三
仝	仝	仝	德金各五、七九八、五一八	仝	九、二七一、六九一
甯湘墊款	英國中英公司	一七一四年	關平二、〇〇〇、〇〇〇	仝	二、〇〇〇、〇〇〇
仝	仝	仝	規元四八六、〇〇〇	仝	四八六、〇〇〇
滬楓	仝	仝	英金三七七、〇〇〇	仝	三七五、〇〇〇
四鄭	日本正金銀行	一九一五年	日金五、〇〇〇、〇〇〇	五釐	五、〇〇〇、〇〇〇
仝	仝	一九一四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	九釐	一、六〇〇、〇〇〇
四洮	日本南滿公司	一九二一年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九釐半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株欽墊款	美國裕中公司	一九一六年	美金一、一五〇、〇〇〇	七釐	一、一五〇、〇〇〇
濱黑墊款	道勝銀行	仝	規元一、一五〇、〇〇〇	仝	五〇〇、〇〇〇
吉長	日本南滿公司	一九一七年	日金六、五〇〇、〇〇〇	五釐	六、五〇〇、〇〇〇
吉會	日本興業台灣朝鮮各銀行	一九一八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釐半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滿蒙	仝	仝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八釐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高徐順濟	仝	仝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仝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京漢	英國匯豐銀行 法國匯利銀行	一九〇八年	英金	五〇、〇〇〇	五釐	不詳
仝	英國菲色爾公司	一九一〇年		五〇、〇〇〇	七釐	——
仝	日本正金銀行	仝		二一、四五〇	仝	——

不僅係借外資築成，主權不全，而且常常戰爭的破壞，封建割據的壟斷，使中國的鐵路現狀，每況愈下。最主要的鐵路如京奉、京漢、津浦、隴海、粵漢等，京奉則在一二次奉直戰爭時破壞很大，北伐軍克服平津以後，就斷絕交通，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通車的希望。京漢則歷年受直皖、直奉戰爭諸役的破壞，尤其是北伐軍克服武漢以後，幾乎長期的因軍事停頓到現在；最近被西北軍炸燬，損失更不堪設想。津浦歷年所受的損失，也和京奉、京漢差不多。隴海、粵漢兩綫，十年來幾乎長期的在軍事管理狀態之下。

再就航業方面說。航業可以分爲三種：遠洋航路、沿海航路與內河航路。遠洋航路是來往各國間的；中國在遠洋航路方面連一艘船也沒有。不僅遠洋航路完全爲外國所壟斷——主要的是英、美、法、日、德——即沿海航路與內河航路，也不能與外國競爭。

本來在世界各國，沿海航路與內河航路，都有專有權，外人不能侵略。但中國自從鴉片戰爭失敗，訂立了江甯條約，五口通商以後，沿海航權，就授諸外人。至於內河專航權的喪失，始於咸豐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條約，開九江、鎮江、漢口等處各商埠。

現在中國最大的輪船公司，是招商、怡和、太古、日清四公司，內中三個是外國的，其規模的比較如下：

公司名	國籍	資本	船隻	噸數	成立年
招商	中國	中幣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三五	三四、六八三	一八七一年
怡和	英國	英金一、二〇〇、〇〇〇鎊	五二	五八、八四七	一八七五年
太古	英國	英金一、〇〇〇、〇〇〇鎊	四七	六〇、四九五	一八七五年
日清	日本	日金一六、二〇〇、〇〇〇元	一二	二五、八〇七	一八九八年

照上面的比例，中國已經遠不及外國了，況且招商等中國輪船公司常常因軍事影響而部分的甚或全部的停駛。長江流域及長江流域附近，一有軍事，長江班華輪往往全部停駛；北方一有軍事，則北洋班華輪不能開行；南方亦常因軍事而致南華班華船全部停班。南華、北洋、長江、是中國航路中最重要的路線，幾乎每年，甚至每季要發生華輪停駛的事情，以致

航業完全爲外輪所壟斷。

資本的不充足、政治的影響、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固然是華輪不能與外輪競爭的主要原因；而管理之不得其人，也是一大原因。中國最大的輪船公司的招商局，其內容之腐敗，早爲人所公知；去年新華輪船（招商海輪中之最優良者）之沉沒，全是所用非人的原故。所以遠洋航路固不必說，即沿海航路與內河航路，中外比較起來，也有天淵之別，可以說，中國的航業，完全是在外人的操縱之下。

據海關報告，中國沿海及內河歷年中外輪船噸數及百分率比較如左：

年代	華船噸數	百分率	外船噸數	百分率
一九一二年	一七、四六〇、二七四	一九·九四	七〇、一〇二、四七四	八〇·〇六
一九一三年	一九、九〇三、九四四	二三·三二	七三、四三〇、八八六	七八·六八
一九一四年	二四、九一二、二二六	二五·八八	七一、三九五、〇四一	七四·一二
一九一五年	二四、一五九、〇〇九	二六·六五	六六、五〇三、九九六	七三·三五
一九一六年	二三、三九七、一〇九	二六·五九	六四、六二二、九九二	七三·四一
一九一七年	二三、〇二二、八一七	二七·四六	六二、八八四、二三二	七二·五四
一九一八年	二一、七八二、七〇四	二七·一四	五八、四六五、〇二二	七二·八六

一九一九年	二七、〇八九、七六三	二八·七九	六八、六三六、一七三	七一·二一
一九二〇年	二七、六五三、三〇九	二六·五一	七二、六一三、三八六	七三·四九
一九二一年	三一、七九一、四七九	二六·七七	八二、八二八、〇六五	七三·二三
一九二二年	三二、八五七、七四五	二六·四六	九一、二七三、六一六	七三·五四
一九二三年	三二、四三三、八四七	二四·七一	九八、八七〇、七〇九	七五·二九
一九二四年	三三、二八八、三六三	二三·五四	一〇八、一四四、四六四	七六·四六

交通是發展實業的第一重要條件；交通不發展，實業就永遠不能發達。中國的交通事業因爲不平等條約及其他種種關係，完全是在帝國主義操縱之下，這眞是中國產業的致命傷。

就企業本身說，近代工業中最重要是煤鐵鑛業了。如前所述，中國的煤鑛和鐵鑛都很豐富，尤其是煤，但是中國的鑛業現狀眞是可憐，不僅是許多寶藏未經開發，而且連已經開採的，幾乎都是在帝國主義壟斷之下。

中國歷年的產煤量如左：

一九一二年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噸
一九一三年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四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五年	一五、四四〇、〇〇〇

一九一六年	一五、五八四、〇〇〇
一九一七年	一七、二〇五、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	一八、〇三三、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三八七、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	二〇、三八一、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一九、八七二、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一九、九五四、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二二、六八一、〇〇〇

據上表看來，中國煤的產量也是逐年進步，而且其增加的速度也不算慢。但其所以增加如此之快，不外少數大煤鑛公司營業的發展；而這些大煤鑛公司，大都是中外合辦或外資獨辦。例如中英合辦開灤煤鑛產量最多，約占全國產量百分之二二；日本南滿鐵路公司經營的撫順煤鑛次之，約占全國總產量百分之十五，而且現在撫順的產量，已超過開灤。茲將中國主要煤鑛，一九二三年的產額及經營者國籍列表如左：

煤礦名	所在地	產煤額(噸)	國籍	備攷
開灤礦務局	河北	四、四九五、六九二	中英	由英工程師主事

撫順煤礦	遼寧	四、七九二、二〇〇	日本	
本溪湖煤鐵公司	仝	三七九、一一〇	中日	日爲主體
淄川煤田(魯大)	山東	五五八、〇四三	中日	仝
焦作煤田(福公司)	河南	六九四、一四三	中英	英工程主事
井陘煤田	河北	六〇〇、二三一	中德	
嶧縣煤田(中興)	山東	七二九、九六〇	中國	主權不全
六河溝煤田	河南	四四四、四四一	中國	主權落英比外人手中
萍鄉煤田(漢冶萍)	江西	六六六、九三九	中國	日本壟斷

煤鑛的現狀如此，鐵鑛也是一樣的在外國操縱之下。中國用新法開採的鐵鑛有：湖北大冶的漢冶萍公司鐵鑛、象鼻山鐵鑛、安徽當塗寶興公司鐵鑛、繁昌裕繁公司鐵鑛、山東益都金嶺鎮鐵鑛、奉天本溪湖本溪湖公司鐵鑛、奉天海城振興公司鐵鑛。茲將這七礦的國籍及產量列表如左：(單位噸)

省區	公司	國籍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備攷
湖北	漢冶萍	中國	六五〇、〇〇〇	三四五、六三三	四八六、六四一	有日本借款故主權在日手
湖北	象鼻山	中國	一六一、五七五	四五、四三九	一四九、一〇六	仝

安徽	寶興	中國	五四、五六五	三四、五八三	四〇、〇〇〇
安徽	裕繁	中國	一六〇、七二〇	二七六、四〇〇	三〇一、六三〇　有日本借款主權落日人手
山東	金嶺鎮	中日	八八、二〇四	二六、三三五	七、六一八　日本操縱
奉天	本溪湖	中日	六七、四三五	——	二五、五一三　仝
奉天	振興	中日	一六九、九四〇	一四三、三六四	一四〇、〇〇〇　仝

漢冶萍公司是中國最大的鑛業公司，但因欠日本鉅款的原故，被日本強迫訂了一種書面的條約，使整個的漢冶萍公司隸於日人的管理之下了。

鐵工業是近代工業的核心，中國鐵工業的現狀，是很落後的。全國新式的冶鐵廠祇有七所，而且幾乎完全在外人壟斷之下。各廠之國籍、鼓風爐之數目及每爐每日出生鐵量如左：

冶鐵所在地	公司	國籍	鼓風爐數目		每日能出生鐵噸數
漢陽	漢冶萍	中國但爲日本壟斷	四座	二座	七五
				二座	二五〇
大冶	仝	仝	二座		四五〇
漢口	揚子	中國	一座		一二〇
廟兒溝	本溪湖	中日（日人主持）	四座	二座	一四〇
				二座	一一〇

鞍山	鞍山製鐵所	日本	二座		二五〇
浦東	和興	中國	二座	一座 一座	一二 三三
石景山	龍煙	中國但有外債一座			二五〇

造船業也是鐵工業中的一種，中國的造船業也都是外國人的勢力。重要者如下：

廠名	所在地	國籍	規模
耶松造船廠	上海	英國	資本五、五七〇、〇〇〇兩、船渠六處、職工三千人。
瑞鎔造船廠	上海	英國	爲上海最大的造船廠
中法求新造船廠	上海	中法	資本一、二〇〇、〇〇〇兩
老公茂鐵廠	上海	英國	
東華造鐵公司	上海	日本	資本三五〇、〇〇〇元
江南造船廠	上海	中國官辦	職工二千五百人
黃浦造船廠	香港	英國	有造船台十二、船塢三、職工四千人。
太古造船廠	香港	英國	
Bacley and Co	香港	英國	
滿洲船渠株式會社	大連	日本	

此外，鐵工業中如兵工廠造幣廠等，對於實業是一無補益的，故不詳述。

主要的工業尚且在外人壟斷之下，產業的運命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就輕工業說。輕工業中最重要的是紡織工業，關於中國紡織工業的現狀，祇要看了棉紗輸入的日增，就可知道是如何不振的了。歷年棉紗進口數如左：(單位擔)

年次	英國紗	香港紗	印度紗	日本紗
一九一二年	一〇、九六五	一三、七一三	一、二九五、五七八	九四九、八〇一
一九一三年	五、一二八	九、六八二	一、三三〇、二二四	一、三〇〇、九二一
一九一四年	四、三一〇	一二、七一五	一、一三七、二二四	一、三三一、七三九
一九一五年	三七〇	一、九四四	一、一七九、三六四	一、四四五、三四五
一九一六年	—	九二、七三八	一、〇六八、三二八	一、三五一、〇〇六
一九一七年	一、八六三	一九、一三〇	三三、五五六、二七八	二九、〇八六、九四四
一九一八年	—	一四、三六六	一六、二九六、〇三六	三五、三五八、八八四
一九一九年	六、一九九	一四、三六六	四一、六〇五、五〇一	三〇、五二五、二〇七
一九二〇年	一、三五八、八六七	二一、八七二	三九、二三七、三三四	三四、七二五、一一七
一九二一年	一、〇六九、六一六	二四、一一三	二四、九九五、七三九	三七、七三三、九六〇
一九二二年	三、二一八、〇〇一	二、八五四	一六、二〇三、五八六	四三、七七三、四七四

其次是關於麵粉工業。自從歐戰告終後，中國的麵粉事業也一落千丈；下面關於麵粉進出口的統計，輸出日減，輸入日增，就可證明近年麵粉工業的如何衰落。

年次	輸出 數量（擔）	輸出 價格（海關兩）	輸入 數量（擔）	輸入 價格（海關兩）
一九一一年	六六九、八八九	二、五二三、七八九	二、一八三、〇四二	八、七〇八、四五一
一九一二年	六三七、四八四	三、二六一、九六八	三、二〇二、五〇一	一二、六九三、八三九
一九一三年	一三九、二〇六	六一〇、一一二	二、五九六、八二一	一〇、三〇〇、六一二
一九一四年	六九、九三一	三三九、八三九	二、一六六、三一八	九、〇一六、五八九
一九一五年	一九六、九三一	六九七、〇三二	一五八、二七三	七九五、一三七
一九一六年	二八八、七四七	一、一四一、〇一七	一二三、四六四	一、一七四、五四四
一九一七年	七九八、〇三一	二二九、三八二	六七八、八四九	二、八一八、五七六
一九一八年	二、〇一一、八九九	八、四一〇、五五七	四、五五二	一九、八四六
一九一九年	二、六九四、二七一	一九、八七二、三一八	二七一、三二八	一、二四二、二八五
一九二〇年	三、九六〇、七七九	一八、二五一、七二二	五一一、〇二一	二、三三〇、二一五
一九二一年	二、〇四七、〇〇四	九、三六六、二五四	七五二、六七三	三、五〇三、五一一
一九二二年	五九三、二二五	五、六五四、八一〇	二、〇六〇、八三八	九、四九七、七四〇
一九二三年	一三一、五五三	七八二、七八八	四、〇一二、七一六	一八、六六八、四七八

一九二四年	一五七、二八五	七一三、九六三	六、六五七、一六二	三〇、〇九七、六九三
一九二五年	二八八、〇六〇	一、三〇三、二九一	二、八一一、五〇〇	一四、九〇四、八三三
一九二六年	一一八、四二一	五三三、三七七	四、二八五、一二四	二三、七一三、五〇二

其他的各種工業，也可以不必再舉例了；這幾種重要工業的衰落，可以證明中國企業前途的黑暗。

中國企業之不能發展，主要的原因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雄厚的資本與精良的技術的壓迫；其次是封建政治的剝削、釐金雜稅的繁多、戰爭的破壞等。舉一個例子來說，日人高柳一郎論中日棉業，曾這樣說：『日本不產棉花，而紡織工業能大發展，中國產棉花而紡織工業不發展；其所以然之故，專在兩國財政制度之不同。日本極力爲此項工業請求獎勵之法，棉花之進口，與棉製品之出口，一概免稅；而對於外國棉製品之進口，則課以重稅，以保護國內紡織工業，使其能與外國貨競爭。中國則不然，其目的在盡量向工商業者徵稅；除此以外，政府以不干涉爲原則。因此之故，可得由棉紗之精粗，分爲兩種觀察之。中國棉花纖維較短，不能用以紡織二十支以上之紗，故想紡細紗，非用印棉美棉不可。

而此項棉花之購入，每擔須納進口稅六錢，棉紗每擔課內國稅七錢。假令外國棉花三、四五擔能紡出棉紗三擔(即一捆)，則每捆棉紗共計須課稅四兩一錢七分。然日本紗輸進中國時每擔僅納稅九錢五分，即每捆僅納二兩八錢五分。單就此點而論，中國紡織業者比日本紡織業者，每捆須多納一兩三錢二分之關稅。次就粗紗言之，中國棉花，例應課釐金等稅，故由國內某地採辦棉花，經過海關時，每擔移出稅三錢五分，移入稅一錢七分五釐，共須納海關稅五錢二分五釐。但中國棉花運至日本時，僅納出口稅三錢五分，且有納子口稅代釐金稅之特權。由此觀之，僅就海關稅而言，中國紡織者中，除能利用附近所產棉花外，須比日本紡織業者每擔多納關稅一錢七分五釐。雖然日本紡織業者因購入華棉紡紗後復運往中國銷售，一往一來，須多耗運費，此中國紡織業者之較勝處也。然中日間運費，因有日本政府航路補助金之故，極其低廉；一九一六年時，每捆紗之運費，僅須日金一元(七錢二分四釐)，故此點亦不足置重也。一九一五年中國棉花出口額爲七二五、九五五擔（內運銷日本者五五一、三二二擔），外國棉花進口額爲三六四、三九〇擔；一九一六年出口額增至八五一、〇三七擔，進口額增四〇七、六四四擔。又中國棉花之品質，均須改良，否則將來紡織業前途發達，

與細紗之製造增加時，外國棉花之進口，必日見增加也。』(見高氏著中國關稅制度論)

國內戰爭的結果，對於產業的發展當然也是很有損失的；可是帝國主義勢力不能打倒，中國革命沒有澈底的完成，國內戰爭是不能澈底消滅的。同樣，釐金雜稅是產業發展的致命傷，但中國革命沒有澈底完成以前，想完全廢除釐金雜稅，這是等於一種妄想。

此外農業手工業經濟的破產，本來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是進化的。但是中國農業經濟的破產，不是企業發展的結果，而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原故。所以農業經濟的破產，不僅對於農業經濟是無意義的，而且是不利的。因爲農業經濟破產的結果，使社會經濟異常的衰落，社會秩序極度的不安，以致人民的購買力非常低下。

社會購買力的消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致命傷。中國今日總不致妄想掠奪殖民地來推銷商品，自然全靠國內市場。所以要發展資本主義，就非提高市場購買力不可；要提高市場的購買力，非打倒帝國主義的掠奪不可。

封建勢力的存在，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中國現在雖然是在農業經濟崩潰的過程中，但封建勢力的社會基礎，依然根深蒂固；而且這些封建勢力有帝國主義的背景——歷來封建

軍閥之必與帝國主義勾結，就是一個例子。

總之，帝國主義勢力存在一刻，中國產業就一刻不能發展。不錯，帝國主義是要崩潰的而且快要崩潰的。但是帝國主義崩潰以後，整個的私有資本主義制度跟着死滅了，到那時整個的世界是非資本主義世界。中國社會經濟的前途，也祇是非資本主義一條路。

自然，決不是說帝國主義崩潰以後，中國就實現共產主義。中國的產業還很落後，離開實現共產主義的條件還很遠；不過中國社會經濟的前程，決不會像歐美一樣經過資本主義之歷史的統治，而是向着非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

第四編　知識分子及過剩人口問題

一　中國知識分子之史的觀察

周谷城

一　緒言

一　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結構是怎樣的？韓昌黎有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製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製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這是講中國社會之結構的最簡明的哲學。中國社會的結構，我近來從線裝書裏反覆考究，覺得牠自古至今，都是一種三重的結構 Threefold structure，裏面包含着顯然可以彼此互相區別的三種人：一，統治階級，就是上文所謂『出令』的這一種；二，被統治階級，就是上文所謂『出粟米麻絲，製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的這一種；三，夾在這兩個階級之間的中間階級，就是上文所謂『行君之令而致諸民』的這一種。三種齊備，便構成

了中國的社會。中國自有歷史以來，任何種人，無不可以直接或間接，分別歸入這三種之內。

二　什麼是統治階級？——什麼是統治階級？換言之，統治階級包括一些什麼人？這個問題，如果要說得明白，至少要著一本厚書，我在這裏，祇能指出幾種極普通的，大家都認為屬於統治階級的，或依賴統治階級而生存的重要成分，略示一個梗概。這些重要成分之中最惹我們注意的，當然是統治階級的總頭子，歷史上所謂君王者。君王是什麼東西？極端的君權論者荀卿在荀子富國篇裏說：『人君者管分之樞要也。』什麼叫做『分』？他在王霸篇裏說：『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分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辨治。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管着這個『大分』的總頭子，便是君王。被統治的百姓，對這個總頭子怎樣呢？富國篇裏說：『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君王出了世，百姓對他便是如此。統治階級裏第二種主

要成分便是貴族，卽歷史上所謂宗室者。一個統治階級的總頭子上了臺的時候，他的全族，無論親近或疏遠，便都尊顯起來。便一律變爲有特權的貴族。他們變成了貴族之後，怎樣生活的？在秦以前，大的小的、親的疏的一切宗室，都領有總頭子所封的土地，以爲生活的源泉。秦時以封土地這個辦法最不便當，最容易使親近與疏遠之間，因分贓不均而發生衝突，便廢去這個法子不用，專以賦稅及賞賜來養宗室。到了漢朝，封土地的這個辦法，又恢復了一部分。漢朝曾把許多宗室插在不世襲的郡守縣令之中坐食地利。從漢朝一直到前淸末年，貴族的主要生活源泉，大都是賦稅同賞賜。秦始皇時，李斯曾有一段講貴族的生活源泉的話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族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漢以後直到淸末，養諸子及功臣的資料，實以賦稅賞賜爲主。君王貴族之外，第三種成分，便是官僚。在國家制度不甚完全的時候，官僚幷不十分重要。到了人民的生產力稍稍進步，社會關係漸漸複雜起來了的時候，支配人民、搾取人民經濟利益的一架機器，所謂政治制度者，也隨着複雜起來了。單祇君王和貴族，尙不能駕駛得如意。於是便需要大批

的官僚。官僚數目之多，在歷史上有時竟多至令人駭怕。例如周初，人口總數，尚祇一千三百七十萬零四千九百二十三（據通考戶口考），而官僚總數竟有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通志職官一）；西漢末，人口總數祇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而官僚總數竟達十三萬零二百五十八員；隋全盛時，人口總數祇四千六百零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而官僚總數有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唐天寶盛時，人口總數祇五千二百九十萬零九千三百零六，而官僚總數有一萬八千八百零五員；我們若於官僚總數上，加上每個官僚所供養的寄生分子至少有八人，（就今世我們目見的情形而論，最小的官吏如科員者，也有一個老太太，一個老太爺，至少還有一個太太、一個小姐、一個少爺、一個男僕、一個女僕，合起自己共計至少也有八人。）於人口總數中減去官僚總數及其寄生分子，再減去君王貴族及其一切寄生分子；那末人民對於統治階級所負經濟上的義務，一定大得可觀。我們現在極希望打倒官僚政治，如有人作出一個複雜的官僚統計表來，一定很有意思。官僚之外，統治階級中的第四種成分，我暫且以一切寄生於這個階級中的寄生分子充之。專門供人滿足性慾的女子，如禮記上所謂：『……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秦始皇養在宮裏三十六年沒有見過的變

幸，唐明皇藏在後宮的三千佳麗，便都是最令人注意的寄生分子。其餘的如奴隸之類，暫且不舉。統治階級的成分的全體，當然不止上述四種。但這四種也足舉其大要了。現在我們且來看一看被統治階級中有些什麼成分。

三　被統治階級之成分——被統治階級中有些什麼成分？韓昌黎所謂：『出粟米麻絲，製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當然是最主要的，出粟米麻絲的，大概是農人；製器皿的，大概是工人；通貨財的，大概是商人。管子上也有所謂士農工商等四民者。士這個東西，據說是四民之首。而在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這個系統之中，僅比庶人高一級，比大夫還低一級。天子、公卿、大夫都有固定的土地，作生活資料的來源。庶人如農工商者又各能出粟米麻絲、製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那末自食其力，當然是天經地義。祇有所謂士者，既沒有固定的土地，（古時上士稍受土地之封賜，現在的智識分子多出於豪富之家，均當別論。）又不能從事力役；我們最好稱之爲中間階級 (Immediate class)。因此純粹的被統治階級成分祇是農工商。農工商三者是統治階級生存的基礎。所以爬上了統治階級的人，必首先要周知人民（農工商）的數目，以便開發自己生活之來源，建立璀璨莊嚴的生活之寶塔，而取

得太平之美名。徐偉長中論上曾說：『……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統治階級自己要人家替他們耕田，非曉得人民的數目不可；要人家進貢納賦，非曉得人民的數目不可；要人家替他造器皿，非曉得人民的數目不可；自己內部要分配經濟上的利益，非曉得人民的數目不可；要人家替他們服勞役，非曉得人民的數目不可；要人家替他們打仗，非曉得人民的數目不可；要建立國家制度，非曉得人民的數目不可；要整飭家族制度，非曉得人民的數目不可；要用禮、要用刑、都非曉得人民的數目不可。人數爲庶事所自出，爲一切制度的標準。徐偉長這段話，把被統治階級對於統治階級的重要之所在說明了。把統治階級必須要倚靠被統治階級的道理也說明了。可算是一篇統治階級的『唯人史觀』，可與『唯物史觀』比美。『唯物史觀』以物質爲社會上層結構之基礎，『唯人

史觀』便是以人民爲統治階級的一切上層結構之基礎。孟子也早就懂得這個道理，所以早就說了一聲『民爲貴』。若因此便說孟子有德莫克拉西的思想，那到底寃枉的他老人家。

四　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關係——這兩者的關係，謂『民爲貴』的孟子有一個言簡意賅的總說明。孟子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個說明，再簡潔明顯沒有了。中國自從周初的時候起，（紀元前二百年的時候）一直到現在，社會上有很顯明的三個階級。一是統治階級，二是被統治階級，三是夾在這兩者之間的中間階級；在上文中國社會之結構一節內已經說及。統治階級的勞動是精神的，叫做『勞心』；他們的工作，是駕駛一架很複雜的機器，叫做管理政治；他們所得的酬報是吃現成，叫做『食於人』。被統治階級的勞動是肉體的，叫做『勞力』；他們的工作是生產，養活統治階級全體，叫做『食人』；他們所得酬報，是被人家管理，叫做『治於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關係是這樣。至於夾在這兩者之間的所謂中間階級又怎樣呢？（一）這個階級最主要的成分是什麼？（二）牠在社會的結構中、歷史的過程中、有什麼功用？（三）牠對付統治階級與對付被統治階級用的什麼法子？取的什麼態度？（四）在今日的中國還有一個這樣的

中間階級沒有？如果有，其成分、其性質、其命運又何如？凡此等等，我們高興的時候，都可以研究出一些趣味來。下面我就要講這個階級了。

二　智識分子

五　智識分子的意義——統治階級的主要成分，是君主、貴族、官僚、以及其他的寄生蟲；被統治階級的主要成分是農、工、商。中間階級的主要成分呢？從歷史上看，祇有智識分子足以當之。智識分子是什麼？在英文中近來有一個最時髦的字，叫做 Intelligentia，與我們這裏所謂智識分子四個字的意思頗相近。但這畢竟是一個外國字，我們不好拿來應用。在國文中，近來也有一個流行的名詞，叫做『士大夫』，與智識分子四個字的意思也相近。但『士大夫』這一個名詞，我不想採用，因爲（一）『士大夫』三字原是由士與大夫兩個名詞所合成的。士與大夫兩個名詞在歷史上各有各的特殊意義。就拿士來說罷，禮王制上所謂天子之元士、諸侯之上士、中士、下士等等固叫做士；而孔安國之所謂辨曲直的理官也叫做士，這樣的士，與我們現在所以謂學士博士碩士以及在學校讀書的所謂士子便全然不同了。再就大夫兩字說，在歷史上，曾有一個時候所謂大夫，明明是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這個系統

中的一級，其意義更是特別。雖然從前曾有人把士大夫三字連綴成一個名詞用過：如顧炎武日知錄所謂：『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即是其例；但(二)現代社會上有許多樣式的人，全然是西洋機器文明輸進以後新生出來的，原來的『士大夫』三字決不足以當之。例如大學教授，我們現在如果直稱之為士大夫，未免太不自然，又如律師以及替書店裏老板當編輯的，替報館裏老板採訪新聞的，也一律稱之為『士大夫』更是離開了事實。所以我們最好把『士大夫』作為機器文明輸入中國以前的智識分子之稱呼，把智識分子作為機器文明輸入中國以前的智識分子的稱呼。在事實上，『士大夫』的範圍應該小些，智識分子的範圍應該大些。智識分子可以包括『士大夫』，但『士大夫』很難包括現代機器文明裏的新智識分子。所以我決定用智識分子這一個範圍較廣的名詞，來代替『士大夫』。

智識分子是什麽？很難用一句簡單的說明。我們現在且從積極消極兩方面找出牠的近似的意義來。從積極方面說，智識分子的生活內容，主要的成分屬於智識。或則創造新智識，如周末的老、孔、墨等即其實例；或則保存舊智識，如漢代的博士、經生即其實例；或則宣傳智識，如報館編輯、學校教師之類即其實例；或則販買智識，如書店裏的翻譯員之類即其

實例；或則以智識作游戲品或粉飾太平之具，如作兩都賦、三都賦的那批人即其實例。現在且不多舉了。總而言之，智識分子的生活內容偏重智識的；再從消極方面說，智識分子的工作是不生產的。中國亘古以來完全生產的祇有農人、工人、商人還祇是幫助生產的。若智識分子，則完全不生產，他們的工作，有時雖極忙碌，但與生產無關。他們不是農人，不事農作。雖然智識分子有時候也種田；例如陶淵明，本是智識分子，『也曾種豆南山下』也曾『戴月荷鋤歸』，好像農人一樣。但他究竟不是農人，他祇是做官做得不耐煩了，歸而享福、歸而作隱士。中國向來的智識分子，多有老來種田的。但祇是一些在政治一方面落伍的隱士。論語上：『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這便可以表示智識分子之不從事生產工作。

六　智識分子的發生——這種依智識爲生活，不從事實際生產工作的智識分子，在歷史上如何發生的？這祇要考究一下中國社會進化史，也很容易找出一個答案來。中國社會的進化凡可以分爲五個階段：黃帝以前，爲第一個階段；從黃帝到周初爲第二個階段；從周初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爲第三個階段；從秦到清末爲第四個階段；從清末到現在爲第五個階段。黃

帝以前爲游牧的部落社會，當時祇有部落與部落的相撞，而無部落中階級與階級的對立；故當時國家的組織尙無踪影，統治階級尙未成立。所謂官僚，在當時最是不關重要，也可以說沒有。從黃帝到周初爲由部落社會過渡到國家社會的時代。黃帝自戰勝蚩尤以後，儼然成了一個國王。據歷史上說，當時許多部落都服從他；那末當時可以說有國家的影子了。直到周初，國家的形式，便完全成立。在這個過渡時代之中，因統治階級的漸漸成立，公共事務的漸漸紛繁，便發生官僚。所以舜帝也令五官，然周初的官吏是多得可怕。從周初到秦始皇，爲型成統一的專制一尊的國家之過渡時代。這個時代，事務愈繁，官僚愈不可少。自秦至於清末，統一的專制一尊之制，從沒有改換面目。在這個長時期中，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完全對立。因社會生產關係漸漸複雜的原故，統治階級的事務比較的紛繁。又因統治階級中貴族的昏庸，官僚乃變成了不可須臾或少之物。若在現代社會正向資本主義的路上前進，更需要許多新式官僚。在歷史上，官僚是如此重要的。然則官僚究竟是那裏來的？官僚的總源泉是什麼？這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智識分子是也，歷史上官僚制度的重要，逼出智識分子的生產。故我們可以說，官僚制度是產生智識分子的總原因。

時候，便首先要製造智識分子，於是乃有所謂教育或學校的制度發生。有了智識分子，又要加以挑選，於是乃有所謂考試或選舉的制度發生。周官上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便是教育的開始。自周初直至今日，歷代都有製造智識分子的教育機關與學校制度。至於挑選智識分子方法呢？歷史上更有極詳的記載。據說挑選智識分子這一件事，是皇帝哲學史中的第一課。一個皇帝，如果這件事弄好了，能選拔眞才，他的天下，便可以治理得太平。王制上所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便是這個挑選方法的開始。漢朝舉士，分(一)賢良方正，(二)孝廉，(三)博士三種；也是屬於這個挑選方法的事情。魏晉時代的『九品中正』之法，也是一種挑選的方法。唐朝的設科取士，也是應用這種挑選方法。前淸用八股文考智識分子，也不失爲一種挑選的方法。這種挑選智識分子的方法，最初固然是用來選拔人材的。但後來智識分子多了却變成了牢籠智識分子的方法，擴而充之，竟變成游民政策。智識分子多了，沒有做官，自然要成游民。一成游民，便可以爲害。這一個

七　考試與舉業——官僚與智識分子的關係，既然是這樣接連的。那末國家需要官僚的

事實，蘇子瞻志林游士失職之禍一條內說得最有趣味。游士既然失職爲害，統治階級便當設法禦防之。游民政策便是一種極有效的禦防政策。這個政策，用來最奏奇效的，算是前清。前清把一班稍有聰敏的智識分子，一律吸收到北京（現在的北平），使動彈不得。在北京的工作，也有笑死人的地方。例如抄寫古籍，也是他們的重要工作之一種。我有一次遊西湖，偶然在文瀾閣裏，看見他們在前清所抄的一部四庫全書，眞箇令人佩服他們的奴性之強。前清的游民政策，也就的確高明極了。不獨前清如此，中國歷代都有很好的游民政策。死去了的黃遠生，在他的遺著中游民政治一文（見遠生遺著）中有扼要之言曰：『吾國數千年之政治，一游民政治而已。所謂學校、所謂選舉（古之選官之制）、所謂科舉、皆養此游民使勿作祟者也，游民之性，成事則不足，而敗人家國則有餘。故古之所謂聖帝、明王、賢相、名吏也者，盡其方法而牢籠之，奪萬民之肉食而豢養之。養之得法，則稱治世；養之不得法，則作祟者蜂起矣。』這段話確實乾脆極了。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學校、所謂選舉、所謂科舉；從好的一方想去，固然可以叫做挑選人才的方法；若從壞的一方面想去，稱之爲游民政策，是千眞萬確的。

統治階級有了這個游民政策，或挑選人材的方法之後，許多有聰敏的人，就跟隨着牠活動起來。胡適之在他的白話文學史上卷第一章有一段扼要之言曰：『皇帝祇消下一個命令，定一種科舉的標準，四方的人自然會開學堂，自然會把子弟送去讀古書，做科舉的文章，政府可以不費一個錢的學校經費，就可以使全國少年人的心思精力都歸到這條路上去。』這條路的出口在那裏？是什麽？我們且襲用一個舊名詞，稱之爲舉業。舉業就是『上致君，下澤民；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的業。蕭一山清代通史八九六頁引有儒林外史第十三回一段話說：『「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祇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做官了；所以唐人都會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了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

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智識分子竭心力於舉業，統治階級施行著游民政策；兩者合巧，野蠻社會，居然也就文明起來了！

三　智識分子的功用

八　提倡學術——現在我們且依純粹的客觀的見解，來看一看智識分子，試看他們在歷史上有過什麼功用。我們從歷史上一直看下來，我們覺得智識分子在各時代，都能顯出最重要的功用。且從周末講起：周末學術思想之發達，在中國歷史上前後各時代都少有能比得上的。據梁任公整理的結果，當時的學派，凡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來研究（見飲冰室文集）。第一個時期叫做南北對峙時期，這個時期有兩個對峙的學派：曰南派，曰北派；南派以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儒者之徒為正宗。北派以老子莊子列子楊朱及其他老學之徒為正宗。第二個時期為三宗鼎立時期。三宗是些什麼呢？莊子天下篇裏所謂老孔墨三家的學說是也。這三家的學說，又可以細分為許多小派。例如孔學便有小康、大同、天人相與、心性、考證、記纂各派；老學便有哲理、厭世、權謀、縱樂、神祕各派；墨學便有兼愛、游俠、名理各派。第三個時期叫做六家分立時期。六家是些怎麼呢？太史公司馬談所謂陰陽、儒、墨、名、法、

道德諸家是也。陰陽、儒、法、名、墨各家，可以算爲北派，道家可算爲南派。第四個時期叫做分裂混合時期。這時期主要的學說，有漢書藝文志上所列的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農家、雜家等等。由這幾家學說發生出分裂與混合的兩種作用。到最後祇剩下韓非李斯爲分裂混合的總結果；與秦始皇的統一之局相輝映。政治統一了，學說也跟着統一起來——先秦的智識分子在學術方面爲怎麼這樣起勁呢？王桐齡在他的中國史第一編第四章裏舉了七個原因：『一由於蘊蓄之宏富也，……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這些原因之中，「人材之見重」一條，特別有力。當許多國家並立，互爭雄長的時代，統治階級自己，無不是手忙脚亂的。這個時候：智識分子若能替統治階級找得一條出路，統治階級沒有不歡迎的。再就智識分子自身著想，智識分子果能替統治階級找得一條出路，實際上也就無異於替自己找得一條出路。王氏在「人材之見重」這一條下說：『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愚；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能之徒，故利民之智。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材，救飢救渴。又

不獨獎勵本國之人材而已，且專吸收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爲雄；失則恐其走胡走越，以爲吾患也。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精研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頗有勢力無恥者（頗有兩個字未免太客氣了），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徧天下。』這段話說得十分淸白。在一方面統治階級需要人材。在另一方面，智識分子熱中勢力。以需要人材的統治階級與熱中勢力的智識分子相遇，不知不覺之中，遂發達了學術思想；這樣發達出來的學術思想，當然是要便於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所以老子說：『……爲天下渾渾焉；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孔子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墨子說：『……天子之所是，必皆是之；天子之所非，必皆非之。』要幫助統治階級找出路，當然衹有這種講法最好。中國幾千年的學術思想，祇有在倫理政治一方面比較的高明，其原因就在「智識分子祇幫助統治階級」這一點。到今只還有許多縉紳先生引以自豪的，所謂精神文明，其基礎也就在這一點。

九　保存古典——諸國並立互相競爭的周季過去了；統於一尊、專制萬姓的漢代經過秦始皇做了一番披荊斬棘的工作之後，便漸漸到來了。在諸國並立，政治未統一的時候，學術

思想，是可以不統一的；若政治已經統一了，而學術思想反紛紜複雜，那是萬萬要不得的。所以秦始皇三十六年的時候（西歷紀元前二一一年），李斯便上書曰：『異時諸侯幷興，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萬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主勢降乎上，黨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者燒之。』要統一學術思想，李斯這種辦法，當然也是很好的。統一學術思想未必就是消滅智識分子。所以在專制一尊的漢代，學術思想雖然統一了，然智識分子仍是大行其時。智識分子在漢代作什麼？一言以蔽之曰：『保存古典。』在秦以前經過孔子整理的詩、書、易、禮、以及孔子自己所作的春秋，到了漢代，都是古典了。這些古典裏包含著維護統治階級的兩種根本思想：一曰宗法思想，二曰封建思想。政局既經統一的時候，這些思想，照理，應該發揮光大。保存，自是絕對的必須。漢代的智識分子，就擔任了這絕對必須的工作。智識分子在什麼地方保存古典？據歷史上說是在太學裏。漢武帝元朔五年的時候（西歷紀元前一二四年）董仲舒勸皇帝興太學說：『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天下之材。』所謂

太學，便是一個這樣的傢伙。智識分子之保存古典，更膺有兩種好聽的名稱：一曰博士，是專門講古典的。他們講古典，有一定的家法，必須遵守。漢武帝建元五年（西歷紀前一三六年）所置的五經博士，後來又復分而爲十四的博士，卽是實例。皮錫瑞經學歷史上說：『劉歆稱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自建元立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其後五經博士，分爲十四：易，立施、孟、梁邱、京四博士（依這四家家法講經的博士）；書，立歐陽、大小夏侯三博士；詩，立魯、齊、韓、三博士；禮，立大小戴二博士；春秋，立嚴、顏二博士；共爲十四。漢人治經，各守家法；博士教授，專主一家。』二曰弟子員，是專門習古典的。武帝時弟子員祇五十人，昭帝時加至百人，宣帝時加至二百人，元帝時加至千人；後來到了質帝的時候，竟加至三萬人，這算多得可以了！包含著封建宗法兩大思想的古典，便是這樣保存起來了。因幾千年以來的政治制度沒有變動，歷代的統治階級都需要封建宗法兩大思想以作護符；於是博士大精深的古典，便整整的保存了幾千年，直到張之洞等提倡所謂西政西藝的時候，還舍不得去掉了，還曰：『中學爲體！』

一〇　作好官——保存古典，還算不得最重要的功用。智識分子對於統治階級最根本最

重要的功用，在作好官。歷代的考試制度、選舉制度、學校制度等等，都是用以挑選智識分子使之替統治階級作好官的。統治階級最大的一種工作，據歷史上說，也就在選拔能作好官的智識分子。這種工作如果弄得好，政治便可以清平；這種工作弄不好，政治沒有不精的。這種工作弄得很好的，在歷史上我們可以拿東漢時代的事實來說明之。東漢的智識分子都是從古典裏面出來的，保存古典，本是智識分子的一種功用。實在這保存古典的過程中，却訓練一些能作好官的工具出來了。東漢二百年間，頗收了他們一些實效。智識分子很有些替統治階級作了好官的。例如東漢歷代的賢相，則有太尉鄭弘、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袁敞、太尉楊震、李固、杜喬、黃瓊、揚秉、直臣則有尚書僕射郅壽、樂恢、尚書韓稜、太僕來歷、司隸校尉虞詡、光祿大夫張綱、尚書張陵、冀州刺史朱穆、度遼將軍陳龜、白馬令李雲、弘農椽杜衆、五官中郎將爰延；循吏則有九江太守宋均、蜀郡太守范廉、雒陽令周紆、臨淮太守朱暉、廷尉陳寵、中牟令魯恭、洛陽令王渙、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朗陵相荀淑、嬴長韓韶、林慮長鐘皎、太丘長陳實、雍丘令劉矩、會稽太守劉寵、南陽太守劉寬。凡此等等，都是好官，都能替統治階級盡了應盡的責任。東漢的統治階級為什麼能得到這些

智識分子，替他們作好官呢？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上有條說：『自戰國豫讓、聶政、荆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尙，一意孤行，能爲人所不敢爲，世競慕之。其後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徇人刻己，然諾不欺，以立名節。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名譽可以獎勵出好官來，我們也不能說是稀奇事。

一一　毫無用處的智識分子——能作好官、能替統治階級作極有用的工具，如上節所述者，在歷史上，實在是少見的事。與這種少見的事實恰恰相反的，在歷史上又有一種很令人注意的事實，六朝時候的淸談之習是也。六朝時候，智識分子差不多全然沒有用處了。他們當時的好尙之總名稱，叫做淸談。這些智識分子，可以分爲下列各派：一曰怕惹禍害的韜晦派，管甯、邴原、王烈等屬之；二曰高自位置的鄉愿派，王祥、司馬孚等屬之；三曰不自檢點的放蕩派，嵇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等，所謂竹林七賢者屬之；四曰喜說空話的虛浮派，何晏、王弼、樂廣、衛玠、阮瞻、郭象，以及竹林七賢屬之；五曰窮奢極欲的豪奢派，羊琇、王愷、石崇等屬之。這些智識分子，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呢？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中六朝淸談之習一條曰：『淸談起於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謂天地

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是時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談虛浮，不遵禮法。籍嘗作大人先生傳，謂之禮法君子，如蝨之處褌。其後王衍、樂廣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首。後進莫不競爲浮誕，遂成風俗。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其時未嘗無斥其非者，……而習尚已成，江河日下，卒莫能變也。……其中未嘗無好學者，然所學亦正以供談資。……當時雖從事於經義，亦皆口耳之學，開堂升座以才辨相爭勝。……風氣所趨，積重難反。直至隋平陳之後始掃除之。』智識分子這樣無用，習氣變成這個樣子，究竟由於一些什麼原因呢？蔡元培在中國倫理學史上舉了五端：一曰經學之反動，二曰道德界信用之失，三曰人生之危險，四曰南方思想潛勢力之發展，五曰佛教之輸入。這五個原因對於清談之習之產生，當然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但人生之危險這個原因最爲顯著。王桐齡中國史第二編第三章論晉室士風之影敝一節裏也頗置重這個原因。其言曰：『……東漢末年，名士輩出。尚氣節，重名義，委身於道德，不以利害爲去就。黨禍一起，殺人如草。俊顧廚及，一網打盡。其學節冠一世，

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駢首就戮，若屠羊豕。人心旁皇，罔知所適。於是反對之風起：以隱匿晦，爲潛身遠禍之計。其末流所極，變爲風流放誕，浮虛詐僞。』人生危險這件事，本可以逼智識分子走風流放誕這條路。中國史上這樣的實例，歷代都有。不過六朝時特別的多些，遂引起人家的注意了。

一二　粉飾太平的智識分子——前面所說的智識分子，是完全沒有用的。但有時候實際上毫無用處的智識分子，若站在統治階級一方面觀察却可以發現他們的大用出來。這個大用在那裏呢？替統治階級粉飾太平是也。粉飾太平的這種用處，我們可以稱之爲無用之用。歷代的統治階級，祇要在他們自己那個階級裏面立穩了脚根，沒有不想藉智識分子來粉飾太平的。例如漢高祖初爬上統治階級的時代，四方多事，尚須用干戈，未遑庠序之事；然而對於智識分子，却曉得利用。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既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能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東漢的時候，光武初爬上了皇帝

的地位，也就趕快的鈎結智識分子。通考學校考曰：『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在晉朝也是一樣。武帝初年，當太學生的智識分子，祇三千人；到太始八年的時候，就增加到了七千餘人。隋朝的煬帝，也曉得這個法子。通考學校考曰；『煬帝卽位之後，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較開皇時更盛）。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到了唐朝，更是入了大一統的時代。太平盛世的景象當然更值得特別粉飾舖張。智識分子，在這個當兒有大用了。我們現在且拿唐朝利用智識分子以粉飾太平的事跡來作個實例。唐朝第一件利用智識分子以粉飾太平的事就是開設學校。唐初中央的學校有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等。國子監底下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律學、六者。國子學的學生，據通考學校考所載，凡有三百人；太學學生凡五百人、四門學學生凡千三百人、律學學生凡五十人、書學學生凡三十人、算學學生凡三十人、中央的學校之外，就是地方的學校。地方的學校有所謂京都學、京縣學、府學、州學、縣學等。京都學學生凡八十人，府學又分爲大都督府學、中都督府學及下都督府學；前兩者學生各六十人，後者學生五十人。州學又分爲上州學、中州學、及下州學；學生人數，上州學六十人、中州

學五十人、下州學四十人。縣學又分爲上縣學、中縣學、中下縣學及下縣學；學生人數，上縣學四十人，中縣學及中下縣學各三十五人，下縣學二十人。祇有京縣學規模大些，學生人數凡有五十。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很少有的。所以當時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國，都派遣子弟到唐朝來留學。眞可謂極太平盛世之大觀了。

第二件利用智識分子以粉飾太平的事就是施行考試制度。唐代選拔智識分子的方法，比任何朝都複雜些。通考選舉考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合選舉與學校兩種制度，有唐一代，竟把四方的智識分子通羅致到統治階級一邊，而爲統治階級作粉飾太平之工具。

一三　桎梏人性的智識分子——由上述各節看起來，我們雖不能斷然的說，某時代的智識分子祇有某種功用；然就大體上說起來，我們却可以說：周末的智識分子有提倡學術的功

用，西漢的智識分子有保孝古典的功用，東漢的智識分子有作好官的功用，六朝的智識分子功用極少，唐朝的智識分子有紛飾太平的功用。現在我們且看宋元明各時代的智識分子，其顯著的功用又如何。這幾個時代的智識分子，我們可以大膽的說桎梏了人性，原來這幾個時代，是理學最昌明的時代。在北宋有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以及程門諸子等所謂理學大師；在南宋有朱晦菴、陸象山以及朱門弟子等理學大師；在元朝也有許魯齋、吳草廬一輩的理學大師；在明朝更盛了。有吳康齋、薛敬軒、胡敬齋、陳白沙、王陽明以及王門諸子等理學大師。這幾個時代裏，理學這樣昌明。理學是什麼？據戴東原說：理學是害死人的東西，是壓制人性的東西，他在孟子字義疏證上卷裏有反理學之言曰：『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人之欲，而王道修。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者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

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之書，豈常以理爲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發爲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理學家是否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我們且不管牠。但理這樣東西既是如此，那的確要不得，的確足以桎梏人性。然而宋元明的智識分子所宣傳的又大都是這個，所以我們可以說：宋元明的智識分子是桎梏人性的。桎梏人性，使人人都變成奴隸，那是統治階級所最歡迎的。所以桎梏人性這件事，站在統治階級方面說起來，還是智識分子的一種頂重要的功用。

智識分子的功用，當然不如上面這幾節裏所說的這樣簡單。不過我們要盡量說出來，却很不容易。現止於此。且從另外一方面，來看看智識分子對於統治階級的態度。

四　智識分子對統治階級的態度

一四　乞憐的智識分子——智識分子對於統治階級的態度，可以大別爲下列數種：(一)央求統治階級的垂顧，就是這裏所謂乞憐的這一種；(二)無恥的諂媚；(三)替統治階級効死力；(四)不合作；(五)反抗。我們且先從第一種講起，從歷史上看，智識分子乞憐於統治階

級，希望統治階級照顧，這類的事實在太多了，要詳細說起來，非常繁瑣。我們在這裏祇能舉幾個實例。例如孔子，就是第一個乞憐於統治階級的人。他自從去魯，周遊列國，後來復反乎魯；曾不稍嫌麻煩，都是爲的要博得統治階級的垂顧。論語陽貨篇述一段故事曰：『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這種干進的心，子路那種蠻漢子都阻牠不住，總算熱到可以了。又有一次，他同子路向兩個種田的人叫做長沮桀溺者問路；他發覺了這兩個人頗明世故，同時又感覺自己沒有爬上政治舞台之無聊。便長歎一聲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子本是智識分子的模範，他對統治階級是這樣的。再拿孟子爲例。孟子也是一個向統治階級搖尾乞憐的。孟子滕文公上述他舍不得離開齊國的故事曰：『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予三宿而出晝，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這樣厚的臉皮眞不是小丈夫。不過希望齊王叫他打轉身那就錯了。孟子祇有一張空嘴，齊王是不會叫他打轉身的。楚國的屈原以及漢朝的東方朔這一類的人，更於文字上，把乞憐於統治階級的精神表現得十足。屈原的離騷全然是這種精神的結晶；東方朔的文章裏，也無處不表現這種精神。楚辭怨思篇裏有言曰：『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慚兮，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所說如此，不知後來果得了一見沒有。又漢書東方朔傳裏還有他一段上書自薦的妙文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

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這樣向統治階級乞憐的，歷史上並不止東方朔。不過我們舉了這個例，也就可見一般了。

一五　智識分子之無恥——上述的智識分子，當其沒有找到主人的時候，便栖栖皇皇，若喪家之狗，向統治階級搖尾乞憐，眞是可憐極了。但未必十分可恥。若比此更進一步，不顧一切，一味向有權勢者要求，橫豎要插到統治階級隊伍裏面去當走狗，那却有些可恥了。然而歷史上這樣可恥的事情正復不少；例如唐朝的智識分子，便極無恥。通考選舉考引江陵項氏之說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爲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我們讀了這段，頗可以替智識分子肉麻一下。然而更有甚於此者。柳詒徵中國文化史明季之腐敗及滿清之勃興一章裏面，引了宗臣報劉一丈的一封極令人肉麻的信曰：『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貴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

袖金以私之！卽門者將刺入，而主人又不卽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卽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矣，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卽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毋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卽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

這種情形，在今日算是普通極了。不過仔細想起來，到底有一點難堪。所以智識分子若運氣不好，那是極不容易過日子的。所以以今日的智識分子，面皮向來不厚的，也常練習練習，把面皮弄厚起來，以便度那不行時的厄運；不願把面皮弄厚的，就祇好在社會上搗亂。若搗亂搗到統治階級的門上去，便叫做革命。

一六　効死力的智識分子——智識分子，沒有找到主人的時候，便棲棲皇皇，若喪家之狗，向統治階級乞憐。更甚的便喪盡廉恥向統治階級糾纏不已。若一旦找到了主人，又怎樣呢？最好的便是爲統治級出死力，以博得忠僕之美名。在歷史上，這類的事跡實在不少。我們且拿明朝直言極諫的士大夫作例。明朝的士大夫，往往有替統治階級効死力的。其忠實之處，的確令人佩服。王桐齡中國史第三編第七章言路之多事一節說：『明世士大夫，好以氣用事。對於君主及宰相之舉動，督責太嚴，絲毫不相假借。朝廷有大事起，不能酌理準情，婉言規勸；動輒呼朋引類，明目張膽，喧呼聒噪以爭之。彰君之失，明己之直；使君主老羞成怒，無轉圜之餘地，圖博一己之名，而於國事，毫無補益。若憲宗時之孝莊皇后合葬裕陵議，世宗時之大禮議，神宗時之張居正奪情議及建儲議，其尤著者也。而持論深刻，遇事生風，推測過深，其所欲加之罪名往往超出對象者應得罪名之上。若三案問題，其最甚者也。張差一妄男子，持挺入東宮，諸臣必欲加鄭貴妃以主使之名！李可灼一庸醫，誤用藥殺人，諸臣必欲加大學士方從哲以弒逆之罪；李選侍一婦人，戀戀於乾清宮，安土重遷，亦人之常情；楊漣責其陰圖專擅，以攻選侍！及移宮以後，賈繼春又倡言選侍投繯自盡以誣帝。附會

宮禁，捕風捉影，狺狺爭論，經年不休。積習相沿，幾成痼疾。及其末流，卒以此敗！魏忠賢一市井無賴，非有操莽等跋扈之才，李林甫、元載、秦檜、嚴嵩等陰險之智。諸臣不能防之於機先，用非常手段，誅以靖內難；而乃搖脣鼓舌，拖筆弄墨，明目張膽，與之打口舌官司！熹宗一黃口孺子，生長深宮，育於宦官臣妾之手；既未教養於未即位之前，豈能責其明斷於已即位之後。對牛操琴，向石說法，甚無謂也。卒之帝之於諸臣所奏，無所可否，一切委之忠賢！忠賢乃誣以罪名，逮捕諸賢，次第受戮，若屠羊豕！正人皆盡，國隨以亡。甚矣狹義之程朱道學養成之之八股先生，不足與語通權達變也！』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明言路先後習氣不同一條更把智識分子効死力於統治階級的情形表現得十足。其言曰：『有明一代，建言者先後風氣亦不同。自洪武以至成化、宏治間，朝庭風氣淳實，建言者多出好惡之公，辨是非之正，不盡以矯激相尚也。正德嘉靖之間，漸多以意氣用事。……然亦有未可概論者。如劉瑾亂政，御史蔣欽疏劾之；廷杖三十！再劾，又杖三十！越三日，又草疏燈下。聞鬼聲，欽知是先靈勸阻；奮筆曰：業已委身，不得復顧；死即死，此疏不可易也，遂上之，又杖三十而死！許天錫欲劾瑾，知必得禍，乃以尸諫！夜擊登聞鼓縊死，而以疏預囑家人於身

後上之！世宗時，楊最等既以諫齋醮杖死，嚴嵩當國，又殺楊繼盛、沈鍊等；而御史桑僑、謝瑜、何維柏、喻時、童漢臣、陳紹、葉經、鄒應龍、林潤等；給事中王韜孟、陳塏、沈良才、厲汝進等猶先後疏劾。廷杖譴戍，至死而不悔！且帝深疾言官；以杖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困之。如沈束在獄，凡十八年！傳贊謂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可見諸臣雖不免過激，而出死力以爭朝廷之得失，究不可及也。』智識分子也是人類，竟肯不顧性命，替統治階級這樣出死力的盡忠！我們於此，可以看出統治階級魔力之大。

一七　智識分子之不合作——雖然，我們若從反面看去，智識分子對於統治階級，在歷史上，也有表示不合作的，甚且有從理論上反對統治階級的。前者之例，無論何種時代，都尋得出。皇甫謐高士傳裏所列的那九十幾個高士，鄭樵通志隱逸傳及欽定續通志隱逸傳裏所列的那些隱逸之士便是實例。這班高士或隱逸之士的不合作，原因也極複雜。有的恨繼起的統治階級比前代被推倒的統治階級不得高明，而不願合作。例如殷代的伯夷叔齊，謂周武王伐紂爲以暴易暴遂不願與之合作，甯肯餓死在首陽山上，即是其例。有的是憤統治階級太橫暴了不肯合作的。例如商山四皓，本是秦的博士，後來看見秦始皇橫暴到不像樣子，便逃到

商山；直至漢高祖已經爬上了統治階級，請他們出來，他們還不出來。有的是不願爲人家的工具而不合作的。例如西漢的逄萌，本曾做過亭長。後來自己歎氣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跑到長安，棄官不作。有的是輕視統治階級裏的人物，而不甘心合作的。例如嚴子陵對漢光武就是這樣的。有的是根本反對統治階級之存在的，那便不知不覺與統治階級，完全脫離了關係，而跑到人民一方面來了。這在智識分子中算是鳳毛麟角，下一節裏，我們特別要來述一述他們反對統治階級的學說。現在我要把高士傳裏那九十幾個人（與通志上間有重復的）及通志與續通志裏所列的那許多人的名字通通抄下。從他們的傳裏，可以找出許多有趣的事，他們的態度，也特別不同。我們有閑工夫的時候，很可以拿他們研究一下；因爲他們在歷史上，比較算是要臉一點的。

高士傳裏所列，自堯至魏不與統治階級合作的智識分子：被衣、王倪、齧缺、巢父、許由、善卷、子州支父、壤父、石戶之農、蒲衣子、披裘公、江上丈人、小臣稷、弦高、商容、老子李耳、庚桑楚、老萊子、林類林、榮啓期、荷蕢、長沮桀溺、石門子、荷篠丈人、陸通、曾參、顏回、原憲（以上列卷上）；漢陰丈人、壺丘子林、老商氏、列御寇、莊周、

段干木、東郭順子、公儀潛、王斗、顏斶、黔婁先生、陳仲子、漁父、安期生、河上丈人、樂臣公、蓋公、四皓、黃石公、魯二徵士、田何、王生、摯峻、韓福、成公、安丘望之、宋勝之、張仲蔚、彭城老父、韓順、鄭樸、李宏、向長、閔貢（以上列卷中）；王霸、嚴光、東海隱者、梁鴻、高恢、臺佟、韓康、丘訢、矯愼、任棠、摯恂、法眞、漢濱老父，徐稺、夏馥、郭太、申屠蟠、袁閎、姜肱、管甯、鄭元、任安、龐公、姜岐、荀靖、胡昭、焦先。（以上列卷下）通志隱逸傳第一所列不與統治階級合作的智識分子：伯夷、叔齊（殷）、四皓、嚴君平（前漢）、野王二老、向長、逢萌、周黨、王霸、嚴光、井叔、梁鴻、高鳳、臺佟、韓康、矯愼、戴良、法眞、漢濱老父、陳留老父、龐公（後漢）、張臶、胡昭、焦先、扈累、寒貧（魏）、孫登、董京、夏統、朱冲、范粲、魯勝、董養、霍原、郭琦、伍朝、魯褒、氾騰、任旭、郭文、龔壯、孟陋、韓績、譙秀、翟湯、郭翻、辛謐、劉驎之、索襲、楊軻、公孫鳳、公孫永、張忠、石垣、宋纖、郭荷、郭瑀，祁嘉、瞿硎先生、謝敷、戴逵、龔元之、陶淡、陶潛（晉）；隱逸傳第二所列：宗炳、沈道虔、孔淳之、周續之、戴顒、翟法賜、雷次宗、郭希林、劉凝之、龔祈、朱百年、關康之、漁父（宋）；褚伯玉、顧歡、杜京產、

明僧紹、臧榮緒、宗測、吳苞、徐伯珍、沈驎士、庾易、劉虯、沈顗（齊）、何點、阮孝緒、劉歊、鄧郁、陶弘景、諸葛璩、劉慧斐、范元琰、庾詵、張孝秀、庾承先（梁）、馬樞（陳）、眭夸、馮亮、李謐、陳修（後魏）、李士謙、崔廓、徐則、張文詡、鄭翻、（隋）；續通志隱逸傳所列不與統治階級合作的智識分子：王績、朱桃椎、孫思邈、田游巖、王友貞、王希夷、李元愷、衛大經、武攸緒、白履忠、盧鴻一、吳筠、潘師正、司馬承禎、賀知章、秦系、張志和、陸羽、崔覲、陸龜蒙（唐）、戚同文、陳摶、种放、萬適、李瀆、魏野、邢淳、林逋、高懌、徐復、何羣、王樵、張愈、黃晞、周啓明、代淵、陳烈、孫倖、劉易、姜潛、連庶、章詧、俞汝尙、陽孝本、鄧孝甫、宇文之邵、吳瑛、張舉、松江漁翁、杜生、順昌山人、南安翁、徐中行、蘇雲卿、譙定、王忠民、劉勉之、胡憲、郭雍、劉愚、魏掞之、安世通（宋）、褚承亮、王去非、趙質、杜時昇、郝天挺、薛繼先、高仲振、張潛、王汝梅、宋可、辛愿、王予可（金）、杜瑛、危復之、杜本、孫轍、何中、武恪（元）。

上面這些智識分子，我不惜爛費紙墨，把他們一律抄出者，蓋欲以表示歷代智識分子之中，也有些與統治階級不合作的，未必人人都盡與統治階級當死走狗也。

一八　反統治階級——智識分子，能表示與統治階級不合作，這比那栖栖皇皇，向統治階級搖尾乞憐的，固然高出萬倍；但單祇不合作，未免太老實了。一定要完完全全站到人民一方面來，替人民說話，正式向統治階級下攻擊，那才算是刮刮叫的智識分子。這樣刮刮叫的智識分子，歷史上未必全然沒有。就是上面所列的這些不合作的智識分子當中，就可以找出許多。蓋既到了不合作的程度，要進而發反對統治階級的議論，相差本祇有一步了。幾年以前，周予同曾作了一篇中國古代社會主義的思潮，登在一種小雜誌名曰工學上面。他在那篇文裏搜集了許多反統治階級的議論。第一個反對統治階級的人就是伯夷。伯夷隱於首陽山將要餓死的時候作了一首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阻兮！命之衰矣！』章太炎檢論儒俠篇附論這中間的道理說：『……伯夷避紂，逖離橫政；周興，乃采薇首陽，稿餓以死。此當爲子氏守節哉？痛君臣立，而奪攻起也。伯夷雖欲去君臣，以子身狷介，無奈之何。』又注曰：『伯夷，盜跖，前世舉爲兩耑相對之名，要其主無政府一也。』章氏的話，是否牽強，且不管他。但伯夷之反對以暴易暴卻是事實。此外又有狂矞、華士兩人，也有反對統治階級的議論。韓非子外儲說

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統治階級不欲聽反對之論，那幾乎是天經地義。而狂矞、華士的議論，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反統治階級的妙論。老子也是反對統治階級的，道德經上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這一類的話，是反對賦稅的。又說：『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這類話是反對戰爭的。又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是排斥干涉政策的話。又莊子

也是反對統治階級的。莊子在宥篇曰：『解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炎及草木，禍及昆虫。噫！治人之過也。』這是反對政治的話。胠篋篇曰：『殫殘天下之聖法，而始可議論。』又曰：『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這是反對法律的話。胠篋篇又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這可以說是反對一切制度的話。莊子反對統治階級的議論，英國羅素所著到自由之路一書(Roads to freedom)裏也譯得有。馬蹄一篇，幾乎完全譯了。

上面所述這些反統治階級的議論，都是秦以前的。六朝時候，也有極犀利的反統治階級的議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裏面的話，即是一例。大人先生傳裏面有言曰：『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餘也。』又曰：『今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眂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貪，內險而外仁！』又曰：『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他這些話，都是反對統治階級的。他自己的主張怎樣呢？他說：『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畏迫、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這算是他

自己極乾脆的主張了。又鮑敬言也是反統治階級的。抱朴子詰鮑篇曰：『鮑生敬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何以見得勝於今世呢？他說：『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川谷不通，則不相幷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涉。』(見詰鮑篇) 他認古代有這個好處，所以他主張廢除統治者。他說：『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同上)他的意思全然是要打破統治階級的統治制度的。

宋理宗的時候，有鄧枚其人者，也是極端反統治階級的。他在所著的君道篇說：『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爲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耶？』又說：『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可得乎？』這是反對專制君主的話。他在吏道篇上說：『小大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又說：『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攫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這便是反對統治階級的經濟的掠奪了。直到明末，又有黃宗羲其人者，也有反統治階級的議論。

他在原君篇（見明夷待訪錄）反對君主說：『……後之爲人君者，……以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於子孫，享受於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皆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在原法篇裏反對法律說：『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得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他這一類的議論，對於統治階級是大不利的。

一九　舊社會裏的舊智識——由上面所討論的種種看起來，我們已經曉得：(一)中國社會是一個以統治階級利用智識分子作工具，統治人民的三重結構的社會；(二)在這社會裏，智識分子的功用，澈頭澈尾是利於統治階級的；(三)智識分子對統治階級的態度始終是擁護、勾結、依賴、但也有些不合作的，更有些根本持反對態度的。凡此種種，都是屬於舊社會裏的事情。都是關於舊時代的智識分子的。現在我們要討論現代的智識分子了。現代的智識分子，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然而現代社會是從舊社會變來的；現代的智識，更是從舊智識變來的。所以這裏有研究舊社會裏的舊智識之必要。舊社會是什麼社會，我們在本文的緒言裏已經略述了一番。舊社會是一個三種結構 Threefo'd structrer 的社會：最上一層是統治階級，最下一層是被統治的人民或農工商；夾在中間的中間階級，最主要的成分便是可上可下的智識分子。智識分子在這樣結構的社會裏有什麼用處？功用如何？具什麼態度？對統治階級怎樣？都已經講過了。現在要進而考究考究他們的智識的性質。他們的智識的性質怎樣？這可以一言蔽之曰是利於舊社會的。然而分析講起來，可以找出下列幾個特點：(一)富於封建

時代的色彩；(二)備具著宗法社會的精神；(三)藏滿了尊古守舊的思想；(四)是維持社會家庭種種關係的倫理和政治智識；(五)而不是征服天行的自然科學智識；(六)是統治階級用來對付人類的；(七)而不是勞動階級用來征服天行的；(八)是處理消耗及分配種種關係的智識；(九)而非幫助生產的智識；(偶與陶希聖談及中國智識分子的智識，他也以為中國智識分子的智識，向來是處理消耗及分配等關係的，而不是幫助生產的；他更以為晉代清談派的智識連消耗及分配等關係都不管了，簡直完全無用。他這個意見，我以為對極了。)末了我們可以說：(十)中國舊社會裏智識分子的智識，最重要的性質，在裝飾身分。上列這十個特點，表現在什麼地方？這可於古典中求之。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直到前清末年，完全是在古典世界中過日子。秦以前雖有智識分子提倡學術，但紛紜複雜的學術是最不利於專制一尊的制度的。所以秦以後，各種學說，都一齊死了，剩了的祇有經過孔子整理的幾種古典。自漢以後，中國智識分子的精力，都集中到古典裏去了。古典誠哉有用！統治階級統治人民，要利用古典；智識分子要幫助統治階級，也要以古典為進身之階。於是古典之為物，便如烏烟瘴氣一般，彌蔓了中國全部歷史。小孩子讀書，以古典作教材；作文章，以古典上的成語

做題目；發議論要以古典上的道理做標準；統治階級考試人材，選拔智識分子，也完全以古典爲考試的範圍。上述的那十種特點都包括在古典裏。所以我們祇要舉出古典兩字，舊社會裏的舊智識之全部精神都可以代表出來了。

二〇　機器文明撼動了中國社會——舊社會裏的舊智識是古典，舊智識的特點也都包括在古典裏。不過舊社會若有變動，這種古典的智識是必須要跟着變的。現在我們且先看一看中國社會之變動。中國社會是怎樣變動的？我們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是西洋的機器文明撼動的。西洋機器文明最後結果祇有兩件東西：一曰剩餘資本，二曰剩餘商品。這兩件東西本國消納不下的時候，是必須要向外國找銷場的。現代的中國便是代替各機器文明的國家消納這兩件東西的尾閭。機器文明國把這兩件東西送到中國來的時候，隨着便有(一)作宣傳隊的基督教徒；(二)作後盾的海陸軍；這還不濟事，必須(三)要與中國訂立各種條約，以作保障；(四)要佔領中國的土地以爲根據地。於是傳教的機關：如學校教會之類佈滿了中國全境，各國的軍艦、兵士、兵營佈滿了中國的要津；不平等條約佔滿了中國現代的歷史；割讓地、租借地擴充到了一切通都大邑。這些可以說是中國社會變動之開始。不過中國究竟不是一個死

物。國人眼看着這種情形，畢竟是要想法子抵制的。抵制的維一妙法，莫如師夷狄之長技以制夷。眼看着外國人的生產制度好，便把牠抄襲過來，於是光緒八年（西曆一八八二年）李鴻章便奏請在上海試辦機器織布局。自時厥後，張之洞便在湖北設漢陽鐵政局、設武昌織布局、紡績局、製蔴局、繅絲局、盛宣懷便在上海發起華盛紗廠。直到今日，不像樣的新式工廠，居然在各地都有了影子。眼看着外國的教育制度好，也把牠抄襲過來，於是同治六年（西曆一八六七年）上海有機器學堂了；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天津有電報學堂了；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北洋水師學堂出現了；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天津武備學堂出現了；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南洋公學也成立了。後經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張之洞孫家鼐張百熙等釐定學堂章程以後，學堂更加多起來了，直到今日，大家都曉得，新式學校遍滿了全國。眼看着外國的交通制度很方便，也把牠抄襲過來，於是光緒七年有開平礦務局所修之唐胥鐵路；自時厥後，便有京奉、京漢、津浦、滬甯諸鐵路相繼築成；直到今日，橫一條，直一條，裝運士兵及鎗砲的鐵路也頗不少了。自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試辦電報以後，到今日便有很好的電報機關了。自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開辦郵政以後，到現在便有很好的郵

政制度了。眼看着外國的政治修明，便把外國的政治制度也抄襲過來；於是在中國的政治史上，也居然發生過總統問題、內閣問題、國會問題、選舉問題等等。此外抄襲外國的制度，不知有若干，現在以限於篇幅，不便詳述。上面所舉的這幾端，是顯而易見者；這種抄襲外國制度以代替中國舊制度的事實，我們可以稱之爲中國社會變動之過程。等到將來，電影院佈滿了全國、跳舞場佈滿了全國、咖啡店佈滿了全國、西菜館佈滿了全國、西裝舖佈滿了全國、厚底皮鞋佈滿了全國的時候，我們便可以說：中國社會之變動完成了。

二一　智識之變動——社會既然被西洋機器文明擾動了、變化起來了、於是智識也跟着變化起來了。從前的智識，我們曾反覆說過，是古典。古典在今日以前的任何時代，都很行時。例如漢代便是古典最得勢的時代。漢武帝時曾爲著名之古典所謂易、書、詩、禮、春秋等五經立博士。光武時，博士之數增至十四。博士所講的是古典，弟子員所習的是古典。魏黃初五年（西歷二二四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明帝太和二年（西曆二二八年）詔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東晉太興時，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

一人。唐代更有可觀了；所有古典分爲三類：名曰大經、中經、小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尙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智識分子之精力，就消磨在這些東西裏面！宋神宗熙甯二年（一〇六九年），議更舉貢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八年（一〇七五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謂之三經新義。下至元明清各朝無不以古典爲智識之總滙。所以古典之爲物，是中國歷代智識分子，尋找智識的源泉！雖然，間或也有別種東西可以供人研究，如唐朝有所謂律、算、醫、畫等；宋朝也所謂律、算、醫等等，但都祇是附庸，概不重要。重要的祇古典。我們可以說：中國自前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設立同文館以前，幾千年之內，古典實充滿一切智識分子的腦筋。這幾千年之久的長時間，我們可以統稱之爲智識變動之前一夜。這一夜過去了，天便亮了，智識便隨社會制度之變動而變動起來了。初變的時候，還是以古典與現代智識並重。張之洞所謂新舊兼學，就是這個意思。張在勸學篇裏論設學之法曰：『……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爲新學。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不使偏廢。』西政西藝是些什麽？他說：『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

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鑛、醫、聲、光、電、化、西藝也。（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西藝之醫，最於兵事有益；習武備者，必宜講求。）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後政，大學堂先政而後藝。』他之所謂先政後藝，先藝後政等等，當然是毫無意義的胡說，但當時於四書五經外，還注重所謂西政西藝的這件事，總算在他的話裏面表現得淸淸楚楚了。這個新舊兼學，舊學爲體新學爲用的時代，我們可以稱之爲智識變動之上半期。直到現在，我們可以說是智識變動之下半期了。這個時期的智識，盡是新的了。處理天然事物的有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礦物學等等；處理社會關係的，有政治學、法律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等；數學之中又有算術、代數、幾何，微分、積分等等；物理學之中，又有動力學、靜力學、固體力學、流體力學；熱學、光學、磁電學等等；化學之中，又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理論化學、應用化學等等；生物學中，又有動物學、植物學、動物分類學、生理學、解剖學、植物分類學、生理學、解剖學等等；礦物學中，又有岩石學、化石學、結晶學等等；政治學中，又有主權論、政黨論、憲法史、議會史、民權發達史等等；法律學之中，又有民法、刑法、親族法、婚姻法、財產法、國際法

等等；倫理學之中，又有倫理學史、純粹倫理、實踐倫理等等；教育學之中，又有教育心理、教育哲學、教育行政、教育測驗、教育史等等；社會學之中，又有社會進化、社會制度、社會問題、社會管理等等；（讀者注意：這裏祇是隨便舉科學之名，以示現代智識之複雜；幷非詳細分科學之類，以明學問之系統。）凡此等等，尙未盡現代智識之萬一。然以之與古典相較，則有天淵之別了。等到將來線裝書在中國絕了種，火酒燈燒遍了一切學校，那末，舊社會裏的舊智識便會變到毫末不存了。

二二　經濟落後之中國的智識分子——社會變動了，智識也都是新的了，智識分子，宜若可以自豪矣，誰知大謬不然。中國現代的智識分子，大都感着恐慌，大都沒有出路。而在事實上看，閑著的智識分子，自己沒有找到出路的智識分子，在社會上的確是多得可怕。這種情形的原因究竟在那裏呢？我們可以一言答之：由於中國經濟之落後；經濟落後，一切社會事業，未能發達，智識分子遂變成了多餘者，無處可以棲身。在上文裏我們曾說過：機器文明擾動了中國社會。那末中國社會事業，應該從此蒸蒸日上，使智識分子有地方安身。但事實上則不然。社會事業雖然漸見發達，却不是很快的發達，却不能與智識分子增加的速度

成正比例。這個原因又在那裏？爲何社會事業不能很快的發達？第一因爲擾動中國的機器文明，幷不是中國固有的而是從西洋輸入的。西洋自從十八世紀下半期，產業革命開始，直到現在，一切文明都是由自己建築起來的。最初有科學、然後有機器、然後有工廠、然後有一切新的經濟關係、然後有一切新的社會關係、然後有一切新的社會上層建築、然後有一切所謂現代的機器文明；新文明是枝葉，物質的變動是根本。西洋人先有根本，然後有枝葉；根本去自己培植的，枝葉是漫漫滋長出來的；所以本末很是一致，遂呈露一種燦然的美觀。所謂社會事業，現在竟如日麗中天，發達到無以復加了。因此智識分子，尙覺有地方安插。中國就不然了，從來沒有科學這回事、從來沒有機器作生產工具、從來沒有什麼工廠。社會的經濟基礎，先沒有樹起來。然而一切上層的建築，都有一個雛形了。學校制度我們已有新的了，政治制度我們也曾採用過很新的，學術思想，更是日新月異。智識分子的數目，隨社會上層建築之增加而日多。就經濟基礎而論、就社會的下層結構而論、中國社會本容不了幾個智識分子。然而智識分子的實數，却已多到像樣了。於是在事實上，發生了一種供過於求的現象。需要智識分子的地方很少，然而自從有了新式學校制度以後，智識分子便一天多似一

天。結果遂造成今日中國智識分子的厄運。

今日中國智識分子的厄運怎樣？其出路如何？我近兩年來，從事實觀察，看出三條很顯明的出路；換言之，就是三種不同的厄運：一曰幫助統治階級。這算是一條厄運。現在任大學教授職，在政府裏當公職員作祕書；在報館裏當編輯的以及作律師、作醫生的種種智識分子，都是走的這條運。二曰爛用其材。這當然也是一條厄運。中國社會事業，原本不發達。而事先預備好了的，以供將來發展社會事業之用的，各種各樣的專門人材，却早已由新式大學，以及外國大學一批一批的製造好了。人材是要找出路的。現在既無相當的出路，祇好隨便投身於各種機關。所用是否卽爲所學，却顧不到了。於是原來學化學的，逼得往政府機關去擬文稿；原來學土木工程的，逼得往學校裏去教英文！這個不幸的事實，現在的大學生，已經曉得了，所以他們在學校裏學理數的時候，也兼練習擬電報稿子，學習學習文科的時髦科學；以便將來萬無出路時，也可以到政府機關或學校裏混一混！現在的政府機關與教育機關，殆是消納智識分子的總滙！然而專門人材却從此埋沒了。三曰當乞丐。凡流落在大都會上，依賴親戚朋友吃飯的，或藉賣文字爲生的都是走的這條運。走這條運的智識分子，最喜

歡談革命，性情也都因環境的逼迫，變成很暴燥的了。比較說起來，幫助統治階級的，因已經找到了謀生之所的原故，不大想擾亂社會了，反之頗有維持社會現狀的功用（社會現狀，應否維持，是另一問題）。爛用其材的是很多牢騷的。遇着喜歡談革命的時髦人物，便談革命；遇着幫助統治階級的穩健人物，便談十年生聚教訓。祇有像當乞丐一樣的智識分子，却無時無刻不想搗亂，他們大概是最倒霉的智識分子了。我下次有機會，要替乞丐般的智識分子作篇小傳；現在以限於篇幅，不便多說了。

二　中國勞動力過剩之探究

郭子堅

勞動過剩的一件事在目前的中國應該是最值得注意研究的。以地大物博著稱的中國，困難的發生不是在物質的數量上，不是在人口的數量上；因爲地旣大、物旣博了、這些當然不是根本的困難。眞正的社會困難，我以爲只是勞力過剩的一件事。雖然中國社會上的困難由種種方式而顯露，但多數可以說是：因爲中國社會整個的勞動過剩的緣故。

中國社會的勞力過剩是隨處可以看得出來的。農村中很多的人出來當兵了，農村中幷不嫌勞動力的缺乏。許多的兵士離開家鄉是要避免在家中坐食，是因爲要減輕家庭的負擔。各地盜賊如毛的現象，只是無用勞力的農民表現。城市一方面呢，勞力過剩的現象也是很容易看出來的，在每一個碼頭上成千成萬的苦力工人，因爲勞力過剩的原故逼得非常低賤的出賣勞力，結果在各國通都大埠盛行的起重機，在中國還是少見的東西；卽如上海這般偉大的商場也還是如此，因爲中國人的勞動力比機器力還要賤。同樣的表現是在電車往來馳驅的上海馬路上，人力車的梭巡也十分擁擠，這是說人力的價值和電力的價值競爭。在其他的種種方

面，我們所習知謀事艱難的現象，以及各種職業中的互相排擠，都是因勞力過剩的原故。

我們說中國的困難是土匪太多，無甯說是農民的勞力過剩；我們說中國城市中的流氓擾亂，無甯說是居民的勞動過剩。政治的不得澄清也只是勞動過剩的競爭中使得官吏只知保位和貪汚（豫備退職後的生活）。誰都知道中國的困難是事情不能上軌道——就是政治的紊淆和社會的擾亂——好多人會說：『只要上了軌道，事情就好辦了。』其實整個的緣因只是一個普遍的勞力過剩。只要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可算解決了中國的問題。

一般人的意見，以爲政治的紊淆和社會的擾亂固然是使中國事事停頓的主要障礙，但所以至此之故却是因爲中國人衣食困難，所以根本上還是物質缺乏或人口過多的爲害，所以中國決解困難的方法或者還是要從努力生產或節制人口著手。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增加物質產量固然需要，節制人口生育也許有或種理由，但這不是根本問題。我們應記著中國每年有鉅量農產品出口，同時有滿蒙新疆西藏等廣大的尾閭。只知努力增加物質生產將不過使農產品出口增加；只知節制人口將使滿蒙新疆西藏等邊境留給外人覬覦。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勞力過剩。

一　中國勞動過剩之造因

以中國這樣亟需人工的國家，却有這樣勞力過剩的現象，乃是一件矛盾的事。我們若對於這種勞動力過剩的造因，加以相當的分析，就可以知道這樣的矛盾的形成是受了時代的驅使。近代的中國是由一個完全封建制度的國家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裏進而受了二十世紀資本制度的洗禮。在這一種猛進的變化中，本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勞力過剩，極快的轉成非常嚴重的問題。在這一種極快的變化過程中，我們的政治家未曾先覺到這種危機——當然是當由於知識的貧乏——或者也有些未能將舊社會組織迅速地改變來應付新時代，結果就釀成這種勞力過剩的慘痛，就形成自己有勞力不能換得自己的糧食反大批的輸出以養外人；自己有廣闊的疆域荒廢著給外人覬覦反覺著國內人口過多的現象。

中國社會上勞力過剩的原因，比較容易懂得到的，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但是要細究各種的情形，我們可以認識到中國社會上的勞力過剩是在帝國主義侵入時代以前就已經存在的現象。中國歷史的特點是每經幾年或幾十年發現一個暴亂，這就是勞力無處使用的農民每經幾十年的積聚而成暴動的原動力的明證。所以在歷史上每一個暴亂起來之後必紀載著殺人

若干萬千——消滅了那過剩的勞力——然後得平靜。

再看中國民間秘密結社的發達，而這種秘密結社差不多都有黨員中經濟上應當絕對互助的一信條。這明是一般勞力不能換得金錢的壓迫下的民衆表現。試一探究這些秘密社會的組成份子，又只證明這一點。中國秘密社會史第四章哥老會說：

『哥老會。又稱哥弟會，其成立在乾隆年間。同治時，平定粵匪以後，湘勇撤營；窮於衣食之途，從而組織各團體，於是哥老會始盛。除有仍爲水陸軍將弁者外，餘則皆以賭博盜刼爲業。……然其本旨則在復仇，其理想則爲俠義，故嚴禁竊攘，不害良民；惟襲刼不義之豪富與不正之官吏，謂盜刼爲武差事，賭博爲文差事。有所謂洪家者，或曰紅帮，乃會中之正統也。』

『又有稱爲青幫者，卽鹽梟及光蛋，如安慶之道友會是也。其徒始皆以運河漕糧爲業，及漕糧改由海運，無所衣食，遂集於大族潘氏兄弟下，組織團體，密行販鹽，或以偸稅爲業。……………別有所謂黑幫白幇者。黑幫業竊盜，多乞食一流，所謂江湖團是也。白幫卽騙拐黨…………』

可見這種組織之形成，都由於『窮於衣食之途』——即勞力不能換取金錢——的原故。光蛋的名稱更顯示勞力無價值的意味。

中國社會所以弄成這種現象的，一種是先聖先賢所養成的崇拜祖先的封建思想，恐怕是頂要緊的造因。因爲是崇拜祖先的緣故，民衆養成了普遍的守祖墓、戀故鄉的「道德」。這種老死不忘故鄉的精神，固然一面是使民族精神不易磨滅(如華僑移外數代仍然不忘祖國)，一面却使民族的發展生障礙。因爲不願離故鄉的緣故，所以雖有面積廣大的人口稀少的土質腴美的邊疆却不容易發展，要是內地幷不嫌勞力過剩倒也能了，可是事實早已指示內地實是有過剩的勞力了。

據馬樂利氏(Walter H. Mallory)所著中國饑饉之地書中所說：中國五口之家年需約二三七二磅的糧食；而據經濟調査處劉大鈞博士的調查，每英畝(acre)的麥田產量平均爲一千二百磅，以之製成麵粉則不過五百磅，依此計算五口之家必須有四·七英畝之耕地始敷食用。又米產量在最好的耕地每英畝產二一五〇磅，普通耕地同面積約產一四〇〇磅，依此計算五口之家亦需有一又十分之七英畝的耕地才夠食用。但是據調查的結果，中國農家平均有五·

七八的，有百分之三十三所耕地少於一英畝，而百分五十五所耕地少於一又十分之五英畝。

這是說，向來中國所謂一年耕有三年之糧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中國社會因為死守故鄉的精神，在人口增加的過程中，土地已經逐漸分裂而小到不能養活普通五口之家的單位了。可是雖然如此，我們的政治家不提倡離故鄉去謀發展，却努力提倡安貧的道德，於是滿蒙新疆西藏等在國人目中永遠只是蠻荒，而同時內地却有勞力過剩的貧窮。

在中國未受帝國主義經濟勢力侵迫之前，社會上雖有了這種現象，可還不至於像現在這樣不可終日的樣子。因為各種各樣的農村副業可以輔助耕作收穫的不給，同時城市的各種手工業也是鄉村過剩勞力的尾閭。而且那時勞力過剩究竟是比較慢性的社會病，使得好多受著壓迫而敢於「挺而走險」的有力分子從容地消納於海外、南洋羣島及滿蒙新疆西藏等地。再加上一種安貧的精神的維持。因為這些緣故，所以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中國時代以前，社會上的勞力過剩不如現在的顯著。

可是在帝國主義經濟勢力滲入之後，這種以武力襄助著的經濟勢力迅速地在中國發展起來，我們考查一下中國國際貿易史知道是庚子之役以後在條約上建築了『洋』的威信之後才突

飛發展起來，而中國的社會是從庚子以後呈了『從此多事矣』的現象。

這種強迫開發的國際貿易，給中國社會的影響是以國外的動力和機器力逐漸代替了中國的勞力，而且這種代替作用進展是異常迅速的。以中國社會說，男耕女織，早成爲社會生活的定例。然而在這去男耕女織的時代不遠的今日，織布的家庭手工業，就早掃除到無痕跡可尋的地位。我們看一看佔進口貿易第一位的棉及棉織品的發展過程，就沒有不驚嘆其數量的鉅大和進展的迅速的了。

中國和外國的貿易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是以鴉片爲大宗的，從那年起棉貨的進口貿易進到第一位，而且從此永在第一位。我們且列舉幾個數目，來證明這一宗交易的偉大和發展的迅速。在一八八五年所輸入的棉貨值三千一百五十萬兩，佔進口總值百分之二五・七；一八九一年增加到五千三百餘萬兩，佔進口總值百分之三九・八；一八九八年增加到七千七百六十萬兩，佔進口總值百分之三七；一八九九年增加到一萬萬零三百五十萬兩，佔進口總值百分之三十九・一；一九〇三年增加到一萬八千一百五十萬兩，佔進口總值百分之四〇・六；一九一三年增至一萬八千二百四十萬兩，佔進口總值百分之三十二。一由這些數目一看，我們

可以卽刻想到有多少紡織手工業者失掉了工作的機會，同時英倫三島的紡織工人和機器却異常的興旺起來。

這只是就進口貨中最緊要的棉貨而論，然而這只佔進口總値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就是那其餘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還不是大部分是工業品，加過了國外的勞工和機器力的，來到中國佔奪中國社會上各種手工業的機會。我們隨處舉目一看，日用品中十九只是洋貨。連在中國夙享盛名的瓷器都已幾乎全爲洋貨所代替了。

這種極其普遍的鉅量的國外勞力和機器力，在這比較短期的幾十年之中闖進中國來，其結果是使中國社會上本來不甚顯現的勞力過剩，迅速地變爲非常嚴重非常顯露的問題，因爲這種進口奪去了農村副業和城市手工業的市場，而且是在短的時期中形成的。

在中國受帝國主義侵略以前，過著勞力過剩的艱難是慢性的，許多人還可以向海外以及各毗連境地移殖，結果可以使整個的社會還不至於感到十分艱窘。可是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後，也就是帝國主義宰制世界的時代了，因此在這同一時期裏不獨是國內農村副業和城市手工業被摧殘了，逼得社會上勞力十分過剩，同時這過剩的勞力想求如以前的移殖機遇都很

艱難。各個帝國主義者不獨在他們本國限制華人入口，而且在一切殖民地都慫恿反對華人。非列濱固然有排華情緒產生，朝鮮也玩過慘殺華人的把戲。而且不但如此，西藏也要仇殺漢人，在外蒙古的漢人趕到內蒙古。這樣，中國社會上的勞力，在內面既給人取而代之，在外面的發展又給人排斥，困難自然要變成十分利害了。

而且在未受帝國主義侵略以前的中國，一方面固然長遠的歷史使社會經濟方面有相當的儲蓄，一方面農產品不會有這樣鉅量的輸出，所以生活程度也低微。在這種社會狀況之下即使有些勞力過剩，社會上還不至感著艱難，因為那些勞力不能得著使用機會的，可以比較容易的得著寄生的生活。轉徙也比較容易。為維持社會的安甯，在中國甚為發達的各種慈善事業贍養了那些無處安身的人。沿途乞食而移居他鄉都有可能。可是在帝國主義經濟剝削後的中國，社會經濟既變成枯窘，生活程度又非常加高，寄生的生活絕不能如以前那般容易而且是不可能的了。轉徙亦是陷於艱難。（山東難民每每賣兒以籌路費，小兒的價值有時低至三元。）

在這些原因之下，中國社會上勞力過剩，就由慢性病變成急性症了。

勞動過剩對於社會上最顯而易見的影響，自然是因無業者的增加牽及社會的安甯。這一點是無用乎多說，我們中國人荊天棘地的生活大家都是身受者了。我不必再說社會上到處都是盜匪橫行等等，因爲這都是大家痛心疾首到淡而忘之的程度的了，我在此要說明一點，就是關於中華民族的命運的事。

我們談起英國在戰後有百萬以上的失業者，都知道這是英國的一個大問題。中國有多少無業遊民，雖然沒有過統計，大家意想中必定知道這數目比百萬要大得多。最近北京警局的調查，在那裏一百二十餘萬人中有約十八萬的貧民，卽約總數七分之一，在報紙上已經宣傳得算一件大事。但是我相信在中國決不止北京社會有這樣的災難，比北京有更大的災難的地方一定還多得很，止是沒有統計可以表示出來罷了。本年九月五日申報北平專電說各省區慈善團統計全國貧民約一萬〇五百萬餘人，而去年郵局統計全國人口爲四萬〇三百萬餘人（概不包括蒙藏）。是貧民平均在全人口四分之一以上，比北京的七分之一的例大得多了，可見必有比北京更遭殃的地方。

一萬萬以上的貧民，只要提一下這個數目，我們就可以想像得到帝國主義工業的努力剝削，所給與中國民族的命運。又據生活程度方面觀察，我們也可以看出同樣的悲劇。第特默爾教授（Prof. O. G. Dittmer）調查北京附近二百家之估計爲年需一百元；泰樂而教授（Prof. J. B. Taylor）之估計則爲一百五十元（上述均以平均五口之家爲言）。我們就拿一百元爲最低的貧苦之標準，實際上在這貧苦的標準之下討生活的，其數目則更可驚異。賑災委員會在直隸山東安徽江蘇浙江五省調查二百四十村，——即七千〇九十七家，三萬七千一百九十一人——的統計，在這種平均五口之家其年收入，就東部各村而論，有過半數．上述貧若的標準以下，而北部各村則五分之四以上爲這樣的情形；其中東部各村有百分之一七．六北部各村有百分之六二．二年收入則在十元以下。

這種多數的收入在貧苦的標準之下的意義，是說中國民衆在帝國主義國家搶奪了國內的勞力市場而又不能向外發展的情形之下，勞力因爲過剩而非常輕賤，使得終歲的勤勞換不到衣食的温飽。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人的『省吃省穿』主義是到處普遍著，就是說中國民衆被逼著普遍的在滋養缺乏的狀況之下討生活了。可是同時中國有大批的農產品出口，中國的農

民，由這一點的意義上說，實是國際資本主義的農奴。

中國農民陷於不堪的奴隸地位，由別一方面更可以看出。我現在提出種鴉片的問題談一談。我所以特別提出這一件事說的，因爲這確是中國近年社會上最要緊問題之一，而且用於本題是很有助於說明的。

農民既那般沒有知識當然想不到向別處移殖，特別是向人口稀少的邊疆移殖的事（除了直魯災民向滿洲移殖以外），所以他們補救他們的貧窮的方法，只有希望在一定的面積土地內增加生產的價值。可是他們也並不能幹什麼科學的種植方法來希望好些的收穫，於是中國農業界一種畸形的發展——種植鴉片——在國內非常普遍起來。

種鴉片的事在國內普通的發展其數量是非常可驚異的。我們只需提一句去年（民國十六年）一年中國內鴉片的總產額約爲二萬萬兩——即平均每一個中國人有半兩這種麻醉藥的份兒——就至少可以估計到民族受禍的程度。（以上數字見拒毒二十三期，本年七月份，還有許多驚人的數目在這一期中，此處限於篇幅，以下只引用與本文說明有必要的。）農民之所以被鴉片引誘，完全是因爲同面積的生產比其他農作物可以多得利益的緣故。據廣東的農民

說，種煙一畝可穫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的收入，而支出連稅項在內不過五十至六十元。這高利的收入無怪農民趨之若鶩了。

說起來眞可憐，這種貽鉅害於民族的農業，固然是農民們迫不得已的掙扎，事實却告訴我們，他們的痛苦只是更深了。事實是這樣，中國社會裏許多勞力無所用之的人擠進了『政界』，而我們那種人浮於事的政界又需浩大的政費和中飽的來源，於是必要在做鉅大稅源之一的農田上想方法，種鴉片遂成爲增加稅源的良法。有好些地方種鴉片面積的擴大，完全是官廳引誘農民的。（拒毒二十三期載有好幾處官廳勸種鴉片的煌煌佈告，某省幷有教育局勸種事，因爲煙稅是教育經費的來源。）全國鴉片烟稅據可統計在二萬萬元以上。這樣的好稅源所以有好些地方由官廳規定種植的面積（豫西各縣每百畝要種三十畝）。官廳旣以增稅爲目的而勸種，決不甘心收穫的利益流入農民的腰包，如是稅額愈加，（例如合肥一縣烟稅收入由十萬元增至一百萬元，幷非種植面積增加的緣故。）馴至農民感種煙之無利可圖輟種，乃勒派稅款。（如福建爲種烟事軍兵時起衝突，槍殺農民；又如陝西派種煙之田，種而納稅者曰罰款，不種而納稅者曰白地款，而白地款有高至每畝三十三元者等等。）我們現在且引

拒毒二十三期幾句話來證明農民之陷於異常悲慘的奴隸生活。

『近年以來，農民已視種烟爲畏途了，因爲多數種烟要賠錢，不種烟更要賠錢。』——陝西省

『……至其收稅方法則不外威嚇各鄉區保董先報若干畝，再按照所報畝數加增一倍二倍，至烟苗實數則均不過問。人民因此不堪其擾，兼以檢查員及地方紳士多方勒索，農民爲此流離失所者不計其數。』——安徽省

『說到福建省的毒況，我們眞停住筆不忍寫下去了。福建歷來的禁烟官吏爲著種烟事動輒和民衆開戰，動輒釀成人命。』——福建省

這所說的不過是一部，如福建每年烟稅不過數十萬元，安徽陝西也不過數百萬元、就全國烟稅二萬萬元以上想，就全國各省均種烟（除山西省）想，中國農民社會中該當還有多少黑暗的悲慘的事。至於不種烟的農民普遍的困於苛捐雜稅勒索等，我們一樣可以想像得到，只可惜找不到說明的統計。估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這樣普遍的沉淪到必要的營養限度以下，而且更進一步到求奴隸生產而不可得的情形，怎能說不是民族的悲哀。

我們習聞直魯災民吃樹皮黃土等。據中央大學王葆仁君分析內政部所送山東災民所食之『石麵餅』其中含有機物僅百分之一六·六，同時我們却有大宗的農產品出口。我們的農民只是外國資本的最賤的奴隸，說起來眞可痛心。

以上是說農村的情形，至於城市的情形或者還不至像鄉村那般枯窘，但情形却是一樣的十分壞。例如前述北京有七分之一是貧民，固然比全國有四分之一是貧民的情形比較起來是好些。但是我們只看一看無論那一個城市，乞丐是很多的，可見情形是不好，只可惜沒有統計可以表示。且舉上海市社會局本年八月份自殺者統計說，自殺總數爲一百十一，分家庭問題、生計困難、事業失敗、失戀、墮落、寃抑、疾病、盜賊、虐待等等。就中除失戀謀自殺者六人外，其餘大概都可以追跡到勞力過剩爲造因。依上的平均爲每六時有一自殺者。上海是中國金融中心的地點，情形尙如此惡劣，其他的城市若是有好的統計，決不能告訴我們可喜些的消息是可斷言的了。

由此，我們說外國資本利用外國勞動力和機械力搶奪了中國勞力的市場，而又多方設法封鎖其分銷路，所造成的中國社會上急性的勞力過剩，逼迫中國民族的迅速沉淪，可不能說

是過甚其詞了。

三　怎樣救濟？

這樣偉大的一個民族問題或民生問題，要求救濟之道，概括的說一句，自然是不外這兩點：(一)振興國內的工業，以抵制外來勞力和機器力，而闢國內勞力的市場；和(二)提倡移民實邊。然而僅僅指出這兩點，是等於沒有說，因爲這是大家都知道了的，可是不容易實現。就是作者當然不能答覆這個難題，因爲談到實現這兩點的步驟計畫是必需許多的專家考慮的。所以講怎樣救濟中國社會勞力過剩，放在這篇文裏做個小綱目實在不恰當，只因爲我個人以爲至少有點可貢獻的意見，所以列上了這個小綱目。

關於振興工業這一點，我們所聽見過的，每每是大規模工業革命的計算。可是這樣大規模的計畫雖曾有，實現却非常艱難，就是利用外資來開發的想頭好像是最合算而有希望，其實也幷非容易實現。例如蘇聯自革命後竭力想吸收外資，却未能如豫期的希望，這固然與賴債的問題有關國體異同的問題，但同時我們應當認識：世界被帝國主義統治著，投資政策和外交政策總是連帶的，戰後的經驗使戰後的投資更加謹慎，更加作極度有利的計算。投資者

要想到不要因振興他國的工業妨礙自己國工業品的市場，而在吸收資本的國家其思想恰恰相反，這就是吸收外資困難的大原故。中國即使逐漸社會平靜，對於吸收外資的問題也必感覺到這種困難，何況中國更有特異的情形。中國社會勞力這樣賤，社會一平靜，工業發展的可能，外人直接投資設工廠，却是更有利的想頭；其實目前外人在內地設工廠已是一天天的進步。固然這樣也可以闢一點國內勞力的市場，但是勞力這樣出售，只有使中華民族淪爲國際資本主義的奴隸。

自然有利益的吸收外資方法總是值得研究的，但在我們未能吸收外資以前，至少也還可以研究些別的方法。

我以爲中國社會上勞力價值逼迫到這樣低賤，至少可以和機器力作一種比肩的競爭而勝過之，而同時社會上資本又那般貧乏，實是社會困難的重心問題。在這種情況之下，要求一個解決的方法，幾於除了有外資惠賜我們，就是不可能。但是我們想一想勞力在這種迫切需求出路的時代，在外資未能供我們吸收以前，又在這種國內資本貧乏的狀況之下，發展機器手工業是很值得留心中國社會問題的人探究的；因爲這種機器手工業實際上可以在中國社會

上適合的發展起來。且舉點例證來說。

在劉大鈞博士所著中國之工業和財政一書中敍述著兩個有趣的調查。一是浙江平湖手工織襪業的發展。一九一〇年之始，中國除上海一埠外無織襪工業。平湖商人高某豫料有發展之可能，運了幾十架手工織襪機回鄉。雖然那時每機的成本多至一百元，出品仍可以和舶來機器出品在市場上競爭。機器是散在各工人家中的，作爲出租。原料——襪紗——由廠家備領，領出若干重量之紗必還若干重量之織成襪，否則扣減工資。工資爲每打襪二角二分至二角六分，而每月每機需付租金二元。又初租機時須繳保證金八元備修理機器費用。機價現每架只二十元。在一九二六年開始時，平湖一地有襪機一萬部以上，總產量爲年約值四百萬元之襪。一是直隸高陽的織布手工業。高陽於一九〇二年初運進織布機。一九一〇年有合記公司創辦，資本爲二萬元，爲該地最大公司。一九一三年直隸商品陳列所調查，合記有二百架織機出租，每日出布一百匹。一九二六年經濟調查處派人調查，該處出產總量爲年約二百萬元。此工業完全利用農人剩餘時間，其地有一百四十四村，人口約十三萬，據云百分之九十參加此工作。現在推廣到任邱、文安等縣。原紗是從天津用小船由豬龍河運至離高陽三十里

的同口鎮，再用驢車運至高陽。所產布運至津浦路泊頭鎮及京漢路保定站出口，散布京漢、京綏、正太、津浦、各鐵路一帶地方。

這種機器手工業所以能發展的原因，完全是利用非常低賤的勞力價值及不需要大的資本兩要素，是恰恰適合於中國的社會。這種工業以個人工作的手工機器爲單位，將機器散布在各工人家庭中，省却工廠的設備和管理，而且機器又按月抑取租金，機器的損壞和原料的耗失完全嫁到工人身上，所以這種工業確是極容易維持，而工人所受的剝削也確是不小。可是在這種極菲薄的價值下，勞力仍是如潮一般的來要求出售，看那種異常的發展就可以明白。

我以爲無論如何我們不可忽視了這種機器手工業對於民族需要的嚴重意義，我們應認識我們在根本上有和別種民族不同的地方。第一我們人口總量的大，構成不可計算的購買力。即使能努力機器工業的發展，在我們不能允許外人無條件和無限量的投資之情形下，要應全國的需要，至少也需要十年，才能漸漸應付社會的需要。在這數十年的時間中努力尋求些可以而且容易自然發展的機器手工業，作有系統的宣傳和實施，是利用本國社會中小量資本安置過剩勞力的最快最好方法。而且能這樣安置一部分過剩勞力，藉以多保存一些購買力，使

民族不至更迅速的沉淪到更悲慘的地步，以待機器工業的發展，却是一種好續命湯。第二我們受國際資本的剝削到了十分乾枯的地位，和勞工對待著說自然國內是有資本家，但這所謂資本家遠不能應付國內需要資本的程度；所以發展這樣事實上指示我們是社會的需要的可能機器手工業，來培養國內微型的資本，因爲他們能異常的發展增大起來，這於希望他們將來能成機器工業資本的一部不是無望的。有的人簡直只曉得朝節制資本一方面想，對於這種培植資本的事全然不想一下，却不知道節制資本是需要的，培植資本以抵抗外資的力量在中國是一樣需要的。

自然，在今日棉貨進口爲第一位的中國，在戰後已經建立了微薄的基礎的中國紡織業，也值得談建設者最先的注意。

關於移民一點，實邊的事已爲一般人注目到了。我對於這事沒有研究，不必浪費筆墨。在這裏有兩點可以說的：一是要打破移殖民的故鄉觀念；一是要防移殖民仍只是外國資本的奴隸。目前爲中國移殖的大批人民的滿洲確是如此。向滿洲移殖的人民——多魯直難民——每年在百萬以上，然而他們不忘故鄉的非常之多。關外鐵路在春季運他們出關，在冬季却大

批回家過年，在京奉南滿路上旅行過的，大概都可以知道這件事。這於移殖的人民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因爲鐵道公司把他們當貨一般的運送，從他們一年勞力所得上掃落一些車費，而同時這般移殖民回鄉又做了一個無代價的宣傳，更大批的前去墾荒。這種墾荒自然移殖了不少的內地過剩勞力。滿洲的大豆已變成中國出口貨的第一位，可見其效果之大。但是我們要看清楚，這內面大部分的利益，到了日本人的衣袋中。所以日本雖將滿洲看得和命一般寶貴，却不會妨礙中國的向滿洲移民，因爲那些移殖民簡直是代他們開發滿洲利益的奴隸。若是我們利用外資再來向其他部分移民，我們對這樣的問題至少應先有些探索。

四 煞尾

我標題爲勞力過剩，說起來又好像只是人口過剩或振興工業的問題。說人口過剩，有使人含胡地極端主張節制生育的錯誤，而中國却是有人口的銷路。說振興工業，一種含混的大規模工業化的計畫就湧到人們的心目中來。爲闡明國內社會的總病因，所以不惜辭費說明勞力過剩的現象，希望留心社會的人，抓住這個總樞紐，向各方面探求建設的方式，以解決中國一面急需建設一面又勞力過剩的矛盾。

第五編　家族問題

中國的家族制度及其崩壞

馬哲民

一　家族制度發生之根源

用人爲的方法，以維持家族制度和民族，及國家之社會構成，其機能卽爲家庭生活的規模。此家庭生活發生以後，其內容是干涉的、和束縛的，乃形成了法律上的、及社會上的對家庭制度的家庭生活的強制。法律爲各個時代，應支配階級之文化的及經濟的要求，始爲創生，不待贅述；而社會的規模，亦直接在此種目的之下，以自然的和人爲的原因形成。支配階級之生活要求，和被支配階級，是各個不同的。尤其支配階級，是經濟的優越者，爲誇示其欲望，以彼等階級的利己心爲出發，所形成的家族制度，在很多地方，是與被支配階級生活要求相背馳。然此種桎梏的制度，非完全由於法律的維持，而是由於支配階級的社會關係所支配的。由此法律合社會關係，乃養成一種社會的生活形態。並由此社會的生活形態，所

生之生活習慣，乃發生了相應的道德觀念。

原來由原始的社會，以血緣結合的氏族爲單位，營共同生活。後因氏族社會生產的進步，尤其定住農業的發達，及私有財產制度之發生。於是以前氏族所屬之土地及其他財產，漸次成爲家族之財產。此時代家族，爲家長的大家族——Die Patriarchalischen Grossfamili——，其家族之內部，長至三代四代的同居，家長自然屬之男性。家長所有家族及子女和財產等，有無限制的權力，可以對妻、妾、子女、奴婢、僕役、及其家屬，生殺予奪。如羅馬法之家長——Pater Familias——，可爲一例。家長的大家族，同時又形成了經濟的生產及消費的團體，而自成爲一封鎖經濟的部落。以此種大家族之發展，乃與從來社會結合的氏族團體相衝突，且使氏族團體，在大家族制之前，完全解體。在氏族團體時代，所有土地及其他重要生產手段，悉爲氏族共有；氏族之首長，則由氏族全體所選舉有一定的任期。在家族時代，則完全相反，土地等悉變爲私產，氏族首長之權利轉移於家族之家長，且非選舉的，而是固定的。因此，在家族中有支配和被支配的關係，而家族的社會，乃有階級的發生；國家組織，漸漸出現。這差不多是普遍人類歷史上，家族制度發達的概狀。

中國原始時代的氏族組織，已不可考，而家族制度發生之始源，亦幾不可辨識；然吾人所知者，中國的家族制度，有很久的歷史，而定住農業之發達，亦有很久遠的歷史。以定住農業靜的生活，由春至夏，自秋徂冬，其生活之狀態以及變化，皆是有秩序的；親族戚眷，極少遠離，自然適宜於家族生活。況因主要生產，爲定住農業及私有財產制（或封建的授田制）發生以後，土地及其他財產之所有——或使用的承繼權者，事實上卽爲家族中之男性的年長者。而農業生產技術，如土性辨別、天時之測度、種子的選擇等等，無不以年老者之經驗是宗。於是家長的家族制度，隨之發達。以家族生活，擴大而爲民族生活，以及國家生活。且以父子關係，引伸而爲族長和族人，以及君主和臣民之關係。兼之軍事征服，與因自然條件所形成之特有的土地國有的封建制度的成立，誕生了集權的封建國家的狀態。國家的社會關係，有君主、諸侯、官僚、士大夫、縉紳、平民等身分；而固定這些身分的社會制度之基礎，便是家族制度。同時，社會的身分既經發生，社會之階級亦起，並且以有階級的差別，乃有身分的差別。於是有富的家族、和貧的家族、及貴的家族、和賤的家族。而支配階級的國家，爲維持發展其支配搾取的利益，自然又形成了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秩序。並以男性

爲生產者，及生產所有者之中心，乃使女性，處在最受壓迫的地位。因此，中國「三綱五常」的宗法制度。以之成立；「敬老」的道德觀念，以之生產；一切「祖先崇拜」的信仰，以之發展。例如「周禮」，卽是其系統的說明；孔孟學說，更是這種思想的代表。由此以見，中國的家族制度之發生，亦與其他民族——或國家社會進化一樣，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

二　中國家族制度發展之概況

中國家族制度，大概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由周以前至周末，爲初期家族階段（Die Frühfamilial Phase）；由秦代迄清末爲盛期家族階段(Die Hcchfamilial Phase)；由清末至現在爲末期家族階段(Die Spätfamiliale phase)。但現行的家族制度，則是從宋代起；其原因係以地主階級與手工業及商業資本之發達，形成了下級封建勢力之基礎，而以前之家族制度，至是乃普遍化。然而中國家族制度之發源，則不得不溯之周代，封建制度，係完成於周代；換言之，卽是原始氏族共產社會，早在周代以前，破壞無餘，而家族制度，自必在周代卽發生矣。我們知道中國「三綱五常」的倫理觀念，已在周末完成；而「三綱五常」，亦卽中國家族制度有力的基礎。雖然周末的道德觀念，第一在「敬宗」，尚有氏族觀念的遺留；但「家」

的觀念，亦頗爲重視。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卽是一例。不過彼時所謂家，大半有政治的社會的特殊的地位之士的家族，而自身爲家長者，在「周禮」及「禮記」上對於血統——及所謂宗的規定，是極嚴而且瑣細。「宗」有大宗小宗，大宗爲永久的存在，限以四代，率小宗且保持一定的身份。卽封建時代，血統、家、身分三者結托不可分的三位一體，以爲封建政權之保證。此時代，除士以外沒有自由民，而家族亦爲士所專有。至周末以手工業及商業之發達，引起貨幣的發生，誕生了地主階級，變換了以前封建制度之形式，乃有秦始皇之統一。經秦至五代，大半純爲軍事貴族之專制，而其統治之形態，亦較複雜，社會層之分化，亦有轉變。在社會上有自由民、半自由民、及奴隸三種。大概自由民爲商人、自耕農、小地主、及手工業者，其數目之增加，約在唐中世以後。半自由民爲貴族莊園勞動之農民、各種家僕及各種勞動者之一部份。奴隸則爲男女家奴，及各種勞動者之大部份，和從事特殊職業之一部份。以三種被支配階級中，佔多數者自然是半自由民，而彷效支配階級的家族制度、亦自然僅限於佔少數之自由民。

商業及手工業之相當發達，連帶增加了地主階級的力量，以之自由民的成份加多，而下

級封建勢力和統治的軍事貴族之衝突，亦加增長。同時以農業之不能長足進步，及手工業和商業長期停頓的前期的資本主義的狀態，受一切榨取階級的剝削，所發生的規則性的農業恐慌，歷次發現農民大動亂——其領導者，多有下級封建勢力——，漸漸顚覆純軍事貴族的統治，增加了下級封建勢力的政治勢力；如唐末五代之亂，即最好的一例。此後宋朝的建國，開創科學制度，乃演成了上級軍事貴族和下級封建勢力代表的官僚(由士大夫變化的)合作的統治。這些藉科舉以得官階的官僚羣，自然亦成了統治貴族結構中不可缺的一部份；然其身份，非世襲的保持，不過表面上是應科學之試，以「身登皇榜」者，而皇帝予以特殊的身分而已。然以此種階級性之取得，亦爲形成自動的家族制度的基礎。況以世襲貴族（上級的封建勢力）之動搖，不但增加了由莊園解放以獲得自由的半自由民之農民，而在唐代的農業經濟之相當發達，至宋代乃益充實。同時，由製紙及印刷術之普及，知識亦漸民衆化。統治者對此被統治者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進步，以及其維持統治勢力的社會秩序，乃得到一空前的推行宗法的家族制度以民衆化的良機。宋代學者雖然歎息宗祧古法之廢絕，實則其所廢絕者爲上級封建貴族時代的宗法家族制度，而至此推行及於下級封建勢力而使之普遍化而已。

自然宋代的宗法，與以前純貴族支配的時代不同；因彼時所必須保持宗族的原因，乃在於決定其人及其家族政治的及社會的身分。而此時已入於與下級封建勢力共同支配的時代，純維持身分爲主體的家族觀念，已經中斷。代之以起的，便是要維持其社會基礎的「新的普遍化的家族制度」。因之，以前宗法的傳統精神，雖生動搖，而其重心，反在民衆中發展了「家族制度」。假使當時統治者，對此種強制，取放任態度，則中國家族制度，早經沒落；而與其他先進民族，同步入開明之域，亦未可知。何故？此後統治者傳統的維持封建社會之秩序，皆在注重於家族制度之普及，以保持地方的治安。

並且統治者爲保持其經濟的及政治的乃至社會的要求，不得不求得佔有文化的優越。而所謂統治者之一要素的官僚階級，以通過科舉的資格，得朝廷所付與的特殊身分，自然成了維持文化、與獨占文化最適當的人物。況官僚階級與士大夫是相聯繫的，而士大夫、官僚、與地主等，又是相聯繫的。由這些成份，組成下級封建勢力的台柱；同時官僚階級，又以接近軍事貴族，反其自身之得有特殊的身份，係軍事貴族所贈予之故，故彼等思想，可以說是封建制度的靈魂。例如中國的文化，即是所謂「禮教」，而家族制度，即是「禮教」的精華。

因之彼等在鄉村利用社會的勢力，以監視村民之是否實行家族制度。村民之生活，自然受不住歷來指導者之縉紳的非難，只有屈服於有強制性的家族制度之下。

其次一切下級封建勢力，依封建國家所特予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優越，積蓄了財富，所以縉紳，實際上卽兼有「勢」和「財」。在中國維持家族制度，須要相當的經濟力量，尤其是華美的外表，非「勢」和「財」來裝飾不可。因此，縉紳的家族，卽可以爲誇示社會的榜樣。

此外被統治者之富有者，爲希求其生活的安定，亦要求其家族及宗族制度之維持。所以家族制度，在農業及手工業有相當發展，而沒有到衝破封建制度以前，是有相當的發展，可爲無疑慮的事實。

要之，中國的家族制度與宗族制度，皆爲封建時代傳留的制度之一；不過一則偏於下級封建勢力，一則偏於上級封建勢力。故歷史上任何時代，奬勵血族同居，所謂「五世同堂」的美德，由唐代至清末，皆爲被朝廷表彰的資格之一。民國以來，在法律上已強制父母在世的直系卑屬，有同居之義務，這當然在於家族制度之維持。同時又證明封建時代的家族觀念，

在最近以前，還沒有完全消滅。

三　家族制度與宗族制度

以上不過概述家族制度的發展，而現在要說明的，就是家族制度的內容，然後再分析其崩壞的趨勢。前文所說，中國的家族制度之成立，有兩個要素；一爲「宗」，一爲「家」。「家」是實在的基礎，「宗」不過抽象的存在。以有「宗」的觀念，乃能保障「家」的基礎，及其發展；以有「家」的觀念，乃充實了「宗」的內容。以祖先崇拜，和半宗教的血統觀念，以團結一羣同姓的宗派，爲「宗」成立的心理根據。然社會制度——或社會組織，缺乏物質的根據，其效用必薄，而其運命亦必短。宋以後「宗」僅抽象存在，唯一的基礎，卽爲宗族組織。宗族爲有共同祖先之家族集團，其本身爲有機的組織體。Y. K. Leong 君在其所著 The Internal Working of a Cdinese Village 中曾說：『一宗族之成員，常達數百數千，有共同的一個祖廟以祭其遠祖外，更有各家族分脈之低次祖先的廟宇。宗族中有富者和貧者，習慣上是以富者接濟貧者。又有全宗族共同的財產，其收入大概爲辦理祖先之祭祀及修理墓地的費用……宗族卽爲一巨大家族故，各員對祖廟當然有同等權利和義務。其義務爲遵奉宗族之習慣和德

義，服從各種儀式，一朝由外族來侵害同族中或者之權利時，加以援助，對宗族之長老，表示敬意，無道德上的過失而眞陷於貧困者，予以金錢的援助，關於宗族結社安危所繫，須挺身當之等等。平常須調整同族各員的行爲，有犯族規者須制裁時，在祖廟內揭示，此等行爲之規定和各種義務，則依長老會議厲行之。又各員有其義務相當的權利。……」此種說明，大體雖然不差，但現行宗族制度，係經過千餘年的歷史，因統治階級的變化，及時代演進，其間亦有許多轉換的事實。試以宋、明、清各朝代對於宗族制度的法則言之：而其取材，宋則爲「太上感應篇」及「太微功過格」；明代則爲「陰騭文」及「文昌功過格」；清代則爲「聖諭廣訓」。宋代以屬於草創時期，「太上感應篇」傳爲神宗（一〇六八——七八年）時代的產物，故其宗族制度，仍未成熟。該篇向民衆要求之二百項目中，關於宗族者僅（一）攻訐宗親；（二）輕慢先靈；（三）背親向疎者，有嚴格的禁止。因之親，不限於兩親，廣包血統關聯之親族，即是與宗族同意義。「太微功過格」，雖對家族道德，詳細明確的規定，但關於宗族，亦不及一言。明代作家憲、修系統，使宗族之關係，益流行廣遠而趨於複雜。此時代通俗道德之經典的「陰騭文」，及「文昌功過格」，除反映當時社會傾向外，最堪注意的，爲特別注意於

「敬老」「矜孤」「恤貧」以及貧富提攜，以求「宗族制度」之基礎，得以維持，而保全其社會秩序。「聖諭廣訓」爲清朝雍正帝，依照康熙帝所立之聖諭十六條，加以縯繹；關於宗族者，即其第二條之「篤宗族即以昭雍睦」，而其中心精神，亦不外藉維持宗族制度，以鞏固其社會秩序而已。在彼等的觀念，以爲構成中國民族，爲血族單位的家族，及地域單位的部落。然部落或以一個乃至數個宗族團體所構成，或以數個部落，構成一個宗族團體。因之，部落之自治，必須以宗族團體之自治，爲先決條件。而宗族內部之和睦，又爲地方自治的根本條件。雍正帝極力主張宗族和睦，除傳統的軍事貴族維持社會秩序之作用外，其政治意義，或者在此。

中國宗族制度既經統治勢力之道德上、法律上、信仰上之保證，和社會上制裁，乃層層束縛，牢不可破。乃透到下層民衆，支配彼等之生活，成了有無上權力的工具。此種制度，雖以時代之進化，使其威力有若何之消長，然宗族制度之特色，在中國民衆，直至清末，尚有充分健全的勢力，只要稍了解中國社會情形者，便可以知道。

宗族制度，在相當時期，雖發生了很大的作用，而爲統治階級維持封建的社會的秩序最好的工具。且依宗族的血統的結合，在其內部行互相扶助的習慣，以族長制度，支配族人之行爲，其能力竟超過國家法律以上。自然所謂族長，即是同族中的縉紳，或士大夫而年長者任之，族長之下，又有按族中宗序各支派，而產生相應之小領袖。故族中之組織非常嚴密，帶強制性的管理和監督，自然是很周到的。不過清朝中代，當和平發達以後，人口有相當的增加，漸苦於過剩，以致農村發生所謂收入遞減的法則，自然影響於包容族人之宗族制度的力量，不得不正比例的減退。況至滿清末代以國際帝國主義之侵入，漸漸破壞了中國堅固的農業及小手工業生產，使一般農民及小手工業者，漸漸失掉生活的憑藉。且以最近二三十年以來，以農業之衰敗所發生之農業恐慌，和相隨以俱來的天災戰禍、軍閥割據、土匪流氓之擾亂，人民之生活，已無法安定；是不但血統的宗族組織，不能維持，且其基構的家族制度，亦不得不漸漸動搖。

另一方面，因國際帝國主義之侵略所自然發生之精神和物質的刺激，引起社會層之變化和思想的轉變。於是以個人爲單位的利己觀念，以及根據此觀念而發生的自由平等思想，便

不得不首先對所謂「三綱五常」的宗法舊禮教，加以懷疑。很明顯的，家族制度的基礎，在於適應定住的農業之生產的需要；但現在農業本身（封建式的），已因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發生將近破產的形勢，一切人口，除一部份爲都市新興工商業所吸收外，其餘大部份，亦多散爲土匪、流民、或當兵、乃至逃亡海外，以及他鄉去謀生，不能死守着那一塊土地耕種，營以前之家族生活。而自給的家族生活，亦爲社會經濟力量所牽制，所謂「父母在不遠遊」的聖訓，也失掉其作用。家長的權威，亦因家族經濟的破壞，而減其成分。在「三從四德」所束縛於深閨的婦女，爲生活所逼迫，不得不現身於社會。且因其自己職業關係生活較能獨立，而提高了其在家族中及社會中的地位。是家族制度，已漸漸動搖；宗族制度，失却基構；乃更不得不日就崩潰矣。

上述的趨向，已漸漸顯明的擺在我們的面前，尤其是由民國八年起的「新文化運動」，已盛行了對宗法社會咀咒及「非孝」的呼聲，而社會解放運動、婦女運動、自由戀愛等等，在學生、婦女、及工人羣衆中，不斷發生，以學生之青年時代，對於家族及宗族組織，原爲卑幼者，反抗其壓迫的尊長，以自覺個人思想，本爲當然的事實。況以其青年好動的特性，易受

新思想的刺激；故對舊制度反抗的情感，容易發生。但青年學生的階級性是不確定的；因其自身並不是一個社會的階級，只是暫時的青年學生的特殊環境。一到其學生時代過去，而歸到其出身的或投入的社會層，即因其所處的社會層的利益，爲自己的利益。並且學生事實上多爲小資產者以上的子弟，彼等榮歸鄉里，或生活於都市，自然恢復了其宗族乃至鄉黨的關係，是很普通的。以此，其在學生時代所發生之詛咒家族制度的情感，必然漸漸的減少或消失。

婦女在家族的生活，是最悲慘的，這是每個中國人沒有不知道的事實。沒有出嫁以前，其父母兄弟，無不以「重男輕女」視爲固然，一切經濟權力，皆操之男子手中。且盛行賣買婚姻，其父兄可以自由處理女子，幾若商品。出嫁以後，則其翁姑之家族，亦有特別的壓迫，此種悲慘之境遇，幾不可筆述。如北京大學文學部所採集民謠中，曾有下列二首云：

一　男子去書房，女子去廚房；男子食雞臂，女子食猪屎。——廣東東莞縣

二　青石頭，響叮噹，我爹賣我不商量。賣的銀錢還了賬，不與小奴做賠妝。——陝西

因此婦女對於家族制度之詛咒，已有充分理由；而彼等表現詛咒之方法，最後却只有自

殺。在中國不僅婦人自殺，未出嫁女子之自殺，亦比他國爲多。這種事實，在社會上，已成了習見不怪了。又如廣東處女所組織之拒婚同盟，亦是家族制度黑暗之反映。最近一部中上級的女子，雖然比較容易得到求知識的機會，或竟得承繼遺產，不爲以前「女子無才便是德」之封鎖；但其教育並不健全，且限於有資產者。至社會之職業，亦雖有小部份的解放；然這並不是普遍的，甚至有許多仍不外於一種「娼妓式」的變形。所以現在的婦女，已視家族制度爲自身之枷鎖，毫無問題；且以矛盾之社會關係，亦不得不作社會運動之一員矣。

工人對中國現行家族制度，其利害和態度，與學生及婦女皆有不同。中國家族制度，是由「宗」和「家」兩個要素成立的。工人對家族制度，亦有兩種觀念：先以宗言之，在封建的純貴族支配之時代，宗必然的成爲一種固定官職及社會地位的工具；故宗族之制，始不過限於王室、諸侯、及士大夫世家。後以下級封建勢力增長，官僚階級力量加增，乃變更以前宗族成立之重心，而爲對共同祖先之崇拜，如雍正時代所提倡的抽象的血統觀念。而其最要者，以當時人口稀少，宗族組織互相扶助的抱擁力，可以實行一種社會政策的效果。但卒以人口增多，社會變革，直至今日，其主觀的要素，除抽象觀念外，已無實際基礎。尤其是對於受

資本制度生產關係支配的工人，既非家族經濟的生活環境，兼打破了盲目對於自然及祖先的迷信，自然宗族制度，在彼等純為贅瘤。至農民，近亦多失業轉徙，及遠去就其他農村之僱傭，亦對宗的觀念，漸漸稀薄。至若「家」，本為維持血統的主觀要素，和定住的經濟生活之客觀要素相結合。且在主觀的血統觀念之維持，當有「家」之財產承繼的物質動因。現在家之經濟財產，既漸漸破壞，血統觀念，自失其質的根據。至生活安定，本為「家」構成之重要原因；但工人之生活，既不安定，復不豐裕，尤不能負擔多人的生活。農民情形，亦大體如是。故以前家族制度盛期，祝福多生子女，而現在貧苦民衆，無不以子女之負擔為苦。甚至供給一妻子之生活，亦多不可能。故不但宗族制度的觀念，在工人之前，是非常渺茫的，即家族制度，亦覺十分的值得咀咒。

五　在法律上及習慣上所表現家族制度之動搖

中國家族制度之一根據的祖先崇拜，過去已普遍透到下層社會。無論任何窮苦之民衆，其家宅中最神聖的地方，即設置「祖先」牌位，及宗譜的神壇。其對宗族觀念，非常重視。例如「民事習慣大全」的親屬編中，曾敍述一習慣云：順昌（福建省）縣重家族主義。一姓之

中，由直系至所流傳之尊卑的字派，謂之家派；由傍系所流出分房之家派，謂之房派。宗派雖如何大，及其人口如何多，而在家派中對於房派的分別，還是很分明的。此所謂家派，即一般的大宗；房派即一般的少宗。家派即維持血統尊卑的意義。這種習慣，雖未完全在勞苦民衆間先洗刷盡罄；然彼等對於崇拜祖先的意義，亦完全不能自解。如試以詢之，則不過依樣仿效，否則受社會的裁制，抑或違反道德和宗教的信仰。可見此不過根據外來消極要求形式行爲，並沒有什麼內在的積極的物質基礎。因爲彼等自身，對於祖先崇拜，並沒有一致的理由。如此，則工人對維持血統觀念，自然趨於薄弱。這種事實上的表現，在習慣上和法律上都可以證明。例如第一爲關於養子之習慣；第二關於財產之承繼。但後者仍以限於有產者範圍，無關於勞苦民衆；現在僅就第一項習慣言之。

養子以其目的可別爲兩種：(一)嗣子；(二)養子。嗣子當承繼宗祧之義男。養子不承繼宗祧，爲異姓或同姓異宗之養子，嗣子當然限於男子，並必須同宗姓者，養子則不問男女。此種以往法律之精神，當然猶在於維持宗法制度。但宗族之小者，不能得合法的承繼，屢屢發生，而其演出之糾紛，亦非常多。爲緩和此種不便，乃由過去狹小的同宗關係，而擴充至

於同姓的範圍。雖舊法及舊判例絕對禁止異姓爲嗣子；但清末立案之「民律草案」，亦設例外：『若無子不欲立同宗兄弟之子時，可由左記各人中選定嗣子：

『(一)姊妹之子；(二)壻；(三)妻之兄弟姊妹之子。』此規定係破中國的傳統，頗遭批評，以爲是對於中國家族制度的逆叛。然實際上民國後，這巳爲司法官有力根據，是在嗣子上固守宗法的傳統，早露破綻矣。依照中國「民事習慣大全」及台灣私法所記，民間——尤其是工人間關於養子之習慣，卽可考察其如何與家族制度相違反之程度。

一　獨子出繼　「大清律例」禁獨子出繼，「民律草案」亦以「獨子不得出爲嗣子，但不限於兼祧」。然民間習慣，貧困之親，僅能養其獨子者。例如：「湖北省穀城縣之習慣，家計貧苦者，其子爲獨子，得爲他人之嗣子。」(民事習慣大全)而該省五峯縣之習慣，亦是同樣的(該書雜錄)。又依「台灣私法」：「在台灣同宗或承繼外親時，以獨子兼祧其生家和親族之家，而在獨子不爲生家所棄以爲他人之養子者適用之。但貧困不能自贍者，屢厮賣其獨子以爲他人之螟蛉子。」此種事例，在中國揚子江以南甚多，然華北以經濟的理由，亦或得成立相同的習慣。

二 異姓養子

異姓養子在「大清律例」爲絕對禁止者，雖「民律草案」斟酌條理和習慣，以求緩和，而其範圍仍甚狹隘。不過爲「民事習慣大全」所記異姓養子之例，在全國不遑枚舉。無子者以異姓爲嗣子的習慣，亦無列舉的必要，而尤其可異者，即迎異姓之子的習慣，並不限於無子之父母，且其數目有超過二人以上者。例如湖北省：『五峯縣，在親子之外，別養嗣子，一人之嗣子定後，更可以立多數之嗣子。竹谿、麻城、助等三縣，有親子復養嗣子，已立一嗣子者，可繼續立多數嗣子。其數麻城限三人、助縣限二人、竹谿則無限制。』（民事習慣大全）類似之習慣，在該省興山、京山、潛江、竹山等各縣，亦盛行（見該書）。此外在民間廢棄血統觀念，尚有很多證據。如陝西司法官所報告鳳翔縣之習慣於左：

四十歲以上無嗣子者，不得不迎嗣子，由其宗族中所選，或由外戚迎來改姓者亦有之；更有預約懷孕之他人的寡婦，產生後以爲之嗣子者，生女則爲壻，養子以繼自身之姓。此民間無識者不重血統之習慣，血統早將爲之廢棄矣。（見上書）

其關於異姓嗣子及迎多數嗣子之理由，約如下述：

安徽省廣德縣經洪楊亂後，人口耗減，因無子者不能在同宗中選出嗣子，乃多以異姓補充。以久有此種習慣，雖同族中有候補者，苟得族人之承認，亦得以異姓之子爲嗣子。又天長縣有無子者自善堂抱得嬰兒，或婦女爲謀老年生活之安定，以養女之壻所生之子，以兼其宗祧者。——見上書

在漳平縣下游一帶，家族觀念至重。各宗族以其規模宏大，威振鄉里。又宗族內各家族中，大家族亦比小家族較爲有勢。故不但無子者，即有子者，亦招養嗣子多人，以圖擴張其勢力。——見前書

此種多養嗣子以擴張勢力，大概係以中產以上之家族或宗族間爲多。又有廢棄血統觀念之一例，即在河南開封縣所發生者。即以誕生之小孩未滿一月而死者，私買貧家之小兒，冒稱親子，俗謂之買血姓(見上書)。此外關係於異姓養子，猶有一特殊習慣，名爲「死帶」者，「民事習慣大全」亦採錄有二例，爲山西及陝西所行之習慣，大致於左：

在寡婦再嫁時，若前夫所生之子幼而無養育者，不得不由母攜帶。此時在結婚契約書中，必附入「死帶」或「活帶」之條件。「活帶」則由後夫應支出之財禮中，扣去小兒之

養育費，迨生長後，則復歸本姓。而「死帶」則改後夫之姓，永遠不歸其家。如後夫無子者，大概多「死帶」。故「死帶」之男子，有承繼後夫一切權利義務；「死帶」之女子，由後夫爲之擇配偶——渭南、鎭巴、枸邑等縣習慣。

尙有山西苛嵐縣之習慣，後夫雖有男子時，「死帶」之男與其親子，皆附與同等財產承繼權，或後夫無親子時，則「死帶」之男子，且可以承繼其宗祧。

三　嗣子和義子　嗣子爲承宗繼祧者，固無問題，義子則雖可分配遺產，然以與養家發生家族關係爲原則。例如河北地方所行習慣，有下述報告：

河北地方之俗語：謂有「義子沒有義孫」，其意義卽以義子係由異姓待來，沒有發生親子關係。卽含有視義子爲「非我族類」的意思。然義孫以生於自身之家，一方面爲義子之血脈；一方面由情誼上已變爲親身之孫矣。

是嗣子義子間，以宗法精神言，有如此嚴重區別，中產以下之社會，乃反用這個觀念，以傾向於擴張選擇養子的範圍。卽是習慣上以異姓納爲嗣子，多爲宗族內部所反對，乃先納入義子，到相當時間，直立爲嗣子。例如：

熱河特別區凌源縣習慣，義子以情誼結合，發生親子關係。義親多以宗族中無可納爲嗣子，且愛義子，與之保持長年相互扶助的關係，兩者間情誼，實不異於親子。因之義親有財產者，除養老及埋葬之費用外，由義子承繼。更有以異姓之義子以爲嗣子之習慣，例如：

陝西郃陽、華陰、洋各等縣習慣，民間老而無子，缺乏扶養，皆以自己意志，求族人了解，立異姓之義子爲嗣，承繼其全部財產。

且有不僅義子，藉異姓之養子，直如嗣子，承繼財產者，例如：

綏遠特別區歸綏縣習慣，男女三十歲以上無子時，抱養異姓之幼兒，承繼其財產及宗祧。故其身分，與嗣子相同，此後即生親子，養子仍可分配其財產。

四　女子之承繼權　現在經政府通令，女子有與男子同樣之財產承繼權，固可謂財產承繼上一大變革；然中國以往之習慣，係承繼宗祧和承繼財產，有嚴格區別。承繼宗祧者必兼有承繼財產權，而承有財產則與承繼宗祧，可以獨立進行。承繼宗祧，很有台灣私法第二卷第六章第一節所謂：『以男系主義、直系主義、嫡長主義以爲宗子者，必其父祖之

直系卑屬，因不能不辨別嫡長地位故也。』不過這個傳統的原則，僅很少數的貴族式的家族而已。此種承繼宗祧權內容之變化，如前所述，其重要原因，係宋代以來，與重要實質利益相伴隨之故。以前因在嫡長地位者，附隨血統，保證其承繼政治的或社會的特權，故以「一脈相傳制」爲確定不移的原則。嗣以下級封建勢力增長，財產之承繼，變爲衆子均分制，乃以此實際利益之分配，反映於宗祧之承繼，使衆子均分之原則，排斥以前一子相傳之傳統，而成爲全國習慣。此種變革過程，可以影響於承繼宗祧之滅亡，並可以動搖大家族制度血統觀念之幹骨，而代替夫婦關係的小家族制度。於是，乃不得不必然的使女子在家庭的地位，引誘向上。以往的律例，自然不承認女子的承繼宗祧權。而關於承認財產承繼權，却有例外的規定。妻之承繼權，限於被承繼人之親生子孫及嗣子爲有效，女子承繼之順位，妻則次於姦生子(台灣私法第二卷第六章第二節)。中國「民律草案」，沒有特別規定承繼宗祧，但關於承繼財產之正當承繼人，規定了左列的次序：

一、夫或妻；二、直系卑屬；三、親兄弟；四、家長；五、親女。

其理由書，則分爲財產之承繼，和宗祧之承繼。宗祧之承繼，以唯限於被承繼人之直系

卑屬，若被承繼人沒有子孫時，則宗祧中絕，但承繼遺產，可斷其與承繼宗祧沒有關係。此以宗法精神觀之，不得不謂之當然。可是依「民事習慣大全」，在湖北省內，亦有女子承繼宗祧之習慣者。如：(一)漢陽、竹谿、與山三縣，無子女且族內無相當昭穆男子，可以宗族內相當昭穆之女子爲嗣子，(二)潛江無子女及相當昭穆之男子，可以女子爲嗣子，爲之配壻。此種事實之例甚多，殊值得注意。

結論

總之，過去中國大家族制度之發生，無非根據經濟背景和生產條件及其關係，與封建制度樣，完全係中國社會的產物。不過以大家族制度之成立，又爲封建制度有力的社會基礎。而根據大家族制度所發生之宗法觀念，亦爲社會道德上的牙城。中國家族制度，始僅限於上級封建勢力，爲保障其世襲特殊身分的工具；嗣以手工業及商業資本之發展，推動下級封建勢力之進步。一方面動搖了上級封建貴族所固定的身分，減少至最低限度；一方面又根據其生產關係、經濟條件、普及家族制度於中下的社會。不過還是以社會關係之變化，引起家族關係之變化，使家族重心，漸漸有單純血統關係，移於財產關係，已在習慣上和法律上找到

了許多根據。尤其最近以國際帝國主義之侵略，引起舊社會生產之破壞，農業凋落，和刺激工商業之相當的發達，乃使個人爲本位的思想，和完全以實利爲中心的小家庭制度，漸漸展開。同時，不得不漸漸宣佈大家族制度的死刑。不過小家庭制度是否達到人類組織之終極，這就看生產關係之社會化，和社會運動之進展，到如何程度才能決定的。本文以篇幅限制，不能詳盡，祇好就此截止了。

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

全一冊　實價一元八角

著者　陶希聖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寶善里

印刷者　蔚文印刷局
上海東蒲石路一八六I
電話三三〇四三

代售處　各埠各大書坊

民國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實價八角

恩格斯著　李膺揚譯　在社會科學名著譯叢中，出版這本名著的意義有兩方面。第一在使讀者認識歷史的唯物論的具體論據。第二在使讀者引起研究民族學的端緒和興趣。在這兩種意義上，沒有比這本書還適宜的。牠是歷史唯物論的宗匠所著作的。牠又根據民族學最初最有系統的名著——莫爾干古代社會——而下筆的。時至今日，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論是權威最大，受批評最多的學說。莫爾干的古代社會也是權威最大，受批評最多的名著。結合兩者的本書當然更是權威最大同時受批評最多的了。本書局在社會思想方面將繼續刊行各派社會主義者的名著，在民族學方面亦將刊行各派——進化論者，傳播論者及批評派——名家的著作。這本書便是兩個計畫的要點。

國家論

實價六角

奧本海馬爾著　陶希聖譯

由無國家的社會，怎樣發達為封建國家及近代立憲國家？要解答這個巨大問題，只有集合世界史以及世界史所未述的民族學的資料，而後以正確的方法來叙述。本書便是負擔這個使命，而能夠完成這個使命的十萬言小册。各國文字均有譯本。中文迻譯，此為初覩。譯者並有長篇序文，介紹本書的要義。

辯證法與資本制度

山川均著　施伏量譯　實價三角

唯物辯證法是研究一切自然現象及社會現象的科學方法，資本制度是我們現在生活着的社會制度，這二者都是一切現代人們所應當知道的。這本小册子，以極巧妙的方法，極淺顯的文字，扼要地說明這二者是什麽，為最便於初學的入門書。著者是日本社會科學界的一大權威，譯者亦是多年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其可信賴是不待言的。

進化論與階級問題

陳寶驊　邢墨卿合編　實價三角

本書分進化論與階級問題兩篇，進化論言生物以物競天擇而進化，然時至今日，人類間之生存競爭，亦幾與生物無殊，資本主義逞其剝削，無復可以制止之力，於是乃有階級問題，此階級問題之解決，其即人類世界大同之始歟？

蘇俄政治制度

施伏量譯　實價九角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聯邦，究有何等嶄新的政治制度？何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主權何在？中央及地方蘇維埃組織如何？中央政府構造如何？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各部及其職權如何？經濟與勞動的管轄機關如何？民族事務的機關如何？這些問題是研究蘇俄者所欲知，而都詳細縷陳於本書。本書爲日本政府機關精密編審，所收羅者大抵爲蘇俄有權威的公法學家論著中的材料。

蘇俄十年來之外交

亞那特著　胡慶育譯　再版實價五角

本書叙述蘇俄一九一七年革命到一九二七年的外交，如蘇俄革命後之國際交涉，蘇俄的國際政策與外交方針，和蘇俄與英美法意日及其他鄰邦的關係。並於末二章中說明蘇俄與半殖民地國家及中國革命過去的關係。蘇俄是西歐與遠東國際關係之鍵，有此一書，則不啻此鍵之鑰。譯筆流暢，尤是特色。

蘇俄黨爭之解剖

高晶齋著　實價五角

蘇俄共產黨現在標榜着無產階級專政，統治着俄國，究竟其政策是怎樣？因政策之不同，而政府派與反對派，右派與左派的鬥爭是怎樣？本書於此，原原本本，詳述靡遺，欲知蘇俄內情者，應讀此書。

歐美無產政黨研究

藤井悌著　施伏量譯　實價六角

世界的勞動者已從日常生活上互相扶助，進于經濟鬥爭，再進于政治鬥爭。政治鬥爭的組織便是無產政黨。施先生既編輯日本無產政黨研究。又譯成本書與此相並，而世界各國無產政黨，已可有正確的概念。本書緒論對於勞動運勞如何發展，國際社會如何分歧，有扼要的說明。本論計六章，對於德、法、英、意、美各國社會黨，及各國共產黨中最有力的俄德共產黨，作歷史的叙述和現狀解剖。

日本無產政黨研究

施伏量著　實價五角

澎湃的日本農工政策運動是日在發展之中，中國的報章雜誌雖不斷的有記載，然其能系統的詳述起源派別及發展形勢者，實屬難得，卽在日文書報，亦不易得其頭緒，本書之出，實可說是應着此迫切的需要的。




新生命

